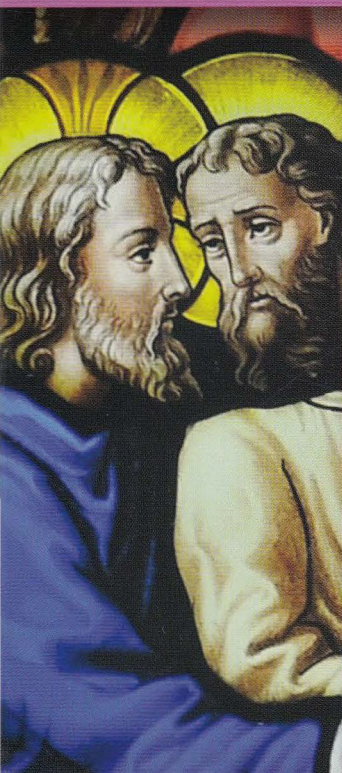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 卷四 /

天主教史



穆啟蒙 / 編著
Joseph Motte, S.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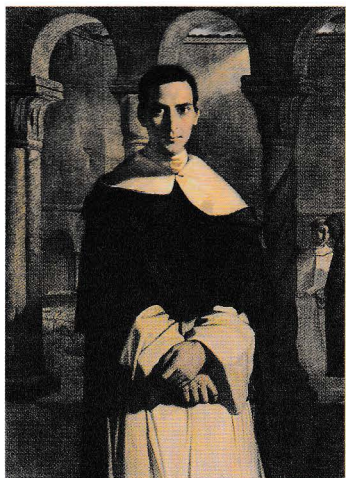
侯景文 / 譯



▲1962年10月，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於聖伯多祿大殿開幕，歷時三年；梵二的成就很多，但對普世教會來說，最重要的一點，莫過於「一個羊棧，一個牧羊人」的大公主義。



- ▲ 碧岳七世 (Pius VII) 曾為拿破崙加冕，但最後因拿破崙的野心，使得教廷和法國的關係決裂，並將教宗囚禁於法國，企圖使教宗屈服，好讓他能統治奉教的世界；而在拿破崙一連串的軍事失利之後，教宗終於得以離開法國，返回教廷。



◀拉高爾代 (Lacordaire) 是拉梅內的得意門生，具有過人的口才，被視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教會演說家。



◀紐曼 (Newman) 樞機原為英國聖公會牧師，為了復興教會原始的純潔而著手研究初期教會的歷史及教父，最後決定放棄英國國教，並在羅馬領受鐸品。因紐曼對改教的認真以及他的聲望，使得許多人也改信天主教，史稱「牛津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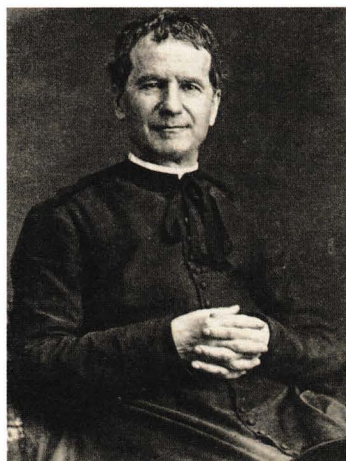
▲碧岳九世（Pius IX）在位三十二年，是在位最久的教宗，這段時間教會也充滿著動盪不安的氣氛；但碧岳九世在位時，不但裁定了聖母無染原罪的道理，也對近代所產生的許多謬論發表通諭以示譴責，還召開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確定了教宗的「不可錯誤」特權。



▲ 良十三世 (Leo XIII) 在位時，發表了許多和信條或倫理有關的通諭，把福音不變的原理和原則，貼合在這個經常變動的世界中；並且針對這個正在要求更多自由的世界，提出了教會的「因應之道」：不是一味反對接受新思想，而是要分清楚什麼是可以接受的，並且應把基督的精神灌注在這些可接受的事實中。



▲ 聖碧岳十世 (St. Pius X) 在位時，除了保衛教會的獨立自主和信仰完整之外，也一反以往的風氣，要求信友多領聖體；同時還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編定「聖教法典」，並恢復國瑞聖樂應有的地位。而碧岳十世也是自碧岳五世以來，第一位被列入聖品的教宗。



◀ 聖鮑思高 (St. John Bosco) 被稱作「孤兒之父」，在杜林擔任副本堂時，認清了成千上萬被遺棄的兒童們在身心靈方面所面臨的危機，便決心為兒童服務。除了收容之外，還創辦了許多教育及出版事業，以培養兒童自力更生的能力。



◀ 賈爾定 (Joseph Cardijn) 神父出身於勞工家庭，於是矢志為勞工服務，創立了公教職工青年會，在獲得教宗碧岳十一世的鼓勵之後，公教會有了迅速的發展，在各種環境中培植教友，而這些教友也有不少後來成為社會的中堅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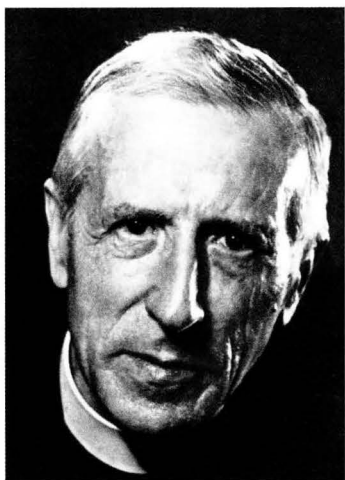
▲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在位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他雖致力提倡和平，卻被開戰雙方指為袒護對方，對他的斡旋自然也不願接受，於是他便盡力減輕戰爭的災禍：收容救護、說服雙方善待戰俘、救濟饑荒；而即使戰爭使得世界情勢混亂不安，本篤十五世仍然公布了自碧岳十世起所編訂完成的「聖教法典」。



▲ 碧岳十一世 (Pius XI) 在位期間的偉大理想——「在基督的王國內建立基督的和平」；而基督不但在個人心中為王，也是普世之王。碧岳十一世據此建立了「耶穌君王瞻禮」；除此之外，教宗和墨索里尼所簽訂的「拉特朗條約」，也保障了教廷的領土和聖座的無上權力，同時解決了懸宕已久的羅馬問題。



▲ 碧岳十二世 (Pius XII) 在位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教宗不但請求交戰國勿在羅馬作戰，並且開放宮殿，救助各地傷患；教宗除於烽火中領導教會有功，更使人領略天主教道理的淵博，除了宣布聖母升天的道理外，還藉著四十多道通諭闡明了基督的妙身、聖心、禮儀、研究聖經和傳教等問題。



◀ 德日進 (Teilhard de Chardin) 神父為耶穌會會士，是一位地質學家，也是一位古生物學家，不但對北京人的挖掘有特別貢獻，並將科學與信仰結合，揭諸生物進化的目的，是把由天主的愛所創造的宇宙，重新引歸造物主。



▶ 雷鳴遠 (Vincent Lebbe) 神父為遣使會會士，中國籍修會「耀漢小兄弟會」的創辦者，在中國傳教時力求「中國化」，在抗戰時期還帶領耀漢會弟兄所組成的救護隊到前線去救護傷患，讓社會不再視教徒為「漢奸」，轉而承認他們是真正愛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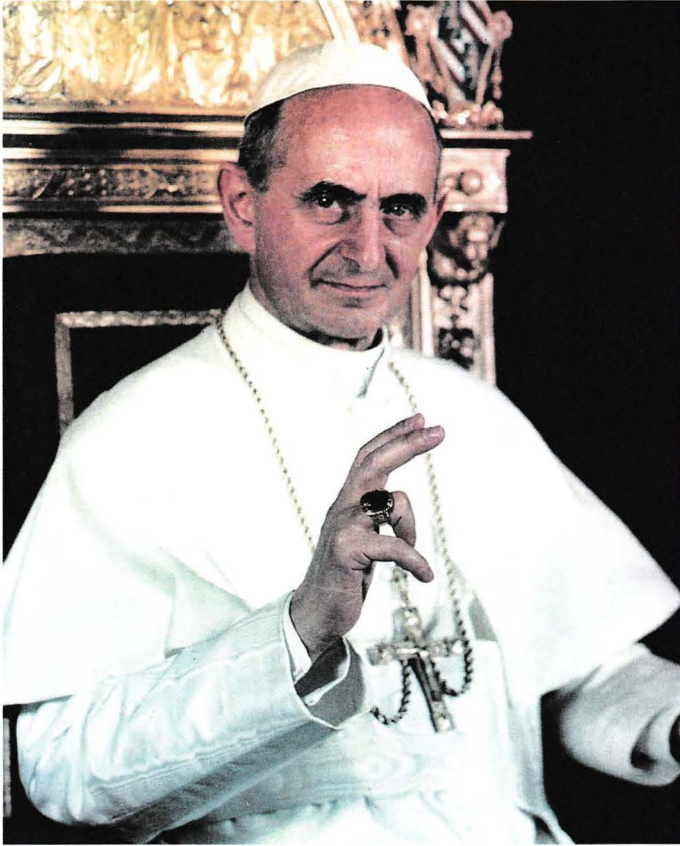
▲拉維熱利主教 (Mgr. Lavigerie) 曾在黎巴嫩小住三個月，因見到回教徒屠殺基督徒，激起他傳教的熱誠；後來聖座把向撒哈拉沙漠傳教的任務委託給他，因著一次非洲瘟疫橫行，主教在非洲建立了收容和教育機構，並創立非洲傳教會，成為非洲傳教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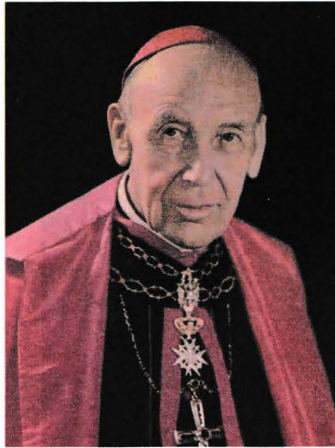
▲發豔主教座堂為陳文六神父於1877年至1895年所建，位於今日的北越，當時的越南稱為「東京」。



▲ 若望廿三世 (John XXIII) 為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發起人，性喜簡樸，取消了一些不合時宜的鐔節和排場，並且大幅增加樞機的人數；祝聖非洲聖人為樞機是他的創舉，而菲律賓的第一位樞機也是由他所祝聖。在大公會議尚未結束時即逝世，世人不分教友、非教友，同聲哀悼。



▲保祿六世（Paul VI）繼承了若望廿三世，他樂見大公會議能順利結束，同時他親自前往耶路撒冷朝聖，是兩千年來第一位離開歐洲的教宗；另外還成立了「無信仰者協談委員會」，希望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把真理傳達給不信天主的群眾。



◀ 伯雅樞機 (Card. Bea) 為「合一祕書處」的首任祕書長。他是一位學養豐富的聖經學者，並且精通多種語言，由於他的活力和若望廿三世的聲望，使得大公主義得到熱烈的迴響。



▲ 1964年1月，教宗保祿六世前往耶路撒冷朝聖，這是伯多祿的繼承人首次返回聖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特那哥拉斯 (Athenagoras) 在知悉此事後，便表示願意到耶路撒冷和教宗會面，這是對方邁向合一之路極為重要的時刻。

天主教史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 卷四 /

穆啟蒙 Joseph Motte, S.J. / 編著
侯景文 / 譯

 光啟文化事業
Kuanychi Cultural Group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ol. IV

By Joseph Motte, S.J.

Translated by Joseph Tarc Hou, S.J.

Chinese Copyright © 1967, 2016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第三期：近代教會（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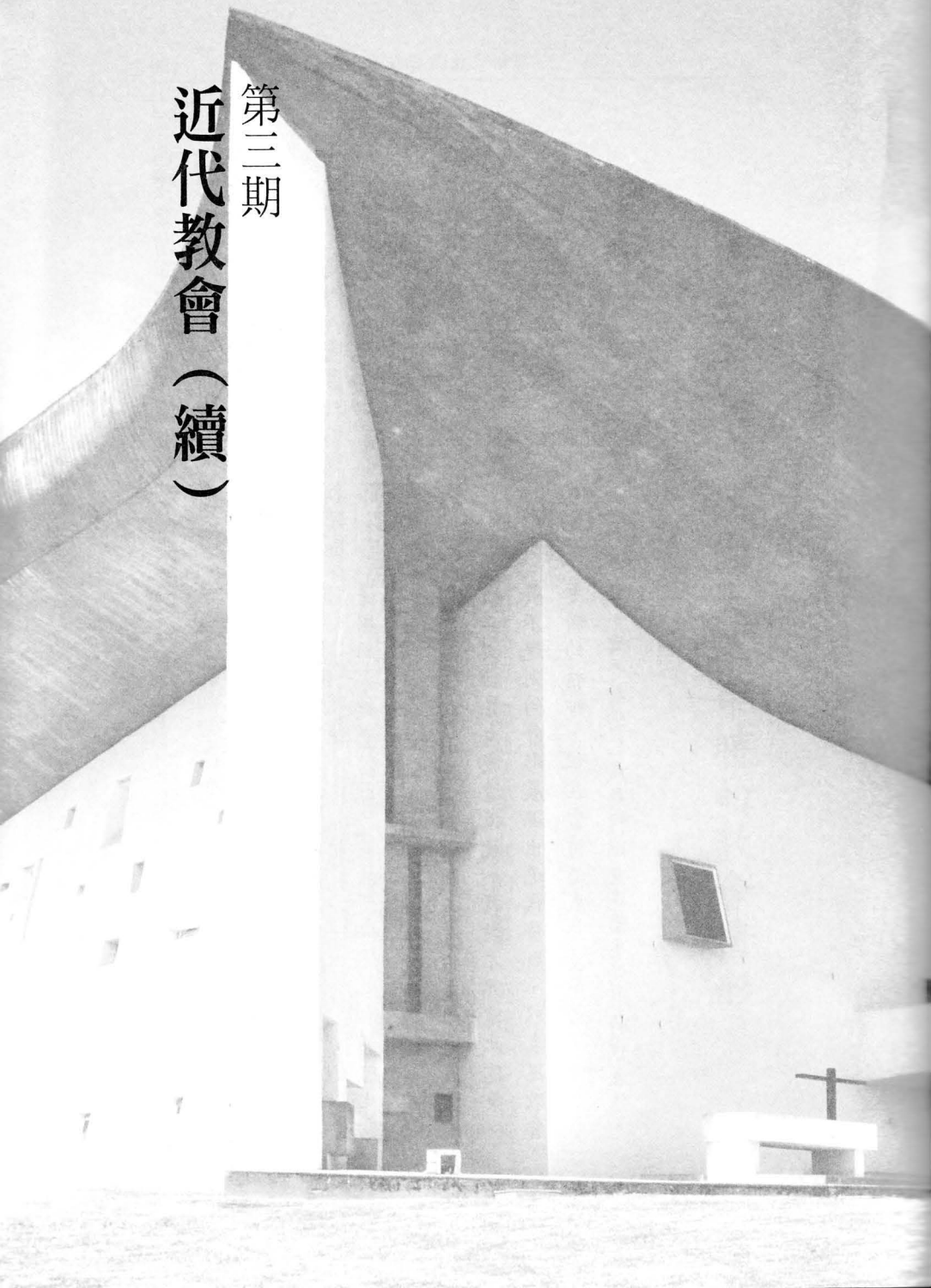
第二十章 法國大革命時的教會情形	0 2 5
壹 革命的起源	0 2 5
貳 宗教革命	0 2 9
參 法國以外的革命	0 3 8
肆 拿破崙與教會	0 4 0
伍 革命的總結	0 4 8
第二十一章 天主教在十九世紀前期的復興	0 5 3
壹 法國教會的復興	0 5 3
貳 德意志天主教的復興	0 5 8
參 天主教在大不列顛的復興	0 6 0
肆 天主教在美國	0 6 5

第二十二章	自由主義時代和教宗碧岳九世	0	6	9
壹	思想自由	0	7	0
貳	政治自由	0	7	4
參	自由經濟政策	0	7	9
肆	教宗碧岳九世與羅馬問題	0	8	2
伍	碧岳九世對教義的功勳	0	8	7
第二十三章	自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至第一次世界大戰	0	9	5
壹	現世主義	0	9	6
貳	教宗良十三世	1	0	2
參	教宗聖碧岳十世在位期間	1	1	4
第二十四章	教會在十九世紀的內部生活	1	2	1
壹	神職界的重振	1	2	2
貳	靈性生活	1	3	1
第二十五章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至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1	4	5
壹	教宗本篤十五世	1	4	6
貳	教宗碧岳十一世	1	4	9

參	碧岳十一世的重要奮鬥	158
肆	教宗碧岳十二世	175
伍	二十世紀教會的內在生活（一九一四—一九六二）	183
陸	大公主義（至若望廿三世止）	193
第二十六章 十九與二十世紀的傳教情形		
壹	概觀	205
貳	非洲傳教	217
參	美洲傳教的情形	230
肆	太平洋區的傳教情形	239
伍	亞洲傳教的情形	246
第二十七章 十九及二十世紀天主教在中國的情形		
壹	教難時期（自一八〇〇至一八四二）	267
貳	不平等條約時期	273
參	茁壯時期	283
肆	鐵幕內的教會	296

第二十八章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319
壹 若望廿三世：大會開幕（一九五八）	319
貳 保祿六世及大公會議圓滿閉幕	331
參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與大公主義	341
結論	347
人名中文索引	355
人名英文索引	370

第二期
近代教會（續）



前頁圖片說明：

法國廊香教堂（Ronchamp）由建築大師柯比意（Le Corbusier）所設計，位於法國東部近貝爾福（Belfort）的山丘，在那裡原有一座朝聖教堂，因二次世界大戰遭摧毀，戰後才興建此建築。其不規則的外形展現出現代藝術，以表現教會更新的精神，但在當時造成許多爭議。時至今日，廊香教堂已成為柯比意建築生涯中的代表作。

第二十章 法國大革命時的教會情形

壹 革命的起源

法國的革命，使當時在位的教宗和教廷，感到意想不到的震驚。公元一七七五年所選出的教宗碧岳六世（Pius VI，在位期間 1775-1799），深為羅馬民眾所愛戴；他是一位愛好豪華的教宗，大興土木，美化了羅馬城；他也是一國的元首，他的國土占據著義大利的整個中部，而且他活力充沛，奮發有為。自表面看來，他的權力穩定無慮，萬想不到威脅會來自法國。

法王路易十六世（Louis XVI，在位期間 1774-1793）是一位虔誠的信徒，素有盛德之名，他得以繼承王位，人民甚感興奮。當時國事固然甚為紊亂，亟待整頓的弊端也不少，不過人們總認為可以和平解決。當時政府所面臨的，是嚴重的財政危機，但對整個國家而言，還相當富裕繁榮，國王於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適時召集了三級

會議 (Estates-General) · 神職界、貴族和人民三個階級的代表齊集於凡爾賽宮，會商解決危機的方策。會議是以宗教的儀式開幕，代表們先遊行全市，繼而在主教座堂參加大禮彌撒，因為天主教是法國的國教，人民的信仰也很熱誠。

誰料想得到五年之後，法國的君主專制竟被廢除，國王和王后都走上了斷頭臺，貴族非死即逃，教會的財產充公，神職人員被捕或逃亡，甚至一個象徵「理智」的女伶竟被推上了主教座堂的祭臺，三級會議的許多代表也做了斷頭臺上的犧牲呢？假如事前有人說出這樣的預言，人必嗤之以鼻，決然無人置信。

何況這樣慘烈的暴風雨所引起的波浪，又延續了那麼長久，絕不可能無深遠的原因。這些原因，聰明的觀察家早已辨認出來：一方面是由於當時法國的社會不安，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半世紀以來所謂「哲學家」所散布的自由思想。

革命的社會原因

自封建時期以來，法國的社會便分成了三個階級：神職界、貴族和第三階級。這種區分與當時的觀念相符合，並不顯得逆耳刺目，而人民所不滿的，是高級神職人員和貴族所享的特權：他們不但擁有國內大部分的土地，而且還不用納稅。神職界所領的國家公費固然由自動捐獻去補助，可是他們還向信徒收繳所得十分之一的

稅捐。這種特權的享受由來已久，原本的理由是：貴族須負擔國防的費用，但到了十八世紀，貴族已無需單獨負擔軍費了；至於神職人員呢，他們還能部分地自圓其說，因為他們的收入不但供給敬禮天主的費用，還支持一切的學校和慈善事業，如醫院、救濟院等等。這些事業是由教會建立的，也由教會負責，政府是不管的。但在神職界本身，卻有令人看不下去的不平等。在革命時期，法國的主教都是貴族出身（這不是教會的規定，而是逐漸形成的慣例），但是最使低階神職人員（本堂和副本堂）不滿的，是他們微薄的待遇，和高級神長（主教和修道院院長）無比的奢侈富厚，真是判若天壤。

國王路易十六世同他的大臣們，多次試圖改革國家這種畸重畸輕的狀況，但因特殊階級的盲目固執，始終反對削減他們的特權。

哲學思想的影響

特權階級的這種固執，經過半世紀以來「哲學家」宣傳反對的思想，更顯得不合情理了。這些思想中有一種逐漸贏得了各階層的認同，不但是伏爾泰（Voltaire）和盧梭（Rousseau）的中產階級讀者，連農民和工人大受影響：那就是平等的觀念。大家對特權階級已無法容忍，認為他們已沒有存在的理由，急欲將它鏟除。

到此為止，還沒有什麼反宗教的事，只是合理地要求社會改革，而低階神職人員也只是發出不平之鳴而已。

特權的取消

一七八九年路易十六世召集「三級會議」以解決財政的困難；但不久代表們便要求改組為「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給每一位代表一個投票權，表示他們願意參與政治，給法國制訂一部新憲法。

事態很快地惡化，七月十四日巴黎的民眾羣起暴動，佔領了那個象徵專制權力的巴士底要塞與監獄(Bastille)。變亂隨即波及各行省，一時謠言四起，聲稱有土匪來侵，外寇已臨境；於是民眾幻想大禍將至，便瘋狂地騷亂起來，搶劫、屠殺、放火，亂成一片。

國民會議大為震動。為了平息眾怒，突有一貴族聲言放棄其一切特權，這樣一來，所有代表都如同感染了熱症一樣，主教和貴族都在一種帶有傳染性的興奮中，自動放棄了社會階級的區別：貴族放棄了封建特權，神職人員放棄了十分之一的稅收，彼此爭先恐後地自我剝削。於是各位代表齊集王宮聖堂，共唱了〈我儕讚頌吾主〉(Te Deum)的歌詞。

他們在散會之前，且通過了一個「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宣稱「人民至上」、「所有國民皆一律平等」、「言論自由」、「宗教寬容」。所希望的改革已實現，封建已取消，法國公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革命似乎已告結束。然而革命所激起的浪潮，仍繼續動盪，而且日甚一日，馴至釀成反對宗教的大騷動。

貳 宗教革命

革命的箭頭，到此為止，只指向政治的改革，並沒有反對教會的趨勢，神職人員且予以支持；此後便惡化至迫害教會了。「人權宣言」固然宣布了「人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寫在紙上的自由，尚不足以保證事實的自由。領導革命的魁首都沾染了反宗教的思想，他們不信啟示，只信人類的理智；否認天主有宰制人良心的至上權威，而代之以「人民至上」¹，事實上是黨的專橫獨裁，自以為是負責領導人民臻至幸福。他們的組織也很堅強，都團結在所謂「俱樂部」之內，魁首們的意見就是「公意」；他們發行日報，散布傳單，鼓勵選舉；往往製造暴動，以便威脅國民會議。這個政權囂張的頂點，就是歷史上所稱的「恐怖時代」(Reign of Terror, 1793-1794)，其間最嚴重的是「革命法庭」和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的獨裁，那

時經常豎立著一架斷頭臺（歧約坦〔Guillotine〕），作為政府的殺人利器。

這個執政黨馴至假借人民至上的名義，給法國加上了一個宗教性的政治，違反大部分人民的意願：先沒收了教會的財產，之後試圖在法國造成裂教的局面，最後想消滅一切天主教的信仰。不過這些努力，因神職界和人民的抵抗，終告失敗，因為他們大部分都堅信天主教。

沒收教會財產並勒令修士修女還俗

神職人員雖然放棄了他們的特權和十分之一的稅收，但仍舊保留著他們的財產。國家的財產卻異常短絀。當時有一位本無聖召而貿然加入神職界的主教，名叫戴來郎（Talleyrand），他主張將神職界的財產盡行沒收。這個提案於一七九〇年十一月二日在議會投票通過，不久教會的財產便發交拍賣。這項措施便宜了以廉價購買的人，而使他們成了令他們致富的政權的黨徒。

沒收財產，不久便導致了修道院的關閉，因為修士們既喪失了財產，自然無法生活下去。何況所謂「哲學家」更視他們為無用的閒漢，視發聖願為違反人權，因而予以禁止。故此派員到各修道院去，詢問修士修女，是仍願意留會內抑或出會還俗。有許多冷淡的修士放棄了修會的生活；反之修女們，除少數的例外，大都忠於

她們的聖召。仍願作修士修女的，都被集中在幾座建築內，各修會會士混雜在一起，空出來的會院全被拍賣。

對神職界立法

神職界的財產被沒收，無論如何不合法，教會固能容忍，但使教會與革命勢不兩立的，卻是所謂的「教士公民組織法」(*Civil Constitution of the Clergy*, 1790，簡稱教士法)。國會代表想改組教會，但最低限度，理應與教會的元首教宗磋商，何況一五一六年教宗與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 1494-1547)，對在法國的教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早有協議。可惜國民會議的立法委員，大半對教廷持強烈對立的態度；他們原來都是法蘭西主義者，一生為增強國家的權力、削弱教宗的權力而奮鬥。這項法律的主要條款如下：

教區重行劃分而予以歸併減少；這種改革還不算太嚴重，如果能同聖座協調，教宗還能接受；然而其他條款則萬難接受，即：此後主教及本堂神父應由人民（包括基督新教和猶太教徒）選舉；主教應由首席主教領受神權，而不再由教宗；主教及本堂神父應宣誓遵守此一法令。

這樣一來，吾主耶穌所建立的教會聖統便被推翻了：教宗對主教、主教對本堂

神父都喪失了權力，本堂神父勢必要受選舉人的控制。這是輕重顛倒，將教會的神權置於國家政治的權力之下，結果教會便成了國家的工具。

不過按照新憲法，法律須經國王批准後始能生效，因此要看路易十六世打算怎麼辦了。他一方面看清了這項法律所含的危險性，另一方面倘若他拒絕批准，又怕給教會招致殘酷的後果。他畏首畏尾，無所適從，乃向教宗請示。羅馬在數月之後才予以答覆，內容是請他不要簽字批准。但已太遲：國王因不堪左右的威脅壓迫，已簽字批准了。

對法律忠實的誓詞

神職界對這項不義的法律，大都持消極抵抗的態度。國民會議對這無言的反對非常震怒，議決在八天之內，所有主教及本堂神父均須宣誓遵守法律；拒絕宣誓者將遭到革職的處分，倘仍繼續行使職權，便以擾亂社會秩序論罪。這樣一來，便沒有閃避的餘地了。

政府對教會這種越俎代庖的拙劣作風，給教會和國家都招致了極殘酷的後果；擾亂人的思想，使國家分成兩個不能妥協的壁壘，因而激起了內戰。

一百三十一位主教中，簽字宣誓的只有四名；其中有戴來郎，他祝聖了許多位

主教，那些由他祝聖的，又轉而祝聖了其他主教；就這樣形成了一個裂教的系統。神父中有半數以上拒絕宣誓；其他的，或由於怯懦，或由於不忍坐視自己的教友成為無牧之羊，只好簽字宣誓了。但在宣誓的人中，當教宗明令處罰這種組織為裂教時，許多人又打了退堂鼓。

神職人員由此便分成了「宣誓」和「拒絕宣誓」兩個陣營。大致來說，教友都拒絕由宣誓者的手中領聖事。幾個月後，未宣誓的神父又開始行聖事作彌撒，但不敢在聖堂內公開舉行，而是在私人的宅第；可惜不久他們便被視為國家的仇敵，被判驅逐出境了。國王拒絕批准這個法令，激怒了教會仇敵，於是一發不可遏止，革命政府首當其衝。一七九二年九月，瘋狂的暴民闖入巴黎及其他城市的監獄，將被監禁的囚犯統統屠殺，大約有一千四百多人，其中有兩百多位神父；他們假如肯宣誓，便能保全性命，但他們寧死不屈？。

於一七九三年，法國西部的農民羣起反抗，要保留他們的「好神父」（不肯宣誓者）。雖被革命軍戰敗，卻仍繼續作游擊戰，直至政府承認他們有權利保留他們所選擇的神父，並自由實行他們的信仰為止。

企圖鏟除宗教信仰

從此革命分子便日甚一日地表示反對宗教。無神主義者決心領導實行，他們的目的顯然不只是壓迫天主教，使之就範，乃是根絕一切宗教信仰。他們從取締使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國瑞曆（Gregorian Calendar）著手，正式取消教會的主日瞻禮；為消滅主日的痕跡，將七日一週改為十天一「旬」。嗣後又採取更加嚴厲的步驟：關閉一切教堂，其中有些被徹底拆毀，「以便鏟除宗教狂熱和迷信的痕跡」；主教座堂及修道院自古以來所保存的藝術傑作，皆遭劫掠，聖像被搗碎、祭器遭銷毀。藝術傑作的損失實在無法估計。

凡不願宣誓守法的神父，非死即流亡，為數有三、四萬之巨，他們由法國逃到國外去避難，概皆生活非常困難。最堅強勇毅的，仍留居在自己的教友中間，銷聲匿跡，冒著生命的危險，繼續照顧自己的羊羣。

宣誓的神父們，開始渥蒙優待，但不久也身陷苦境。在「哲學家」和無神主義者看來，他們不也是「宗教狂熱」和反動的支持者嗎？他們不也是遵守迷信的敬禮嗎？於是有人想強迫他們放棄司鐸品位，並勒令他們結婚。有的由於懦弱或因利誘而讓步，其他則誓死反對；更有以英勇的結局洗刷他們已往的錯誤。

人民被暴力折磨得疲弊不堪。一七九五年雖獲得了信仰的自由，但尚不是宗教的全面和平，隨著政治的變遷，還要經歷殘酷的迫害時期。一七九七年遭配、放逐重新開始，許多神父被流放至圭亞那（南美），受極惡劣水土的折磨，或被關進骯髒的監獄，大半都病死獄中。

新型的崇拜

法國有一句格言：「採用替代品是消除某事物的最好方法。」這是想消滅信仰的人所熟知的。因此他們便幻想用新型的崇拜來代替天主教。在那些年中出現了六、七種替代品：有所謂「理智」的崇拜，第一次在巴黎出現，即在著名的聖母大殿內，一個戲院的女伶代表理智，接受了人民的崇拜。持自然神論的羅伯斯比爾提出了「至上實有的崇拜」，以後又有「自由的崇拜」、「農業的崇拜」等。為推行這種種的崇拜，還聘請了藝術家擬定禮儀、詩人撰寫頌詞。這些崇拜雖有政府作後盾，但像空中樓閣一樣，令人生厭、毫無吸引力，不久便消滅於無形。顯然這樣的幻想，絕不能同被釘死而復活的基督所建立的教會爭一日之長短。

殘存的宗教生活

消除天主教的一切手段皆不成功，它仍舊生存在鄉間的神父身上，那些神父冒著生命危險，在地下執行他們的職務：有的藏在森林中，有的隱身在枯井下，有的在有夾板的櫥櫃內，有的在地窖裡。他們利用千奇萬妙的計謀，逃避警察的搜捕，甚至有時佯醉，有時挽著美婦的臂膊以便進入教友家中。城內的教會也暗中生存著，神父們有時喬裝工人，甚至喬裝婦女，或者扮作小販，潛入監獄或跟著載運囚犯去刑場的車輛，以便給他們偷偷地念最後的赦罪經，教會在殉道犧牲的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身上，可說仍然生存著。

革命時期的殉道者

簡直無法計算大革命時期究竟有多少人犧牲了。就連神父、歷史學家的估計也大有出入：有的說是二千，有的說是五千；至於一般教友，就更難確知了。雖然犧牲的人未必都是為了宗教的罪名，但真正堪稱殉教者的的確很多。不用說那些無名的英雄，只有天主知道，就連有名可考、有事跡可述的，為數也很驚人。在此，我們只引證兩件，作個榜樣：比諾神父（Noël Pinot）正在準備作彌撒時被捕，法官們

為了訕笑起見，命他穿著祭服去受刑；他一邊念著：「我要到天主的祭壇前去。」一邊走上了斷頭臺。還有康白尼（Compiègne）的十六位聖衣會修女，她們因為在修道院查封以後還過著集體生活而被捕，並以「狂熱」的罪名被控告。其中一位質問法官「狂熱」二字是什麼意思。他答說：「我認為是指你們的信仰太幼稚，你們宗教的行為愚昧可笑。」，她於是大聲說：「姐妹們，你們聽見了，我們是為了我們的信仰而被判處死刑啊！為我們的天主而死是多大的幸福！」她們在斷頭臺下重發了自己的聖願，口中唱著〈我儕讚頌吾主〉和〈伏求聖神降臨〉而死。

這些犧牲絕非毫無價值，這些英雄支持了人民的信德，在灰下埋藏的火種，一旦信仰的自由重新恢復時，將為之復燃而大放光明。有多少在十九世紀光榮了聖教會的神父不是在這時蒙受天主的聖召呢？只因他們尚在孩童時，便曾經參加過不肯宣誓的神父所偷偷舉行的彌撒呀！

法國逃亡海外的神職人員

許多逃亡海外的神父、會士和非會士，為傳揚聖教實在作了很大的貢獻。他們為數有三、四萬，有的是被放逐的，有的是自動逃亡，但都在鄰國找到了避難所。連基督新教的國家，像瑞士、荷蘭，尤其是英國，對這些身無長物的不幸者，也很

樂意予以收容；且聽英國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怎麼說：「誰也忘不了那些可尊敬的人們的無望，和長期而痛苦的忍耐，他們如今置身於信仰、語言、風俗習慣都不同的外國，因他們生活的規律、熱心和禮讓，深得大家的敬重與同情。」藉由這種接觸，使許多成見消失了，這種輿論的改變，促使英國天主教的解放運動，又為十九世紀天主教在英國的復興鋪了路。

放逐到圭亞那的神父們，一部分轉入美國；他們同那裡的法國移民聯合，對彼邦天主教的發展，產生了很重要的作用。

參 法國以外的革命

歐洲其他國家深恐革命思想會往外蔓延，乃於一七九二年進攻法國。但革命軍也加以反攻，且占領了比利時、瑞士、義大利及荷蘭。革命的思想 and 迫害教會的法律，也隨著遠征軍而流入那些國家。

當時的情勢——尤其在羅馬——非常嚴重。一七九六年，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率軍遠征義大利，教宗於一七九七年被迫同法國訂立刀蘭弟諾（Tolentino）條約，割讓了一部分土地；次年在一次羅馬所激起的暴動中，一位法國將官被害。法國政府利用這個機會，聲言教宗碧岳六世從此喪失政權，羅馬應改為共和國；於

是拘捕了教宗，先囚禁於錫耶納（Siena），後擄至法國。教宗一到法國，衛護人員甚為驚奇，他們萬萬想不到一位解除武裝而又被俘的人，在他的教友面前仍保持著那般的威望。凡御駕途經之處，民眾都趨前求降福。無奈八十二高齡的老人，悲傷與旅途的勞頓已使他心力交瘁，乃於一七九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逝世於瓦倫斯（Valence）；臨終前寬恕了他的仇敵，且為他們祈禱。

向法國政府報告教宗噩耗的官員且說：「這是最後的教宗，迷信從此壽終正寢了。」

教宗碧岳六世逝世後的教會情形

就人們的眼光來看，這個預言似乎可能實現；教會自有史以來，從未遭遇過如此危險的情形。號稱「教會長女」的法蘭西已瘡痍滿目，政府淪為無信仰；神職界死的死、散的散；宗教的教育已徹底改組；人民在恐怖和不安中生活著。義大利被革命粉碎，教宗的國土以及比利時都劃歸為法蘭西共和國的版圖。信奉天主教的波蘭，被基督新教的普魯士、東正教的俄羅斯和奧地利瓜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權則由與教會為敵的人掌握著。德意志早被所謂「開明世紀」的無信仰所污染。大不列顛和荷蘭的天主教也正受著壓迫。遼遠的傳教區得不到生力軍的補充，亞洲的天主教又遭受著迫害，好像一切都坍塌了。

然而五年後，碧岳六世的繼位人越過阿爾卑斯山，來到法國，這次並非俘虜，乃是以凱旋者的姿態來到巴黎，為給恢復宗教敬禮的拿破崙一世行加冕禮。但誰能預料到如此迅速的變化呢？

肆 拿破崙與教會

碧岳七世的選舉

碧岳六世逝世後，樞機主教齊集威尼斯選舉新教宗。經過了三個月與困難及陰謀的鬥爭，一致（只有一票反對）選出了一位最謙恭有禮的教宗，取名碧岳七世（Pius VII，在位期間1800-1823）。新教宗原為本篤會士，嗣升伊摩拉（Imola）主教，以溫良和不知勞倦的愛德知名；但當教會的利益面臨危險時，他卻能堅強不屈。

碧岳七世一到羅馬，法國的新執政拿破崙便照會教廷，願與教廷成立協定以恢復和平。

拿破崙

這個拿破崙是誰？他原本是革命軍中的一名青年軍官，以其義大利及埃及的輝

煌戰果，贏得了無上的光榮。這時因自一七九五年便執政的「督政部」(Directory)腐敗無能，大失民心，未能建立國家的和平秩序，他乃於一七九九年班師回國，推翻督政部，獨攬政權，實現了他掌握法蘭西的夢；時年只三十歲。他打算復興法國的天主教，並不是由於熱愛教會；他雖生在天主教家庭，但自青年時已受了當時哲學思想的影響，不相信耶穌的天主性；不過還沒有墮落到否認神的程度。不是他的信仰在領導他的宗教政治，而是因為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深知在人民的生活中，宗教的重要性，他曾聲明說：「任何人，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生從何來，死向何往，絕不會被認為是公正虔誠的人。只憑理智絕不能在這上面屹立不搖；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仍舊是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天主教對人的起源和最後歸宿，能給予人確實而無誤的光明。一個社會沒有宗教，就如船隻沒有羅盤。」經驗啟示他，天主教絕不如「哲學派」所想的已奄奄垂斃，正相反的卻是生氣勃勃，他不久即說：「我很有能力；不過假如我想改變法國的舊宗教，她便會起而反抗我，而且定要把我擊敗……天主教是我們的國教。」所以他有意同教宗妥協：「我的政治理念是治理人民，要照顧到大多數人的意願……我在埃及能立足，是因為我成了回教徒……假使我要治理猶太民族，我便要重建撒羅滿的聖殿。」這些唯利是圖的看法，乍看之下，似乎對教會有利，其實內中所蘊藏的，卻是衝突悲劇的種子。

政教協議

拿破崙或許夢想著，新教宗在他提出的條件下會接受和平；然而教宗碧岳七世表示反對；財產方面的問題可能和解，一旦牽涉到教會的獨立自主，他便堅強不屈。談判延長了差不多一年，多次幾乎瀕於破裂；幸賴教廷國務卿公撒味樞機（Card. Consalvi）擅長外交，才獲致了協議。

協議於一八〇一年七月十五日在巴黎簽字。天主教並未定為國教，只認為是法國大部分人民所信仰的宗教而已。舊日的一百三十三個教區被取消，以六十個新建的教區代之。這就發生了教會史上絕無僅有的事：教宗請舊制度下還在世的主教們辭職；法國政府仍舊保留著法國國王所獨得的選任主教的權利，然後由教宗賦予神權；主教在教區內的權力，得由政府認可批准；主教和本堂神父們微薄的待遇由國家保證供給。教宗既接受了這項保證，便正式放棄了革命時期所充公的一切教產，從此教會的一切敬禮儀式可自由舉行，一切大小聖堂也予以發還。

教宗和聖教會雖作了不少讓步，但也不失為一大成就；革命對教會和教宗十年的奮力攻擊，究竟得到了什麼？天主教得以復興，歐洲的勝利者同羅馬暫歸協調，教會組織的分裂也一掃而空，法國重新獲得了天主教的統一和宗教的平安。十八世

紀末葉昏昏欲睡的教會，得以重新振作起來；聖座的威望又抬起了頭。

但在公布協議時，拿破崙竟加添了一個「根本條文」(Organic Articles)，內容顯然又使「法蘭西主義」死灰復燃，限制教宗在法國行使權力。碧岳七世對此提出抗議，其後歷代教宗也從未接受。

此協議一出，各國紛紛效尤。不但拿破崙為北義大利（當時隸屬法國）與聖座訂立了協議，西班牙及葡萄牙也同聖座調整了它們的歧見。德意志的王侯也步武拿破崙之後，同聖座簽訂了協議。

拿破崙的加冕禮

此後數年，拿破崙一帆風順節節勝利，乃於一八〇四年被擁立為皇帝；於是趾高氣揚，想效法查理曼 (Charlemagne, 768-814) 及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們的前例，請教宗給他加冕。這種加冕禮能在信奉天主教的民族前增加他的威望；他並且要在巴黎舉行這次典禮。教宗對此躊躇多時，若拒絕了，怕惹惱這位權威無匹的皇帝；但若答應了，又認為這是破天荒的創舉。樞機們堅決反對教宗成行，他們說：「這是十八世紀以來前所未聞的事。查理曼是親來聖城、跪伏教宗足下接受加冕禮的呀！難道這位新興的國君，自以為比查理曼更為強大，竟敢命令教宗前赴巴黎

嗎？」然而為了教會著想，碧岳七世竟接受了他的要求。典禮於一八〇四年十二月二日隆重舉行。最堪注意的一個意外事件：拿破崙並沒有按照傳統的禮節等待教宗給他加冕，竟自行把皇冕從祭壇上拿起來，加在自己頭上。教宗對這種傲慢而有傷自己尊嚴的舉動，只得予以容忍；這種舉動，已預兆了將來在教宗與皇帝之間，衝突仍不能避免。然而差強人意的是民眾對教宗的熱烈歡迎，使他能稍稍自慰：凡教宗經過之處，民眾都萬頭攢動，夾道歡呼，並接受他的降福；教宗回羅馬後曾追述說：「我們是在民眾跪迎中行經了法國。」

教宗同拿皇的破裂

拿破崙作了皇帝以後，野心更加毫無限制，陶醉於他一再的勝利，認為從此一往無阻，沉溺於他日益強大的美夢中，終致一蹶不振。

在他加冕以後的翌年，衝突便開始了：拿皇的弟弟傑倫（Jerome Bonaparte）和他的妻子宣告離婚。拿皇就想請教宗聲明他弟弟的第一次婚姻無效，以便能在教會前與另一位新歡結婚。教宗親自研究了這起事件之後，看不出有絲毫無效的法定理由，便予以拒絕。

這就是導致破裂的政治性事件：拿破崙既以查理曼的繼承人自居，便想把整個

義大利囊括在自己帝國的版圖之內，連教宗的領土也不例外；他可以讓教宗仍留居羅馬，但教宗必須乖乖地執行他的計畫才成。

這時拿破崙正在對英國從事一次決死戰，既然不能在海上得勝，他就決心用飢餓使它投降，命令大陸的一切國家對敵人實行經濟封鎖，也就是禁止一切船隻進入英國的海港同他們通商貿易。然而這種措施除非一切國家同意參加，否則絕不能生效。於是他警告教宗，要他封鎖教宗領土的港口，不准英國船隻駛入。他照會教宗道：「教宗固然是羅馬的元首，我卻是皇帝；我的所有敵人也應該是您的敵人。」教宗卻反駁他說：「世界性的神聖教會領袖，不能介入各國彼此敵對的世俗鬥爭，因為一切國家都是他的兒女。」拿破崙乃於一八〇八年以軍隊占領教宗的土地作為報復，翌年並決心把它併入自己的版圖。

教宗對這種侵犯自己權利的暴力能作些什麼呢？如果碧岳七世只是一位世俗國家的君主，便可能如同其他國君一樣，忍受這個強橫者的法令，對這個所向無敵的霸王的要求暫時低頭。連在樞機中也有人向他建議採取這種行動：既然像奧地利皇帝和普魯士國王那樣強盛的君主都讓步了，教宗何必那麼傻獨自固執反對呢？但教宗卻決心不讓步；教會的元首，不能聽命於一位妨礙他自由行使神權的霸王，什麼也不能使他那堅強不撓的意志屈服。他說：「我的前任碧岳六世，平時暴躁如同一

頭獅子，死時卻如一隻綿羊；我雖為人處世猶如一隻綿羊，但卻知道自衛，並願如獅子一般地死去。」教宗對暴力只能以精神的武器來對付；六月十一日他對掠奪者和他們的同路人，發出了一道開除教籍的通諭；雖然拿皇的警衛森嚴，勇敢的人們還是把通諭貼在了羅馬各處的牆上。

教宗被俘

這位不恃武力的荏弱老人，面對令歐洲戰慄強而有力的征服者，竟敢不放在眼裡。拿破崙瘋狂地喊說：「他以為開除教籍就能使我的兵士們拿不住武器了嗎？」

於是他下令俘虜教宗，並將他帶至沙弗納（Savona）。

拿皇的意思是想暫時把教宗拘留於沙弗納，讓他孑然一身的反省一下，之後再把他正式安置在巴黎，因為他打算要教宗長住在帝國首都。拿破崙在等待教宗來到的期間，把樞機和修會的首長們都召來；他把巴黎總主教公署大加裝修，作為新的梵蒂岡。他夢想統治奉教的世界，就如他統治俗世的世界一般，正如他所自稱的「教會的太上皇」。

拿破崙妄想這位老人，既與世界隔離，又不能同他的參謀團接近，勢必要讓步而放棄教會凌駕國家的權力。教宗在沙弗納被拘留了三年之久（一八〇九—一八一

二)；之後下令將他遷至法國的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在那裡又被拘留了兩年，教宗始終不屈。教宗用以自衛的唯一方法，便是聲言他在失掉自由和參謀團的情勢下，不能行使自己的職權。

然而有許多宗教問題非由教宗解決不可。當一位主教出缺時，碧岳七世拒絕賦予皇帝所指派的繼任人合法的承認（這是同協議相符合的）。他對加給他的一切壓力，只是溫和地堅拒而已。這樣的堅拒激怒了皇帝，但他極不欲教會分裂而再引起革命，乃試圖用他召集在巴黎的主教們的會議來同教宗對抗，但是仍舊枉費心機，毫無效力。

拿皇決心達成協議，試行最後的鬥爭：他親到楓丹白露去面見教宗；經過了五天的爭辯，威魯利誘輪番兼施，老教宗由於長時間的奮鬥心力交瘁，終於簽署了一項協議，放棄了他那唯一的武器，犧牲了建立主教的權力。在這為期五年的鬥爭中，拿皇得到勝利了嗎？沒有。次日教宗受不住良心的譴責，自承他失職；兩個月以後他給拿皇送去一封親筆函，聲稱他在暴力威脅下所作的一切，完全無效。

教宗回羅馬

拿皇的軍事命運逆轉，在輝煌的戰果後，繼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失利。乃在一

八一年正月決心放回他的俘虜。碧岳七世凱旋返回羅馬。此時拿破崙已不再是皇帝；因為一個月以前，他在楓丹白露拘禁教宗的同一大廈內，簽署了退位的詔書。

在數年以前拿皇便曾如此聲明：「世間只有兩種權力：武力和精神……久而久之，精神終要戰勝武力。」他竟在不知不覺中預言了他威脅教宗權位爭鬥的結局！

碧岳七世的以德報怨，無愧於他基督徒的身分，因為基督說過：「要善待那些迫害你們的人。」當英人將他們戰敗的敵人（拿破崙）流徙到聖赫勒拿島（Saint Helena）時，教宗以慈愛之心在羅馬收留了他的母親和他皇族的家人，並請求英人對他們的俘虜勿為已甚。

伍 革命的總結

損失

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革命的武力和拿破崙的軍隊將它傳遍了歐洲。這些觀念，尋根究柢來說，本來都是源自天主教的觀念：教會自初興以來不是就宣布一切人類均屬平等，都是天主的子女、耶穌基督的弟兄嗎？聖保祿（St. Paul）也宣稱，在主內沒有希臘和猶太或夷狄、奴隸和自由人的分別。教會在

舊世界不是解放奴隸的最大推動力嗎？（請參閱卷一第四章肆節）這些觀念，在革命的大動亂中卻以暴亂的姿態出現，革命黨竟以這些原則為名，轉而攻擊教會，甚至想把天主教會完全消滅。雖是枉然白費，然而教會在這場鬥爭中卻損失了不少：在法蘭西、德意志、比利時及義大利北部，喪失了許多財產和她那超然的地位；財物的損失，甚至拖垮了她的行政；因為既然缺乏財源，如何還能維持修道院、學校以及慈善事業呢？最嚴重的是神職人員損失了很多，修道院的修士也死亡或逃散一空；堂區神父大感缺乏，損失最重的是修會的神父，尤其是修道院的會士。本篤會在革命前有一千五百座修道院，現在已不超過三十座；道明會士如風掃敗葉般地消散了。專門在聖堂行隆重典禮的會士的絕跡，對教友們的宗教生活有嚴重的後果：十九世紀的教友只靠個人所行的神業培養自己的熱誠，而不能再靠聖儀了，教會團體的意識也大為減低。

其他方面的損失也不小：教會所創辦的大學，直至大革命時常是屬於教會的機構；每座大學都有神學院，而且神學常控制著精神生活。大動亂時大學都行關閉，當其再開辦時，已落於政府之手，只求人文知識而已。在整個十九世紀期間，高等的宗教教育者均付之闕如。

利益

常言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教會固然是窮了，但也洗刷乾淨了。迫害在神職界中完成了一項淨化的工作，良莠立即分明。主教已不再是世俗的公卿首長，再也沒有為度闊綽生活而作神職人員；神職人員也一心獻身於神聖的使命。碧岳七世的英豪作風，雖使他作了歐洲霸主的犧牲品，但在道德方面他卻成了戰勝者，且更提高了教宗的聲望。教會以再接再厲的精神恢復了她的力量，且在新的傳教區域比往日更為強大。

註釋

- 1 盧梭實為「法國革命的導火線」，他的《民約論》（*Du Contrat Social*，或譯《社會契約》）被革命黨奉之為聖經。按盧梭的理念，人民乃屬至上，個人應無條件地服從「公意」；「公意」由大多數人投票來表現。個人在身靈兩方面都隸屬於社會。他實際上把耶穌所說「凱撒的歸凱撒，天主的歸天主」的原則給推翻了。他把國家的主權，推展到宗教的主權範圍之內，實際上毀滅了良心的一切自由。盧梭是一切極權制度的發明者，列寧（Lenin）、史達林（Stalin）等犧牲人格於國家的淫威之下，都是他的忠實信徒。
- 2 教宗碧岳十一世（Pius XI，在位期間 1922-1939）於一九二六年將這些犧牲者中的一百九十一位列入真福品：其中有三位主教，一百八十四位神父，四位教友，他們都是為純宗教的動機而遭殺戮的。

第二十一章 天主教在十九世紀前期的復興

聖教會在歷經革命的動盪以後，於十九世紀前期，活力大振。這裡我們只把精神復振最顯著的幾國略敘述一些：受革命影響最大的兩國是法國和德國；其次是大不列顛；之後再約略敘述最有前途的教團的產生，那就是北美合眾國。

壹 法國教會的復興

法國是在拿破崙當權時，自一八〇一年同教廷成立協議時起，教會便恢復了和平，也因而開始復興。

遠在發動武力革命之前，在人們的思想中就有了革命，這是十八世紀的「哲學派」和「百科全書派」，宣傳唯理主義和唯物主義思想所產生的後果。假如不先改變人們的思想，教會也就無法有深刻的復興。這種改變思想的工作，有賴於許多天才作家，他們重新恢復了十八世紀的作家所剝奪的教會聲望。

夏多布利昂

這個時期最早的作家是夏多布利昂 (Chateaubriand, 1768-1848)。當政教協議公布時，他即出版了《基督宗教的天才》(Le Génie du Christianisme) 一書，立刻紙貴洛陽，膾炙人口。他曾解釋自己所抱持的目的：「此書證明在所有的宗教中，基督宗教在文藝兩方面是最富詩意、最人道、最愛護自由的，近代世界的一切都沐浴在它的恩澤中；由農業以至形而上學，由救濟貧老孤苦的養育院以至米開蘭基羅 (Michelangelo) 所建、拉斐爾 (Raphael) 所裝演的大教堂，什麼也比不上它的道德更神聖更可愛，也沒有比它的信條、教義和敬禮更莊嚴的，它促進天才、澄清興趣、發展修德的情緒、加強思想的強度……。」¹

《基督宗教的天才》一書並非純粹護教的著作，教友們之所以信服，是因為它說的是真情實話。夏多布利昂不是神學家，他亦無意辯證，只是指出天主教是優美而富麗的，且常衛護文化和藝術；他以令人心醉神迷的文筆，描述教會的可愛，也奇妙地達到了他所期望的目的；此後具有文學修養的人，不但不再攻擊宗教，反而成了它的衛護者；宗教也不再像伏爾泰時那樣飽受嘲笑譏諷，反而成了驚奇欽羨的對象。夏多布利昂對十九世紀的宗教情趣貢獻極大¹。

邁斯特爾

邁斯特爾 (Joseph de Maistre, 1753-1821) 也是一位優秀的法文作家。他以卓越的文筆致力批駁十八世紀的唯理主義；他恢復了原罪的概念，救贖的重要，並證明了在歷史的過程中隱藏著天主的照顧。他那本著名的《論教宗》(Du Pape)，證明了在國家元首之上的神權，實在是人民自由和利益的保障；那就是教會和教宗的權力。這本書的影響力歷久不衰²。

拉梅內

上面我們所引述的作家都是普通的教友。拉梅內 (Lamennais, 1782-1854) 則是一位神父。他對神父一職長期猶豫不決，最後終於戰戰兢兢領受了神品。他拯救人靈的心火非常熱烈；他的第一部著作《論對宗教的冷漠》(De l'indifférence en matière de Religion)，情感豐富，頗具詩意，因而感人甚深：人們甚至視之為「一位新教父」。對攻斥十八世紀的自然神教，誰也沒像他那樣激烈；提到人生唯一大事：救靈，誰也比不上他更使人心震驚。這本書一問世，立即譯成了多國語言，為教會爭取了不少的人靈。

拉梅內對當時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他周圍有一羣名弟子，其中有神父也有普通教友，他把他那衛護聖教的熱忱通傳給他們。可惜的是他的神學造詣不高，在他的護教教學內，摻雜了些不甚健全的哲學思想。他的確也有些誇大，而最缺乏的是真正的謙遜。他自信有救護教會的感召，但不承認自己會犯錯誤。這種傲慢的心理最後竟使他離開了教會；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不幸的結果，而將他對教會的所有輝煌功勞一筆勾消。

拉高爾代

拉高爾代（Lacordaire, 1802-1861）是拉梅內的得意門生。一八三五年的封齋期內，巴黎總主教委任他在總主教座堂——聖母大殿中，講述一連串護教的道理，成效卓著；不僅因為拉高爾代具有非凡的口才，被視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教會演說家，更是因為他最能符合當代人的希望。所有巴黎受過教育的人，都去聽講。聽眾中曾有一位作證說：「我們好像列席參加現代社會的宗教復甦一樣，而不是列席天主教的復甦，因為它是永不會死亡的。」巴黎聖母大殿封齋期演講的創興裨益甚大，直至今日仍盛行不衰。

佈道大會

協議雖因保證教會的自由和宗教文藝的再生，給教會帶來了一種有利的氣氛，但光是使大批的民眾恢復信德尚嫌不足；因為大革命之後，民眾對宗教的道理多已生疏，生活中也沒什麼宗教活動了；所以為了使大批民眾重返天主教的懷抱，使他們重新進堂瞻禮，非有特殊的運動不可；於是不在修會或對此項工作專門的修會司鐸，便肩負起佈道的工作。他們在聖堂中連續演講兩個、四個或五個星期，當聖堂不能容納大批民眾時，便在露天演講。當佈道大會結束時，常見有三、四萬人前去領聖體。在好多公共場所，隆重地豎立起大型的十字架，作為恢復信仰的證明。

教友傳教運動

此時教友的傳教運動也是值得注意的；這實在是今日所稱的「公教進行會」的前奏。這裡我們只引證一位歷史教授奧薩南（Ozanam, 1813-1853）作為代表。在他一生中，常參加當時的一切宗教活動；他曾創建一項慈善事業，很快地便傳遍了全歐，隨即普及全球：那就是「聖文生善會」（Pious Society of St. Vincent of Paul，香港地區名為「聖雲先會」），它真的使這位大聖多方面的愛德精神都復興了起來。

為了明瞭當時法國天主教復興的全貌，尚須一提各修會格外繁榮的情形，以及他們對外方傳教所占的重要地位；稍後我們再加以敘述。

貳 德意志天主教的復興

德奧兩國的天主教，因受唯理主義及若瑟主義的影響，消沉了好一陣子；但在十九世紀初葉便重新振作起來。聖郝夫包爾（St. Clement Hofbauer, 1751-1820），被人們視之為贖世主會的第二會祖，他在奧國維也納時，對窮人和貴族同樣具有吸引力，他的善表和言論也影響了許多人的歸化。

心靈的復興

心靈的復興在德國尤其顯著，何況倡導者多非主教，而是普通教友或新歸化的人，更屬難能可貴。他們組織了許多團體，把作家、詩人、藝術家等團結在一起，共同討論教會的需要，於是最有價值的歷史和神學等著作便紛紛問世。塞勒（Salier, 1751-1832）以他的著作和人格的高尚優美，深深地影響當代的人，且引領了許多基督教徒重返天主教的懷抱。他的著作很多，特別是關於祈禱和默想的書，道理純正，富於熱情，而且文筆簡潔流暢，童叟皆和。格萊斯（Görres, 1776-1848）對天主

教的神祕學甚有研究。莫勒（Möhler, 1796-1838）是當代最偉大的神學家之一，他的歷史著作，雖然在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之間標出了很嚴格的界限，但沒有傷感情的辯爭，因而引發了一個反正的運動，對天主教的立場賦予了新的威望。多林格（Döllinger, 1799-1890）特別攻讀教會的古代歷史和宗教改革的起源。以上這些思想家影響了整個天主教的歐洲。

各種協會

德國性格的另一特色是組織精神。在天主教的生活中也很有顯著，尤其在十九世紀後期，目標良善的各種協會日益增多，有的是純宗教或慈善性的，其他則是社會性的，有的組織農民，有的則把學徒或工人聯合起來，因為德國的天主教教友，有意把信仰的意識和習俗灌輸到整個生活當中，並解決當時龐大的社會問題。他們對一般工人及女工、童工的法律特別關心，所以很認真的去投票，樹立了很好的榜樣。自一八四八年起，一種名為「天主教日」（Katholikentag）的盛大集會，每年集合天主教各種協會的代表於一堂，開會討論有關教會生活的現實問題。這個運動的主要組織人員之一，是梅因茲（Mainz）的主教凱特萊（Ketteler, 1811-1877），他是天主教社會運動的開路人。

德國天主教教友雖然在德國居於少數，但因他們的活力和同心協力的精神，在十九世紀末葉，竟成了一股社會和政治的力量，足以抵抗迫害。

參 天主教在大不列顛的復興

十九世紀初期的天主教情形

基督新教改革使天主教教友陷於悲慘的境地：他們被視為次等國民，排除於政治和軍事之外；他們的子女沒有進大學的資格。經過了兩個世紀的迫害，只剩下十來萬人，還有幾家貴族信奉天主教，但在國內已沒有什麼影響力了。被視為傳教區的英國甚至沒有主教，只有幾位宗座代牧。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曾為他年輕時所認識的英國天主教畫了一張驚人的圖畫：「那時已沒有天主教團了，只有一小撮信奉舊教的人，沉默而悲哀，好像只能紀念以前有過這麼一回事罷了……所謂『羅馬天主教徒』，已經算不上一個宗派，只是屈指可數的一小撮人而已，好像大洪水過後剩下的幾塊碎石瓦片……這邊有一夥愛爾蘭的貧苦工人，在收穫期或在首都的陋巷中打點零工；那邊有一位老人，躊躇街頭，與世隔絕的態度只能在偏僻處、陋巷中或鄉間才能顯露；他們只能潛存在暗影中，一旦出現在傲慢的基督新

教地主面前，就只能閃躲罷了。」

愛爾蘭（那時尚隸屬英國）的國民雖然大多數都是天主教教友，但仍不免被視為低級人民；英國的大資本家和大地主根本是在奴役他們。他們已經貧困異常，卻仍得負擔神職人員的費用，對英國國教的牧師還得繳納十一稅，對基督新教的主人則繳納更重的年稅。

天主教教友的解放

天主教教友所期待的解放，乃來於自愛爾蘭；這是愛爾蘭的教友在奧考乃爾（O'Connell, 1775-1847）的領導之下，掙扎奮鬥了三十年的結果。奧考乃爾是一位令人傾心的演說家，他那無比的辯才喚起羣眾，展開了驚人的活動。他的策略很簡單：就是在不流血不犯法的原則下，利用一切合法的方法：如開會、請願、抗議等，向英人施壓力；為了擴大活動，他組織了「天主教協會」（Catholic Association），把愛爾蘭的教友聯合起來。政府對這個全國沸騰的運動，已不能坐視不管。

奧考乃爾為摧毀議會的抵制，決心採取一種大膽的措施：他雖然明知自己身為天主教教友，在議員就職時不能宣誓。但他仍參加競選，並擊敗他的政敵。他既獲勝，便不顧議會的規定堅持出席。議會在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讓步：皮爾（Peel）首

相只得讓「解放法案」(Emancipation Act, 1829)通過，賦予了天主教教友在政治上的平等權利，除極少數的職權之外，並可擔任國家一切職務。

這是一種偉大的勝利——不流血的勝利，而且成果豐碩。奧考乃爾不但拯救了愛爾蘭的教會同胞，連英格蘭以及大不列顛一切殖民地的天主教教友都同蒙其利。

紐曼和牛津運動

有人說：天主教教友雖然擺脫了桎梏，但長期的禁錮所招致的癱瘓和麻痺卻依然存在。因為他們經過了兩個世紀的鎮壓和迫害，早已變得非常膽怯；直到紐曼和受他感召而歸正的一羣知識分子起身奮鬥，才恢復了他們的勇氣和克服困難的精神。歸正的運動產生於著名的牛津大學（這個學府本是天主教的，自宗教改革後始落於基督新教之手），因此在歷史上被稱為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

有一夥英國青年牧師，對教會的缺乏活力和政府橫加干涉教會的事務，甚感痛心。他們想：英國教會除非能擺脫擾亂它的一切惡劣影響，恢復它原始的純潔，否則無法復興。他們本著這個目標，去研究最初教會的歷史和教父。他們為宣傳自己的見解，發表了一連串的論文，在論文中陳述他們研究的結果。在這些牧師中，有兩位最為傑出：一位是蒲賽(Pusey, 1800-1882)，他是一位學識豐富而虔誠的神學

家；另一位是紐曼，他是一位銀行老闆的兒子，加入了修會，擔任大學聖堂的主任牧師；他在教堂講道，成績卓越。不久人們便懷疑他們袒護羅馬教會，並以「教宗派」(Papism)的罪名控告他們。不過他們當時並沒有轉向羅馬的企圖。蒲賽至死是忠於英國教會的教徒；至於紐曼，則因他自幼便相信教宗是達尼爾(Daniel)和聖若望(St. John)所預言的假基督，為此想在路德(Luther)和喀爾文(Calvin)所倡導的基督新教及羅馬天主教之間，找出一個「中道」，一方面同天主教共同保存著教父的傳統，一方面放棄他認為天主教在信條上所擅自改變的一切。

但他愈研究這個問題，愈發現這個「中道」是行不通的，因此也就愈加懷疑他所生而信仰並且非常留戀的英國教會是否是宗徒們所傳的真教會；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這種無所適從的情形延續了四年之久，對他真是一個極大的痛苦。他於是辭去了牧師一職，以便退隱到僻靜的地方去，專心祈禱並從事研讀。研究的結果，他看清了只有羅馬教會是保存宗教傳統的真教會。但最後一項困難在他心靈中留滯不去，就是他所稱的「羅馬教會在信條上所作的竄改」，他總認為同耶穌最初的門徒所教訓的不符。然而不久他便瞥見了光明：羅馬在原始的「信經」上所加的，原來只是教會對「寄託物」所作合法而必要的發展；譬如人的身體，雖然長大而發展，但仍

是原來的身體。

紐曼既已毫不懷疑，便於一八四五年十月八日放棄了英國國教；次年便在羅馬領受了鐸品。

有人說：羅馬教會自路德改教以來，從沒有得到如此大的勝利。紐曼對改教的認真，他那學識的聲望，以及他對青年的影響力，在在都使羅馬教會獲得了非常熱烈的反響；他的朋友、門徒、知識分子、神學家及教授之中，有數百人步武了他的後塵。這些反正的人中最著名的有法柏神父（P. Faber, 1814-1863），他是講道員和神修的寫作者，他的著作至今尚在廣泛地傳布中；還有馬寧（Manning, 1808-1892）。天主教在英國又重新獲得了它喪失已久的聲望，從此更不停地繼續增高。一八五〇年教宗碧岳九世（Pius IX, 在位期間 1846-1878）認為時機成熟，便在英倫重新建立了教會的聖統，並任命偉斯曼（Wiseman, 1802-1865）為西敏寺的總主教，且升他為樞機；他是一位有分量的演說家和寫作家。他也是天主教方面擁護牛津運動的人，以他的明智和練達，使新歸正的人更易同天主教的團體處得融洽，因為許多英國老天主教教友對他們多不信任。他死後，馬寧繼任為總主教，也於一八七五年升為樞機。

紐曼升神父後，即在英國遵照聖斐理·乃立（St. Philip Neri）的規範建立了祈禱會；他又活了三十年，繼續他演講和寫作的生涯，並躋身於英國偉大作家之林。他雖然只是一位普通司鐸，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 在位期間 1878-1903）卻於一八七

九年因他的功勳升他為樞機。他於一八九〇年去世，享年八十九歲⁴。

在紐曼行將去世的時代，有些人曾希望英國能全體歸正，連在英國國教內也有許多人這樣希望。良十三世當然很歡迎，但先得將英國國教的牧師全部收為天主教的司鐸，問題是他們的神品是否有效。良十三世徹底研究之後，雖然抱著和解的熱忱，但也不得不聲明英國國教的神品典禮均屬無效（請參閱卷三第十二章參節）。

肆 天主教在美國

起源

當一七七六年美洲的英屬殖民地宣告獨立時，天主教在美洲只不過是一棵嫩弱的小樹而已，教友的數目還不到兩萬，神父也只有二十幾位。然而其中卻有一位卓越的、人物，名叫賈勞（John Carroll, 1735-1815），既精於政治，又善於管理，他給了天主教一種決定性的鼓勵。他生於美洲，在歐洲進了耶穌會；在耶穌會解散後，返回本國。在獨立戰爭時深獲華盛頓（Washington）的信任，他遂利用他的影響力，提出了美國憲法的修正案，加入了保證信仰自由的一條；天主教也充分利用這種便利。在一七八九年天主教已大有進展，教宗碧岳六世給合眾國立了第一位主教，也就是

任命賈勞為巴爾的摩（Baltimore）的主教。

教會發展的一個阻礙就是缺乏司鐸；幸好來了一批援軍，即因大革命從法國被驅逐的司鐸，其中不少才德兼優之士；他們的英語雖然不很嫻熟，但在指給他們安身的地方卻熱心傳教，而且成效卓著，其中六位被擢升為主教。但對美國人來說，最好由美國人傳教。為了開辦神學院，賈勞主教曾從法國請來蘇比斯會士（Sulpicians）；他們於一七九〇年在巴爾的摩建立了第一座神學院。

進 展

教會的進展從此一日千里；在賈勞主教於一八一五年去世時，已有教友七萬名，美籍神父七十二位；一八三〇年增至三十一萬名，一八五〇年增至一百五十萬名，一八七〇年已接近五百萬名；在十九世紀中，新主教區、學校、修道院、慈善事業，都如雨後春筍般地日見繁盛。

這種繁盛的原因，當然不只是基督教徒的歸正，除了天主教教友的自然繁殖外，最多的還是歐洲移民。自一七九〇年起，愛爾蘭人逃避迫害或逃避天災，紛紛前來美國尋求避難所。乍看似乎偶然的原因，增加了愛爾蘭移民的湧入；即在一八四七年馬鈴薯橫遭天災，而這是愛爾蘭人主要的食糧，結果釀成了大飢荒；因此上百萬

名愛爾蘭人逃到了美洲（自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間移入美洲的五百萬人，愛爾蘭人幾乎占了半數）；之後，德人、義人、斯拉夫人等也接踵而至……而從事教育或獻身慈善事業的男女修會團體，也隨移民俱來，這樣一來，天主教的生活很快便組織了起來。

信教自由雖已載入憲法，但這並非說天主教便不會遭受反對；別忘了這個新共和國是在基督新教的氛圍中產生出來的，所以英國移民的子孫，眼看著美國東部的城鎮，已被愛爾蘭的天主教教友所淹沒，感覺極度不滿；因此十九世紀中葉，幾個祕密會社所激起的騷動，在「美國歸美國人」的口號下急遽展開，好像天主教教友不能作個良好的美國公民一樣；於是暴動紛起，許多修道院和聖堂竟遭焚燬或搶劫。不過這種越軌的行動不久便逐漸失勢，和平終究是恢復了。

多數美國天主教教友都來自移民，他們脫離祖國出外找工作，這可說明十九世紀美國天主教的一些特徵：天主教教友大部分集中在東部的城鎮和海口，那裡較接近歐洲，多屬中下階級，知識水準不高。這卻與過去在歐洲的情形相反。歐洲的信仰，農民比工人保存得更為完整，而美國的天主教教友卻大半為城市的居民。

註釋

1 夏多布利昂是浪漫派 (Romanticism) 文學運動的前驅之一，啟發了十九世紀大部分的作家。浪漫派的特徵，是想像和情感勝過理論，頌揚人對宗教的嚮往，羨慕中世紀的天主教風味，使人心更接近天主教；但把信仰建築在情感上則是一種危機，是給宗教的主觀主義開了路。

2 還有一位普通教友寫作家名叫德波那 (de Bonald, 1754-1840)，同邁斯特爾很相近，攻擊唯理主義甚烈。但他貶低人性理智的價值未免過甚；按照他的意見，人光靠本性的理智不能認識天主。對天主的認識是由最初的啟示一代一代相傳下來。這種理論就是所謂傳統主義 (Traditionalism)，曾遭到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的屏斥，大公會議宣稱：本性的理智能夠證明天主的存在。

3 偉斯曼是著名小說《法比約拉》(Fabiola) 的作者，各國都有譯本，中文有直譯為《法比約拉》的一種，又有光啟文化事業譯為《碧血紅顏》的一種。

4 紐曼的著作除了許多講道遺稿外，較著名的有：《為自己的生活辯護》(Apologia Pro Vita Sua)，縷述他的歸正經過，甚為感人；以及《試述基督教義的演進》(An Essay On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 一書，給神學開闢了新途徑。此外還有不少其他著作。

第二十二章 自由主義時代和教宗碧岳九世

法國的革命，無論對思想或政治來說，都堪稱是天翻地覆，引起了深重的紛擾。大亂過後，政府和教會面對著革命黨所宣傳的制度和思想，該要抱持什麼態度呢？應視之為一種既得的進步？還是把它想成可憎厭的東西？

有些人，特別是那些親歷革命血腥的人，對那些兇暴的屠殺和那威脅教會生存的戰爭，記憶猶新；在他們看來，大革命簡直是撒彈的勾當，是徹頭徹尾的邪惡，應當鏟除淨盡，不留絲毫痕跡，以防死灰復燃，還要盡可能地恢復已往的秩序。這是在拿破崙失敗之後的幾年中，最占上風的趨勢；這也是為了改造歐洲而召開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中，許多外交家所企圖激發起來的趨勢。

然而經過數世紀之久，由許多人深思熟慮所籌劃準備的一種事變，改造了社會和政治的秩序，歷史難以倒轉逆流，革命黨所散布的思想，也無法從人心中的掃除。「自由」一詞，早已啟發西方，成了一八三〇至一八七〇年之間，大部分政治鬥爭

和思想戰的口號。美洲西班牙的殖民地，是以自由之名爭得了獨立；希臘人也是以自由之名，於一八二九年掙脫了土耳其的宰制；一八三〇年在法國，一八三三年在西班牙，此後又於一八四八年在法國及歐洲各國所發動的多次革命，都是以爭取自由為目的的戰爭；就連反對教宗世權的鬥爭，也是以爭自由為名；馴至資本主義的發展，也是因「自由經濟」的學說抬頭而逐漸興起。

那麼教會面對著「自由主義」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呢？

在答覆這個問題之前，當注意「自由主義」四字有種種歧義：反對專制政體的人被稱為自由主義者；擺脫外族侵略希圖獲得解放的人，也是為爭取自由；思想自由的人攻擊教會箝制人們思想的自由，為教會爭取自由的天主教教友以及爭取經濟和貿易自由的資本家，都是打著自由的旗幟。為了澄清問題，我們需要把思想自由、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分別予以說明。之後再研究教宗碧岳九世與自由主義鬥爭所持的態度。

壹 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的極端不是別的，原來就是啟發法國革命的唯理主義的延續；它要為人類爭取完全的思想自由，把一切高於人的權威——天主的權威、啟示的權威、教

會的權威——統統加以揚棄。

顯然，人們絕不能接受這種方式的自由主義而仍不失為教徒；不過所謂自由主義另有一種方式，它是為公民爭取最高度的自由：即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

法國自由主義的天主教教友

一八三〇年的法國七月革命，是由爭取自由的名義而引發的，連帶也發生了許多反宗教的暴行。我們前面已看到了拉梅內對天主教教友所產生的影響，他願意保衛教會。他說我們既然不能仰賴政府來保衛，只好採行一種新的策略，就是利用一切現代的自由，使之有利於教會。他曾這樣說過：「人一提到自由主義，便有些震驚害怕，我們來使它宗教化吧！那麼社會就可以復興了。」為了宣傳他的思想，他創辦了一份日報，名之為《展望》，這報紙的宗旨是「天主與自由」。他吸收了不富有才氣的助手同他合作，其中有拉高爾代，還有一位二十歲的青年，言辭熱烈而具有吸引力，他名叫蒙大郎白爾（Montalembert）。這張報紙聲明，聖教會應擺脫國家的保護，以免其變質而受到奴役；教會當以辭謝所謂「協議」來同國家分離：「自由的教會在自由的國家內」，這才是理想。「天主教的本質就是自由」。所以他們

要求一切自由：出版自由、教會自由、投票選舉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教會自由行動，才能擔當傳教並實現解放民眾的使命，因為民眾是至高無上之權的持有者，民眾向著民主發展，所向無敵。

在《展望》以高度才華所發揮的社論中，有的眼光正確，有的論斷則未免過火而武斷；希望固然很大，但幾近幻想，對教宗儘管是一片至誠，但對自己的思想卻很固執。拉梅內確有天分，對好事也有遠見；後來的許多大事，都應驗了他的預言；但他和他的合作者，對神學都沒有充足的修養，因此在正確的思想中往往摻雜著過激的論斷。天主教奠定了人們精神自由的基礎，那是千真萬確的；但「天主教只能靠自由保全」，則顯然是一種錯誤。因為天主教自身有絕對的價值，並不是靠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建設。何況這種對自由的完全信賴，是由誤信人性本善而來，好像人一自由，便足以看事正確，修德行善，不受私慾偏情的困擾了！

自由主義遭受譴責

《展望》不但影響法國，還遠及國外；有些主教對它的煽動作用深感不安，便下令禁止神職人員和修生們閱讀。面對這種反對，拉梅內、拉高爾代和蒙大郎白爾決心向教宗申訴。這幾位「自由的朝聖者」開始步上了羅馬的征途，自信能獲得完

全而決定性的贊同。

他們這種行徑太狂妄自大了，好像一位普通神父要向教宗口授命令，教誨他在領導教會上應當抱持什麼態度一樣。很快地他們便發覺，教宗國瑞十六世（Gregory XVI，在位期間 1831-1846）雖很慈祥地接待他們，但並無絲毫贊成之意。拉高爾代明白了這種靜默的用意：教宗不能表示贊同，但也不願予以公開的譴責；於是他便離開了羅馬。拉梅內卻堅持要等待決定；決定終於頒下了，那便是一八三二年所頒《我們使我們驚奇》（*Mirari vos abhorreretur*）的通諭。它譴責了極端的自由主義：所謂良心的自由，是把一切宗教等量齊觀，視同一丘之貉，這會導向良莠不分的「冷漠主義」；至於主張毫無限制的出版自由，是對真理和錯誤一視同仁，毫無區別；教會與國家分道揚鑣，僅能視為一種理想。通諭雖未指出所譴責的人名，但顯然已觸及《展望》所標榜的許多理論。

拉梅內先是俯首認錯，繼而揭起了叛旗；他缺乏使人成聖的那種謙遜。一位曾被譽為「教會新教父」的人，絕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他雖直到此時仍很光榮地衛護了教會，但卻從現在起頑強地反抗，社會主義和革命思想終於沖昏了他的頭腦。人們也漸漸地離棄了他，終至眾叛親離地死去，甚至臨終時還拒絕了一位神父的探視。人們不禁要想：假如他謙虛認錯，並以他的天分繼續服務教會，那麼十九世紀

的教會歷史或許要改寫了。

被譴責後具有自由思想的天主教教友¹

雖然老師反抗，他的門徒——特別是拉高爾代和蒙大郎白爾——卻謙恭地屈服了，且繼續慷慨地散布由國瑞十六世的堅強干預而與莠草分離的良好種子；但他們仍在教宗認可的尺度內，繼續為自由而奮鬥。

拿破崙曾把教育權劃歸國家，由政府獨辦；君主復辟後，這種制度仍舊保留，但對宗教的教育卻是一大阻礙。這是自由主義的天主教教友所重力的重點；雖然遭遇了長期的反抗，幸而在一八三三年獲得了初級教育權，之後於一八五〇年又獲得了中學教育權，最後於一八七五年又獲得了高等教育權；這真是教會在法國的大成就，嘉惠無數青年，直至今日。

貳 政治自由

自一八一五年簽訂維也納條約後，歐洲又劃歸幾個強權玩弄，對人民合理的要求不大注意。然而在專制政體之下人民卻要求立憲。從此為了爭取自由，在西歐國家中又歲無寧日了。

這種騷亂是由爭取政治自由而引起的，一方面是為了擺脫外族的統治，另一方面是為了擺脫專制獨裁的淫威。就宗教的觀點來看（這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後效有幸也有不幸：當教友獲得實際的宗教自由時則可說是幸；當所謂「自由主義」只是指思想的絕對自由，對整個宗教的觀念卻加以敵視時，那就是大大的不幸了。

荷蘭和比利時

維也納會議又使比利時和盧森堡同荷蘭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低地王國（Netherlands）；這樣一來，就使比利時的天主教教友隸屬於荷蘭信奉基督新教的國王威權之下了。國王威廉（William）利用一切機會排斥天主教教友，一切公職都由荷蘭人擔任；比利時人自然非常不滿。法國一八三〇年的革命激勵了他們，於是比利時人便脫離了荷蘭，自行組成一個獨立王國。國王黎奧保一世（Leopold I）公布了憲法，給予人民信仰自由、教育自由和結社自由。比人善於利用賦予他們的自由，增建了許多天主教學校；著名的魯汶大學重行開辦，而且成了知識生活的中樞，從此它的光芒不停地向比國及其鄰邦放射。以後自由思想者雖然在比國開始反對神職人員，但教友勇敢地起而抵抗，維持他們的權利於不墜。

自比荷分立後，天主教教友在荷蘭只剩下少數，但在主教們的衛護下堅強團結，

人數也逐漸增加，至一八七五年已占全民的三分之一。

波 蘭

一七九五年波蘭的三個強鄰：基督新教的普魯士，天主教的奧地利和東正教的俄羅斯，共同瓜分了波蘭歷經侵略而剩餘的土地。維也納會議竟批准這種罪惡，於是天主教的波蘭便由歐洲的地圖上刪去。一八三〇年，隸屬俄羅斯的省分奮起，試圖恢復他們的獨立與信仰的自由；反抗持續了兩年，英勇的事蹟雖然前仆後繼，終因眾寡不敵，革命在血泊中淹沒；一八六三年的二次革命，也未能成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波蘭始得恢復獨立。

奧地利

奧地利的專制政權維持到十九世紀中葉始行消滅。若瑟主義自十八世紀以來，不停地影響政治；皇帝將教會抑制在他的羽翼之下。但自一八四八年自由之風吹遍歐陸之後，奧皇法蘭西斯·若瑟一世（Francis Joseph I）終於在一八五五年同教宗碧岳九世簽訂了協議，教會從此恢復了自由。

瑞士

維也納會議硬派派給了瑞士一種染有自由色彩的政體。自十六世紀以來，天主教教友連在日內瓦居留的權利都沒有；一八一五年各聯邦之間成立了一個協定，保證信仰自由；直至一八四〇年，天主教教友與基督新教徒才得以和平相處。但基督新教徒的敵視死灰復燃，釀成了不少嚴重事端；教廷的大使被逐出，天主教的教友成了被攻擊的對象。七個天主教聯邦乃組織了同盟（Sonderbund），進而衍發內戰，天主教教友不幸落敗。不過這次落敗幸未造成嚴重後果。一八四八年頒布了新的憲法，保證各邦的信仰完全自由，天主教從此亦能在基督新教聯邦內發展。雖然仍有反對情事，但此後來自日漸變得容忍的基督新教徒的反對，比來自反對宗教的自由主義者少多了。

西班牙和葡萄牙

這兩個國家為繼承王位的問題所困擾，天主教教友卻受了連累。西班牙國王於一八三三年去世後，問題就來了：誰是合法的繼承者？是國王的弟弟嘉勒（Don Carlos）呢？還是當時只有三歲的國王的女兒依沙貝拉（Isabella）呢？於是內戰遂起，

其中政治問題和宗教問題糾纏不清。結果擁護嘉勒者戰敗，自由黨便對天主教徒施行強烈的報復。最後同教宗碧岳九世簽訂了協議，承認天主教為國教。

在葡萄牙，兩個覬覦王位者也是互爭雄長，也是天主教教友所擁護者戰敗，勝利的自由黨便對天主教大肆迫害。直到一八一四年簽署了協議，和平才告恢復，但共濟會（Free-Masonry，也稱巧人會或祕密黨）在國內已根深柢固，而資產階級則為反宗教的唯理主義所滲透。

拉丁美洲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拉丁美洲，先後自一八一七至一八二九年爭得獨立。居民除少數原住民外，幾乎全部信奉天主教；可惜神職人員太少，信仰摻雜了許多迷信；兼之共濟會在知識界很活躍，也頗有影響力。

拉丁美洲各國在十九世紀期間，常為革命和政變所困擾，教會亦受累不小；政府隨著政治波動，時而傾向教會，時而敵對，甚至有時公開迫害，就如一八五九年在墨西哥所發生的教難，便是一個例子。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厄瓜多爾。總統莫萊諾（Garcia Moreno, 1821-1875）將它建成一個完全的天主教共和國，並奉獻給耶穌聖心。他的政敵同他誓不兩立，但既不能

以合法手段擊敗他，乃於一八七五年予以謀殺。他雖得知他們已多次圖謀行刺，但仍聲明說：「天主和教會的仇敵可能將我致死，但天主卻是永生的！」

參 自由經濟政策

法國革命以前，在信教的國家中，工人都有行會（Guild）組織，作為工人的靠山，以防企業主獨占權利，妨害同人。這種制度，自中世紀以前便已盛行（請參閱卷二第九章壹節）。

但到了十八世紀末葉，「自由經濟」的制度先興起於英國，繼而傳至法國；它的原則是「聽其自由！隨他去吧！」的放任主義，也就是取消一切經濟和商業的限制，讓工業領袖與工人自由訂立合同，他們深信自由可產生繁榮。

這些原則同盧梭的理論甚相符合；他最憎恨協會，不願在全能的政府和個人之間有媒介。大革命加速了這些原則的實施；它把工人的一切行會取消，建立了自由競爭的制度。假如生產的情形還同中世紀一樣，也就是說假如仍舊是家庭手工業，這種制度或許能產生良好結果；然而當時正在進行產業革命，它對經濟和社會所產生的效果，不亞於法國革命對政治的效果，許多新發明，如蒸汽機、紡織機等，改變了生產的情形，都集中到大工廠去了。但機器的裝置費用十分龐大，只有那些富

有的人——大資本家，才有財力裝置；手工業者不能同大工廠競爭，只有關閉自己的工作坊，改將自己的勞動力售與廠主。產業革命在十八世紀開始於英國，稍後便延伸至歐洲大陸。結果在十九世紀中葉形成了資本社會，它的特徵是造成了兩種社會階級：一種是擁有生產工具的資產階級，另一種是只靠工資生活的無產階級。

雇工的情形

產業革命的好處是生產工廠化，紡織品和金屬品等的價格大為低廉，提升了大多數人的購買力。但這種制度的鐵律——「自由競爭」，卻給工人帶來了嚴重的危機：為了善用機器，便須大量生產；為了使產品暢銷，就得降低價格；這樣一來便得壓縮成本；為了壓縮成本，廠主們勢必要削減工資並延長工時。反過來看，工人方面卻一點保障都沒有，因為規定工作時間和工資的一切法規都取消了，廠主禁止組織工會，免得他們形成一股力量；因此無論條件多麼苛刻，他們都只有接受工作一途，否則難以為生。

從那時起，便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嚴重的流弊，尤其是女工和童工；比如在英國，曾有七、八歲的兒童被迫每日工作十五小時，他們那纖細的腿因工作乏累而軟弱無力，不得不用鐵皮箍起來，以免睡魔侵犯時癱倒在地。

被迫離家到工廠去勞動的工人，成千上萬的集中在新興的城市內，他們的工作力就是他們的全部資產；工人的勞動變成了商品，價格由廠主和工人雙方訂定；維持生計既已日益艱難，致使他們無暇再顧及宗教的義務。

工資低廉，工作時間又不顧人道地任意延長，不但男人，連婦女兒童也被迫去擔任這種過度的工作，結果是處處貧困，毫無公道；這就是絕對自由的效果，使弱者任由強者擺布，一點保障也沒有。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這種自由競爭的悲慘結果勢必會激起反感，於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便應運而生。在法國有聖西門（Saint-Simon, 1760-1825）和普魯東（Pierre Proudhon, 1809-1865）等策劃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呼籲友愛和正義；但他們帶給人們的影響，卻遠不及同樣生活在倫敦的一個德籍猶太人——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他視法國社會學者所提供的解決辦法為「烏托邦」而予以唾棄，他要在哲學和科學的基礎上建立他的社會學說。他的哲學是無神唯物論，方法是辯證法。據他所說，領導歷史過程的不是大人物、思想家或國家的元首，而是經濟的事實：產業革命產生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過度發展，必然引起階級鬥爭和革命，由此共產社會便要出現；在共產社

會中不容宗教有立足之地，註定要被淘汰。

這種學說是徹頭徹尾反宗教的，不只因為它是絕對的唯物論，攻擊宗教為「人民的鴉片」，以期共產社會加速成功，而且也因為它以仇恨和階級鬥爭來代替友愛。

工人的不幸，也引起了有遠見的天主教人士的注意。在法國，由於蒙大郎白爾和自由思想的天主教教友²的奮鬥，使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初步法律得以通過。在德國奠定天主教社會理論基礎的，則是梅因茲主教凱特萊；但一個具有權威的綜合理論，還有待於教宗良十三世在十九世紀末葉所頒的《新事的》(Rerum Novarum)通諭。

肆 教宗碧岳九世與羅馬問題

自由主義所揭起的爭論，於教宗碧岳九世在位時達到了最高峰，在義大利則因「羅馬問題」(The Roman Question)更為複雜。他在位的長久歲月中(自一八四六至一八七八年)，教宗的世權逐漸衰落，終於在一八七〇年完全喪失；但同時教宗的神權，則由於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對教宗「不可錯誤性」的判定，也達到了最高峰。

羅馬問題

所謂羅馬問題，是由義大利努力爭取統一所產生的。自羅馬帝國分裂以來，義

大利只不過是一個地理名詞而已。維也納會議以後，它被分為七個小國：北部的王國，包括米蘭和威尼斯，歸奧地利統治；西北的皮埃蒙（Piedmont）包括杜林城（Turin）在內，屬薩丁尼亞；中部是教宗領土和三個獨立的大公國；南部是那不勒斯王國。

義大利除非兼併半島上所有的國家（連教宗的領土在內），否則不能實行統一。於是政界人士不顧宗座提出羅馬問題的抗議，而實行武力歸併。

這個問題，因遭遇了兩個不容否認且又難以妥協的權利，便顯得更形棘手。

一方面，全義大利的民族原是同種，對它過去的威望感到驕傲，亟思擺脫它被瓜分後的桎梏，自然有權利希望統一起來。尤其自十八世紀以來，作家們便喚起了這種希望；他們將其視為一種政治的需要，這樣才能把他們的同胞從奧國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建立一個強盛的、足以與列強相抗衡的國家。然而棘手的問題便由此而生了：統一後的義大利要求收回羅馬作為首都，它原是羅馬帝國的首都，只有拿它作首都，義大利其他省分才肯甘心順服。

另一方面，教宗不但有權利保衛他領土的獨立自主，而且有不容推卸的義務；這種權利是十二世紀合法取得的——即始於不平的獻贈（Donation of Pepin，請參閱卷二第六章），且為其他國家所一致承認；何況對全球的天主教教友來說，有加以保

留的嚴格義務，那麼這種權利便倍感需要了。實際上，世界最高的神權，在所有國家的心目中，清楚地顯示出它的完全獨立自主，是極端重要的；不過除非它不隸屬於任何政權之下，且在它所在的地方是至高無上的，否則便無法表現出這種自主的姿態。妥協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在義大利民族主義黨中引起極端的分裂，而嚴重地敵視教會。

碧岳九世擔任教宗的初期

教宗國瑞十六世於一八四六年去世後，樞機們選了一位當時不很知名的人來繼位，取名碧岳九世。他的性情活潑而熱烈（青年時曾想當軍人），凡接近他的人，都被他和善愉快的態度所吸引，此外他又非常虔誠熱心。

碧岳九世公認愛護自由思想，實際上自他即位以後，便大赦監獄的囚犯和他前任所流放的人。他施政的初步，表現出他很願以現代的方式治理他的國政：他在羅馬的馬路上裝置煤氣路燈，興建鐵路；他甚至不顧左右的反對，給人民設立了一種憲法和議會，對出版的檢查也取消了。在羅馬從來沒有過任何一位教宗比他更為民眾所歡迎擁護，歐洲的自由思想者都歡呼碧岳九世為他們中的一員。當時有人說：「他好像是天主派遣來使教會與自由互相協調的人。」

假如義大利的民族主義者只期待教宗以自由的方式治理他的國家，那麼他們算是如願以償了；但他們計畫把義大利所有的國家聯合起來，以教宗為首，同奧地利宣戰，把它從米蘭及威尼斯驅逐出境。如果教宗接受這種計畫，一定要被尊崇為義大利的解放者；但他絕不能參加這樣的計畫：他是一切教友的公父，他有愛護所有人民的天職，他絕不願向任何人宣戰。從此他便大失民心，自由主義者轉而撻伐他，並煽動羅馬人民攻擊他。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教宗的國務卿羅西（Rossi）被人刺死；教宗既被圍困在宮中，對教會無法施行治權，乃喬裝易容逃至加艾大（Gaeta），託庇於那不勒斯王國。此時在羅馬便建立了一個共和政權。

這事使天主教的世界大為震動，於是法國應教宗的呼籲進軍占領了羅馬³，同時奧國軍隊也占領了教宗領土的北部。教宗於一八五〇年返回羅馬。但從此法國軍隊便經常留駐羅馬，以保障教宗的獨立與安全。碧岳九世有了這次痛苦的經驗，便對自由思想失去了信心，倒是不難理解。

塵世權力的告終

薩丁尼亞是當時義大利最大的王國，只有它有一支有組織的軍隊；國王伊曼紐爾（Victor Emmanuel）為了自身的利益，妄想統一義大利；又加上一位精明強悍的首

相伯爵加富爾 (Cavour) 輔佐著他，由一八五九至一八七〇年逐漸實現這個計畫。義大利中部的三個大公國，被加富爾所派遣的使者煽動，宣言與薩丁尼亞王國合併；於是伊曼紐爾的軍隊便占領了教宗的領土，只給教宗留下了羅馬城和郊區；另一方面，英勇的加里波底 (Garibaldi) 得到加富爾的祕密援助，率領他那一千名義勇軍——馳名的「紅衫軍」——由西西里登陸，占領了那不勒斯。於是伊曼紐爾除羅馬和威尼斯外，已占領了義大利半島的全部，乃於一八六一年自稱義大利王。

教宗的一支弱小軍隊，雖有由各奉教國前來的志願軍相助，但絕非義大利軍隊的敵手，羅馬城之所以仍能屹立獨存，是靠著法國軍隊的支援；它的前途顯得非常黯淡。事實上，當一八七〇年法德開戰時，拿破崙需要全力抵抗，便把他的軍隊自羅馬調回；義大利政府哪會輕易放過這個大好機會，乃於一八七〇年九月二十日派遣軍隊進攻羅馬。碧岳九世知道抵抗已屬枉然，乃於雙方交鋒未久時下令停戰，表示係被逼處此；他只發表了一個嚴重抗議。

保證法

義大利政府為了避免過分刺激全球教友的輿論，乃自動聲明保留教宗的獨立自主；為此於一八七一年公布了《保證法》(Law of Guarantees)。此法聲明教宗本人

神聖不可侵犯，保證梵蒂岡宮歸教宗使用（只是使用，並非物主）。這項立法，藉著表面的尊重和慷慨，完成了對聖座的掠奪：只是把梵蒂岡宮和花園讓給教宗使用，實際上只是義國政府的一位客人。再說既是法律所制定的，便可由法律來解除啊。教宗絕不能接受這種隸屬，他斷然拒絕了這項保證法和對聖座的施捨，為表示對暴力的抗議，教宗自動禁錮於梵蒂岡宮，自稱「梵蒂岡之囚」（Prisoner of the Vatican），終身未出梵蒂岡一步。

他的繼位者也抱持同樣的態度，持續了五十九年；直至一九二九年，羅馬問題才由教宗碧岳十一世和墨索里尼（Mussolini）所簽訂的條約正式解決。

伍 碧岳九世對教義的功勳

碧岳九世在位三十二年，是聖教史上最長久和最動盪的一段時期；假如他沒有鋼鐵般的意志，早被摧毀了。但那些困擾並未能阻止他對教會完成無與倫比的事業：他除了同世界各國保持關係，並簽訂了許多協議外，還以兩則新信條充實了教會，並對當時的種種錯誤予以嚴正的批判。

裁定聖母無染原罪的道理

聖母瑪利亞始孕母胎未染原罪本來不是一則新的道理，而是溯自聖教會初期的傳統信條。中世紀時，方濟會會士曾著論衛護；文藝復興時代，教宗思道四世（Sixtus IV，在位期間 1471-1484）建立了聖母無原罪瞻禮，並指定在十二月八日舉行。從那時起，對聖母這種殊恩的信仰愈傳愈廣，教友們也非常愛慕；不過教會還未聲明為一則信條，還不至於否認便算異端。教宗碧岳九世於一八五四年對全球主教發了一封信，請他們對這個問題表示自己的意見。在六百零三封回信中，有五百四十六封懇切請求他定為信條。碧岳九世乃於一八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聖伯多祿大殿，當著兩百位樞機和主教的面裁定：「聖母瑪利亞自受孕之初，便被保護絲毫未染原罪」為天主所啟示的真理。

對宣布這則信條，教宗認為沒有召開大公會議的必要；他是以「宗徒聖伯多祿、聖保祿以及他自己的權威」行事的；事實上，他運用了他那「不可錯誤」的特權，十六年後，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鄭重地承認了這個特權。

對近代謬論的譴責

十年以後，即一八六四年，碧岳九世在羅馬問題所激起的混亂思想中，認為揭發當代謬論的時機已經成熟，乃以《多麼大的操心》（*Quanta cura*）通諭及被歷代教宗所譴責的《錯誤的提要》（*Syllabus errorum*）正式加以譴責。

教宗確認反對教會的威脅，並非來自某種或某局部的謬說，乃是來自侵入人類腦海的「自由思想」。這種思想對個人及社會生活的大問題所給予的解釋，與教會的信仰完全不符。在十九世紀中葉有一種對科學的狂熱，認為它能創造奇蹟，可以解釋啟示所已解釋的一切難題；這種狂熱，可與文藝復興時代對人文主義所燃起的狂熱，以及十八世紀對哲學的無限信賴相比擬。

教宗所譴責的是：唯理主義，它否認一切超越自然的啟示；自然主義，它認為社會的建立和治理不需要宗教，而是需要進步；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使家庭完全隸屬於國家；無差別主義，則視一切宗教均等，無高下真假的區別；法蘭西主義，認為教會應在國家之下，受其統治；絕對的自由主義，認為無論何種主張，都應有言論或出版宣傳的自由，不受教會或國家的限制。

這份《錯誤的提要》激起了嚴重的動盪不安。教會的仇敵誣蔑教會箝制一切自

由，阻礙進步，排斥近代的文明⁴，有些天主教教友也感困惑。奧爾良（Orléans）的主教杜邦魯（Dupanloup, 1802-1878）乃起而為教宗辯護，將譴責的真確意義加以說明；他證明教宗的文獻是給教友社會的理想定型，我們當向著這個理想去發展，但並不禁止教友適應目前生活的條件，把生活納入社會中，盡可能使它基督化；然後他又把目錄每節的確實意義講得一清二楚，說明教宗所譴責的近代文明是排除超性的文明。教宗對他這種溫和的解釋當然不會不贊成，遂特別讚揚他對自己的思想闡釋得那般清晰。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

已經很久沒召開大公會議了，最後一屆乃是十六世紀召開的脫利騰會議。百年以來，聖教會備受種種教難，和侵害它基本權利的錯謬道理的攻擊（法蘭西主義、若瑟主義、國家對神職人員立法等）。看來迫切需要的是，澄清教會體制的要點並加以裁定，庶幾在天主教人士中，不至於對此再有爭論。

大公會議於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八日在聖伯多祿大殿開幕，與會的有七百四十七位樞機和主教。第一項要點是關於信德的問題：對人類的理智過分信任（唯理主義）和信任不足的，都該加以譴責；並確定人的理智，無啟示的協助，本身便足以認識

萬物的創造者。主教們對此點意見一致。

及至討論教會體制時，爭辯便集中在羅馬教宗「不可錯誤」的問題上了。憶及康士坦斯會議時，已有過這種爭辯（請參閱卷二第十章參節）：是教宗個人獨享不可錯誤的特權呢？抑或歸於教會全體並在大公會會議時呢？自中古世紀以來，對教宗個人不可錯誤的信仰已在教會中漸占優勢，然而爭辯甚烈；實際上，相信不可錯誤的特權在傳統上無充足證據的主教，為數甚少，但也有些主教認為教宗不可錯誤的裁定，尚非其時。有些主教（為數五十五）在辯論終結之前便離開了羅馬，只為避免發表意見；但他們都向教宗保證忠實並服從會議的決議。在投票表決時（一八七〇年七月十八日），只有兩張反對票，但他們立即表示贊成。碧岳九世於是便聲明裁定教宗的不可錯誤特權，同時也確切地註明了界限：當教宗「由職權」（*Ex Cathedra*）即以全體教友的司牧和最高導師的名義發言，依據他至上的宗徒權力，裁定關於信仰或倫理的道理時，享有不可錯誤的特權。

全球教友都以欣悅的心情接受了不可錯誤的信條。只有德國和瑞士的少數司鐸和教友拒絕接受，並組織了一個分裂的小團體，人們稱之為「舊天主教徒」。

一八七〇年法德開戰，法國軍隊自羅馬撤退，羅馬城歸併於義大利王國。這一連串的事變，迫令大公會議在未完成它的工作前閉會。所以對教會的組織，只討論

通過了關於教宗本身的一章；其餘的只好等到一百年後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再作商議了。

碧岳九世的晚年

碧岳九世在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後又活了七年。他在痛苦事變中的尊嚴，在逆境中的堅貞，以及質樸的慈祥，為他贏得了普世教友日益增強的尊敬。對教宗不可錯誤的裁定更加強了他的聲望。

當教宗在普世的教會中聲望最高時，教廷的領土已完全喪失，教會的敵人甚至預言天主教已臨末日。如今我們回顧後發現，世權的喪失，反倒使教宗擺脫了治理國事的煩擾，對他的神權更為有利；但在一八七〇年時，事態並未如此顯明：就教會的外表看來，這種喪失似乎損及教宗的威望，各國政府也覺得可以毫無顧忌地隨意攻擊教會和她的領袖。在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開會時，連在傳統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像義大利和法蘭西，這種攻擊也有增無減。

註釋

- 1 極端的自由主義被譴責後，在教友中有兩種趨勢：一種擁護溫和自由主義，奧爾良的主教杜邦魯可算是主要代表；另一種對立趨勢的代表則為普瓦泰（Poitiers）的主教比約（Mgr. Pie, 1815-1880），及一位天才報人沃婁（Louis Veuillot, 1813-1883）。
- 2 自由政府的擁護者不一定主張自由經濟，擁護自由經濟者卻往往對政治保守。
- 3 當時法國總統是拿破崙一世的侄子；他於一八五二年帝制自為，稱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他本人並沒有什麼信仰，但為了討好法國天主教徒以獲得他們的支持，他只得援助教宗，至少為他保存著羅馬城。而另一方面他也曾應許過薩丁尼亞王，助他統一義大利。他迫於這兩種矛盾的要求，對「羅馬問題」實在有些躊躇，他雖說派兵去保衛教宗的領土，但總不能徹底作到。
- 4 《錯誤的提要》顯然只羅列了曾被譴責的句子，並沒有陳明所以被譴責的理由，對那些不熟悉神學規則的人，不容易明瞭；何況為了正確判斷被譴責的內容，必須翻閱以前譴責它們的教宗文獻才成。

第二十三章 自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至第一次世界大戰

現世主義時代

一八七〇年不但在教會的歷史上，且在世界的歷史上，都是開啟一個新時代的里程碑；那時，一連串的事變和社會改造，終於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後效仍不停地發展著。

這個時代比較重大的事件是：在政治方面有普法之戰（一八七〇—一八七一），促成了德意志的統一；義大利也實現了統一（一八七〇年）；國家主義在歐洲和南美的進展；開發非洲並建立殖民地；民主思想的普遍抬頭。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則是實用科學的進步，機器的發達，工業的迅速擴張，結果是城市的繁榮和工人的集

中。何況由於交通工具的進步（汽船、鐵路、電訊），不但人及貨物的運輸更為方便，人的思想也能迅速地由世界的一端傳達到另一端；從此在地球的某一處所發生的任何重要事件，很快便會影響到整個世界。

壹 現世主義

受到科學主義與實證主義的影響，一八五〇年代以後，歐洲文化走向「現實主義」（Realism）與「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風格。

無信仰的趨勢日形猖獗

思想和信仰領域內的變化，不亞於社會和政治，對教會（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皆同）感染很深。

十八世紀的所謂「啟蒙哲學」，雖曾反對啟示和基督的神性，但連一個創造萬物的真神也不信的很少。而今連這點信仰也遭受了猛烈的攻擊。那個年代時髦的學說，或是「不可知論」（即主張在經驗的領域之外，無法知道什麼確實的事情），或是「無神論」。

對推翻天主的信仰影響最大的是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

他以為只有能直接觀察得到的事物才能稱為科學。在思想的歷程上他分為三個連續的階段：

(一) 神學階段（或宗教階段），認為一切現象都出於神的意志（即為神所創造）。

(二) 哲學階段（或形上學階段），在抽象的概念中去尋求解釋。

(三) 就是我們所進入的科學階段，不求認識世界的起源和歸宿，只探討現象彼此之間的規律便足夠了。他給這種哲學定名為「實證哲學」，避開「神」、「精神」、「靈魂」等已往都視為哲學對象的一切問題。在這種觀點下，對宗教連否認都不否認，乾脆不談，他認為那些過時的事，已沒有談論的價值¹。「實證主義」主張，科學方法是唯一獲得知識的方法。他們認為，運用觀察、分類、探求事物彼此間的關係所獲得的知識，才是正確可信的。

然而除非有替代品，否則無法把宗教完全取消，因此應該供給人心所需要的一種崇拜對象。孔德想用他所神化的人道來代替降生成人的天主。他為這個新宗教擬定了一種禮儀、一種日曆和許多節目，一切都模擬著天主教的敬禮；他預料有一天在巴黎的主教座堂中，「人類的塑像」將取祭臺上的苦像而代之。這個新宗教比起大革命時所建立的類似敬禮並沒有更大的成就。但孔德思想的本質——拿人道來代替天主——卻對十九世紀末葉的思想，在不知不覺中有了很深的影響，就如人對所

呼吸的空氣本無所覺一樣，且在有意無意中對許多現代人的思想也有不少的感染。

還有其他思潮朝著同樣的方向激盪；許多人被科學驚人的進步沖昏了頭，以為科學是萬能的，科學的幸福日子不久便可來臨。不幸的，如所周知，物質愈進步，假如道德不同時進步，將帶給人類更惡劣的浩劫，比如原子或核子戰爭。然而人人憧憬著進步，進步一詞真是漫天飛，成了一種時髦的口號，在書籍報章雜誌上到處可見，人們甚至談到「科學的宗教」。

對聖經的攻擊

所謂哲學家不只是攻擊信仰，他們還攻擊聖經。德國基督新教的解經者自十八世紀以來，便以歷史批判為名，攻擊聖經。他們懷著唯理主義的成見，認為奇蹟和超性都是無稽之談，凡聖經中同他們的理論不相容的，都視為神話或傳奇。例如史特勞斯（Strauss, 1808-1874），在一本《耶穌傳》（*Das Leben Jesu*）內（自一八三五年出版後風行一時），稱奇蹟和基督的復活是由祂的門徒發揮想像力所偽造的。

這種思想，被一位天才作家勒南（Renan, 1823-1892）一講，便更加不脛而走了。勒南原是巴黎聖蘇比斯（Saint Sulpice）修會的一名修生，在二十歲時喪失了信仰；一八六三年他也出版了一本《耶穌傳》（*Vie de Jésus*），雖然有好些人對作者的歷史

方法嚴加批評，但此書因不具學術理論且通俗化，因而很受大眾歡迎；兼以文筆流俗諧和，美妙動人，對他是一大成功；西歐各國很快就有了譯本。他把福音經中同他觀念不合的盡行刪去，雖然對基督極口稱讚，但卻剝奪了唯一重要的天主性；這樣祂已不能算是救世主，只是一個講了高妙道理的人，是人類的光榮，但終歸還是人，「加里肋亞（Galilee）的溫和幻想者」，一樣有人性的弱點和幻覺。

馬克斯主義

資本主義的進展也助長了工人的無信仰。成千上萬的無產階級放棄了他們生長的農村，湧向大城市，同他們的長輩失去聯絡；勞工像商品一般的出賣，生活的掙扎愈來愈尖銳化，對宗教便無暇顧及了。馬克斯對民眾說宗教是鴉片，社會用以麻醉人民以便奴役他們；所以為了解放人民應取消宗教。這樣的理論能在無產階級中得到響應，自然不足驚異，因為它許給他們在世上即可獲得幸福的天堂，那是資本主義所不能給予的。

現世主義

信仰無神共產主義的人當時尚未取得政權，也還沒有對信仰天主公開宣戰。在

我們所研究的這個時代中（一八七〇至一九一四年），教會遭受政府不少的攻擊，但除了幾處例外，還未達公然流血的迫害；鬥爭是在現世主義的藉口下進行的（現世主義或稱世俗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及崇拜的主義和實踐，英文為 *Secularism*，法文為 *laïcisme*）。

現世主義在十九世紀末葉十分風行，就如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中葉十分風行一樣。它也仿照自由主義，用了各種曖昧的說法。它本身只說是有意把俗事和宗教的事分開。假如提倡現世主義的人真的只限於把國家的權力同教會的權力公正地分開——教宗良十三世當時已講得很清楚——他們何至同教會衝突呢！但他們在現世主義的藉口下，實在是想用一種新的觀念改變人的生活。許多現世主義的煽動者是無神派；無論如何，他們都同意這一點：宗教應從公共和社會生活中完全取消；至多可拿它當私人事務而予以容忍。現世主義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無宗教的社會。法國政客剛伯達（Gambetta）所喊出的「教權主義，那就是敵人」（*Le Clericalisme voilà l'ennemi*），成為現世主義的口號。「教權主義」這個名詞的本義，是神職人員過問國事；但此處這個名詞所指的就是宗教，特別是針對天主教，這在當時宗教鬥爭的歷程中極為顯明。

現世主義的方法

在以現世主義的藉口攻擊教會的各國中，戰鬥進行的方式和持續不斷的情形，顯示他們的目的是真的要從學校和社會中，把宗教思想完全消滅。無論在法國、比利時、義大利、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都是用同樣的辦法（正如同後來極權國家想消滅宗教時所用的手段一模一樣）。因為宗教的信仰已深入人心，勢難正面攻擊，所以他們才一步一步地慢慢進行；他們的戰略是：

- (一) 先解散修會，然後再採取適當的步驟逐漸使神職人員的來源枯竭；
- (二) 從教會手中奪回教育權交還政府，以便使各級的教育世俗化；他們要求學校中立化，就是要以尊重兒童的良心自由為名，使他們擺脫宗教的一切影響；其實是想從兒童的良心中把天主攆走；
- (三) 取消在教會內結婚的一切合法效力，必須在政府的官吏面前舉行結婚儀式；同時並制定保障離婚的法律；

(四) 最後教會同政府完全分離。

這種持續的反宗教行徑，可由共濟會的活動來解釋；這種祕密會表面雖不顯著，卻在各處活動（請參閱卷三第十七章壹節）。共濟會於法國革命以前所鼓吹的自然

神教，在法國這一支和由法國所分出的，已逐漸消失；到了十九世紀，他們已從其規章中，把「宇宙大建築師」之名抹去，決心變成無神派；仇恨教會已成了他們活動的主要動機。在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南美的大多數國家，許多政府的要人都是共濟會員，向來遵循黨方的指示行事。

這是十九世紀末葉攻擊教會的影響。慶幸當時教會有一位見識特別高明的教宗為領袖，就是良十三世，他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的計畫後來又由教會尊為聖人的一位教宗——碧岳十世（St. Pius X，在位期間 1903-1914）——來繼續實行。

貳 教宗良十三世

良十三世

當良十三世在一八七八年被推選出來繼承碧岳九世為教宗時，已是高齡六十八歲的老人，外表看似脆弱，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竟能展開他那堅強的活動力達二十五年之久。他出身於羅馬望族，曾作過教廷駐比利時大使，隨後在教廷的領土內作了三十二年帕魯查（Perugia）的主教，思想和事態的轉變都是他所親身經歷的。他埋頭深思想出了整個道理和實行的計畫，在漫長的在位期間，予以推行。他的智

慧晶瑩透闢，對教會忠誠熱烈，對政治有尖銳的敏感度，能分辨何事行得通，何事則否。

良十三世的大原則

教會對所面臨的暴力，直到那時是怎樣應付的呢？自革命以來，它只是保持消極自衛的態度，以前的教宗為維護道理的純潔發出了許多譴責和懲罰。治理教會的神長，約有一世紀又三分之二的時間，都是在革命所激起的混亂中成長起來的；他們親眼所見的患難，使他們對自由主義感到強烈的恐懼，他們認為教會的一切災難都導源於自由思想，除了根絕這些原則，看不出其他解救的辦法；他們動輒以開除教籍來攻擊時髦的文化。許多天主教教徒，與企圖恢復舊制（革命以前的）的政黨沉澱一氣，彼此聯合起來；然而這是向失敗者表同情，因為愈來愈明顯，過去的就算了，歷史是不能逆轉倒流的。

良十三世洞燭了此中的危機，深知無信仰的浪潮，只靠反對接受新思想是無法制止的。如果教會以反動的力量出現，民眾便要同它脫離了。必須避免教會與現代的世界完全破裂；對過去空懷悲嘆無濟於事，應該採取有建設性的態度。良十三世既公然揭示了原則，又堅決地維護自己的前任們所持守的道理，盡力使教會與現代

的世界協調；他願意分清什麼是原則，什麼是可指責的傾向，什麼是可接受的事實，應當把基督的精神灌輸到可接受的事實中去。

對迷信自由的人，教宗向他們指出提倡自由所有的好處，並證明教會時常爭取自由，且付之實施。自由非放任，更非一味順從自己的情慾，而是使自己的行為遵循我們本性的法律，符合理智。聖教會固然屏棄縱情恣慾或使人成為偏情奴隸的無節制自由；但如果每日所產生的進步確實能增進此生的繁榮幸福，且又能導致永生，教會將以全力去擁護。

教宗又轉向公教教友，把初期教友的榜樣指示給他們：他們不是藉由悲嘆當時的傷風敗俗，也不是憑靠詛咒羅馬皇帝的政府而征服了世界，乃是用自己的善表去滲透，使天主教的真理和原則在社會中起作用。他說：「什麼也沒有比福音經的格言和倫理，同外教人的格言和倫理更格格不入的了」；可是人們眼見教友「威武不能屈」，竟勇敢地踏進他們所選擇的一切生活方式。他們對政府首長完全盡忠，在許可的範圍內盡力奉公守法，他們在各處放射著聖德的美妙光輝，努力服務他們的弟兄姊妹，吸引別人追隨我們的主；可是他們常準備著，假如保持祿位榮譽或軍職有礙他們的良心，他們便率然放棄，甚至迎向死亡亦在所不惜。他們就這樣很快地把信仰傳入家庭、軍中、政府、甚至「羅馬的皇宮」內了。現代的教友如能追隨這

樣的榜樣，一定也能獲得同樣的成績。這是良十三世所給的指示，他並且囑咐在實行時要符合聖座和主教的規定。

許多偉大的通諭

在良十三世以前，任何教宗為訓誨和領導教會，不曾公布過那麼多的通諭，且都是有關係條或倫理的專著，把福音不變的原理原則，貼合在世界經常變動的環境中。良十三世一連串的通諭，構成了莊嚴道理的整體，使繼他位的教宗們仍繼續予以發揮。

革命的騷擾和戰爭，大學的俗化及許多修會的摧毀，使教育水準一落千丈。良十三世願重新予以強力的推動。他深知沒有天主教的哲學，便沒有天主教的思想，堅固的神學，因此當從恢復天主教的哲學著手。他並且在即位之初，便以《永遠之父的》（*Aeterni Patris*, 1879）的通諭，要求人們讓出第一把交椅給聖道茂（St. Thomas Aquinas）的哲學。他並非輕視其他聖師的道理，乃是因為聖道茂學派的理論，對科學與信德，啟示與理智，教會與國家等怎樣調和的大問題，更容易解釋而已。

一八九三年所發的《至眷顧的天主》（*Providentissimus Deus*）通諭，是恢復聖經研究的出發點。良十三世在其中指出註解聖經的原則，並說聖經的真正註解，應符

合傳統又符合批判的要求。

為促進宗教歷史的進步，良十三世毫不遲疑地給普世的學者——連非公教徒也不例外——打開了梵蒂岡的祕密檔案室。有些人感覺不安，生怕被人發掘出令人駭怪的資料；教宗用下面的一句話杜絕了悠悠眾口：「聖教會所需要的只是真理」。

教宗並以全力維護公教大學的建立，和神學院的讀書精神。

他推行這一切的目的很顯明：教會在研讀的道路上，當走在現代世界的前面；應該使教會能在崇尚學術的世界中宣傳真理。

在一連串討論動搖人心之問題的通諭中，都顯示出他見識的遠大，像是自由的真諦，基督精神的國家組織，基督精神的民主、政權、教友的婚姻等問題。不過這些通諭哪一道也趕不上論工人地位的《新事的》通諭那樣著名。

《新事的》通諭

無產階級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社會主義的進展，國際間的組織，以及各處對這問題所掀起的討論爭辯，促使良十三世給全球的教友們，指出了指導勞工組織的規範。

自拉梅內和《展望》時期起，這些問題便引起了天主教人士的注意，曾有不少人試圖解答³。自一八八四至一八九一年，關心這些問題的教友和神學家每年在瑞士

的夫里堡 (Fribourg) 交換意見，策畫一種共同的理論；不過這只是些私人的討論，無權以教會的名義說話。何況在天主教的教友中，還有好些爭論未決之點，比如：為解決社會問題應喚起人們的愛德和慈悲呢，還是正義呢？應靠私人倡導呢，還是靠政府協助？抑或應靠行會？資方與勞工的公正報酬是什麼？

為此，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新事的》通諭出現了，其中的問題和答案都是以高度的觀點考慮而得，也表現了他的天分。教宗把勞工不應得的悲慘處境揭發出來：「毫無保障地任由不人道的廠主支配，成了貪得無厭之競爭的犧牲品；吃人的高利貸，工商業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經營，這一切都給無數勞苦的大眾加上了奴隸般的桎梏。」

教宗拋棄了自由經濟的解釋，說那是使人與機器無別，視勞工為一種商品，任由雙方指定的價格買賣，它對工人的不幸和階級間的仇恨，應負大部分的責任。然而共產主義不但不能改善這種情形，而且變本加厲；它建基在唯物主義上，因此不承認人的真正命運；它否認人與生俱來的所有權；它鼓勵階級鬥爭，那是直接違反基督的愛德。社會問題的真正解決之道，是在符合正義規則的勞工界組織；政府為保障勞工階級的生活和利益，有權利且有義務干涉；要之，廠主和工人應成立協會，保障他們的利益，解決工人的生計問題。

教宗若望廿三世（St. John XXIII，在位期間 1958-1963），在紀念《新事的》通諭七十週年的《慈母與導師》（*Mater et Magistra*）通諭中，有這樣的贊辭：「很少有過教宗的言詞，以所談題目的深刻廣闊和衝擊的力量，比它更具有普遍的反應。它給教會的活動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最高的牧人，把貧賤和受壓迫者的痛苦、怨嘆和希望，當作自己的，再一次挺身而出，作他們權利的保衛者。」說實在的，全世界，不只是教友，都很驚奇通諭所啟發的高貴感情，和它解釋問題的正確性。人人都譽之為「勞工的大憲章」（The Magna Carta of the Workingmen）。它給天主教的教友布置了也擴大了社會的運動；到處可見社會事業熱鬧地展開，也可見到教友們提倡，使符合通諭原則的法律得以通過成立，按照公正原則在廠主和勞工之間建立起關係，強調、指出勞工的尊嚴，在物質和道德方面都提高了工人的地位。

良十三世與德國

良十三世滿懷協調的熱忱，也多次對許多國家所制訂的反宗教法律提出抗議。在這點上，他最關心的是三個新組成的政府：日爾曼帝國、法蘭西共和國和義大利王國。他在位期間，教會與這三個國家的關係就很緊張；後來教宗同德國建立了和平關係，可惜他雖滿懷善意，也擁有外交天分，對法國和義大利的成績卻微乎其微。

信奉基督新教的普魯士，統一了各個獨立小邦後，於一八七一年建立了日爾曼帝國。天主教教友只占全民的四分之一。首相俾斯麥（Bismarck, 1815-1898）一方面因為崇信基督新教，一方面因為施行專制政體，所以對天主教強烈敵視；他為反對聖教會，曾進行歷史上所稱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因為在他的心目中，打擊天主教便是為文化鬥爭！他採用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五年間所通過的一連串法律，努力想把教會完全置於政府控制之下。他剝奪了修會人員的教育權，把所有修會會士驅逐出境，一開始先向耶穌會開刀，次及其他修會，強迫修生在國立大學攻讀神學；教會人員則由政府任命（率皆基督新教）。

主教們對這些剝奪教會自由的措施自然是提出抗議；有不少的主教遭受了禁錮；數百位司鐸遭遇了同樣的命運，也有被放逐的。

俾斯麥既以他堅決的意志被人們賦予「鐵血宰相」的稱號，可見其絕不讓步，非打倒聖教會不可。他曾聲明說：「我們絕不去坎諾薩堡（Canossa）！」——那是影射亨利四世（Henry IV）向教宗國瑞七世（St. Gregory VII）懺悔的事（請參閱卷二第七章貳節）。他估計天主教教友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反抗，不料他們卻組織了一個政黨，名叫「中央黨」（Zentrum），在幾位有分量的領袖領導之下，紀律非常嚴明。例如凱特萊主教，還有一位天才政治家同時又是卓越的天主教教友，名叫溫陶爾

(Windthorst)，他們在國會中代表著一分力量，得不到它的支持，宰相是不能統治裕如的。俾斯麥終於決定讓步，作了一次「小型的坎諾薩堡」。剛即位的良十三世，以他那精明的外交手腕助了他一臂之力。於是中斷了十年的外交關係又重新建立起來；反宗教的立法逐漸取消，直到一八八七年才完全絕跡。天主教的中央黨愈戰愈強，教會很快地重新建立起她全部的學校、醫院、大學及無數的教育和社會協會，到十九世紀末葉，已成了天主教世界的模範。

一八八五年俾斯麥作了一件創舉，這對一位基督新教政府的人物來說，可算是驚人的，也證明教宗的聲音達到何等的高峰。當時對於太平洋上加羅林羣島 (Caroline Islands) 的占有問題，在日爾曼與西班牙之間起了爭執，俾斯麥呼籲由教宗作仲裁人，西班牙表示同意。良十三世所擬的仲裁協定雙方都接受了，這樣便避免了兩國以兵戎相見。

良十三世與法蘭西

日爾曼的天主教教友在國中雖占少數，但服從他們的領袖——主教和教宗，由於他們出奇地團結，得以迫使俾斯麥宰相讓步。反之在法國，天主教教友占著極大的多數，但在以現世主義為名攻擊教會的鬥爭中，卻不能獲致勝利，恐怕人免不了要

驚奇，這是由於環境不同。首先當說的是，反對宗教的言論、伏爾泰的譏諷（他的著作在十九世紀傳播得很廣）、實證主義、馬克斯主義等，帶給人心的影響很大，消滅了或者說是減弱了一切較深刻的宗教生活，所剩的只是天主教的外表儀式罷了，如洗禮、結婚及殯葬等等。何況教友在政治立場上已四分五裂。在六十年之間，國家經歷了六次革命，各種政體輪流接替，每種政體都有自己的擁護者。拿破崙三世下臺以後，只以一票之差過了共和，在主教和神職人員中，許多人都希望政治的形勢轉變，重建一個有利於教會的君主政體。他們對共和政體甚少認同，而國會中的「激進黨」不久又占了多數，激進黨黨員雖然對許多問題意見分歧，但對仇恨天主教這一點倒是很一致。他們都自視為法國革命的繼承人，其中加入共濟會的也很多，並認為假如不是現世主義的信徒，便不能作個良好的共和國民。一八七七年，他們的一位領袖人物甚至以宣戰的口吻說道：「教權主義，那就是敵人。」

首先遭受攻擊的是學校。法律明文規定初級教育為義務教育，這本來是很可稱讚的，但在一個大多數國民信奉天主教的家可就大不相同了，因為已經規定教育不該具有宗教色彩，表面上是中立，實際是反宗教的。無論如何，一切宗教教育被屏於校門之外了⁴。

下一步便是攻擊修會，首當其衝的是耶穌會，之後便及於其他修會，他們只好

四散奔逃。反對教會的一方所玩的花樣很多：規定神職人員有服兵役的義務，禁止宗教性的遊行，准許離婚的立法等。

不難了解天主教人士對當政者以各種方法欺侮他們是多麼的苦悶，然而他們卻未能採取一致的行動作出有效的反抗。良十三世密切觀察法國事變的動態，痛惜國家對宗教的敵視及由此萌生的邪惡，但他也認清了愈是拖延，愈難恢復君主政體。於是他建議法國的教友們，不要把宗教的問題同政體的形式問題連在一起。他說：在這方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愛，只不過法國選擇了共和。共和政體一如其他政體是合法的，本身並無所謂好壞。教友最好是平和地接受這個既成事實，以便在它的統治下設法改善反宗教的立法。

為符合教宗的希望，許多教友犧牲了自己的愛好，對共和表示了贊同，但這並不足以平息反教者的仇恨；苟安了幾年之後，攻擊又變本加厲地死灰復燃；這次攻擊是由一名名叫公勃（Combes）的叛教修士所發起的，他以冷酷無情的姿態恣意攻擊。一連串的立法觸及殘存的修會：他們或被貶至羞辱而無法接受的地位，或者被迫解散，財產全部充公。最後，甚至嚴禁修會人士辦理各級教育機構。這樣一來，一切修會會士，無論他們擁有什麼學問技能，或任何證件，或已往如何效力過，只因他們曾發過修會聖願，就都被視為無資格教學。正如在天主教學校內，大部分的

教師不是修士便是修女，這條帶給天主教教育致命打擊的法律，無疑的達到了它的目的。實際上這條法律的發動人公勃誇稱，將有一萬三千九百零四座學校遭到關閉。

良十三世調解法國與天主教的努力顯然失敗，教宗異常悲痛；對教會的攻擊在他死後又延續了數年，但良十三世長久的忍讓，在教宗聖碧岳十世在位時，終於產生了效果；再也沒有善心人士，緊抱天主教與舊社會的制度分不開的成見了，人心也逐漸平服。

良十三世與義大利

良十三世對義大利則保持著碧岳九世所採取的同樣堅強的態度，他仍堅持他的前任對剝奪教廷領土的抗議，然而反神職主義在義大利也同法國一樣猛烈。殘存的修會解散了，羅馬的修道院被充公，神職人員也得服兵役，學校排斥宗教教育，政府任由報章雜誌對教宗恣意凌辱誣衊，即使公開輕蔑教會與教宗，政府也不加以制止。當碧岳九世的遺骸遷葬時，這些惡行達於極點，無羈的暴民險些將教宗的靈柩投入臺伯河中，政府也不加以彈壓。事態之嚴重達於頂點，以至於教宗數度想放棄羅馬，避居國外。在這樣敵對的情形下，羅馬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參 教宗聖碧岳十世在位期間

良十三世於一九〇三年以九十三歲高齡去世，樞機們選舉了一位出身微賤的撒爾托樞機（Card. Sarrio）繼任。他在作威尼斯宗主教以前，曾任副本堂、本堂、神學院教授等職，嗣後升任曼土亞（Mantua）主教；所以他對牧靈工作有過長期的經驗，但促使樞機們選舉他的理由，無疑地是他聖德的名譽，凡是他所駐留過的地方都是有口皆碑的。他是一位非常慈祥又極熱心極謙遜的人；他絕料不到他會膺選，因為他去羅馬參加選舉時買的是來回票，並且在戰慄流涕之下才接受了這個重任。儘管他賦性溫良，卻很堅決：當他認為天主的利益遭受侵害時，總是百折不撓地維護。在他整個在位期間，他常盡力實現他所選擇的格言：「在基督內建設一切。」

碧岳十世與法國

當碧岳十世即位時，宗座與法國政府的關係已極度緊張；一九〇三年法國政府同宗座斷絕了外交關係，且把一世紀以前拿破崙所簽的協定取消，宣布政教分離；這種分離卻是在最嚴酷的條件下完成的：不但對神職人員已商妥的待遇被取消（這是一件顯然違反正義的事，因為這種待遇是革命時被充公的教會財產的賠償），政

府並且聲明它是教會一切財產的主人：大殿、聖堂、學校、修道院、主教住所等都包括在內。專作敬禮天主的建築（聖堂），交由地方所選的委員會自行處理，而委員會卻大都是由世俗人員組成。為避免教會的財產被完全剝奪，有些人答應參加這樣的委員會。碧岳十世在深思熟慮之後，拒絕接受這種剝奪教會合理的自由且能導致裂教的處置。他並非不知道他這種決定，可能導致法國教會的財產被剝奪一空，神職人員要被迫度赤貧的生活；然而法國的全體主教對教宗表示一致的服從，使人為之喝采稱讚。始料未及的是，法國政府鑑於天主教教友這般堅強不屈的態度，竟然不敢徹底執行這條立法：主教公署、修道院、學校予以充公，但保留聖堂，讓神職人員和教友們自由使用。

法國的教會雖已一貧如洗，卻也因此而更加淨化，更堅強有力。全國教友團結起來，應付這個新事態：由於他們的慷慨解囊，使得新修道院、新醫院、新學校又紛紛建立起來。這種「政教分離」，在現世主義信徒的心目中，認為必使法國教會遭受致命的打擊，不料卻反倒成了它蓬勃的良機。

現代主義

碧岳十世對現代主義（Modernism）事件，表現了同樣的睿智和堅決。這是一種

微妙的錯謬思想，是幾位神學士和幾位奉教的思想家所絞盡腦汁想出來的；他們想使天主教教義同現代的思想協調，那也是教宗良十三世曾嘗試的一種思想方式，用意並非不善。但所不能接受的，是現代主義者以協調為藉口，卻染上了反宗教的毒素，馴至要顛覆信仰的基礎；不但不能保衛必須堅守的信條，反而想使信條遷就現代的需要而變質；其他人甚至想否認福音經所記載事件的歷史價值；認為一切所謂「超性」，都應視為無稽的神話，不足置信。

堅持這種學說的為數實在不多，但都是些神學院或大學的教授，和具有影響力的作家⁶，教宗深怕這種謬論逐漸滲入神職界和有知識的教友，最後傳染全體教徒。何況那些現代主義者聲言並非反宗教，乃是要從內部重新加以改造（其實是使它完全變質）；當他們被教宗譴責時，外表毫不遲疑地表示屈服，但仍繼續以筆名散布他們的邪說。

碧岳十世洞燭它的危險性，表現得非常堅強有力；乃於一九〇七年在《因悲嘆的》（*Lamentabili*）通諭和《應牧放主之羊羣的》（*Pascendi dominici gregis*）通諭中，揭發了現代主義的謬誤，並毅然予以絕罰。他們大都屈服了；只有少數幾個表示反抗，且叛離了聖教會。現代主義從此一蹶不振，從基督新教改教以來，這個威脅完整信仰的最大禍害，便完全被屏除了。

碧岳十世的革新工作

以上是碧岳十世為保衛教會的獨立自主和信仰的完整所做的決定，但他建設和革新的工作也很重要。特別是對於教友生活中心的聖體聖事，施行了顯著的改革。

脫利騰大公會議曾經勸告教友多領聖體；但十八世紀在許多地方流行的楊森主義（Jansenism），沒有完全消逝。十九世紀末葉雖有一股逆流推動人們每日領聖體，但對積習已久的風氣難以扭轉過來。碧岳十世毅然斬斷這個問題，他在一九〇五年公布了一道上諭，聲明：「參加每臺彌撒的教友，不可只神領聖體便認為已足，希望他們實領聖體。」只要靈魂上沒有重罪，並有正直的意向，便可以每天領聖體。

以前的習慣，年屆十二歲或十二歲以上的兒童，始准領聖體。碧岳十世規定：兒童只要按他們的年齡知道此為救靈最緊要的真理，並曉得聖體與普通麵餅不同，便該準備讓他們領聖體。這兩道上諭，對領聖體給了很大的鼓勵，至今不衰。

碧岳十世在晉升教宗以前，對牧靈的職務已有多年經驗，對教會管理上的許多弱點有了親身的體悟。當時教廷的組織，還是三個世紀以前思道五世（Sixtus V.，在位期間 1585-1590）所擬訂的；他為適應時代的需要，全部予以改組。《聖教法典》包括一大堆法律、教宗的上諭和決議案，經過多世紀以來的積累，已屬漫無頭緒，

難以檢核；碧岳十世決心加以整理。他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命他們負責彙集整理，訂成了一部明確而合乎邏輯的《聖教法典》，與現代國家的民法相似；這個繁鉅的工作，直到碧岳十世逝世後，才由他的繼位人完成公布。

碧岳十世對禮儀也有改革；他是聖樂的復興者，恢復了國瑞聖樂所應有的地位。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和同時代大部分人的眼光不同，早已看出那個醞釀已久的戰爭將特別慘烈，且要禍延全球。也曾呼籲各國教友熱切祈禱，希望避免戰爭。某交戰國人士曾請求他祝福他們的武器，他回答他說：「我們祝福的是和平。」對這場人類自相殘殺的悲劇，他因未能阻止，感到非常痛心，使他提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開戰後兩星期，他便棄世了；舉世痛失慈父，對他的聖德備加欽敬。四十年後，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在位期間 1939-1958）將他正式列入聖品：這是自碧岳五世以來，第一位享受這項榮耀的教宗。

註釋

1 孔德的錯誤，是他所說的三個連續階段，其實是對事物三方面的三種思想方式。真正的進步是把這三方面清晰地分開，因為實際上三者是共同存在的，彼此並不排斥。形上學和神學並不反對以自然律來解釋宇宙間的問題，只是進而把這些自然律同它們的來源聯繫起來，由宇宙的秩序推究創造並制定這些律例的真神——天主而已。

2 勒南於一八四五年十月六日離開了修會；值得注意的一項巧合是：兩天後，即十月八日，該世紀最著名的一位皈依者——紐曼，脫離英國聖公會而進入天主教（時年四十五歲），因為他長期研究歷史的結果，深信只有天主教是基督的真教。

3 在天主教社會理論的倡導人中，引證幾位如下：德國有凱特萊主教，良十三世稱他為「我的大前輩」；英國有馬寧樞機；法國有理論家「松樹之塔」（*La Tour du Pin*, 1831-1924）；一位工業家良·哈爾美（*Leon Harmel*, 1825-1915），一位演講家亞爾伯·得蒙（*Albert de Mun*, 1841-1914）；義大利有道尼奧老（*Toniolo*, 1845-1918）教授；奧地利有臥各桑（*Vogelsang*, 2-1890）；瑞士有代古爾丹（*Decurtins*, 1855-1916）和麥爾米勞主教（*Mgr. Memillod*, 1824-1892）。

4 天主教人士固然能開辦私立學校，學校內也能教授宗教。但這種體制非常不公平，因為這樣的私立學校得由教友擔當全部經費；然而他們一如所有的公民還得繳納維持公立學

校的經費，這樣為維持私立學校便得額外增加很重的負擔。為避免這種不公平的現象，應當由政府不分立私立津貼所有學校，或由政府津貼家庭，任由他們選擇學校，教育自己的子女。這樣的制度已在各國實行，例如比利時和荷蘭，法國亦於一九四五年實行。這種制度就能保證家庭有選擇學校的自由，也不至於過分加重他們的負擔。

5 若按廣義的信仰自由來說，政教分離的制度，對教會可能是一種完全自由發展的機會，比如在美國便是如此；但在法國制訂這項分離法的人用意卻非如此；他們是想用這種方法先把教會在物質方面弄垮，最後好使國家完全俗化。

6 主要的現代主義者，在法國是羅依西（Loisy），在英國是梯瑞爾（Tytell），在德國是篩肋（Shell），在義大利是穆利（Murri）和小說家弗戛匝勞（Fogazzaro）。

第二十四章 教會在十九世紀的內部生活

看了前面幾章，很可能會這麼想：聖教會為了攻斥過激的自由主義、唯理主義、實證主義、馬克斯主義、現世主義、現代主義等，採取防衛的姿態，已筋疲力盡，無暇顧及其他了；這只是膚淺的看法，未能窺見其底蘊。在教會的歷史中，視線最先接觸的，自然是些外表的事變，像是同政府的糾纏爭辯、同世俗權力的鬥爭等等，這只是事件的一面，也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深藏在內部的情形，也就是內部的生活和聖寵在人靈魂內的行動。想衡量一個時代精神生活的程度，絕非易事：精神生活不能以數字統計。不過一個時代的宗教活力，也會把它的效果表現在外：我們在前面的幾卷中也提出了證明，例如由神職人員的虔誠熱心所表現的高度宗教生活，新教會的興起，表現英豪德行的聖人，最後還有英勇的傳教士，他們以驚人的熱情去向教外人傳布福音。這都是自法國大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時期，教會活力最顯著的特徵，而且最應注意的是：教會奮鬥最激烈的地方，信德的表現也最好。

聖教會在內憂外患交迫之下，被自己的幾個不肖子出賣，面臨著嚴重的困難，甚至仇敵聲言她要一敗塗地了；然而她在十九世紀不但屹立不搖，還產生了新的力量。說十九世紀是一個宗教到處式微的世紀，顯見是大錯特錯的。在許多老教友的国家，無神論騙去了不少信徒，很多領洗的人只擁有教友的虛名，那倒是不能否認的，然而另一方面它卻證明了比前一世紀更大的活力。

壹 神職界的重振

教區神職界

革命和拿破崙的戰禍，給神職界帶來了嚴重打擊；不但許多神父死亡或逃散，神職人員的來源也幾乎枯竭。

但和平一恢復，教宗和主教們所關心的大事之一，即設法發展或創建神學院，以挽救這種情勢。所期待的效果果然浮現；將近該世紀的中葉時，神學院已告客滿，一八七〇年，義大利的教區神父有七萬名，達到了最高峰，法國有五萬六千名，西班牙也是最多的時期。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品質；但在十九世紀後半期，神職界神修生活的水準，無論

是主教或神父，都已顯然提高，這是那一時期教會史上最重要的一點；因為人們已多次驗證，教友精神生活的水準，要看神長的精神生活如何而定。每日的默禱，每月的小退省，每年或每兩三年一次的退省，幾乎普遍奉行。愈熱心的神父，也必然更勤勉工作；他們不以作彌撒、施行聖事、講解教義為已足，他們在自己工作的園地——本堂區內，展開各種方法，培養、增強教友的精神生活，成立各種善會。他們更以學校來補充本堂區的活動。如果信仰是一致的，只需本堂神父監督公立學校便夠了；倘若公立學校不講述或反對宗教，神父便籌辦私立學校。為創辦和支持這些私立學校，神父必須不斷地喚起教友們慷慨捐助；為建立偌大數目的學校，而且逐漸推廣到西歐和北美合眾國，需要好大一筆經費。

聖衛雅

當碧岳十一世願給所有的本堂神父提供一位模範時，便選擇了這時期的一位神父，他除在鄉間任本堂神父外，一生沒盡過別的職務。

若翰·衛雅（St. John Mary Vianney）是里昂教區熱心農民的子弟，他同父親一齊在田野工作，直到二十歲；他是在革命期間長大的。他在兒童時，曾給被剝奪人權的神父們在密室作彌撒時輔過祭。他固然很熱心，但他後來之所以能光芒萬丈，絕

不是因其學識出眾，因為他的資質魯鈍，對升任神父所需要的拉丁文和神學，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剛好及格；但比學問和書本更有價值的，是他賦有一份非常健康的思想和意識，而且判斷力準確，尤其他的謙遜和不平凡的聖德格外輝煌。時人常說：「只消一看他（作彌撒），便足以相信超性的事理。」

當他担任亞爾斯（Ars）本堂時——那只是一百三十多人的農村，教友還十分冷淡，上酒館的比進堂的人多。他必須同對宗教冷漠和花天酒地的惡習奮鬥，是非常艱苦的，然而幾年之後，農村完全改觀了。那完全是他講解和說教的功效，不但是因為他的言詞能深入人心，尤其是他的榜樣，他那貧困的生活和他那幾乎不能令人置信的刻苦，更是有力的身教；他所吃的，只是幾片剩的麵包和兩個或三個星期煮一次的馬鈴薯，還是只吃剩的、冷的；此外他還常苦鞭自責。他自持愈嚴，待人卻愈寬宏良善。

他的名聲愈傳愈遠；一開始是鄰近的堂區請他講道理聽告解，不久便有許多人自動來到亞爾斯，為了看這位聖人並聽他講道，另外則是向他討教、辦告解；因為人們都知道這位神父的學問雖然不很高，天主卻賜予他非常的光明，他有識透人心祕密的特恩，能揭露人的良心。多少罪人從他那兒回去，便同天主和好了！多少困惑不安的人獲得了安寧！多少對自己的聖召遲疑不決的人獲得了光照和勇氣！還有

許多本來沒有信仰，而只因好奇心的驅使特來觀察的人，驚奇自己的祕密被揭穿而產生了動搖！當時的交通雖不甚好，可是不但從法國或歐洲各地，就連遙遠的美洲，都有不少社會各階層的人，普通的人和重要的人物，知識階級的人，神父、主教等，湧向亞爾斯去；長達三十年之久，平均每年有八萬人。

聖人絕無求名之心，他為救人靈魂甘心承擔繁重的後果：他每天關在告解亭裡十六至十八個小時聽告解，冬天冷得發抖，夏天悶得要死；他子夜後不久便去告解亭，只在早晨五點作彌撒和十一點講教義時才出來，下午一直聽到夜深才去睡一會兒。這種累死人的工作，直到七十三歲（一八五九年）去世時才告結束。

大願修會的復興

復興的情形，在修會方面比在教區神職界還更值得注意。自十八世紀以來，大願修會（Religious Orders）比其他任何組織更成了眾矢之的。耶穌會的被迫解散，是這場鬥爭中最慘痛的一幕，其他修會吃的苦也不少。若瑟二世（Joseph II）在奧地利一下子取消了六百座修道院。法國革命和戰爭時期，把剩餘的全部加以毀滅，以致在天主教的歐洲，修會幾乎完全絕跡。

情勢剛剛好轉，復興工作便呈現出教會有史以來未有的現象。自一八〇四年教

宗碧岳六世復興耶穌會以後，一八五〇年會士便已超過六千名，十九世紀末葉已有一萬二千餘名。本篤會雖未完全消滅，但在暴風雨時修道院已所剩無幾，而殘存的也未能保存其修會原有的精神。那時有一位偉大的會士祁朗緒神父（Dom Guéranger, 1805-1875），在法國復興了本篤會，他把索來斯木（Solesmes）修道院振興起來，以後成了復興禮儀和國瑞聖樂的中心。拉高爾代在法國重建了道明會。除了已喪失原有精神的，和在革命大亂時完全消滅的幾個大願修會外，幾乎所有的古老修會，都恢復而且興盛起來。

新創的小願修會

最具這時期特徵的是小願修會（Religious Congregations）的蜂起，數目之多，幾乎令人難以置信。歷數十九世紀，幾乎每年至少有一兩種新的男或女修會產生。自一八〇〇至一九一四年這段時期，究竟創建了多少修會，幾乎無法統計¹；光法蘭西一國，便建立了一百多種男修會，三百多種女修會。其他各國，如西班牙、義大利、比利時、愛爾蘭、加拿大、瑞士等，發展的情形也大致相仿，只是不及法國那樣廣泛而已。正是在這個時期，流行著一種笑話：連全知的天主也不曉得究竟有多少女修會，更不曉得她們彼此不同的服裝。

這些新成立的修會，很少度默觀生活，古老的修會在這方面已經夠多了；大多數是獻身於各種傳教活動。有些是專門為了在外教地區宣傳信仰而建立的，但多數是在奉教國家和傳教區擔任同樣的工作。產業革命所造成的新情勢，帶給精神和肉體兩方面無數的災害，如無知、貧窮、疾病和兒童及老人的被遺棄；針對這些災難，許多新型的修會出現了。連教會的敵人，對這些為了愛基督而放棄世俗，獻身於一種忠忱的生活，也禁不住驚奇稱讚。

為了簡便起見，這裡我們只提分布最廣或最為熟識的幾種修會：在法國產生的有無玷聖母會（*Oblates of Mary*），散布之廣，自北極至錫蘭和澳洲都有；非洲有白衣傳教神父（*White Fathers*）、畢布斯會（*Picpusians*）等；在比國建立的有聖母聖心會（*Scheut Fathers*）；在荷蘭有德國神父所創立的聖言會（*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他們是在文化鬥爭時被驅逐出境的；在義大利有慈幼會（*Salesians of St. J. Bosco*）和一位德籍神父在羅馬所立的救世主會（*Salvatorians*）。此外還有專門獻身教育青年的聖母小昆仲會（*Little Brothers of Mary*，也稱 *Marist Brothers*），在中國服務者很多；衛道會（*Clerics of St. Viator*）是在法國建立，但卻在西班牙和加拿大最為興盛²。

這時期所創立的女修會更加難以數計了；為針對各種需要，並為救助各種痛苦，真是應有盡有；有的獻身為教育青年女子，如聖心會（*Society of the Sacred Heart*）。

是聖女德蓮索非 (St. Madeleine Sophie Barat) 所創立的：安老會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專門收容無依的老人；善牧會 (Sisters of the Good Shepherd) 專門救濟墮落的女子；拯亡會 (Helpers of the Holy Souls, 今改名為拯望會) 是以服侍窮人所立的功勞救助煉靈；以上不過是新興修會羣中的幾種而已。

聖鮑思高

在一切新興的修會中，誰也比不上鮑思高 (St. John Bosco, 1815-1888) 的慈幼會傳播得那樣快；在所有創立修會的會祖中，誰也沒有聖鮑思高在生前及死後那樣出名。

聖鮑思高並不是蓄意要創立修會，乃是在時勢的巧合中看出了天主的聖意，有意讓他創立一個修會，於是便創立了慈幼會。這位有「孤兒之父」之稱的鮑思高，早年受了他母親的良好教育，自幼便覺得天主教在號召他；為響應天主的號召，他必須辛勤工作，以便掙得所需要的學費。一八四一年晉升神父，先被派作杜林城的副本堂。就是在這座大城裡，他開始認清了成千被遺棄的兒童在街頭閒晃，所遭受的身靈兩方面的危險，甚且導致坐牢。鮑思高對人心，尤其對青年們，有特殊的感召力；不久便有上百名兒童投奔他；他便決定奉獻自己的一生，為兒童服務；他戰勝了種種困難和反對，終於找到了一個收容難童的地點。他隨即組織了夜校；天資好

些的，受過完全的栽培後，便擔任老師教育其他兒童；如果有人發現自己有作神父的聖召，他便幫助他們去完成。以後為了使兒童們能學些技術，他又建立了一些工廠（他最愛印刷術，因為他深知出版事業能有好影響，也能有壞影響）。

為了使事業能持續進行，鮑思高乃建立了慈幼會；在他去世時已有九百名會員，現在可說是會員最多的一個修會，有兩萬一千多名會員，在全球各地從事教育事業，特別是在傳教區，受他們教育的青年有百萬之多。他又創立了母佑會（*Daughters of Mary Help of Christians*），以教育青年女子，現在也有一萬五千多名會員。

鮑思高在教育上，嚴格與慈愛並施。他的教育方式，是預防邪惡比糾正邪惡更要緊，盡力避免強制和體罰，設法以善表和信任影響學生，努力用宗教的力量（如勤領聖體、勤辦告解以及孝愛聖母等）誘導學生向善，這樣也容易使他們習修德行。

鮑思高不但是無與倫比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優秀的寫作者和實行者。教宗良十三世曾請他斡旋教會和義大利政府的衝突。他的超性生活極深，常受神見和神聖顯現的啟發及鼓勵，傳說他也行了不少奇蹟。他也非常平易近人，是聖人中最具吸引力的一位。

教會人員的學識

十九世紀的神職人員，大都有良好的德育，對傳教也表現得積極熱心。若問他們的學識是否也相當可觀？那得承認，至少在十九世紀前半，他們學識的水準還不甚高；這是受時勢所迫，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為當時缺乏神職人員，為了維持本堂區的敬禮和宗教生活，在鄉村佈道，給大眾施行宗教的基本教育等，不得不採取救急的辦法，而執行這類的職務，神學院的普通教育便足以應付了；這樣一來，神學、聖經以及教會歷史等的深入研究，就不免被暫時擱置了。

然而對這種缺陷也不可過甚其詞。我們在二十一章已經見到，德國的大學是當時高深學術的中心；我們也曾說過，像德國的莫勒或多林格，法國的拉高爾代，英國的紐曼等，在知識界所擔任的角色。在整個十九世紀當中，常有出色的護教者，不過就大體來說，他們只能盡衛護的責任，未能將反宗教者的攻擊完全駁倒。為了對付孔德、馬克斯、勒南的攻擊，得有像聖道茂（多瑪斯）那樣的博學鴻儒才成；但那樣的天才學者當時確實沒有。

在該世紀的末葉，教會的學術大有復興之勢，其後繼續發展，直至二十世紀的今日。士林哲學在良十三世的推動下有了很大的貢獻；這個復興的主要倡導人之一，

是梅謝樞機 (Card. Mercier, 1851-1926)。他在魯汶大學內，曾致力使道茂派哲學與近代的科學相協調。

教會學術復興的另一原因是天主教大學的重建：魯汶大學於一八三四年重新建立以後，法國、瑞士、北美合眾國以及加拿大等國的大學，都在十九世紀的末葉紛紛建立起來。

對於聖經的研究，天主教教友也晚了一步。基督教徒（像史特勞斯）或唯理主義者（像勒南）所用的基本方法，天主教的解經家都不敢信任而予以採用；他們深恐採用反對派所用的方法會有誤入歧途的危險。慶幸有些學識淵博的人並不作如是想，他們認為：歷史的真理絕不會同信德的真理相衝突，歷史性的批判，如果不超越歷史的範圍，應該有助於保衛信德。走這個路線最卓越的，當推拉崗熱神父 (Fr. Lagrange O.P., 1855-1938)，他是耶路撒冷聖經學會的創立者，並且一生領導該學會，栽培了不少傑出的解經家。他不顧某些天主教集團的猜疑反對，對這使人驚奇的學習事業，持續了半世紀之久。

貳 靈性生活

楊森異端懸擬天主為嚴肅而高不可攀的威權主宰，給十八世紀的靈性生活烙上

了冷酷嚴峻的印象。這種思想的痕跡雖然持續了很久，但十九世紀在這方面卻有鮮明的反擊；人們漸被引向熱心的路線，感情和外在的表現都活躍起來，這是由於勤領聖事和勤行正確的敬禮的緣故。這種熱心最突出的一點特色，就是以耶穌為中心；也就是說，教友們의 思想和祈禱大都偏向天主聖三的第二位，聖父和聖神有時好像被忽略了。對聖體和耶穌聖心的熱心敬禮，就是這種傾向的最顯著表現。

對聖體的敬禮

對聖體的熱愛崇敬，在熱心教友的生活中，地位愈來愈重要，特別是朝拜隱藏在麵形之下的基督。「四十小時明供聖體」和「無間晝夜的陪聖體」禮，已普遍舉行；就是把聖體在教區的各大小堂內明供出來，讓教友們輪流朝拜；又加上了夜間的朝拜，目的是為賠補耶穌在聖體內所受的凌辱。聖體降福和聖體遊行也增多了。

這種敬禮最盛大的表示是全國及國際的「聖體大會」，即某一國家或全球各處的教友聚集在一處，公開崇拜聖體內的耶穌。發起這種敬禮的並不是神職界人員，乃是一位名叫達彌謝（Emile Tamsier）的普通教友。這樣的大會，第一次是一八八一年在法國北部里耳城（Lille）舉辦的。以後，先是每年一次，隨後每兩年一次，一次比一次多人，有時多至百萬，成羣結夥的去參加盛大的國際聖體大會。

若不勤領聖體，算不上真正熱心敬禮聖體。在該世紀的初期，使人少領聖體的楊森餘毒還沒有完全絕跡；連在許多修道院中，普通的習慣只是每星期領一次聖體。然而也有一個反對的潮流正在展開，更因為聖碧岳十世勤領聖體和兒童早開聖體的上論而強大起來。

對聖心的敬禮

在敬禮基督的各種方式中，有一種也在此時逐漸在教友的熱心中取得了地位：那就是對聖心的敬禮，也就是敬禮吾主對我們的愛情，而基督的血肉之心，是這愛情活生生的象徵。這種敬禮本是教會早就有的，只是在給聖女瑪加利大（*St. Margaret Mary*，請參閱卷三第十五章貳節）的多次顯現之後，才傳播開來而已。這很適合教友們的熱望，且對楊森的嚴厲思想和該世紀枯燥的唯理主義，是一帖解毒劑。一八五六年教宗碧岳九世命全體教會慶祝耶穌聖心瞻禮，算是正式批准了這種敬禮。之後，又確認每月「第一個星期五」為特敬聖心之日，舉行「聖時」作補辱的工夫。教宗聖碧岳十世又命每年將人類奉獻於耶穌聖心，這些都是這項敬禮的顯著發展。一八六一年，兩位法籍耶穌會士高特萊（*Fr. Gautrelet*）和拉米耶（*Fr. Ramière*）所創立的祈禱宗會，也是受聖心敬禮的啟示，會員每月按照教宗所批准的特殊意向，聯

合於耶穌聖心祈禱領主。這個善會已普及全球。

敬禮聖母

假如十九世紀可說是「聖心的世紀」，那麼更正確的說法恐怕是「瑪利亞的世紀」。虔誦〈玫瑰經〉和慶祝「聖母月」（五月為特敬聖母月），已成了教友普遍的習慣，此外聖母會及以聖母為名的修會更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標以聖母聖名的女修會，更是屈指難數。神學士們更專心研究天主之母的種種特恩：這都是特敬聖母的標誌。一八五四年，教宗碧岳九世欽定聖母無染原罪為信條，更增加了信友們對聖母的孝愛。

天主又用聖母的多次顯現，鼓勵這種熱心的運動，這帶給教友們很深的印象，全球都有良好的反應。就如一八三〇年聖母顯現給一位仁愛會修女佳琳·拉布萊（Catherine Labouré, 1806-1876），命她使人鑄一種聖母聖牌：顯示由聖母手中射出萬道祥光，象徵由她的轉禱所獲得的聖寵神恩：這就是所稱的「聖母顯靈聖牌」。

在聲明聖母無染原罪為信條後四年——即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一日至七月十六日——在庇里牛斯山一個叫露德（Lourdes）的小村，聖母顯身給一個十四歲名叫伯爾納德（Bernadette Soubirous）的少女，竟達十八次之多。當少女問她是誰時，顯身者

答說：「我是始孕母胎未染原罪者」。教會的神長們一開始甚表懷疑，但有許多絕症的治療，無法以自然的理由解釋，這才被迫相信了顯現的確實性。到山洞上所建的聖所去朝聖的愈來愈多，起先是由法國各地，隨後由全球湧來，奇蹟不斷出現³。

一九一七年世界第一次大戰正在進行時，聖母在葡國法蒂瑪 (Fatima) 顯現給三個兒童，並通知他們耶穌願在全球建立聖母無玷聖心的敬禮。自此以後，法蒂瑪便成了朝聖聖地，可同露德媲美。

默禱與禮儀生活

可別以為十九世紀教友們的熱心，只限於外表的敬禮，每日舉行默想神工的也不限於司鐸；教友們也常行「停止課外活動的退省神工」，安享默禱的神味，由此獲得了抵抗自然主義的神力。

這種深入的個人內修生活，是一種莫大的進步。不過教友生活的實質面——集體敬禮——尚未明朗化。教友的靈性生活，是時代精神的反映，因為那是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盛行的一個世紀。培養教友熱心的，不只是正式禮儀，其他同禮儀相關的也有助益，如聖體降福、聖體遊行和聖心及聖母月的舉行等。然而禮儀的真正意義，尤其禮儀中心的彌撒聖祭，一般教友尚未完全了解；因此只見教友們望彌撒時，

多不顧彌撒的經文禮節，每人只管念〈玫瑰經〉或其他與彌撒聖祭毫無關係的經文，也就不足為異了。

但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在重整法國本篤會的神父祁朗赫的影響之下，禮儀的真精神才慢慢地復興；他在這方面可稱開路先鋒，他以半世紀不倦的努力，首先在德國，以後在其他國家，引起了很大的功效；這實在是二十世紀展開的禮儀運動的先河，直到碧岳十二世及最近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大力推動，才達到了鼎盛時期。

宗教藝術

禮儀生活是與宗教建築和宗教聖樂緊相聯繫的：宗教建築供給施行禮儀的場所，聖樂可使公共祈禱和讚頌天主的情緒圓滿地表達出來。十九世紀宗教生活的高潮，本可使我們相信，這兩種藝術將在十九世紀大放異彩；豈知絕非那麼一回事，反之，這個世紀為對兩種藝術卻是一段停滯不景氣的時期。

這個時期固然建造了不少聖堂，可是對宗教建築的獨特風格毫無表現。在該世紀開始時，人們按照古典式建造，還有希臘、羅馬建築的風味。以後浪漫主義使中古時期現代化，於是人們又欣賞起中古建築藝術的傑作了；他們看出在羅馬和哥德

式內，有宗教建築不可超越的典範，只好從事模仿。當時所建的無論是法國或德國本堂區的聖堂、供人朝聖的露德聖所、紐約或北京的（北堂）主教座堂等，都是模仿中古時期哥德式的作品，而巴黎致命山上的聖心大殿等，卻是羅馬和拜占庭合璧的作品。只是到了二十世紀，建築師才按照時代的風氣，用新的材料建造新式作品。

聖樂本來是協助禮儀祈禱的，而且國瑞聖樂已達到了黃金時代；但在我們所研讀的這個時代卻不其然；當時在堂內奏樂很多，歌也唱得不少，不過多次在舉行禮儀時只是奏些交響曲，而不是表現教友團體祈禱的樂曲，慶幸還不至於採用世俗樂曲——那最好是在戲院演奏而不宜在聖堂。

但在該世紀中葉已有了更新的趨勢；那是導源於國瑞（額我略）聖樂的復興。這種決定性的推動也是由祁朗緒和索來斯木的本篤會士發起的，隨後由當時在德國盛行的一種歌詠團體繼續推動。十九世紀末葉，一位生活在巴黎的比籍天才大風琴演奏家佛蘭克（César Franck, 1822-1890），深具宗教的靈感，他造就了一批出色的弟子。伯勞西（Percosi）在義大利復興了古典合音曲。

聖人

十九世紀聖德出類拔萃的司鐸、修士、修女以及普通教友，較任何世紀毫無遜

色。聖教會對此雖素稱穩健，但也冊封了大批的真福品和聖品，還有不少尚在教廷審查之中。我們已描述了幾位大革命時的殉道者、傳教士、修會的創立人，以及像衛雅那樣的本堂神父和聖碧岳十世那樣的教宗。此外還該一提愛德的英雄，例如聖高刀藍高（St. Joseph Cottolengo, 1786-1842），他在杜林建立了「主顧小宅」（Piccola Casa della Provvidenza），是一間專靠隨時捐助來支持的收容所；最後竟擴展成一座小城，收容了八千名病人、殘廢者、老人和瘋癲者，另外有一千名修女和兩百位神父給他們服務。至於英勇的傳教士也不能忽略不提，留待稍後再詳述好了。

應當注意的是，這些聖德的英雄，不只是神職人員或修女中才有，普通教友中也不少；只就教會已正式列品的人中引證幾位：真福塔伊基（Anna Taigi, 1769-1837）是一位家庭主婦；聖沙維豪（St. Dominic Savio, 1840-1857），是聖鮑思高的一個學生，去世時才十七歲；聖熱瑪（St. Gemma Galgani, 1878-1903）是一位藥劑師的貧窮女傭，卻修到了神祕生活的最高峰；聖高萊第（St. Maria Goretti, 1890-1902）是一位為保全自己的貞潔而致命的十二歲少女，兇手想姦污她，她抵死抗拒，兇手遂以匕首將她刺死⁴。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小德蘭

在這些聖人聖女中，誰也沒有聖女小德蘭（St. Thérèse of the Child Jesus, 1873-1897）出名。這位於一八九七年在法國西部一個無名的小城里修（Lisieux）隱修院中逝世的二十四歲聖衣會青年修女，誰能想到二十八年後，便在全球的歡呼聲中由教宗碧岳十一世列入了聖品呢？這般迅速而又輝煌的榮耀，真是史無前例。

德蘭出生於中產階級的家庭，世代宗教氣氛極為濃厚。她四歲喪母，自幼受四位姐姐和極虔誠的父親撫育。十五歲時，戰勝一切反對和阻撓，進入了聖衣會；她的兩位姐姐已先她而進入該會，第三位也隨後進入。她矢發聖願後，恪守聖衣會的規矩，度了九年另幾個月的靜默、祈禱和苦修的生活。最後因結核症棄世；葬禮不用說極簡樸，伴她入土的只有幾位親友。在隱修院的幾年中，外表同其他修女毫無特異之處；沒什麼顯著的作為，也沒顯過奇蹟；她的同會姊妹們（有三位是她的同胞姊妹），至少直到她臥病不起時，好像並未猜想她有什麼卓越的聖德。

然而她剛一去世，便開始在里修城由近及遠地紛紛傳說，一位聖衣會的小聖女去世了。她死後一年，她的一本自傳（*Histoire d'une âme*）便出而問世；數月之後，便有成千上萬的人索閱，不久便譯成了三十五種文字。這樣一來，這位里修的小德

蘭和她給世人帶來的天上消息，便風行全球了。她在死前曾說：「我願以施惠於地來過我在天的生活。」實際上，由她的轉禱而獲得的神恩異寵和奇蹟，的確是指不勝屈。教宗應大眾的請求，縮短了以前為列品所要求的延遲；碧岳十一世於一九二三年宣布了她的真福品；又於一九二五年，當著空前眾多的民眾，將她列入聖品。這位聖女雖然一生未出隱修院一步，卻在兩年後被立為傳教區的主保，與聖方濟·薩威（St. Francis Xavier）並列。

神嬰小道

小德蘭給世人所帶來、世人也踴躍奉行的信息究竟是什麼呢？她在去世前曾聲明說：「我知道我的使命就要開始了，我的使命是使人愛天主如同我那樣愛祂，要把我的小道送給人靈。」她所賴以成聖的「小道」，是「神嬰小道」；她曾這樣描繪說：「就是使我們在天主懷中成為謙卑渺小的一種心情；深知自己的軟弱，卻大膽地依恃著天父的大慈愛。」這個方式，是由生活中的無數小事實，提取進步的持久方法。謙遜誠實地接受與時俱來的歡樂和痛苦，完全盡好自己的責任，無論怎麼困難，也要尋覓各種機會，對人表示愛情和幫助，加給自己惟求天主知道的小克己犧牲：這一切都要以愛心去實行，就是愛慕愛我們如子女的天主。

但不要因为她的名字和她的道路上所標的這個「小」字（小德蘭，神嬰小道），以及她文筆的天真誠樸和她那美麗的比喻「玫瑰花雨」等，而使我們誤解，以為神嬰小道只是些幼稚好玩的玩意兒，不需要多作努力；反之，這種不斷的犧牲克己，比有時作件輝煌的大事所需要的毅力還要大。小德蘭不但常以微笑擔承嚴厲的會規和長期病痛所加給她的痛苦，還甘心樂受公共生活所有的衝擊，和上司們對她的誤解；這一切都是她擁有真正英雄氣魄的明證。但最驚人的還是她所受的考驗，連她的姊姊們都不曉得，那就是多年困擾她的心靈黑夜和疑慮。然而小德蘭深明「諸聖相通功」的道理，她進會修道就是為了拯救人靈。天主使她明白唯有痛苦才能實現她的願望；她也了解十字架的真諦，因此特別愛慕而把它們奉獻給耶穌。

小德蘭曾寫道：「我感覺天主號召我作使徒、聖師和殉道者。」她雖從未出離過隱修院一步，卻以祈禱和犧牲拯救了無數靈魂；這就是碧岳十一世立她為傳教區主保的原因。她對吾主所說：「你們除非變得相似孩童，不能進天國」這句話，恐怕比任何聖師都了解，也最能使世人了解其真意。她將全部生命獻為愛情的犧牲，證實了她臨終前所說的這句話：「只有愛情算數。」

註釋

- 1 教廷年鑑 (Annuario Pontificio) 上所登載的修會 (教區的修會不包括在內) · 半數是十九世紀所創立的。
- 2 衛道會的創立人該爾博神父 (Fr. Querbes) · 聖母司鐸會 (Marist Fathers) 的創立人高林神父 (Fr. Colin) · 聖母小昆仲會的創立人真福尚巴拿 (B. Champagnat) · 他們三位都是聖衛雅在修道院的同窗。臺中的「衛道中學」即是衛道修會的加拿大籍會士所創辦的，迄今校譽卓著。
- 3 伯爾納德後入修會，在修道院中隱居了一生，於一八七九年去世：一九三三年由教宗碧岳十一世列入聖品，關於露德的顯現和奇蹟，請參閱顧保鵠所編著的《露德之聲》(光啟文化事業出版)。
- 4 高萊第在一九五〇年被列入聖品，她的母親曾參加列品典禮，這是史無前例的。刺殺她的兇手已經懺悔改過，並在一座修道院中參加了他那位犧牲品的光榮。
- 5 聖女的行傳，是她本人奉長上的命令分三期所寫的自傳：她的長姊在她死後將那三段自述彙集在一起，把敘述的語氣稍加修改，命名為《某人的心史》，很快便不脛而走，傳遍了全球。直至一九五六年，聖女的手稿才印刷行世。中文版最早有馬相伯譯的《靈心小史》(上海土山灣版)和蘇雪林女士譯的《一朵小白花》(香港真理學會版)；以上

兩版都是根據她長姊所潤飾的底稿翻譯的。一九六三年（民國五十二年），光啟文化事業始請張秀亞女士根據聖女的手稿重譯一遍，名之為《回憶錄》。

第二十五章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至梵蒂岡 第二屆大公會議

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顯示了人類矛盾衝突的開始，但戰後並未結束；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只是暫時停戰，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卻埋下了「冷戰」的種子。

結束第一次大戰的和約，使歐洲的版圖大為改觀。奧匈帝國被分裂為四個獨立國家：奧地利共和國大都為天主教教徒，已淪為次等國；匈牙利本為天主教國家，基督新教徒比較少些；捷克斯拉夫的國民大多數為天主教教徒，但也有少數基督新教或裂教徒，政府則為共濟會所操縱；南斯拉夫則熔東正教、天主教和回教於一爐，由東正教徒掌握著政權。此外自一七九五年便喪失獨立的波蘭，又復興了起來。

大戰以後，歐洲無論戰勝國或戰敗國，均已力盡筋疲；北美合眾國的經濟卻反

而大見繁榮，世界的領導權也自歐洲移到美國；東方的日本也躋身世界強國之林。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最堪注目的一點，是極權政府的產生：俄國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統治，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Bolshevik，亦名激進黨）戰勝，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於一九二二年取得政權，建立了法西斯黨；德國不肯接受凡爾賽條約，希特勒（Hitler）組織了國社黨，也稱納粹黨（Nazi）。

壹 教宗本篤十五世

本篤十五世與世界大戰

大戰爆發後數星期，碧岳十世便與世長辭；他已盡力避免戰爭，及見警告雙方無效，極感痛心，遂加速了他的離世。在這混亂時期統治教會的重任遂落在了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在位期間 1914-1922）肩上；他本是外交出身，外表瘦小，但極為聰明。

本篤十五世深為此次戰爭的蹂躪和災難所震懾，何況對將來的慘痛後果，他比從事戰爭的人看得更清晰，因此便決心設法使戰事結束，最低限度也要盡力阻止擴大。提倡和平，努力重建秩序，顯然是教宗的職責；以他為教友公父的身分來說，

他自然當不偏不倚地嚴守中立，但他這種態度，卻招來交戰國雙方無理的對待，雙方都誣他袒護對方，所以對他的斡旋，雙方都不願接受。

他對和平的看法既不為人所重視，他便盡力減輕戰爭的災禍；於是不分國籍和信仰，對交戰國的傷患，一視同仁地予以收容救護；他說服了雙方優待俘虜，遣送傷號回鄉，搜尋失蹤者，救濟飢荒者……他又籌畫了偌大數目的金錢，或取諸私囊，或來自教友的捐獻，以便贍養由戰事所蹂躪的地區收容來的兒童，並在戰爭結束後救濟俄羅斯和中歐的難童。至少這種宗教博愛的輝煌表現，為他贏得了普遍的稱讚。

本篤十五世與和平

戰事終了時，既然教宗一貫的主張是重建和平，在決定世界命運的和平會議中，不就應該要邀請他為仲裁人才對；不料義大利政府竟反對教宗參加會議，以後成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時，也拒絕教廷派代表參加。殊不知他對正義及平等的和平呼籲，在當時是最重要不過的，因為衝突雖已中止，但一方面只圖滿足他們的貪慾，另一方面民族主義的宣傳卻未能平服，教宗已預料到，凡爾賽和約不但不是真正和平的開始，且是再一次浩劫的前奏曲。

不過本篤十五世雖處在這般困難的環境中，卻不停止奮鬥；在他最後三年的歲

月中，展現了他偉大外交家的天分，同新興的國家達成了一連串的協議，同斷絕外交關係的國家又恢復了邦交，比如瑞士，就是因為教宗在戰時的博愛行動，使許多人放棄了他們的成見。在法國也是一樣，他們在二十世紀初葉所懷的那種反神職界的情緒，在大戰期間也逐漸消弭了。驅逐會士的法律雖未正式撤銷，重返祖國的會士們卻沒有再被騷擾。法國在一九〇四年同教廷中斷的外交關係，終於在一九二〇年得以恢復。

對義大利的關係，也有了鬆弛的跡象。本篤的幾位前任，自羅馬被占領以來所宣布的禁止參加政治活動的命令，他也予以取消，並為解決羅馬問題開始談判。可惜困難重重，在他生前談判仍未能成功，但已給他的繼任者打開了應走的路線。

有一個數字足以證明本篤十五世在位時，教廷的聲望不斷地上漲；在他就職時與教廷通使的國家只有十五個，在他逝世時已增至二十七個。

對教義的活動

本篤十五世的活動並不限於外交方面。他本是一位教育程度很高的人，因此對教會的學術，尤其對聖經的研究，常盡力推動。他建立了統攝修道院和大學的聖部。雖有大戰的紛擾，卻未能阻止他公布《聖教法典》，那是他的前任所開始編輯的。

教宗對全聖教會普遍關懷；他特別掛慮的有兩大目標：即東方教會和傳教區域。他在一九一九年公布的《夫至大》通諭（*Maximum Illud*），是近代教宗對傳教所發偉大通諭中的第一道；他以一種強大的魄力強調培植本地神職人員的重要性。相傳他在臨終時所念念不忘的仍是「傳教」一詞。

本篤十五世在位七年，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四日去世，一種輕微的病症便結束了他六十八歲的生命。假如他在位更久，而又遭逢太平的時節，無疑會成為一位偉大的教宗。可惜天不假年，致使他沒有時間實行他的抱負，但在許多方面他已採取了步驟，使他的繼位者有蕭規曹隨的便利。

貳 教宗碧岳十一世

就身體方面來說，碧岳十一世不像他的前任那樣羸弱，因為他出身義大利北部中產階級的家庭，比較健壯。他以前的生涯，不像是做大事經大陣的準備。一直到六十歲，他完全是過著學者的生活，先是在神學院作教授，後三十年則在圖書館擔任館長，先在米蘭，後在梵蒂岡；他在盡這些職務和著作之暇，會到一所修女所辦的學校，為兒童們講解要理；暑假期間，則是到阿爾卑斯山最險峻的山峰去爬山。

然而本篤十五世卻能識英雄，一九一八年遴選他為宗座巡閱使，派他到新興的

波蘭去視察。三年之後果然脫穎而出，顯示出他的外交才能在艱苦環境中的魄力；於是升他為樞機並委任他為米蘭總主教。他在總主教任內只五個月，便膺選為教宗。

如果說良十三世的特徵是天縱聰明，碧岳十世的特徵是聖德超羣，那麼碧岳十一世的特徵無疑是大無畏的精神了。他的智慧當然也不低，尤其因為經常鑽研歷史，顯得更為尖銳；不過在他身上最顯著的，還是由他人格所流露出的權威，和他那百折不撓的堅強魄力。在次要的事件上他能妥協讓步，但當天主和教會的利益受到威脅時，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避開他所畫出的路線，任何威脅都不能使他戰慄，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退縮。他在位的十七年期間，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未曾削減。

在基督的王國內建立基督的和平

「在基督的王國內建立基督的和平」，這是碧岳十一世在位期間的偉大理想，也是他在第一道通諭《天主的奧祕》(Arcano Dei)內所揭櫫的：在人心、在家庭、在社會內建立和平。為此他藉由公教進行會和傳教工作，在世上推廣天主的國，因為只有在天主內才有真正的和平。碧岳十一世雖堅持教會不干預俗事，那是國家的領域，他卻攻擊無神的現世主義，聲言政府也應遵守道德和精神的原則，人在公共和私人的活動中，都有遵守天主永久法律的義務。

基督不但該在個人心中為王，祂且是全人類的主宰；碧岳十一世就是根據這端真理建立了「耶穌君王瞻禮」，命令普世每年在十一月最後的主日舉行慶祝。

和解的教宗：拉特朗條約

本篤十五世雖然在位不久，卻表示有意恢復教廷與各國的邦交。碧岳十一世繼續這個政策，在樞機加斯巴利（Gasparri）襄助之下（他於本篤在位時已是教廷的國務卿），不但努力與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且欲簽訂協議，以保證教會行使其權力的自由，調整有關教會和政府的各項問題，如關於任命主教，及教育和婚姻等。歷代教宗，誰也沒有比他簽訂的這類協定更多，也沒有一項協定比得上「拉特朗條約」那般響亮。

教宗的領土被剝奪，碧岳九世和他的繼任者提出抗議而構成「羅馬問題」，已經歷時半世紀以上了。本篤十五世曾與義國政府談判，但未成功；碧岳十一世繼續談判；一九二六年談判進入決定時期；此時墨索里尼已取得政權，且實行獨裁。他本人雖無信仰，但願結束這困擾義國國民的尷尬局面；他深知如能同宗座達成協議，定可名垂千古。他一再地重複著這句話：「能解決羅馬問題的人，定是最偉大的政治家。」困難的確很大，致令他們在極度的機密中談判了三年，終於在一九二九年

二月十一日於拉特朗宮簽訂了兩項協定。因為教宗願就簽訂此條約之便，將聖座與義國政府間的其他政治問題，也一併解決。

教宗深知在這經濟和軍事的強權時代，教宗的獨立和聲望，與教廷領土的大小無關；最重要的是教宗不能作任何世權的附庸，他應享有一國元首的獨立自主之權。但聖座的無上權力不能只是虛擬的，須有領土為根據，領土的大小倒沒什麼關係。條約承認聖座對梵蒂岡所包括的聖伯多祿大殿，以及教宗的宮殿和毗連的花園（面積有四十四公頃），有絕對的最高主權；此外還有岡道爾夫別墅（Castel Gandolfo）和羅馬城中的幾座建築，都享有治外法權。在這樣的條件下，教宗毅然決定永久消除羅馬問題，並承認義大利王國以及羅馬為首都的事實。實際上，碧岳十一世是「為了精神的最大利益，而滿足於物質的最小利益」。

教宗願使協議與條約緊緊連在一起，這使聖教會在各方面都獲得了滿意的結果；他不但聲明天主教為義大利的國教，且規定凡涉及政治和宗教的事項，均應遵照教會的法例調整；作為天主教教友，由教會締結的婚姻享有一切法律上的效果，故須受《聖教法典》的管制。一切小學和中學都須教授宗教科。

這種協議的締結，在義大利獲得了狂熱的接受，在全球提高了聖座的聲望。

公教進行會

碧岳十一世有「公教進行會的教宗」之稱，實際上，在他的言論和公文內，這個問題出現過百次以上，足以證明他是多麼重視這個問題。

自教會開始以來，教友便參加了傳播福音的工作；其實那就是實行人人有責的基督愛。到了十九世紀，教友熱望衛護並擴展教會的團體，在各國增多起來。良十三世深知這個教友使徒的工作，為了獲致圓滿的效果，必須統一指導才成。這個在主教們領導之下的教友使徒工作，聖碧岳十世將它命名為「公教進行會」(Actio Catholica，簡稱公進會)。

碧岳十一世在位的初年，已有一個公進會在本堂區和主教區工作，可說已經有追求這類目的的分會，不過彼此各不相屬，以致力量分散。再說這些團體似乎不能把握住日益增多的勞工羣眾，原因是工人大都不願加入公進會的組織，他們認為接觸一些教育程度比自己高、生活也和本身完全不同的人，感覺不大舒服。

碧岳十一世明察幾微，認為對公進會有自行處理和予以發展的必要。首先得將一切活動加以整理，使它們從事最緊急的事項；為此當在教宗的最高指導之下，歸主教們管理。尤須加強教友們的使徒工作，不可只作神父們職務上的補充或輔助，

因為教友自有其重要的角色，不能由神父代替；倘引用福音的比喻，可說只有教友能發揮酵母的作用，以便使整個麵團發酵起來；只有他們能使基督的精神浸入他們的周圍——尤其是工人的核心，因為他們已被馬克斯的思想所浸透，眼看著神父對他們已不能產生作用了。

然而怎樣才能具體實現這項計畫呢？教宗對這個問題的確感到困惑，不曉得該怎麼解決。恰巧碰上一位比國副本堂神父賈爾定（Joseph Cardijn），給他帶來了一線曙光。

賈爾定神父創建公教職工青年會

賈爾定於一八八三年生於比利時的工人家庭。當少年賈爾定表示有志作神父時，他父親（本是一位虔誠的教友）為了讓兒子能進修道院，於是又多接了一份額外的的工作。及至這位青年暑假回家，他傷感地看出往日的同學都在迴避他，因為他既準備去作神父，工人階級便視他為叛徒了。他絕不願同勞工羣眾絕緣，乃於一九〇四年在他父親臨終的床前，誓許要為工人階級奉獻一生。他被委任到布魯塞爾郊區作副本堂時，便先把青年女工團結起來，隨後又把青年男工團結起來；他就這樣創立了公教職工青年會，他所揭櫫的目標是「觀察、審斷、力行」；他教給那些青年們

先認清有什麼當糾正的弊端，無論是物質方面、道德方面或宗教方面；然後訓練他們如何審斷是非，當用什麼方法約束自己的行為。

賈爾定的作風不久便博得了人們的同情；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加以批評，說他在教友中製造分裂，引起階級鬥爭。他被這些批評激怒了，遂去見他的總主教（當時是梅謝樞機），向他陳明自己的情況。

梅謝樞機告訴他：「對這個問題我不十分清楚，你最好去見教宗，他必能給你清楚的指示。」於是他便去晉謁教宗。教宗問他究竟想做什麼。他答說：「為了拯救勞工階級，即使犧牲性命也在所不辭。」這無疑是教宗當時最關心的問題。於是教宗感慨地說：「啊！終於有人來同我談起羣眾，想拯救羣眾了！……這是你所能給教會做的最大服務，把她所失掉的羣眾再還給她……十九世紀最大的恥辱，是教會失掉了勞工羣眾啊！」於是賈爾定神父便把自己所採取的方法和計畫草案，向教宗詳述了一遍。最後教宗結論說：「我不但要祝福你的運動，而且這正是我的宿願，我會把它視如己出。」

專業化的公進會

這次晉謁教宗的效果之重大用不著多加渲染。賈爾定神父這項看似平凡的運動，

經教宗這一鼓勵，獲得了迅速的進展。由比利時至法蘭西，之後隨即傳到了歐美和亞洲其他國家²。因為這項運動的成功，更激起了一連串的反應：在其他的社會階級中，適合各個環境的各種特殊協會，也相繼組織起來，如公教農民青年會，公教學生青年會等，每種都有男女個別的分支。教宗在他的通諭中，對這種專業化的運動不但表示贊成，還極力推薦，並聲明這是各種傳教方式中最適合時代潮流的：「為了把否認基督的各個階層重新引向基督，當務之急便是在各階層中，把那些明瞭他們的想法和願望，並曉得以友愛的精神同他們談心的助手，徵集而組織起來。工人的直接使徒該是工人，商業界的使徒則是商人」（《在第四十週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

專業化公教進行會的產生，是聖教會歷史上在二十世紀最大的成就之一，即使公進會未能完全實現它使羣眾再基督化的目的，但至少帶給教會新的精神；首先是它還給了教友他們應有的位置，也在各個環境中培植出精英，其中不少人成了社會、理智和政治生活的領袖。十九世紀的公教教友，面對著不信和現世主義的攻擊，只知保持消極的防衛姿態；現在公進會卻啟示並給了他們興奮劑、創造性和征服力³。

碧岳十一世的教訓

碧岳十一世追隨良十三世的芳蹤，他在位期間所公布的通諭，都是些有價值的專著。他以遠大的眼光，將教會不變的道理，貼合在這世間千變萬化的環境上。幾乎沒有一個題目是他未曾談及：例如耶穌聖心、基督君王、司祭職、〈玫瑰經〉、神修訓練（或稱神操）等……但最著名的通諭，還是那些討論與社會生活有關的道德問題的通諭。在《那神聖導師的》（*Divini illius Magistri*, 1929）通諭中，他面對著企圖壟斷青年教育的國家，爭取了家庭和教會的權利。在《貞潔婚姻的》（*Casus conubii*, 1930）通諭中，他面對著腐化的風氣和家庭的解體，闡明了教友婚姻的道理。在論重建社會秩序的《在第四十週年》通諭中（是在《新事的》通諭的四十週年公布的，即一九三一年），教宗針對經濟的發展，表達了教會對社會的期許；因為自良十三世以來，資本主義有了顯著的進展，這種主義並非不善，但過分發展，便不免發生流弊。自由競爭的結果，是使經濟大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方便他們對政府施加壓力；於是經濟的鬥爭，便演變成無法抑制地嚴酷了。當粗糙的原料由工廠一變而為精緻的工業品時，人工的價值便一落千丈，道德自然也墮落得不堪設想了。

為救治這種情形，教宗強調了兩點：應絕對廢止以利潤為經濟活動的最高規律，

當代之以公共利益；建立職業制度以及國家和國際間的機構，目的是要使經濟活動受公共利益的制衡約束。

傳教的教宗

碧岳十一世不但堪稱「公教進行會的教宗」，實在也稱得上是「傳教的教宗」。對教會的傳教活動，我們要以專章討論，暫且不多談這個課題，不過若一點也不提那占據他大部分思想的傳教事業，對碧岳十一世的偉大人格便不能有完全的概念。為了避免重複起見，仍以留待後續詳論為佳。這裡只提幾個數字以概其餘便了。

這種活動的果實，在數字上顯然易見：傳教區在他在位期間，由三百三十個增至五百四十一個，其中三十七個教區是委任本地的主教或監牧治理的。

參 碧岳十一世的重要奮鬥

假如碧岳十一世在一九三〇年去世，而非在一九三九年，則他在歷史上留給後人的，當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面目：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懷柔的教宗、公進會的教宗、傳教的教宗、偉大通諭的教宗，但他還沒有機會顯示他對衛護信德不屈不撓的精神；他此時就要在抗拒極權國家的侵犯上——亦即是義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粹和無

神派的共產黨——一顯身手了。教宗對這些權力從事鬥爭，並非如他的敵人所誣指的是為了政治的理由，乃是因他要衛護「信仰的寶庫」，同時他也自認是人類尊嚴和文化的保護者。

碧岳十一世與法西斯

天主教與德國的納粹和無神派的共產主義根本不能並立，那是很明顯的。但對法西斯也不能相容嗎？法西斯的創始人墨索里尼固然是一名無信仰者，但他不也是共產主義的死對頭嗎？實在說來，墨索里尼對宗教，不像馬克斯那樣有清晰的認識；他對聖教會的態度，完全是站在直接利益上著想。然而有一點，遲早要導致法西斯主義與教會不可避免的衝突，就是它極權的特質。照他來說：國家的形成不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公共利益，個人乃是為了國家而生存，因此墨索里尼的口號是：「一切都在國家之內，國家之外什麼也沒有，反對國家的一切均屬無效。」碧岳十一世反駁他說：「倘若一個城市或國家只認自身是它存在的目的，一個國民只以國家為他的目的，一個城市只認為該給它貢獻一切，它該吸收一切；那都不是天主教的思想。」

恐怕有人要問：在這樣的情形下，教宗為什麼答應同法西斯政權談判，而簽訂拉特朗條約呢？若認為教會同某政權簽訂協議，便是表示承認那個政權的政治原則，

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教會或因希望和平相處，或為了明哲保身，常設法同任何政權建立關係。對當前這種情形，碧岳十一世雖然明知困難重重，卻認為解決「羅馬問題」，才是極關重要的大事。

事實上順利的議程為時甚短；對於無關輕重的爭執，教宗為了顧全大局，寧可隱忍不言；但當法西斯政權對主要問題所持的態度令教會為難時，教宗即打破他一向的隱忍緘默，毅然予以反擊。

當法西斯黨攻擊公進會，尤其攻擊青年會時，衝突便更形嚴重了。政府想把教育青年的權利逐漸歸政府壟斷。教宗則嚴肅的表明：侵犯公進會便是侵犯聖教會，「也就是侵犯教宗的眼珠子。」他在《那神聖導師的》通諭中，對政府壟斷教育，曾予以毫不留情的譴責。

一九三〇年年尾，情勢緊張了起來：他們開始對公進會散布謠言，不久且以暴力相向，許多公進分會被搶劫一空，公教青年遭受毆辱。墨索里尼公開聲明：「兒童到了入學年齡，便隸屬於國家，且是完全隸屬於國家，絕不能分屬於別人。」政府甚至命令所有兒童和青年皆應入黨，絕無例外；其他一切青年組織都應解散。這明明是違反了協議。

於是《我們不需要》通諭 (*Non abbiamo bisogno*, 1931.6.29) 便如青天霹靂般地怒

吼了，那是教宗在極端祕密中親手撰寫，而交由外國通訊社發表的，只為給全世界作證。教宗在通諭中，對攻擊公進會的譏言逐一駁斥，證明它沒有絲毫政治作用。這是他再一次爭取教會陶冶青年的權利，他說：「我們從未否認過，政府有教育國民的權利和義務，但說國民自幼至長毫無例外地隸屬於國家，同聖教會的道理絕不能相容，也違反家庭的天賦權利。」碧岳十一世也起而攻擊那些武斷的根由，稱之為「異教對國家偶像的崇拜」，對國家過分崇拜，便是推翻社會的秩序；因為社會是為人而設，人非為社會而生。

面對這種不屈不撓的態度，墨索里尼深知一意孤行將有損無益；而且同教宗衝突，會在義大利和全球的輿論前造成重大的錯誤；於是不得不開始和平商榷，數月之後終於達成了協議。這次風暴的結果，慶幸還不算太壞，並引起了全球對公進會一致的注意。

希特勒與納粹

羅馬與納粹的衝突，遠比同法西斯的衝突更為嚴重也更為持久。義大利人民幾乎全是天主教徒，墨索里尼深知有他絕不能逾越的界限；但在德國卻不同，天主教友只占少數。

碧岳十一世在位的前半期，正值納粹黨和它的領袖氣焰高張的時期。希特勒出身奧地利，曾在德軍中充當過排長打過仗。他究竟是一個傑出的梟雄，抑或是一個瘋子，還真是很難說；不過不能否認的一點是，他那帶有毒素且具煽惑性的雄辯，對民眾有一種強烈的吸引力；在外人的眼中，希特勒好像是一個毫無前途的煽動者，但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所屈辱、被失業和窮困所激怒的德國人看來，希特勒因為許給人麵包和強盛，好像天生此人，是為了拯救德國脫離共產的赤禍，使它得以重新躋身於強國之林的人物。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正式掌握了全權，使他成為德國的獨裁者；納粹以外的其他政黨全被解散，前一世紀抗拒俾斯麥勝利的中央黨，也毫無抵抗地無形消滅了。

在反對天主教這點上，納粹和法西斯是一丘之貉，這兩者一致認為國家至上，也就是「元首」至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樣，認為每個人都隸屬於國家。但在許多點上，納粹主義（Nazism）卻攻擊天主教的道理。希特勒毫不掩飾地想新的面具下恢復日爾曼人已往的異教。納粹黨最突出的一點，是種族主義：希特勒聲稱，人的一切理智和道德的優長，都由血統和種族而來。因此國家當以法律和一切現代的醫學方法，保衛種族的純粹。世間的種族絕不是平等的，最優秀的種族則為印歐語系的亞利安族，只有他們才是人類文明的創造者；德意志則是這個種族最純粹的模

範，所以它應該宰制世界；全世界的資源和機運，都應由這個種族的領袖來支配。最受德國民族憎恨的種族是猶太人，硬說他們好批評、擁護無政府的自由和資本主義，所以德意志的一切災禍都應由他們負責。

這種主張，一方面勢必粉碎人格的尊嚴，使它成為萬能政府的犧牲品；另一方面則對所謂低等民族輕視而憎恨；這顯然與天主教的教義格格不入，因為天主教既尊重人格的尊嚴，又主張人皆平等，而且命令人實行博愛。對此誰也不可心存幻想，希特勒曾親自聲明：「德國人信奉宗教根本是笑話；人或是作基督徒，或是作德國公民，二者絕不能得兼。」在希特勒攬得政權以前，德國主教們已清楚地警告過教友，在納粹的黨綱中有些錯謬的思想，天主教教友如果接受，便算否認信德，教宗也批准了這項警告。

一九三三年的協議

為什麼希特勒一取得政權，便和宗座謀致協議？因為他是由選舉得到的政權，因此不能輕忽輿論——對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同樣有所顧忌。正是為了這個目的，他才保留一位有影響力的天主教教友巴本（von Papen）作副總理，而且在議會中聲明：「他願同宗座繼續且發展友好關係，因為基督宗教是民眾道德生活的基礎。」

碧岳十一世對希特勒的真正意向絕不心存幻想，不過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為了使德國教會避免痛苦的折磨，也為了給所有的人證明聖教會並不拒絕與人和好，所以對希特勒的建議沒有掉頭不顧。他說：「在有關救人靈的問題上，即使同魔鬼交涉，我們也不怕。」實際上，教廷國務卿巴塞里樞機（Card. Pacelli，未來的教宗碧岳十二世）和巴本之間的談判，很快便簽訂了一項對教會很有利的協議。碧岳十一世預先看出這項協議日後必遭破壞，但幸賴有這個正式承認教會權利的協定，教友們的抵抗才有法律的根據。

納粹對教會的迫害

果然，簽約之墨瀋未乾，一連串對教會敵視的措施便接踵而至，有的暗藏陰謀，有的顯然粗野；有些是表示對神職人員和修會的不信任，那是對品行的惡意誣陷；其他的則是企圖逐漸窒息天主教的生命，例如：封閉天主教的報館、解散職工青年會和天主教的學校等；同時也建立了第一座集中營，把猶太人、天主教教友和共產黨徒禁閉起來，神父被逮捕的有數百位。這種暴力的手段，表面上看來，雖似比蘇聯或西班牙的為輕，但若延續下去，恐怕危險性更大。

主教們首先起而反抗暴政，這是天主教的光榮。慕尼黑的總主教弗海伯爾樞機

(Card. Faulhaber) 和明司特 (Munster) 主教賈藍 (von Galen)，他們英勇的態度最為突出。教宗對這些破壞協議和有意使德國擺脫基督教而重返野蠻異教的行為，提出了嚴重的抗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一項法律，通過了國家對青年的統治，那項法律規定：「德國所有的青年，除家庭及學校的教育外，無論在物質、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得按照國社黨的精神，為服務民眾和公益接受『希特勒青年』的教育。」這條法律，把所有的德國青年，自十歲至服兵役的年齡，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可任意塑造他們。

教宗為反對這種政策，發表了《極度關切》(Mit Brennender Sorge) 通諭。這道通諭是在極度祕密中用德文書寫，避過警察的監視，在德國全境傳播開去，並且於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的聖枝主日，在德國所有的天主堂，都聽到了由講道臺所宣布的這項教宗批駁的言論：這下子可把納粹黨人氣炸了。碧岳十一世把衝突的責任完全放在納粹政府身上，說它「把種族、國家的人民及掌權者都予以神化而加以崇拜，把一個人同基督並列，向宗教學校公開宣戰。這是一種新的侵略性的異教思想，被有勢力的人以種種方式推進。以隱祕的或公開的強制手段，以恐嚇和利誘（許以經濟的利益或政府的職位，或以褫奪公民權相恫嚇），企圖使德國人民叛離教會。」

這一切都是侵犯天賦的人權。」最後教宗對自詡武力及勇武善戰的納粹黨人嘲笑說：「教會不需要由任何人接受英雄主義的教訓。這種革新者惹人憎恨的傲慢，以可憐的方式譏諷教友的謙虛，認為是自貶人格，其實他們本身才真正是自找無趣呢……」

教宗為了證明他這種譴責並非出自政治動機，同時也準備了抨擊無神派共產主義的一道偉大通諭，是在論種族主義通諭的前四天公布的。但他除了自己的權利外，沒有其他武器，所以向德國政府提出對違反協議的一再抗議，也就得不到什麼結果了。攻擊教會和神職界的新暴力浪潮接踵而至；誣讟神職人員和修會會士的運動，更加尖銳化；成百成千的教友被送進集中營。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將奧地利併入德意志版圖，於是又一個天主教國家墜入了納粹虐政宰制之下。墨索里尼數年前尚稱種族主義為「愚昧無知的怪論」，現在也進而同希特勒結成同盟；這樣一來，教宗遂無法阻止這些謬論浸入義大利了，這對教宗而言當然痛苦更甚；他遂利用各種機會在全人類面前展開了他痛苦的呼聲，及反對迫害和虐待猶太人的抗議，甚至喚起人們記住基督也是一名猶太人……當一九三八年希特勒正式訪問羅馬時，碧岳十一世離開了羅馬，他說：「為了避免眼見那已準備好的，與基督的十字架為敵的另一種十字架的崇拜儀式，非關我的老邁……這裡的氣氛使我們難受。」

當碧岳十一世在一九三九年去世時，納粹的報紙尚在侮辱他。但在歷史上，他

將永遠是一位面對種族的謬論毅然呼籲的教宗：「人的尊嚴就在乎此：所有的人共屬一個大家庭，一個共同的人類。」

蘇聯

碧岳十一世與法西斯、納粹極權政治的鬥爭雖然極感痛苦，但他深知最嚴重和最普遍的危險，還是一九一七年在俄國獲得勝利的共產極權政治：排除其他一切形式之共產主義的馬列主義，是徹底的無神論者，它的企圖無非是想赤化全世界。碧岳十一世在位時，已有三個公教國家遭受共產黨的迫害：即俄羅斯、墨西哥和西班牙，教宗稱它們為「恐怖和血腥的紅三角形」。

在蘇聯，大部分人民屬東正教；天主教教友只占極少數，約二百萬名左右。

碧岳十一世即位後發現，他的前任本篤十五世雖然沒有正式承認蘇維埃政府，卻和它有往來，即幫助它在戰爭所引起的嚴重飢饉中奮鬥。碧岳十一世繼續著這項政策，派遣了十二位神父到蘇聯，把全世界天主教教友所捐贈的救濟品不分宗教，發放給所有飢民。這項使命在兩年期間（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完成了驚人的工作，每天供給十八萬六千人食糧。蘇聯的公教教友雖然遭受共產黨人的迫害，教宗也不願中斷這項救濟工作，直至蘇聯政府拒絕為止；蘇聯最後寧願千萬無辜的人餓死，

也不願再接受天主教的救濟。

其實，在蘇維埃政權開始的幾年，已表現出反宗教的政策，視宗教為「人民的鴉片」而加以取締，教會的一切財產均被充公，隱修院和修道院也遭到查封，聖堂大多數改為電影院或博物館，祭器和聖像被沒收拍賣，許多神父和修會會士遭受逮捕，禁閉在集中營；同時「否認神」的組織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宗教活動：利用種種方法嘲笑、侮辱神父、會士和教友，極力使人憎恨他們。

這些迫害，首先是向堅信東正教的民眾發動，天主教的教友自然也包括在內。一九二三年有三位主教、十二位神父和一名教友被鬥爭：一位主教飽受嚴刑後於耶穌受難日被處死。在那年年終，連一位執行職務的主教也沒有了。為補救這個缺陷，教宗派遣了兩位巡閱使，以便伺機祝聖新主教，但不到三年，他們都遭到逮捕關進集中營。一九三〇年，在全蘇聯剩下不到三十位天主教神父。

墨西哥

墨西哥自一八二一年擺脫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後，一直動盪不寧。該國人民幾乎都受過天主教的洗禮。但「自由黨人」取得政權後，因為他們已浸染了法國革命的思想，便在十九世紀通過了反對宗教的立法，且曾多次發動真正的教難。自一九

一七年起，墨西哥首長在反宗教的鬥爭中，且仿效了蘇維埃的方式：驅逐外籍神父，取消修會，禁止矢發聖願，限制執行聖職的神父人數，甚至有些地方在十萬教友中只剩下位神父。碧岳十一世在位時，墨西哥的總統賈萊（Calles）執政（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教難達到了慘烈的高潮。在那幾年中，政府為鏟除墨西哥的天主教，想盡了各種方法：對神父和重要的教友進行逮捕、驅逐，甚至殺戮。學校中所有的兒童，都應接受無神和性教育。甚至還曾試圖製造一個與教廷分裂的教會，但完全失敗。未遭禁錮的忠實主教和神父，常被跟蹤追逐；他們留居國內不走，便是該死的罪名；為了繼續執行任務，不使教友完全喪失行敬禮和領聖事的機會，他們只好轉入地下。有幾百位神父不顧死亡的威脅，化裝為工人、小販甚至憲兵，巡迴全國各地，在穀倉或牛馬棚中舉行彌撒。這些地下工作的神父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耶穌會士普勞神父（Miguel Pro）。他有數月之久，化裝為各式各樣的人，避過了所有的警察密探，甚至在警察守門的家庭裡作彌撒，到監獄去給被判死刑的人行聖事。但他最終還是被發現逮捕，和他的一個弟弟同遭槍斃。他在臨刑時請求解縛，一手持著苦像一手拿著念珠，大喊著「基督君王萬歲」而殉教。

碧岳十一世對這些暴行提出了嚴重的抗議，迫害才暫時停止。賈萊的繼任者雖骨子裡同樣敵視天主教，但手段稍微緩和。此時期中墨西哥五千三百名殉道者的鮮

血（其中有三百位神父），沒有白流；教友們的抵抗顯示天主教在墨西哥已根深柢固，絕難消滅。反對天主教的立法雖然尚未正式取消，但已逐漸失效；為使教會重獲完全的自由，仍須長期奮鬥；儘管困難重重，墨西哥的人民依舊保持著活潑的信德。

西班牙

列寧曾經聲明，歐洲首先要「解放」的國家，當是西班牙。他相信西班牙雖然信仰最深，但終有一天要被共產政權控制。他這項預言幾乎真要實現了呢！

一九三一年四月，西班牙國王亞爾豐索十三世（Alfonso XIII）被迫讓位亡命，西班牙遂建立了共和國。這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天主教的教友以樂觀的態度接受了共和政體，但不久便覺悟了。在新的政府中反神職的人員眾多，他們煽起了反對教會的怒火。共和國成立未及滿月，便有亂黨起而突擊聖堂和隱修院，加以搶掠焚燒，而政府竟坐視不管。一九三一年的新憲法不但規定政教分離，且是一種真正反宗教的勾當：教育完全世俗化，離婚定為合法，禁止會士任教，解散耶穌會，並將其財產充公。碧岳十一世對這些措施，在一九三二年所發的《我們極可愛的》（*Dilectissima Nobis*）通諭中，提出了嚴重抗議。經過了兩年緩和時期，一九三六年的選舉，導致了「人民陣線」（*Frente Popular*）的勝利，也就是左派政黨的聯合；這是爆發狂暴反

宗教的信號，不但通過了驅逐會士，關閉天主教學校，禁止公開舉行敬禮的立法，而且放任暴行，不加制止：上百的教堂和隱修院慘遭焚燬，許多神父、會士被殘殺。天主教的領袖索特婁（Calvo Sotello）在國會中對放任暴行提出了抗議，次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他本人也被殘殺。四天後，佛朗哥將軍（Franco）所領導的革命軍便在西屬摩洛哥出現，立即贏得了全國的響應，於是慘烈的內戰便開打了，一直持續了兩年半，造成了百萬人的死亡，西班牙也從此一蹶不振。在政府軍所控制的地區內，天主教教友遭受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迫害與恐懼；成千的教會建築被焚毀或搶劫，多少世紀以來所積蓄的珍寶，毀於一旦；神父、修士、修女、修女們屍體被從墳墓裡挖掘出來；有時看見神父的屍體被掛在屠戶的鐵鉤上，修女們的屍體被從墳墓裡挖掘出來；任人褻瀆。在這個時期被殺害的神父及修士、修女，實在無法予以正確的統計，但肯定有七千五百位以上，其中有十二位主教。

《天主贖世主的》通諭

蘇聯、墨西哥和西班牙這些暴亂事件，使碧岳十一世相信，已經到了嚴正譴責共產邪說的時候，尤其是因為在其他國內，共產的危險尚蒙著假面具，其實更加陰險。例如在法國，一九三六年的選舉，已使一個「人民陣營」的政府得勢；共產黨

徒雖未入閣，但對國家的影響力卻很大。他們對天主教教友所持的態度，由他們在各處所張貼的標語可以看得出來：「天主教教徒，我們向你們伸出了友誼之手！」有些教友幾乎要和他們握手了，誤認在不接受他們唯物無神論的條件下，可以同他們攜手合作，以便建立一個比資本主義更公正的秩序。碧岳十一世以他那《天主贖世主的》（*Divini Redemptoris*）通諭，昭示這種天真的幻想應當及早截止。

教宗雖已多次向全世界控訴，天主教教友在蘇聯、墨西哥和西班牙所受的無理虐待，但這次他則是把那些悲慘結果的惡毒根源揭發出來：馬列主義成了蘇維埃政權的聖經，他們竟想用它來赤化全世界。通諭上說：「這種學說聲稱只有一種實在的東西，就是物質和它那盲目的能力；植物、動物和人，都是它進化的結果；連人類的社會，也只是按照進化律演進的一種物質姿態，以一種不可抗拒的需要，經過無數的力量衝突，向著最後無產階級的社會邁進。在這樣的一種學說內，顯然神的觀念毫無生存的餘地，並且在精神與物質、靈魂和肉體之間也無分別可言了：人一死便了事，談不上靈魂的存在，那麼也就毫無來世的希望了。」據馬克斯所說，神和宗教的觀念是「人民的鴉片」，無產階級的社會一實現，這些幻想便要自行消滅。人唯一的神，就是人自己。此外，正如人的行動能加速社會的進化，共產黨徒也獎勵階級鬥爭、仇恨和破壞；認為煽動階級鬥爭，便是促進人類的進步。反之，其他

一切反對暴力的勢力（宗教便是其中之一），無論如何，都必須視同人類的仇敵予以消滅。

面對著這個黑暗的版圖，教宗重申教友對人和社會的觀念，是與一切極權對立的；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人，就有他天賦的權利，任何人不能剝奪；社會為人而存在，人非為社會而存在；他隨即指出了挽救時弊的處方：階級鬥爭和恐怖政策，絕不能挽救時弊，更不用說濫用專制政權了；只有按照社會正義和宗教友愛的精神所建立的經濟秩序，才是挽救時弊的真正處方。假如人民以前未曾忽視教會的教訓和告誡，今天共產主義便絕對不會產生；教宗對有些人妄用資本的權利，剝奪工人公正的薪金和他們合法的社會權利，深表惋惜。

由此可見，聖教會之所以根本反對共產主義，是認為它本質邪惡，徹底否認神和反宗教。當共產黨徒還未抓到政權時，常以各種謊言欺騙爭取民眾，在外表良善且具有吸引力的掩護下，把它真正的企圖隱蔽起來，請大家千萬不要上它的當，它的真實面目遲早是要揭穿的。

碧岳十一世為和平所作的奮鬥

碧岳十一世自即位以來，便不停地憂慮行將來臨的戰爭，他對「建立在紙上的

不自然和平」絕不心存幻想；自一九三〇年開始，法西斯的進展、納粹黨的升高和共產黨的增強，更加深了他的恐懼。他對所接見的政府首長，以及政治或外交人員，曾一再重複他的建議；他譴責對軍備競爭所耗損的巨大花費，聲明普遍裁軍的重要；戰雲愈濃厚，他的呼聲愈悲痛。一九三四年他當著齊集御前的樞機們預言：誰發動戰爭，誰便是將自己的國家和全體人類社會，交付於殘殺滅亡。五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證實他的預言時，他說：「倘有人敢首先發難，那時我們被迫向天主這樣呼求：請你驅散那些好戰的民族吧！」

一九三六年教宗患病，人都以為他將臥病不起，他也曾向左右的人聲明，他願奉獻自己的生命以求換得和平，並且在病榻上用廣播發表了那篇悲壯的聖誕獻辭，為和平作了最後的呼籲。但不久他痊癒了，不過從此他眼見墨索里尼愈來愈同希特勒緊密聯繫，把義大利拖向毀滅的浩劫，感覺異常悲痛。在拉特朗條約的十週年紀念日，教宗為了作出最後的指示，並再次譴責導致民族浩劫的瘋狂獨裁，因而召集了全義大利的主教。他為了準備將要宣布的演講稿，弄得心力交瘁⁴。他自覺終期已經來臨，乃懇求天主假以時日，只為能宣讀他那篇演辭；他本來計畫於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二日演講，不料因力盡筋疲，於十一日清晨便與世長辭。

這位不知倦怠的鬥士，正如他所希望的，竟在全面鬥爭中棄世，享年八十有二。

這時，世界正以焦急的心情注視著戰雲密布的嚴重事態，對教宗的逝世，都認為是全世界的不幸。碧岳十一世真可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所幸繼起有人，能以同樣的精神完成他未竟之業：那就是他最親信的合作者——教廷國務卿巴塞里樞機。

肆 教宗碧岳十二世

當巴塞里樞機於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被選為碧岳十一世的繼任者時，他早已是全球教友家喻戶曉的人物了；他為表示對前任的作風蕭規曹隨，遂取名碧岳十二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任教廷駐德大使；也曾以教宗代表的身分，正式視察過法蘭西、阿根廷和匈牙利等國，並以私人身分訪問過北美，最後九年間，他又以教廷國務卿的身分，輔佐了碧岳十一世，他對外交固然是科班出身，但對祈禱和神修生活也十分卓著；他對聖母瑪利亞的虔誠孝愛，更是眾所周知。他具有語言的天分，嫻熟多種語言。

碧岳十二世與和平

碧岳十一世的身體和氣質，好像生來便是為了戰鬥；碧岳十二世呢，卻好像是天主要他作一位和平的教宗。他賦性溫和，更精確地說是膽怯，愛好平靜獨處，他

的溫和使他以堅忍來克服困難。為此他選擇了「正義的工作是和平」作為他徽章的題詞。

然而這位和平的人士，卻作了戰爭時期的教宗，以一種和平而不屈不撓的毅力，面對著最困難的情勢，全靠他那熱烈的信德和負責的決心予以撐持。

他在即位之初便見戰雲密布，他盡一己之所能，不顧世人的誤解，設法使聖教會和人類避免這世界浩劫的恐怖；他用盡一切外交手法，企圖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以便抑制情感的衝動。八月二十四日他藉廣播電臺向全世界呼籲說：「正義之路不是以武力開闢的，乃是以理智。非建立在正義上的帝國，不能得到天主的降福……用和平的手段什麼也喪失不了，戰爭卻能喪失一切。」

教宗的呼聲無人聽取；幾天之後，德國和蘇聯便侵入波蘭而將它瓜分。碧岳二世努力使義大利不加入戰團，但愈來愈傾向希特勒的墨索里尼，對教宗嚴酷地責難；教宗率直地答覆他說：「與其對職守有缺，我寧可準備進集中營。」

碧岳二世既不能阻止戰爭的浩劫，便設法減輕其災害：他先組織了俘虜營的服務隊，隨後又組織了調查失蹤者的機構，以便使無數失散在世界各處的家庭，得以重新團聚；他又組織了一個救濟會，以便在各交戰國內救助種種貧困災難。當義大利淪為戰場，羅馬也被德軍占領時，他請求交戰國勿在這全球教會的京城作戰，

並對圍困在城中的人民施以救濟，因此被譽為「羅馬的保障」。有人勸他離開羅馬以策安全，他不但聽，反在空襲之後，立即親身組織救護隊，營救傷患。他曾從納粹的魔掌下救出了數百名猶太人，免遭屠殺⁵，打開他的宮殿，收容難民。他節省飲食，雖在嚴冬，室內也不生火，以便節省銀錢多行救濟；以致戰爭結束時，他已瘦弱不堪，醫生對他的健康很是擔心。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既被打倒，日本也隨之戰敗投降，美國和蘇聯間的冷戰便由此展開；空前猛烈並具毀滅性之武器的製造，使各民族深感焦慮不安，倘若第三次世界大戰來臨，其慘烈將遠較第二次大戰為甚。教宗也不停地祝禱著國際間能協調，有效地消除原子、核子、細菌和化學的戰爭，他請求善意的人們將這些驚人的發明，用在和平之途，給人類的繁榮和幸福，貢獻新的源泉。

共產主義

中歐和東歐國家，好不容易擺脫了納粹的壓迫，卻又淪入更殘暴、更仇視宗教的政權宰制之下，那就是共產主義；鐵幕低垂，將天主教教徒占大多數的三個國家：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拉夫圈入其內，其他天主教教徒雖占少數，然而也是非常重要的國家，如東德、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教友總共有五至六千萬名，

也被迫生活在暴力政權之下，一切宗教的生活和情緒，政府要逐漸使它窒息。在東亞，北韓和中國大陸也遭受著同樣的命運（見第二十六章和第二十七章）。在以上這些國家，共產政權所用的方法千篇一律，只是按照當地的情形，加減施行而已；雖盛倡信仰自由，在教堂以內有時也准許一些敬禮的儀式，但其他一切宗教活動概行取締，或加以嚴格的限制；比如修道院、教授宗教教義、公教進行會以及出版事業等，一概不准舉辦，以「間諜」或「反動」的罪名，打擊神職人員——尤其是最能起作用的領袖人物，在教友中挑撥離間，製造分裂，訓練所謂「愛國」教士，煽惑他們組織與羅馬教廷斷絕關係的獨立教會。

一九四六年，南斯拉夫的狄托將軍（Tito）取得政權後，有數百名神父遭逮捕，或禁閉在集中營或被殺。札格拉布（Zagreb）的總主教斯代比納克（Stepinac），以南國被德軍占領時與侵略者合作的罪名，遭到逮捕（事實上他拯救了許多猶太人和東正教的人），被罰十六年強迫勞動；一九五一年好不容易被釋放，但政府不准他復職，被貶謫到他出生的鄉村，幾年後便去世了；教宗卻升他為樞機。

一九四八年，全世界對匈牙利的樞機閔真諦（ Mindszenty ）橫遭逮捕和被審判的情形，一致表示憤慨；他那種不屈不撓的毅力和反對政府仇教措施的勇敢，贏得了「鐵人」的徽號。為摧毀他的抗拒，法官曾用疲勞審訊希圖給他洗腦；以賣國的罪

名被判監禁。教宗除提出嚴重抗議外，別無他法，他在某次演講中，曾將這種迫害比之於尼祿（Nero）的教難：在尼祿時教友便被控以種種罪行而稱之為人類的仇敵。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民革命時，閔真諦樞機被人民從監牢中救出，隨即到美國大使館中尋求避難，無法行使他教會的職權。

波蘭在納粹占領期間，受過嚴酷的迫害。及至被關進鐵幕以後，政府也不能無視於人民的情感，因為他們幾乎全都是天主教教徒，為此教會比其他鐵幕內的國家享有較多的自由——有限度的自由。政府也曾企圖建立一個同羅馬分離而獨立的教會。維辛斯基樞機（Wyszynski）對這種企圖堅強反對，曾一度下獄（一九五三年）。但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發生革命之後，政府的嚴厲稍微減低，樞機也獲得釋放，並曾參加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共產主義連在西歐也獲得了進展，尤其是在義國和法國，不少的人——連天主教教徒都在內——輕信他們謊言的宣傳，加入了共產黨；教宗為喚醒教徒的迷夢，曾於一九四九年公布了一道上諭，對加入共黨或以任何方式擁護共黨的人都予以絕罰。

同時，在西德、義大利、法國，民主黨特別發達，服膺天主教社會主義的原則；大戰以後，這類的政黨在上述這些國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聖教會的至公

碧岳十二世最具革命性的行動之一，是給樞機團增加了各國的人選。一九四六年二月，他宣布了三十二位新樞機，其中只有四位是義大利人，西歐十一位，美國四位，拉丁美洲六位，波蘭、匈牙利、亞美尼亞、澳洲、中國（田樞機）和非洲各一位。

以前義籍的樞機常在半數以上，但如今卻一反既往：義籍者只有二十八位，屬其他國籍者則有四十二位之多，而且東亞的樞機則是破天荒首次出現。教宗此舉，是明顯地表示教會是所有民族的母親，對任何地域也不見外；當他在傳教區任命許多本地主教時，這種大公的精神更為顯著了。

碧岳十二世在道理方面的成就

碧岳十二世不只是在混亂時期有領導教會之功，他還使人領略了天主教道理的淵博。

他徵詢了全球所有主教的意思之後，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在五十餘萬名主教和教友面前，隆重地宣布瑪利亞離世不久，便身靈一起被提升到天國了。這並

不是一則新的信條；自很早以來，天主教便在八月十五日慶祝聖母升天的節日，先是在西方教會，以後則普及到全教會，這是教會自古以來便深信這端道理的明證。這次的宣布，不僅符合全球信眾的期望，也是全教會欣然接受的。

他還藉四十多道通諭，發表了他的教訓，闡明了基督的妙身、聖心、禮儀、研究聖經和傳教等大問題。他還用通訊、廣播、著作和許多訓話的方式，講解了各種道理。碧岳十二世發言不少，比任何一位前任發表的言論都多（他的論集出刊了二十卷）。在羅馬召開的全國或國際會議不計其數，幾乎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都願晉見教宗，聆聽他的言論。對每批晉見的人，無論他們是作家或律師、醫生或助產士、警察或消防人員、新聞記者或科學家，教宗總有針對他們職業的一套言論，表示他常注意科學的最新發展；使他的聽眾驚奇地感到科學與天主教的道理和諧無間，並由他們每人的職業，引伸他們所負宗教和道德上的義務。由於科學——尤其是醫藥——的進步，在教友們的良心上所產生的各種問題，教宗總是如此處理。

每天為了仔細準備針對各種問題的談話，可以想見他的工作該是多麼繁重，他往往要犧牲夜間的部分時間。再加上私人或團體的接見，各國、各階層、各教派的人都有，有政治人士、公教進行會的青年、國家元首和民族領袖、名人博士等等；他的慈祥，尤其其他那具有高度宗教修養的人格，令所有蒙他接見的人，都留下了極

深刻的印象。

碧岳十二世去世

碧岳十二世的身體雖然看似脆弱，竟因責任感的支持，孜孜不倦地工作了近二十年。一九五四年患病時，人皆料他將從此不起；但他休息了一段時期，竟又開始工作，直至他去世的前夕為止；時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享年八十二歲。

全球各國，無論政治人士或普通工人，信徒或非信徒，對這位在大戰及戰後的動盪時期堅強站在崗位上的教宗，一致地讚揚他的智慧和道德。

結 論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歷任所有教宗，都是才德兼優的偉大人物。他們在這段特別混亂的時期，不但向教友，而且向全世界，經常討論著有關於人類全體的大問題，例如：和平、人格的尊嚴和他對國家的權利等。

據說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有人在史達林面前提到了教宗，史達林表示不屑地說：「教宗，他有多少兵力？」二十世紀的教宗不以武力作為權威的後盾，他們所依恃的只是精神的力量；恐怕他們的言論之受人尊重，是任何人都不能比擬的，即便在

天主教以外，所有具有善意的人，凡相信世界不能專靠武力征服的人，莫不尊重宗教的意見。

伍 二十世紀教會的內在生活（一九一四—一九六二）

非基督宗教運動

十九世紀出現了教宗碧岳十一世所稱該世紀的「奇恥大辱」，即由工業的突飛猛進所產生的無產階級羣眾，愈來愈與教會脫離。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很多，不僅是受共產主義無神思想的影響，現世主義的影響也很大，他們想把宗教排除於公共生活之外，只准它留在人的內心深處。在公開宣稱無神的羣眾中，仍有許多人對教會保持著眷戀；他們接受洗禮，並給自己的子女付洗，在神父跟前結婚，遵守著宗教的葬儀。不過在幾代之後，這些由傳統保存的禮節，已成了空洞的虛禮，喪失了宗教的意義，於是逐漸自行放棄了。二十世紀的非基督宗教運動（Dechristianization）日益發展，不受洗的人數日增；但除了共產黨徒外，對教會還沒有公開的敵對情事，只是表現得漠不關心而已，大體上來說，是思想的趨勢，使人擺脫宗教的影響；不只是天主教，乃是世間的一切宗教。過去人們認為宗教思想是一種天賦的傾向，而

今好像千百萬人已不作如是想了。不久以前，人們還猜想是因為生活極度貧困，以致無暇關心宗教，把精神的熱望完全窒息了；但生活的水準已經提高，資源也有了更公平的分配，西方教會的情形並沒有好轉。為了追求生活的舒適，反而使人心對超性的事情更加淡漠了。

這種情勢，假如只看陰暗面，將令人十分悲觀，聖教會的前途也將暗淡不安；其實有些地方，有些國家，比如愛爾蘭，信仰仍舊很活潑。此外，不用說傳教區，就連英、荷等國，教友的數目也是有增無減；北美合眾國，自二十世紀初葉至一九六〇年，已由一千二百萬增至四千萬名，當然除了出生和歸正者外，尚有移民的原因。須特別注意的是：由於環境的影響，教友固然有消滅的現象，但是固守信仰的人，卻愈加堅強。

優秀分子的進步

前途最樂觀的是，眼見知識界的優秀分子紛紛歸正。在十八世紀時，有許多作家隨著潮流放棄了信仰，對一般民眾也逐漸起了影響。反之，二十世紀期間，在各種學術領域內，無論是文學、歷史、哲學或科學，都有天主教教友的出現。就他們個人的價值和信心的熱烈來說，都是非常卓越的；在大學和科學研究院內，到處可

見。他們那不可否認的價值和公開的堅強信仰，在在都證明那些聲言科學與宗教互不相容的武斷妄言，是多麼荒誕不經。

不是只在知識界出現這樣的優秀分子，在工農羣眾中也不乏其人，這大都得力於公教進行會。由於他們人格的卓越，儼如職工會的領導人物，因而培植了工農大眾的堅實信仰；他們深信不但應保持個人信德的完整，還應作酵母，使整個麵團發酵起來，在他們的周圍重建起信仰的氣氛。

神學的復興

在十九世紀末葉已開始復興的教會學科，現在已全面展開，欣欣向榮。聖教會傳統的道理，自數世紀以來逐漸晦暗不明，神學家們又使它重放光明，那就是基督神妙身體的道理，教宗碧岳十二世曾以《基督奧體的》（*Mystici corporis Christi*, 1943）通諭大加闡明。這端道理強調，所有教友藉著同基督聯合的彼此關係，給傳教職務建立了神學的基礎，而且適逢其時地使教會藉公進會在傳教上得到了新的進展。

另一方面，神學家努力答覆唯物哲學的問題，使人們得以看出天主教教的信仰，雖然主要目標是救人靈魂，但對人世間的困苦艱難，並非漠不關心。

在教會學科的各個領域內，如聖經學、哲學、教會歷史和社會學等，研究者們

都一致努力，使與現代科學和歷史批判的發明融會貫通，毫無抵觸；為了填平知識分子與神學家之間所自掘的鴻溝，他們盡量用現代知識界所易領會的語言，闡明信仰不變的信條。

最大膽的嘗試之一，是耶穌會士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 S. J., 1881-1955）在這方面所作的綜合。他是一位地質學和古生物學家，他在中國所完成的工作，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他在中國度過了二十三年的生涯之後，前往中亞、南亞和非洲各地研究，對周口店所發掘的「北京人」有特別的貢獻。他的著作有許多在他死後才刊行問世。他曾在其中陳述了他對世界的偉大看法。以他那博學和在聖保祿（St. Paul）的思想中所養成的神學家的知識，描述了世物的進化；他揭露了一個超自然的意義：即進化的目的是把由天主的愛所創造的宇宙，重新引歸造物主。這種科學和信仰論據的綜合，連在無信仰的人中也激起了活躍的興趣，對德日進著作的廣事翻譯和出版便是明證，評論的文字尤其多得不可勝數。

在這思想混亂的時代，神學家對科學的新進步所提出的許多問題，有時解答得未免太大膽了些。有幾位神學士一味地想陳明天主教的道理同這個時代的精神並沒有抵觸，立論未免偏頗。碧岳十二世洞燭了其中的危險，便於一九五〇年發出了《人類的》通諭（*Humani generis*），對危害天主教教義基礎的幾種意見，略加指責。這道

通諭雖未指名譴責任何人，但總算收到了防患未然的作用，免得形成一種新的現代主義。

聖經學的復興

聖教會常鼓勵人研讀聖經；但在宗教改革時代，對偏激的解釋不得不加以防範，免得誠樸的教友誤信違反傳統的解釋。於是天主教人士為反對基督教徒自由解釋聖經，未免矯枉過正，索性對聖經拋棄不讀了；這樣一來，許多教友除了主日在彌撒中所聽到的部分聖經以外，對聖經的其他部分幾乎茫然無知。

但在十九世紀末葉，神學家又燃起了深研聖經的心火，這對反駁唯理派所散布的謬說，實在非常需要。一八九二年道明會在耶路撒冷所創辦的聖經學院，以及稍後一九〇九年教宗碧岳十世在羅馬所立的聖經研究院，對學者們研究聖經又給予一種新的鼓勵。碧岳十二世在他那《由聖神虛氣》(Divino atlante Spiritu, 1943) 通諭內，邀請聖經註釋家利用批評學、考古學等的進步所提供的一切新方法，並充分研究語言及東方文字，以便對聖經達成更正確的了解。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工作的結果，已不限於學者們的圈內，許多通俗的著作也源源問世，適合一般人理解；聖經的譯本也逐漸增多，教友們也把在聖經中

尋求精神食糧的習慣，重新拾取起來。

禮儀的復興

教友們多讀聖經聖傳，使他們對禮儀中的詞句更加了解，也促進了禮儀生活的再度繁榮。十九世紀由祁朗緒和本篤會士所發起的禮儀運動，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還只限於少數的範圍內；禮儀的復興，卻成了現代天主教最顯著的特點。彌撒經書的多種譯本，已散布在教友之中，他們望彌撒時已不再念〈玫瑰經〉或其他經文了，卻利用彌撒經書來追隨主祭所念的經文，這還只是初步；以後為表示彌撒已不單是司祭個人的事，乃是教友同司祭所共同奉獻的祭祀，於是大家一齊同司祭應和，而不限于輔祭，並且同司祭共念〈榮福經〉、〈信經〉和〈天主經〉。為了使教友們更易於參加彌撒，多數祭臺也改為面向信眾。好多事情，在梵蒂岡大公會議批准和普遍實行以前，都是先由地方教會所發起的：先是在德國，隨即推展到比利時和法國，然後逐漸推展到全教會，禮儀的氣氛為之一變。這樣更表現出教友們的聚會，這才真是名副其實的教會，同元首共同祈禱的基督妙身。

教友們也更為明白，領聖體是參加祭祀的標準方式，而由碧岳十二世所放寬的聖體齋，使教友們參加任何時刻的彌撒時，都能領聖體。

勞工司鐸

神職界對無產階級大眾的非基督宗教運動，不能容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歲月中，司鐸們——特別是在法國——試圖用種種方法，在非基督宗教的環境中，重新建立宗教的氣氛；因此在盡可能不損傷司鐸身分的條件下，去和他們宣傳福音的對象採取同樣的生活。這種傳福音方式最出名的例子，是法國勞工司鐸（Workers-priests）所作的試驗。為了盡量深入無產階級的圈子，有許多修會會士和司鐸去作礦工、碼頭工人以及冶金工人等等。他們度著工人的生活，同時還盡司鐸的職務，真是弄得力盡筋疲；在一天的勞作結束之後，又去念日課經、作彌撒和其他司鐸的職務。

這種試驗，固然是由於熱心傳教的感召，不過也得承認，他們並沒有全部採取適當的防範，以杜流弊。所有勞工司鐸，對這種艱巨的傳教方法，並非都有同樣充足的準備；有些人在共產思想浸潤的環境中住久了，自己便逐漸染上了這樣的思想。一九五三年，羅馬聖座認為這種試驗，在那樣的情形下，既未能達到他們所預期的目的，便不可再繼續實行。勞工司鐸，必須經由他們的主教特別遴選，還當接受道理和神修方面的適當訓練；並且每天只能作有限度的勞作，避免參加一切政治和社會的活動才成。但在勞工之中的傳教工作，在羅馬所批准的方式下，仍在繼續進行。

修會

在這世紀的過程中，雖然沒有像十九世紀那樣增加新創的修會，但已有的修會——尤其在歐洲以外，人員卻有大量的增進；這是歐洲迫害會士始料未及的效果。他們由歐洲大量地被逐出，卻在他們所託庇的地域內繁衍起來，特別是在美國更見顯著。

本篤會士在一八八〇年只有二千七百名，到一九六二年卻增至一萬一千名；幼會會士同時也增至二萬一千名；方濟會的三個分支，共有四萬七千名；耶穌會士由一九〇〇年的一萬六千名，增至一九六五年的三萬六千名。

聖教歷史的每一時期，都曾產生特別適合時代需要的修會生活方式；在我們這否認神存在的共產時代和落後的國家內也不例外。在這裡我們只提出由某人的感召而產生的修會；此人生活的時期雖大部分在十九世紀，但在他去世後卻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此人就是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 1858-1916）。

眾人的弟兄富高神父

富高生於法國勃艮地的一個富厚家庭，前半生放蕩不羈，不足為法；他自幼便

喪失了信仰，二十三歲時曾任騎兵中尉，因生活奢靡，行為不檢，為人所不齒。但在一次非洲戰役中，卻愛上了非洲的空曠和安靜；幻想著在那裡大展雄圖。他喬裝成一名猶太人，冒著生命危險，去摩洛哥探險（當時對歐洲人是禁地）。在那裡待了一年，嚴厲的生活把他煉淨了，因見回教徒很深的信仰，使他作了一次認真的反省，天主的聖寵又來幫助他，因此他就回頭了。從此以後，他便以鋼鐵般的意志，向著聖德邁進，他曾寫道：「當我相信有一個天主時，我立刻便曉得我只能為祂而走的路；起先加入了熙篤會，但又離開，認為當去尋找更貧窮、更謙卑、更隱晦的生活。他在納匝肋過了三年隱晦的生活，在一座隱修院內當一名工人。他在一九〇一年領受鐸品後，竟得到一種號召，叫他去非洲，幾乎令他無力拒絕；但不是號召他去用言語傳福音，而是以陪伴聖體、祈禱刻苦、實行福音的勸諭，去對任何人普遍地友愛，甚至把他僅能餬口的食物也分施給最貧窮的人。他作這些善工，都盡量不使人知，人只知道他是一位善良的人而已。他深怕日久會被人發覺而讚美他，便到撒哈拉沙漠與摩洛哥交界的地方去，混在最貧窮最不受重視的人中，度貧窮獨修的生活，在那裡實現了他的理想：「我願用我全部的生活宣傳福音，我是眾人的弟兄。」以後他得知在很遠的撒哈拉沙漠的心臟地區有一個游牧民族，從沒聽過福音，

實為被人遺棄的羊羣。他便移居到他們中間去，過著最貧窮的生活，除了祈禱之外，便是學習他們的語言，編輯文法和字典，以便給將來的傳教士鋪路。他的善良和不知疲倦的愛德，不但贏得了那些野蠻游牧民族的尊重，且成了他們最愛戴的朋友。不幸於一九一六年，被一羣強盜慘殺而死。

富神父本想招收門徒，他寫了好幾種修會會規的草案，只有一個報名加入，但不幸在到達撒哈拉找到富神父之前，便因患病而中途放棄。他在這方面的企圖顯然是完全失敗了。但在他去世之後，他的精神感召卻日見增長，且影響到非洲以外；他那生活的榜樣和著作，啟發了許多嚮往完善和渴慕拯救人靈的人；今日已有三個修會和許多非神職人員的團體，私淑著他的精神。他去世後十七年，有五位神父在阿爾及利亞南部，創立了第一座「兄弟會」——「耶穌小昆仲會」便是由它產生的。一九六三年，耶穌小昆仲會士已在二十三個國家工作，也有九百五十名「耶穌的小姊妹」分發到四十五個國家去工作，其中歐、亞、美三洲的人都有。他們來自社會的各階層，全都散布在工人和窮人之間，同他們度一樣的生活；在工人中作工人，在農人中作農人，在游牧民族中作遊牧人，完全靠自己的工作所得生活。凡有窮人和尚未認識或不承認基督的人的地區，如香港的船戶和澳門的難民中，歐洲或日本各大城市的勞工中，撒哈拉的帳幕和比利時的煤礦中，到處都有基督的小昆

仲和小姊妹。他們用自己祈禱和勞作的生活作為榜樣，用他們對人的友愛，使基督的愛發射光明，給福音的傳布鋪路。

陸 大公主義（至若望廿二世止）

在全球三十億人口中，有九億自稱為基督徒，然而卻彼此分裂著：其中五億四千萬為天主教徒，一億五千萬為東正教徒，一億七千五百萬為基督新教徒，基督新教又分為兩百多個教派；此外還有四千三百萬英國聖公會教徒。這種情形，顯然違反基督「使他們合而為一」的旨意，也使基督徒感覺痛心。

在歷史的過程中我們已經見到，或同東正教會，或同基督新教，曾多次試圖接近，但總未達到決定性的效果。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在教義上的衝突最大，尤其對他們自樹一幟的觀念。至於東正教，可說道理上的歧見微乎其微，由於信仰的一致，應該很容易聯合起來，無奈彼此的不諒解和分裂一千年來所積累的成見，礙難消除人事的阻礙而重歸於好。兩方面分裂得愈久，愈難接近。許多基督的信徒都認為分裂是一件極可惋惜的事，但實際上又很難解救。

已經有過許多人，對這種顯然違反天主聖意的情勢，感覺無法再忍受下去，像是教宗良十三世。在他整個在位期間常設法同其他教派接近；尤其是向東正教呼籲

統一，可惜不但得不到同情的反應，有時還遭受斷然的拒絕。教宗卻保持他那一貫的和善態度，他曾說：「我們所嚮往的教會合一，恐不能及身見到其實現，但對所不斷嚮往的事實，我們卻不認為它是『烏托邦』的幻想。在福音經上明明有吾主甜美而不容否認的許諾：『使他們成一個羊棧，歸一個牧人。』基督的代表，怎能不繼續努力使其實現呢？天主也不許可呀！」就是這種精神推動著良十三世，試圖同英國國教謀取合一之路。

同英國國教和解的試探

蒲賽和紐曼由牛津大學所發起的運動（請參閱第二十一章參節），在英國教會內喚起了同羅馬合併的有利思想。英國望族哈利法克司爵士（Lord Halifax, 1839-1934）一生致力於英國國教和羅馬的協調；他同一位法國遣使會士包爾達（Portal）志同道合，結為朋友；他們倆自一八九四年便發動了一個和解運動，從事研究兩個教會具體合併的問題。他們特別努力闡明「英國國教的聖秩」這個最棘手的問題，即主教神父在英國教會所領受的聖秩是否有效（請參閱卷三第十二章註6）。教宗良十三世命人搜查歷史事實深入研究之後，乃於一八九六年正式裁定英國教會的聖秩無效。這樣一聲明，合併的問題便更加困難了，因為加入羅馬教會的主教、牧師，必須承

認他們實際並未領受聖秩神權，應該重領聖秩聖事。於是會談便暫行擱置了。

二十五年之後，在馬連（Malines）總主教梅謝樞機的主持之下，問題又提出來討論；一方面是樞機和包爾達，另一方面是哈利法克司，另有幾位神學專家參加。這是歷史上出名的「馬連會談」；雖經教宗認可，但非正式談判，不過因梅謝樞機的特殊身分，自屬非常重要，那是盡人皆知的。他們共同討論雙方爭執之點，雙方的發言人都曉得他們不能正式解決問題，但他們實行了梅謝樞機所提出的大公的金科玉律：「為實現合併，必須彼此先親睦；為能親睦，先得彼此認識；為能彼此認識，必須會面商談。」

梅謝樞機不幸於一九二六年棄世，遺囑將自己的主教戒指贈送給哈利法克司，作為希望合一的象徵。包爾達不久也相繼去世，會談便從此結束。雖然未達成具體成就，但對雙方的接近，的確有了相當的貢獻。

基督新教的合一運動

在二十世紀開始以前，天主教同分裂的教會東正教或英國國教試探過的合併，還不算「大公」意義全部的精神；「大公」的真正意義，是把所有的基督徒合而為一。對基督新教徒來說，他們以前對各教派分歧還不認為是怪現象；不少的人還

以此自豪，認為在各式各樣的方式下表現對基督的信仰，是寬宏容忍的表現。

然而新事態卻改變了這種想法。基督新教的各教派，直至十八世紀末，從未有過到異教國家去傳教的活動；到了十九世紀，才積極展開傳教活動。這樣一來，往往幾個教派對立起來，因傳教心盛而競爭，惹起了非基督徒的詫異：「他們既然都自稱是同一救主的門徒，怎麼分門別戶的對立起來呢？」

一九一〇年基督新教在英國愛丁堡開國際佈道大會時，有一位來自遠東的代表，在全體與會人員的面前提出：教徒的分裂，使該地區的佈道工作完全喪失了效力。這句話使美國聖公會的主教布倫特（Charles Brent, 1869-1929）深受觸動，從此他便時常關懷，必須除去這個絆腳石。於是所謂「大公運動」便應運而生。

一九二〇年左右另一位大公的先驅出現了，此即瑞典烏普沙拉市（Uppsala）的路德教派主教蘇德布隆（Nathan Söderblom, 1866-1931），他是一位學識淵博的人，且與基督教各教派，如路德教派、東正教、英國國教、天主教往來頻繁。他雖然深知不易使各教派的不同教義聯合一致，可是他試圖使大家至少在行為方面聯合起來。他為此創建了一個委員會，名「世界生行大會」（Life and Work），提出社會、倫理和經濟等問題；並於一九二五年在斯德哥爾摩集會：六百位各教派的正式代表，及代表三十一個不同名稱的教徒團體和三十七個國家的受邀列席人，在上帝跟前共同

謙遜認罪，懇求祂賜給合併統一的助佑。

這種「世界生行大會」運動，很快便獲得了布倫特所創立的「世界信禮大會」(Faith and Order)委員會的讚譽。東正教和英國國教也自行加入。這個委員會專心致志地研究教義問題，一九二七年在瑞士洛桑集會，在教義的基本重點：教會、聖寵、聖事和聖體上，尋求協調。

這兩種運動本是殊途同歸，於是一九三八年在荷蘭的烏特勒支(Utrecht)集會時，大家同意把它們合成一個新的機構，稱為「世界基督宗教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但第二次世界大戰迫使這項計畫延期實施。直至一九四八年才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第一屆大會。一九四八年有一百五十個教派加入了「世界基督宗教協會」；一九六五年加入的教派已有二百一十四個。第二屆大會於一九五四年在芝加哥附近艾凡斯頓(Evanston)召開。

第三屆全體大會於一九六一年在新德里召開；值得注意的是鐵幕後的東正教也加入了該協會。大會曾用下面的詞句說明了協會的性質：「世界基督宗教協會是凡依據聖經承認耶穌基督為上帝和救主的教會的聯誼會，努力同聲響應上帝對他們的共同號召，為了唯一的上帝父、子及聖靈的光榮。」⁶

在同一機構內，存在著對教會的基本概念意見分歧的教派，勢必引起緊張和敵

對。領導運動的人們曉得這些困難，但他們對祈禱懷有信心，希望獲得上帝的助佑，以便排除一切困難，共同向著合一邁進。

天主教的態度

天主教對它以外的大公運動當然高興，認為這是聖神的感召，使人嚮往基督向祂門徒所要求的統一，也有意參加；它視那些由洗禮而復義成為基督神妙身體的人為在主內的弟兄，希望天主教教友跟分離的弟兄合在一起，懇求天主賞賜聖寵，以便能實現基督所願望的一致；它也叮囑大家對分離弟兄們的處境加強認識；應該站在平等的立場，並在主教們的領導下，請專家們開會討論，在謙誠和愛德內共同尋求合一的途徑；它邀請所有的基督徒合作，以推動和平，同人類的災難奮鬥，或在信徒的氣氛內發展技術和科學。

不過在現在的情形下，天主教還沒有參加這個協會；它曾給在新德里召開的大會派去了觀察員，不過不是代表。恐怕有人評判這種態度為高傲的不容忍，不過凡是充分認識天主教所處的地位的人，都曉得它不能採取其他態度；合一絕不能建築在模稜兩可之上。天主教相信只有一個建基在磐石上（伯多祿）的基督教會，那就是羅馬的天主教，在它內從來沒有喪失過統一和一致。天主教按人事的機構說，自

知在風化和紀律上常需要革新，對以前因不夠容忍而導致的分裂謙遜認錯，並向天主和分離的弟兄們請求寬恕和諒解，並願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與分離的弟兄們商談合一的途徑。天主教以外的許多教派，尋求他們所喪失的一致，天主教在這方面只有贊成並盡力幫忙，但它不能承認也不能表示承認，外表聲稱是一個教會，卻具有不同教義的分子。

為合一祈禱

合一的實現，好像遇上了不能克服的阻礙；不過人所作不到的，對天主而言卻毫無困難。倘若信徒們遍地虔誠祈禱，救主所叮囑的「使他們合而為一」，定會實現。

教宗良十三世早已倡行了自耶穌升天到聖神降臨的九日祈禱。

一九〇九年，教宗碧岳十世又批准了自一月八日聖伯多祿（St. Peter）首座至二十五日聖保祿歸化，舉行八天的祈禱。這個八天的祈禱，本是紐約聖公會的牧師瓦特生（Watson）和他的朋友倫敦的牧師瓊斯（Spencer Jones）所首倡的，目的是為了使英國聖公會重歸羅馬的懷抱。瓦特生本人於一九一〇年皈依了羅馬聖教會。這種祈禱，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很少在天主教以外進展了，因為我們分離的弟兄們很難接受它。實際上，他們既然自信是基督的真教會，怎能為他們的教會被天主教吸收合

併而祈禱呢？

最後還得感激里昂一位名叫柯圖烈 (Paul Couturier, 1881-1953) 的神父，他終於找到了大家都能接受的祈禱方式，就是「為了使所有的基督信徒，恢復祂所希望的一致」或「企望基督所願望的一致，依照祂所願望的方法和時間，早日實現」。對此誰也不能反對；因為有哪個信徒敢反對完全服從天主聖意的措置呢？

柯圖烈神父是在一九三五年想出了這個傑出的觀念，立即獲得了東正教、聖公會和基督新教很多領袖們興高采烈的同意，稍後不久也得到了「世界信禮大會」的贊同。自此以後，基督徒合一的「祈禱週」便普遍地展開了。

大公運動的進展

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公運動才逐漸展開，這是因為有好幾種有利的形勢：如無神論的日漸擴展，迫使所有的基督徒同舟共濟、同仇敵愾，尤其是不斷舉行聯合祈禱，神學家們的研究也促使彼此更常接觸；此外天主教徒對研究聖經的復興，也使他們同基督教徒更形接近，而基督教徒對「聖傳」也有了新的認識；禮儀的復興，也使我們同最重視禮儀生活的東正教更接近了。不過這種有利的形勢只是這近十年以來的事，可說運動的潮流還未觸及信徒羣眾。為了使合一的希望達

到像今日這樣的高潮，還有待非常人物若望廿三世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這節留待下章再為詳述。

註釋

- 1 猛一看，恐怕人們會以為碧岳十一世所要求的，並不比一八七〇「保障法」所給予碧岳九世而被他拒絕接受的為多。但實際上卻有實質的區別：(一)保障法是由義國國會投票表決的單方面立法，並未徵詢聖座的意見；所以能由該國會取消；拉特朗條約則是兩方面簽訂的條約，由雙方在平等的立場上談判，並在教宗所指定的條件下由教宗接受的。(二)保障法只准教宗享用梵蒂岡宮；拉特朗條約則承認教宗有完備的主權，且由此產生了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國家，擁有最高主權的一切屬性，即立法權、警察權、制定國旗、錢幣、郵政，以及與各國交換使節的全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充分表現了這種獨立自主的利益。
- 2 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有十九個國家成立了公教職工青年會，中國也包括在內；一九五三年已增至六十五個國家。

- 3 一九六五年教宗保祿六世 (Paul VI) 在位期間 (1963-1978) 升賈爾定神父為樞機，這對一位沒有主教品的普通神父是一種罕有的榮譽。教宗且聲稱他之所以如此做，「是對一位在這個世紀為教會和人靈工作最好的人，表示歉意。」
- 4 據可靠的證人敘述：教宗在去世前數日曾接見兩位義大利的政治人員，向他們說明義大利同德國併肩作戰實屬瘋狂，並說義大利一定會戰敗，並向他們描述戰敗和敵人進占的悲慘情形，歷歷如數家珍；他說法西斯主義定將一蹶不振，而法西斯黨人亦將血流成河。該兩人視這預言為老人的幻覺囈語，毫不予以重視。然而數年之後，他們才戰慄而喪膽地目睹它若合符節地一一實現了。
- 5 近來有人控訴碧岳十二世，說他對納粹黨人慘殺猶太人並未提出抗議；可見是何等的誣蔑了。他因氣質溫和的關係，固然未曾抗顏面諱，大聲疾呼……即使他那樣做，也於事無補。當希特勒氣焰正盛時，提出嚴重的抗議，不但不能使他停止迫害，反會使他變本加厲，結果他那不響拯救千百人的生命和救濟無數難民的工作，反倒受阻而不能實行。由此可以看出「世界基督宗教協會」與「大公會議」的基本區別：世界基督宗教協會本身不是一個教會，是各教派的聯誼會，由於共信基督救主和三位一體的上帝而聯合起來，但各教派對教義的基本要點各自分歧，各個獨立自治，並沒有一個統治各教派的權威；它只能建議和提供協商。反之，大公會議卻是由信仰一致並與羅馬教宗相連的主教們所

組成的，它是天主教的最高權威。

7

教會的態度已由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大公主義法令」內說明。我們大部分分裂的弟兄對這項法令都很滿意。當時值得注意的是大會非天主教的觀察員，能藉合一祕書處的轉達貢獻自己的意見；實際上他們也多次提供了意見，並且發生了效力。

第二十六章 十九與二十世紀的傳教情形

壹 概 觀

十九世紀的傳教歷史，可用兩句話總括：十七世紀所獲得的一切，到十九世紀之初幾乎全部喪失；傳教的事業，好像已接近跨臺、壽終正寢的地步。十九世紀末葉，十字架又在全球豎立起來；兩個新的大陸澳洲和非洲給福音敞開了大門。傳教士比以前任何時期都來得多。

十九世紀初葉的傳教情形

十六和十七兩個世紀，傳教的情形可說飛躍發展，而十八世紀卻開始低落。在亞洲、中國、日本、安南、暹羅等國對傳教士的敵視，固然是一種原因，但癥結還是在歐洲：諸如楊森主義的騷擾，加上對禮儀的紛爭，揚言為了宗教觀念的合理和

進步所激起的戰爭，伏爾泰對傳教士的嘲笑，耶穌會橫遭取締（一七七三年）……。

這一切都是造成傳教衰落的原因。此外法國革命和它的後果也是重要因素：由於取消修會和關閉修道院，使傳教士的來源無著；因教會財產的充公和教友捐獻的減少，使財源枯竭；為了政治的紛亂，無暇顧及傳教事業；因教宗碧岳六世和碧岳七世被俘及傳信部被拿破崙查封，使得教宗喪失了活動的自由；還有歐洲國家二十年的陸海戰爭，導致奉教國家同傳教區的聯絡時斷時續。

十九世紀最初三十年的傳教區情形，也使我们沮喪。在隸屬傳信部的整個區域內，只剩下二百五十名歐洲傳教士，二百七十名本地神父；聖堂大部分都已圯毀；老傳教士相繼死去又不見年輕人來接手；本地的神職人員又因教難而死傷極多；於是教友日益削減，信心萎靡，以致在日本、高麗、中亞細亞、澳洲、馬達加斯加和衣索比亞等地，連一位神父也沒有。

復興

然而由這時期起，也正醞釀著來日的復興：天主教於十九世紀初，在歐洲又興盛起來，修會復振（尤其是耶穌會和遣使會），新的修會一再創立，這都是復興的前奏。十九世紀也是大量發現新地的時期。英、俄、法、德、奧、美等國的探險家，

正在熱心深入尋覓澳非兩洲和南北兩極尚未為人所知之地，這樣也給傳教事業開闢了新的工作領域。傳教士追隨在探險家之後，有時還走在他們前頭。不但是天主教的傳教士，就連基督新教也前去尋覓待救的人靈，使他們皈依基督。

基督新教徒開始傳教

直至十八世紀末葉，幾乎只有天主教的傳教士到遠方去宣傳福音；東正教沒有顯示過遠征的精神。至於基督新教徒；自他們改教後兩個世紀以來，為著他們對天主教或彼此之間的神學論爭，已弄得筋疲力盡，不但沒有時間到歐洲以外的地區傳佈福音，也沒有那樣的精神和毅力。在十七世紀，甚至十八世紀，在德國有些基督新教的神學士，倡言信徒並沒有到國外去傳教的義務：據他們所說，吾主使福音傳到天下各國去的命令，只是向十二位使徒說的。何況，基督新教的君主，同天主教的君主正相反，對向異教人宣傳信仰不感興趣。

但在十八世紀末葉，小批的基督新教牧師，也開始向歐洲以外的民族傳福音了，但那只不過是少數人單獨的嘗試。到了十九世紀，基督新教對傳教才普遍發生了興趣。隨著英國的殖民和美國的勢力發展，基督新教的傳教事業才格外興盛起來，傳教的機構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增多了；可說哪裡有天主教的傳教士，哪裡也必有基督

新教的傳教士。我們雖然不準備寫基督新教的傳教史，不過應該說，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傳教士，尤其是最初，彼此不大和諧，那是早已料得到的，並且很可惜也有過十分惡劣的衝突。即使沒有發生過什麼不幸事件的地方，信徒間的不和（不只是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即在基督新教各教派之間也是如此），給非教徒留下不良的印象，對福音的傳播自然不無妨礙。

教宗國瑞十六世的作爲

在這個對傳教有決定性的時期，選一位有毅力積極推動傳教的教宗，對天主教的傳教事業而言，自然是一種幸運。

因為國瑞十六世本身作過傳信部長，完全明瞭傳教的各種問題，因此把向異教人傳教，視爲他作教宗的第一要務，對傳教修會和新舉辦的傳教事業，盡力予以鼓勵；派遣樞機主教去巡視傳教區，改組修道院，劃分傳教區域（教區），並委任最好的人選去管理。

他使全球各傳教區，藉著傳信部，直接隸屬於教宗。再加上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無力像十六世紀那樣，擔保供給傳教士和為傳教需要的費用，自然也不能視他們所壟斷的保教權為合法特權了。除了葡國的屬地：亞洲的臥亞（Goa）和澳門，非洲的

安哥拉和莫三比克等地仍有屬保教權的教區外，其他傳教區已一律隸屬傳信部。這樣幾世紀以來有傷信德光輝的亂源才消失了。從此以後，何處需要傳教士，便由傳信部指令各修會派遣。它也鼓勵在歐洲所產生的輔助傳教事業，把其中最重要的集中於羅馬。對傳教士，它也時常提醒他們牢記，作為他們行動準繩的規矩和原則，即：不得干預有政治性的事項，禁止經商謀利，尊重當地的文化和民族，盡速培植本地神職人員等。

傳信部既已行動自主，便給傳教區立定了法律的規章：當某地傳播福音的工作收到相當的成效時，便把它委託給一位宗座監牧主持；及至教友的數目增至相當的規模時，便把教區的主任升為宗座代牧；如果他還沒有主教的聖秩，便予以祝聖¹。最後，如果該處教會已根深柢固，擁有相當好的地方組織，如教育和慈善事業、公教進行會和修道院等，教宗便可能建立教會組織的正統，將該傳教區劃分為總主教和主教區；至於福音的傳播尚不普遍的地域，可能仍由宗座監牧管理。

自十八世紀傳播事業開始衰落，直至十九世紀中葉才逐漸恢復了生氣，認真地向前進行起來；自一八五〇至一八八〇年，傳教士才真正又布滿了全球各地，不過人數還不十分充足。但全球在此時期的進步卻甚為可觀，真可稱十九世紀為「傳教的世紀」；實際上這裡所說的十九世紀，是涵蓋由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的

一段時期。

傳教事業

假如不是奉教的世界共同協力的話，教宗和傳信部絕不能實現他們改組及擴展的計畫。法國在十八世紀和大革命時期，曾領導反宗教運動，現在卻首倡復興宗教和傳教的運動了。所以最早的傳教事業也是在法國產生，目的是提醒教友羣眾關心傳教之事，鼓勵他們為異教歸化祈禱，並募集金錢。

這些事業中產生最早、傳布最廣的一種是「傳信會」，那是一八二二年在里昂產生的。提倡者是一位年僅二十三歲的女子，名札里高（Pauline Jaricot, 1799-1862）。她完全獻身給天主和愛人事業。她由她的哥哥（也是神父）介紹，得識外方傳教會的神父，說明自己願幫忙他們，但不知他們特別需要的是什麼；他們答以需要經費。為了給傳教事業募捐，她根據三個原則擬具了一項簡便而有效的方法：一、把善心人士聯合起來專為傳教事業普遍捐款，免得零星分散。二、分頭負擔收集捐款，一名會員負責收集十名捐戶，每十名會員將百人捐款交給另一階層的會員，如此層層轉交上去。三、應捐的數目規定得極低——一法郎的五分之一，約合臺幣五角，這樣誰也能捐獻，毫無困難。所謂匯流成川，集腋成裘；不到幾年，傳信會便收到了

數目可觀的捐款。這個善會由法國傳播到其他奉教國家。教宗碧岳十一世為表明它是全教會而非一國一地的善會，乃於一九二二年將會址遷至羅馬，以便統籌分配。

傳信會的影響極大，不只是因它對傳教事業每年能捐很多的金錢，也是因為它引起了千百萬名教友輔助傳播福音的興趣。自該會成立以來，便刊行了一份雜誌，名《傳信會年鑑》，不久便發行了各種語文版本，把那些新的福音使徒和殉道者的冒險精神及犧牲，公布給全世界，庶幾使讀者聞風興起，慷慨響應傳教的聖召。這份雜誌可稱為傳教雜誌的先河，現在這類刊物已有多種，散布在全球各國。

傳信會產生後二十年，在法國又創興了「育嬰會」。這是由一位滿懷傳教熱忱的主教福庇詹森（Mgr. Forbin-Janson）所創立的；他因未能實現去中國傳教的夢想，便獻出了他演講的天分和力量，去為傳教事業作宣傳。育嬰會是向各國奉教的兒童呼籲，請他們祈禱並捐款，以拯救教外棄嬰的靈魂。它也和傳信會一樣，所要求的捐款數目不大，但當按時繳納；它也刊行了一份雜誌，以支持傳教的熱忱。

一八八九年，法國諾曼第的一位少女讓·比加（Jeanne Bigard）和她的母親，共同創立了「聖彼得會」，目的是為了協助在傳教區建立神學院，培植當地的神職人員，並支持修生的生活費。

一九一五年有一位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名保祿·瑪納（Paolo Manna），感於

連神職界也有許多人對傳教漠不關心，乃創立了「神職傳教協會」(Unio Cleri pro Missionibus)，以激勵神父們為傳教祈禱，並使他人祈禱。

該世紀所產生的協助傳教的無數善會中，我們只引證這四個，是因為它們的性質最普遍，也被聖座特別列在自己的保護之下，而封之為「宗座傳教事業」。

教宗本篤十五世的作為

國瑞十六世以後所有的教宗，對傳教都非常關心。碧岳九世和良十三世對新興的傳教修會都加以鼓勵，並扶助他們的事業，就如栽培本地神職人員等。碧岳十世改組了傳信部，為了使它能產生更大的效力，給傳信部長——樞機——的權力格外廣泛，以致人們稱他為「紅衣教宗」呢！

然而真正給「偉大的傳教教宗們」開路的，卻是本篤十五世，繼位的幾位教宗直至現在還遵循著這條路。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幸阻礙了傳教飛躍前進的路程；戰事結束的次年，他馬上便公布了《夫至大》通諭，那真稱得上是傳教的「大憲章」。他以遠大的眼光討論近代傳教的各種問題，他的繼位者們只是將那道通諭所定的原則，予以擴大、確定和實施而已。在奉教國家因狹隘的國家主義剛剛結束衝突之後，教宗便強調教會應超越國界的種種分歧，他向傳教士說：「你們要牢記，你們絕不

可為擴張人類的國家而工作，而是為擴展基督的神國；也不是為祖國徵募擁護的人民，而是為天國。」倘若傳教士忘記了這條金科玉律，那便成了瘟疫，一切努力都將虛擲白費。

教宗又說：福音已傳入了幾世紀的地域，本地神職人員只是盡些次要的職務，連一位主管級的人物也沒有，這其中必定有應行糾正的錯誤。當為神學院致其全力，以便培植可以領導其本地教會的人才。

這道通諭不但是對傳教士發的，更是對整個奉教世界，它邀請所有的教友關心傳教工作，為之祈禱，培養傳教的聖召，對傳教事業表示慷慨大量。

傳教的教宗——碧岳十一世

人稱碧岳十一世為「傳教的教宗」，真是名副其實。他承認，一想起及世間還有十億以上的人不認識基督，便睡不著覺；他職掌教會時雖在亂世，使他不得不顧慮許多問題，但他從未忽視有關傳播福音的事。

教宗在他於一九二六年所公布的《中國傳教》（*Rerum Ecclesiae*）那道通諭中，提醒傳教士不要忘記，傳教並不是終點，乃是建立本地教區而委之於本籍人員的過程。他也把這些原則付之實行。他在一九二三年祝聖了第一位現代拉丁禮的印度主

教，三年之後，為表示事態的重要，他以最隆重的禮節，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中，親身祝聖了六位近代的首批中國主教²。

這在傳教史上實在是一個大轉變：教宗指明這是一次大躍進，播種之後需要繼之以培植；應該把人們誤信天主教為外國販來的商品或歐美勢力侵略中國的工具之謬言消除，給世人證明教會實在是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公教。

這種運動並非一發即止；碧岳十一世又繼續委任了許多位本地主教，到他去世時已有二十八位，他的繼位者仍照著這個路線繼續前進。

碧岳十一世還實現了本篤十五世所擬定的另外一項計畫：就是使奉教的整個世界參加傳教工作。他邀請所有的修會派人到傳教區去，連那些原本不是為了傳教的修會，亦即連專務默觀天主的隱修會和女修會也不例外。他願使所有的教友醒悟，人人對傳播福音有責，他願喚起羣眾的大規模運動，幫忙傳教。他曾為這個目標建立了「傳教日」，每年在耶穌君王瞻禮以前的主日在全球各堂口舉行。祈禱宗會每月的傳教意向，也是按照他的希望加派的。

為了使傳教的思想深入人心，他曾號召使用現代的宣傳技術：他於一九二五年在羅馬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傳教展覽會，並為了使這項舉動永留人心，翌年還在拉特朗建立了一個傳教人種博物館，不但將一切有助於傳教以及它的進步和它的事業

的報導彙集一處，還搜集了一切有助於認識各民族和他們文化的檔案文獻。為了使全世界獲得正確的報導，他於一九二七年創立了「信德通訊社」，給各報館傳遞有關傳教的消息。

這種多方面作為的效果，在數字上很顯著：歷經碧岳十一世在位的十七年，天主教教友在傳教區的數目，自一千二百萬達到了二千二百萬；教區由三百一十五達到了五百二十六，其中四十個是委任本地主教管理的。

碧岳十二世和若望廿三世

教宗碧岳十二世和若望廿三世都是蕭規曹隨。世界大戰雖已爆發，碧岳十二世施政的第一步，便是親身祝聖國籍不同的十二位傳教區主教，其中有德籍者一位，法籍者一位（他們的祖國正在彼此交戰），印度二位，中國一位（就是陽穀的代牧，後升樞機的田耕莘），和非洲兩位首批主教。這在各民族彼此廝殺的同時，對教會的超國籍性，可說是再好不過的證明了。為了更便利傳教起見，他毫不遲疑地同非天主教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如中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日本等國，並在傳教區大事增添了本地主教的數目。

最後幾位教宗，也公布了重要的傳教通諭：如碧岳十二世的《致中國教會》

(*Evangelii Praecones*, 1951) 和《信仰的恩惠》(*Fidei Donum*, 1957, 這道是特別給非洲傳教區寫的)；若望廿三世在《牧羊人的領袖》(*Princeps Pastorum*, 1959) 通諭內，特別強調教友參加傳教的義務，公進會、學校、出版以及慈善和社會事業的重要，並強調應尊重非基督宗教民族在風俗習慣上未沾染異端的文化。

傳教士

歷經整個十九世紀，法國在供給傳教士方面可說常占第一位。一九〇〇年間，在全球各地從事傳教的六千人中，有四千五百位是法國人，可說占了全部人數的三分之二，此外還有二千六百名從事教育的修士和一萬名修女。

從那時以來，尤其從教宗本篤十五世和碧岳十一世鼓勵傳教以來，傳教士的數目增加了三倍以上，而其來源也很廣泛；以前總不派遣傳教士或派遣很少的國家，也加入了傳教的陣營。若要細較他們的數目來自哪國最多，則還是以小國較多：荷蘭可占首位，它所有神父的五分之一在傳教區工作，其次是愛爾蘭、比利時、瑞士，然後才是法國、英國、加拿大、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和美國。

現在我們巡視世界每一角落，概括地看一看這一系列傳教英雄事跡的發展，以及他們的成績和所遭遇的困難。

貳 非洲傳教

埃及和北非在教會初興時是教友生活氣氛最濃厚的地方。人不免要驚奇，這個奧力振（Origen）、聖西彼連（St. Cyprian）和聖奧斯定（St. Augustine）等教父的鄉土，廣袤的非洲大陸，離歐洲那麼近，何以在近代卻是最後接受福音的地方？那是因為自回教的浪潮湮沒北非以來，天主教便逐漸消滅了；以後土耳其人（他們也是回教徒）在十六世紀征服了這些地區，將其作為海盜的大本營，嚴禁天主教的船隻靠岸。自一四九七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繞過好望角之後，非洲的地形已為人所知；於是葡萄牙人，繼而法人、英人、荷人都在非洲海岸建立了商站。天主教傳教士雖於十六世紀在各處有短暫的成績，但從未有一位歐洲探險家深入過非洲：森林無法穿越，廣漠無邊的沙漠乾燥異常，氣候惡劣，可怕的瘧疾在當時還無法醫治，再加上勇武善戰的阿拉伯人的敵視，比洶湧的海洋更難穿越；因此非洲十九世紀中葉的地圖，中央只是空白，標以「不知之地」而已。直至一八三〇年法國征服阿爾及利亞時，回教的銅牆鐵壁才被推倒；以後大膽的探險家才逐漸揭穿了非洲大陸的神祕。

殖民政策與傳教

歐洲的資本主義正在發展時，各國政府認為占領新地，是銷售大量工業品的最好辦法。於是英、法、德、義等國都銳意盡速占領更廣大的殖民地。列強於一八八五年在柏林開會，劃分了非洲大陸的勢力範圍；十九世紀末葉，只有衣索匹亞、賴比瑞亞和摩洛哥仍保持獨立，其他幾乎都成了列強的屬地。會中曾經議定，原住民的信仰自由應予以保證；列強應不分信仰與國籍，努力發展宗教、科學和慈善等建設。

這些原則，雖不能說履行於各時各處，但大致尚被尊重；實際上非洲的殖民政策是和傳播福音平行並進的。但這並不是說實行殖民的國家常關心致力傳教；他們為了經濟或政治的利益，有時竟阻礙傳教（比如在北非，法國政府竟不怕妨礙天主教的傳教事業，而遂行遷就回教的政策）；但因列強打開大陸，和平、秩序和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傳教工作則是事實；殖民與傳教齊頭並進，有時互相利用，有時彼此掣肘。

傳教事業重整旗鼓——雅物艾院長

十六世紀非洲海岸各處所建立的那些教團，到十九世紀初葉，幾已消滅無餘；

整個非洲不足五萬名天主教教徒，神父也只剩下六十來位。

一八一七年有一個新修會的幾位修女，在西海岸的塞內加爾登陸，五年以後，她們的創立人也追蹤而至。這雖算不上什麼驚人的大事，但卻可說是非洲再度傳教的開始。這個區域傳教希望極微，連該處的宗座監牧都因灰心而離去了呢。這些冒險進入回教城市的大膽女子是些什麼人？她們是聖若瑟會的修女（*Sisters of Saint Joseph*），是雅物艾（*Anne Marie Javouhey, 1779-1851*）在克魯尼（*Cluny*）的舊隱修院附近所創立的；她真是一位奇女子，尚在童年時，便在大革命時因掩護被驅逐的神父表現出她的勇敢。她一心想獻身給天主，只是躊躇不知該用何種方式。某日忽得神見：見她的房間內滿是黑面孔的兒童，向她伸手喊著：「親愛的媽媽。」，又見聖女大德蘭（*St. Teresa of Avila*）顯身向她說：「這是我給你的孩子，我要作你所立修會的保護人。」她在塞內加爾找到了這些孩子。她一抵達，便顯示了她的組織天分，巡視農村，奠定了天主教的基礎；使兒童們得以受教育，病人們得到照顧，開闢了模範農場；從一開始她便認定了非洲人的靈魂必須由非洲人去拯救，於是準備培植本地神職人員，她選拔了一些兒童，送到法國栽培；於一八四〇年，她見到了其中三名領受了鐸品，那是近代第一批黑人神父。兩年以後，因操勞過度，使她的健康不支，不得不回到法國休養。然而，她所創立的修會，也需要她親自照料；修會發

展得很快，聖召源源而來，全球各處都邀請她們前去。雅物艾會長雖然沒有重返非洲，但她仍不停地為她的黑人孩子工作。有人請她到圭亞那去接收被救出的黑奴，施以教育，她便率領了三十六位修女前去。

當她鞠躬盡瘁而死時（一八五一年），聖若瑟會修女已有一千二百名；今日散處在世界各地的已有三千五百。教宗碧岳十二世於一九五〇年將這位英豪的女子列入了真福品，她真是近代傳教史上一位出類拔萃的女性。

新興的傳教修會

十九世紀中葉產生了三個獻身傳教（特別是非洲傳教）的新修會：即聖神會神父（*Fathers of the Holy Ghost*）、里昂非洲傳教會（*African Missions of Lyon*）和白衣神父（*White Fathers*）；他們對非洲的傳教史占著重要的一頁，使福音打入了大陸中心。

其實聖神會自十八世紀初葉即已存在，只是大革命時受到打擊之後幾乎不能復振，而且會員存在的也只有少數；當它和一歸化之猶太人黎伯滿（*Libernan, 1802-1852*）所創立的新修會於一八四八年合併後，才恢復了生氣。黎伯滿健康欠佳，他本人從未去傳教，但他對拯救非洲人的靈魂懷有甚大的雄心。他被選為總長之後，便成了該會的靈魂而賦予它精神——聖保祿那樣的精神：他叮囑他的神子們要為非洲人而

自成非洲人，且要培植一個本地的神職班和精華團。他的事業開始受考驗：一八四四年派往西非的第一批十名傳教士，數月之間即被病魔攫去；殘存的三人乃遷往加彭。黎伯滿一方面不願放棄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人，一方面又怕遣派自己的神子前去是送死，於是躊躇不決；但他的門徒卻堅決願意出發前去，於是他讓步了。第二批傳教士乃於一八四六年成行；他們建立了一個傳教站，以後發展成了達喀爾市（Dakar）。

一八五六年馬立雍主教（Mgr. de Marion-Bressillac）在里昂創辦了非洲傳教修道院；一八五八年聖座委任他去獅子山開教；他立即同五位同伴動身。這次仍是一樣，將來的進展，又是以開荒者的犧牲換來的，因為在他們登陸後六星期，創辦人和四位同伴，便被瘧疾攫去了；然而繼任的首長仍再接再厲地衝鋒。

一八六八年又有一個非洲傳教會誕生了（公稱白衣神父）；教宗保祿六世稱創建人為天主所喚起的一位最卓越的人，不但非洲，連整個文明世界都應對他永懷紀念。

拉維熱利樞機

起先誰也沒想到拉維熱利主教（Mgr. Lavignerie, 1825-1892）要投身傳教事業；他是巴黎大學的一位卓越教授，後升南錫主教，在任時顯示了非常的組織能力，有升任里昂或巴黎總主教的希望。當他還是一位普通神父時，曾在黎巴嫩住過三個月：

其時回教徒屠殺了二十萬名基督徒，他是被派去放賑的；他當時見到了回教的影響，而激起了傳教的熱忱。為此，一八六七年有人建議他去接受阿爾及利亞首都的主教任時，他立即接受了；聖座又把向撒哈拉沙漠傳教的任務也委託給他。撒哈拉地區本已極廣，但尚不能滿足他的傳教熱忱。他有更廣泛的計畫：阿爾及利亞是兩億人口大陸的一個門戶，從那裡可進入廣漠無垠的撒哈拉沙漠，他要把福音的光明帶到這個真相不明的大陸心臟去。

這個偉大的計畫遇到了阻礙：因為自一八三〇年法國占領阿爾及利亞以來，政府的政策便是禁止一切向回傳教的工作；當權人曉諭他，當滿足於教化阿爾及利亞二十萬名天主教教友的職務。但拉維熱利主教絕不甘心只作移民的司祭，福音應向所有的民族傳播。他於是上書法皇拿破崙三世堅決請求，並向他陳明：如果他這種行使職權的自由被拒絕，他便要設法自動爭取。法皇對他這種百折不撓的意志終究讓了步。

拉維熱利主教曉得使回接受福音絕非易事；他要仰仗愛德的力量去著手，不久便抓住了實行愛德的機會。當時瘟疫大作，有十萬人作了犧牲品，遺下了大批的孤兒。拉維熱利主教便收養了那些孤兒，建立了育幼院、職業學校，並開墾農場；將他精心栽培起來的兒童充實其中，組成了奉教農村的核心理。

為實現他那些偉大計畫，自然需要助手：他便創立了非洲傳教會，教他們同非洲人相處，仿效非洲人的生活；他們的會衣便是一襲寬大的白袍，如同回教徒一樣，這就是人們稱之為「白衣神父」的原因；不久又創立了一個女修會，稱為「白衣修女」。

非洲的心臟：烏干達的殉道者

拉維熱利主教一有了所需要的人，便派他們穿過撒哈拉大沙漠向蘇丹進發，不幸首兩批遠征隊都遭屠殺。既然此路不通，他便須尋找別的通路。基督新教的傳教士李文斯頓（Livingstone）和探險家斯坦萊（Stanley）於一八七〇年所走的路線，引起了歐洲對非洲心臟尚不為人知的地帶注意的大潮。拉維熱利認為那是他傳教士傳布福音的場所。一八七八年教宗良十三世把向這些地帶傳教的工作都託給了他；他立即籌組了遠征隊。這次的出發點是在東岸桑吉巴島（Zanzibar）對岸的巴加莫約（Bagamoya），聖神會的神父們十九世紀在那裡建立了一個教區，作為那一帶各傳教區的出發基地。

白衣神父們走了一年半，有些中途死了，其他到達了烏干達的首都。基督新教的傳教士已先他們到達。起先國王待他們很好，皈依的不少，尤其是國王的扈從，但回教徒反對，逼迫他們退走。及至四年後他們返回時，卻見他們最初受洗的教友

給自己的同胞一百七十七人授了洗，且吸引了六百名望教者，他們真是喜出望外。但首相是一名回教徒，仇恨天主教甚烈，且激起了一次教難，有一百多名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徒被害，其中包括國王宮中的扈從。國王曾一再勸他們背教，他們都拒絕，遂壯烈殉教。有三位青年，深怕被人遺忘或忽略，大聲高呼自己信仰天主。他們用蘆葦把他們裹起來送上刑臺，其中一名十二歲的童子前一天才受洗；當火焰升起時，他們不但不痛哭喊叫，反而以清晰熱情的聲音朗誦經文，痛苦愈大，誦經的聲音愈高。

國王的侍從長路昂加 (Charles Lwanga) 是首相特別切齒痛恨的對象，被交付文火焚死。刑役譏諷他說：「祈求你的天主，教祂從刑臺上救你下來吧！」他從容回答說：「你在我腳下點燃的火，像涼水一般的爽快。你侮辱天主可要小心哪！假如你不悔改，恐怕天主有朝一日要把你投入永不熄滅的火中呢！」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教宗保祿六世在參加大公會議的全體主教面前，將這批英雄中的二十二位列入聖品，並立路昂加為非洲黑人的主保。在參加列品典禮的主教中，有近代的第一位非洲主教吉瓦奴加 (Kivavuka)，他是烏干達人，於一九三九年經教宗碧岳十二世祝聖的。「殉教者的血是教友的種子」一語，又得到了一次證明；因為烏干達的教會，成了非洲二十世紀最繁榮的一個；現在教友二百萬名，分為七個教區，有本籍神父二百五十位。

反奴隸運動

自十九世紀初葉，西方列強即已禁止在他們的殖民地內販賣黑奴，但在非洲內地，阿拉伯的商人仍在繼續著作虜賣黑奴的勾當。非洲東岸桑吉巴便是主要的人市，被虜的可憐黑人，成羣的被運到那裡裝船，賣到土耳其和其他回教徒的國家去。

拉維熱利樞機從他那些傳教士們的信中得知虜賣黑奴的詳情；據說被阿拉伯商人牽至市場販賣的不幸者，如果連被打或因病死亡在中途者計算在內，每年竟有四十萬名。許多區域完全慘遭蹂躪，幾至淪為廢墟，有些部落因常受這樣的威脅，已陷於悲慘的絕境。

拉維熱利樞機決心終止這種獵人的醜劇，「把這些用黑奴的骨骸所製造的道路洗刷乾淨。」但一位七十五高齡的老人能做什麼呢？首先當向歐洲揭發這種殘虐的罪行，並向全世界的輿論控訴。為此，這位老人用盡了他所有的力量：到歐洲各大城去巡迴演講，激起聽眾的義憤；將所得的報告通知各國政府，警告全世界應負起良心的責任；他也盡力募集金錢去贖回黑奴，籲請志願者去非洲，用各種方法阻止這類可恥的交易，在各處掀起反奴隸運動。他的熱情和激昂的演說除去了一切的阻礙和反對。一八八九年列強的代表在布魯塞爾集會，採取具體的辦法，中止了販賣

黑奴的勾當。

其他地方傳教的情形

在那麼多傳教的英豪表現中，我們只撰寫了幾個。他們不怕忍受人所罕見的疲倦，不怕冒著人所罕聞的危險，甚至不惜犧牲生命，把福音傳入非洲。對耶穌會士進入馬拉加西島，遣使會及嘉布遣會士進入衣索比亞，無玷聖母會士之在南非等，都當敘述一下；至於公保尼主教（Comboni, 1831-1881）對反奴隸的奮鬥，可與拉維熱利樞機媲美，他是義國威洛納（Verona）非洲傳教會的創立者，他的門徒在蘇丹，聖母聖心會士在剛果，都值得一提。非洲大陸的探索愈進步，傳教的事業愈發展，聖座劃分教區愈多，各修會的傳教士去得也愈多：現在遣派神父到非洲去的已有六十個修會，非神職界的修士和修女會尚未計算在內。

傳教的阻礙

這一世紀以來，非洲變化很大，最初傳教士工作的情形，今日幾乎已無法想像。除了北非的回教國外，傳教士當日所遇到的不是些統一的國家，而是按種族、語言和習俗的差別聚居的民族和部落；沒有文字，更談不到成文法律，只有些約定俗成

的傳統規律，而且往往異常複雜。非洲固然也有實在的文化，不過隨地域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別罷了。有些野蠻的習俗，同教友的道德大相逕庭，例如酋長的暴虐、各部落不停的戰鬥、啖食人肉、巫術、殺人祭神、剝削弱小、輕視工作，只有婦女和奴隸才工作，因此一夫多妻的甚多。

何況由於交通的困難和危險，沿著不明底細的小徑或整天整夜地划著獨木舟，對地勢的探測難以正確；再加上水土的惡劣，原住民的懷疑和敵視，就更無法探測了。

不過時間一久，傳教士便獲得了經驗；他們是首先研究非洲語言、書寫、整理文法、編輯字典、編寫教義的人。語言是開啟非洲人心門的鎖匙，能同他們講話，便能得到他們的信任，明白他們的思想，也就能正確運用傳教的方法。

傳教的方法

普通傳教士到了一處，便先開一座學校；因為成年人多半狐疑，只好先從年輕人著手。所以歷經整個十九世紀，幾乎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傳教士擔任教育工作，即在今日，非洲許多地方，半數以上的學校，還都是傳教士開辦的。同時還應該栽培傳道員，以便派往各傳教站去；這些傳道員不但負責一個學校，教授教義，傳教士不在時，還得領導新生教團的一切宗教活動。傳教士的中心住所包括一座聖

堂、傳教士和修女們的住宅、男女學校、一個診所和幾個小作坊；附近有一菜園和培植樹木的區域。正如中世紀歐洲的隱修院一樣，傳教的中心不但分施宗教教育，並以慈善事業散布基督之愛的光芒；它也是一個文化中心，傳教士們很快就曉得了，除非先有某種程度的文化，否則天主教是接不上枝的；尤其是因為原住民輕視工作，遂致閒懶無事，這在很長的時期內對宗教的陶冶是一大阻礙。所以為培植教友，先該培植他作人。為此必須先使他們以工作為榮，訓練他們耕田學藝，修女們陶冶家庭主婦，教給她們縫紉或烹調，這都是將來成立教團的基礎。

第一次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傳教區不但初級教育的機構增加了，還增設了中等和技術學校。一九四八年在剛果創辦了第一座非洲公教大學。這樣一來，教友不但能得到更高的宗教栽培，生活水準也隨之提高，對公共的管理和私人的事業，也有了較高的能力，培植了不少社會的優秀分子。因有這些重大的變化，城市也飛速地繁盛起來，傳教的方法自然也得革新，已經和歐洲的情形很接近了；此外公教進行會、基督宗教工會、印刷事業、圖書館等，都逐漸建立起來。

以上是對黑人的傳教情形。至於回教徒呢，因他們的信仰已根深柢固，且對傳教的試探極為仇視，唯一能同他們接近的方法，是施行照顧病患和教育兒童的博愛工作，富高神父的作風便是最好的例子。

二十世紀的情形

二十世紀傳教的進展最快的是在非洲，由十九世紀初葉的五萬名教友增到了二千二百萬名，神父由六十位增至一萬五千位，其中二千位是本地人；此外還有四千七百名修士和兩萬一千名修女。

因為此一進步，聖座將許多地區提升為正式聖統（自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一）。一九三九年教宗碧岳十二世祝聖了兩位非洲首批主教；二十三年以後，已有四十四位參加梵蒂岡大公會議，其中還有一位樞機。

成績雖很可觀，但不能認為已臻滿意，應努力之事尚多；天主教教友只有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分配得極不勻稱。大湖一帶，喀麥隆、剛果、奈及利亞等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有戲劇性的進展；至於其他地區——不只是回教國——則仍邁著牛步。就大體來說，回教比天主教進展得更快。

最後這十年，非洲大部分的國家已由殖民地進而為獨立自主的國家。由於聖教會進行教育和社會的活動，並使他們認識人格的尊嚴和權利，可說是這種進展的部分原因；但同時它也不可避免地同殖民地的制度，多少連結在一起。教會從自己這一方面，自反殖民政策以前，業已對非洲人的獨立，清楚地表明了贊成的態度，並

多次對新獨立的政府表明合作的真摯願望；新政府大致也應許教會仍享有和往日同樣的自由。可是在剛果，傳教事業已籠罩在它獨立後政治的苦難之下，它這次的獨立使得國家非常混亂。有百位以上的傳教士和修女在混亂中被慘殺而死。在其他地方如衣索比亞、幾內亞，宗教的自由已受法律的限制。在蘇丹，回教徒占絕對的多數，少數的天主教徒受著壓迫，並將外籍教士驅逐出境。

教會在非洲應積極栽培本地神職人員，教友既然迅速增加，本籍神父相對便顯得太少了；也該培植一些優秀的教友，庶幾希望他們能抵制共黨的滲透和反神職的宣傳，其實那對非洲濃厚的宗教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

參 美洲傳教情形

美國雖然一直到一九〇八年仍隸屬傳信部，但天主教已不像十九世紀只是少數的信徒了；他們為戰勝多數的基督新教徒以爭取社會地位，奮鬥多年。現在天主教在美國已茁壯起來，有自己的神職人員、學校、大學、慈善事業，而且組織也非常進步。一八六〇年天主教徒只三百萬名，一九〇〇年已超過了一千萬名，一九三〇年有兩千萬名；一九六〇年在一億八千萬人口中，天主教徒已有四千二百萬名，自此在國內便有了「人數最多的教會」之稱（基督新教各教派分別來說，哪個也比不

（天主教）：幾十年前，一位天主教徒競選總統，基督新教方面的輿論竟誓死反對；然而一九六〇年甘迺迪（J. F. Kennedy）的膺選，證明了天主教在美國已和其他教派融洽無間。

合眾國的印第安人

因有少數民族——印第安人——尚未奉教，北美合眾國和加拿大還算是傳教區，他們的部落在廣漠的西部和加拿大的北部漂泊無定。十七世紀所建立的教團，早已消滅無餘。原住民和與他們文化不同的人格格不入，有被消滅的危險；傳教士（其中也有基督新教的）常盡力予以保護，免得他們受到白人的迫害；無奈白人愈前進，印第安人愈被迫向西退，傳教士也無力阻止。

但在印第安人中，還一代傳一代地對「黑袍人」（耶穌會士）留有紀念，因為那些人在一百五十年前曾給他們傳過福音，他們也多次派代表來要求傳教士回去。在華盛頓附近正有一批耶穌會士，是兩年前從比利時來的；他們便動身到原住民中去傳福音（一八二三年），同時也教給他們初步的文化，如耕田牧畜等。在這批耶穌會士中，有號稱印第安人摯友的斯麥特（de Smet, 1801-1873），他不久便對他們有了非常大的影響；他給許多部落傳福音，連最剽悍的蘇族（Sioux）都很歡迎他；白

人中只有他能進入最野蠻的民族部落而無恙歸來。政府也多次請他去同印第安人商洽和平相處之道，他利用這些機會替原住民辯護，也為他們跑了不少路，只為徵求新傳教士來加強傳教；他曾十九次渡過大西洋，進謁教宗和各國國王，幾乎走遍了歐洲各國。如果說，他的奔走並沒有得到人們所期待的廣大效果，那是因為白人西侵，印第安人已所剩無幾的緣故。今日在美國的三十三萬名印第安人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天主教徒。

對黑人傳教的情形

至於大部分仍為奴隸、為數幾百萬的南部黑人，雖經主教們大聲疾呼，但歷經十九世紀的期間，對他們的幸福很少有所建樹；大部分雖在天主教內領受了洗禮，但對教義所知無幾。及至南北戰爭以後奴隸制度取消（一八六五年），基督新教各派也急起直追地仿效天主教佈道，他們便改奉了基督新教。不過從此以後，傳教修會（像彌勒·希爾〔Mill Hill〕的聖若瑟會等）更加努力傳教，聖言會的神父們也專心致力給黑人傳教，還有幾個女修會特別針對這個目的創建了起來。根據一九五七年的統計，在美國的一千八百萬名黑人中，天主教徒只有五十萬。

加拿大

加拿大一如美國，直至一九〇八年仍隸屬傳信部，不過沒信仰的人從來便占極少數，絕大多數的居民都是歐洲移民，不是基督新教徒便是天主教徒。一七六三年法國將加拿大讓渡給英國，從那時以後，天主教徒便須為保障自己的權利而奮鬥；一八五二年法律才承認各教派享有平等的地位。根據一九六二年的統計，一千八百萬的居民中，天主教徒占八百五十萬，一九六五年兩教的信徒已平分秋色；大部分的天主教徒是法國移民的後裔，散居在東部各省。

加拿大北部，廣漠無垠，終年積雪，人煙稀少，只有些印第安人和白種或混血的獵人住居其間；起先是由加拿大的神職人員開教，一八四一年，新創立的無玷聖母會傳教士便來增援。在這些荒涼的曠野中，幾乎只有傳教站是固定的機關，許多地方，或是湖及村莊的名稱，還都是最早的傳教士名字，例如比臺灣大五十倍的代牧區格魯阿爾村，便是宗座代牧格魯阿爾主教（Grouard）的名字；他在加拿大北部奔走傳教達七十一年之久，是一位不知勞瘁的傳教士、航海家、地理學者、探險家、城池的建築師、工程師、畫家、作家、印刷工人、農民，簡直是無所不通。他於一九三一年去世，享年九十一歲；他是最勇敢的開荒者之一，也是一位愛祈禱的神修

人；他能說印第安人的各種語言，他們稱他為「花白鬍子的偉大祈禱者」。

這些開荒者中有一位曾寫道：「我們從事傳教的地區，不像中國那樣人煙稠密，自然也沒有成羣歸化的人；我們可能因飢餓或凍餒而死，但沒有殉道的幸運；我們這些貧困的傳教區，沒有像你們那樣富有詩意的生活，我們的生活只是長期的殉道而已，平淡無奇，只有天主知道。」固然有兩位被人戕殺的殉道者，不過最大的危機還是酷寒，在犬拖的雪橇上無盡無休地東奔西跑，以及令傳教士們最大的痛苦是長期的孤獨。

一九一二年，有兩位無玷聖母會士越過印第安人的地區北上行駛，直到北極的冰帶，在那裡找到了另一種愛斯基摩人，為數不過幾千，他們在那廣漠無垠的冰帶流浪著。傳教士工作了四年，幾乎沒有人肯信教；他們的宗座代牧正決定將他們召回時，奇蹟出現了：皈依者忽然增多起來³，此後教務一直順利進行。

恐怕有人要問，為什麼這樣浪費精力？既然神父這般缺乏，值得讓幾十位傳教士，在那樣艱苦的情形下，為了一兩萬人的靈魂費那麼大的力氣嗎？理由是他們聽見了基督的命令：「你們去教誨萬國萬民！」任何困難都不能阻止他們響應這個號召。傳教的教宗碧岳十一世曾談及這個加拿大北部的傳教事業說：「那實在是最美麗、最艱苦也最有功績的傳教事業，為此我們特別愛護它。」

拉丁美洲十九世紀的情形⁴

十九世紀初葉，除了幾個印第安人的部落仍信守著它們祖先的偶像，還有些未開化的民族退居在深山野林外，原則上可說在拉丁美洲已沒有不信仰基督的人了。印第安人和黑奴都領受了洗禮，而且許多國家都以天主教為國教。

實際上這些基督徒的信仰，摻雜了好多迷信。神父為數很少，多次連起碼的宗教栽培都沒有接受過，也無法參加宗教敬禮，領受聖事。

雖然如此，傳教的活動卻從未中斷過；十八世紀末葉耶穌會被取締，雖然帶給他們嚴重的打擊，但方濟、道明和奧斯定等會士相繼而來，負起了給印第安人傳播福音和教育他們的責任；並且建立了學校，和培植傳教士等工作。

自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二五年間的獨立戰爭，固然使拉丁美洲脫離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統治，產生了現在的共和國，卻也造成了很大的混亂，教會也蒙受了重大損失，新政府滲入了自由革命和圻人黨（或稱共濟會）的反神職思想；這就是在整個十九世紀期間，幾乎所有的天主教國家都遭受教難的原因。玻利維亞、赤道、秘魯、墨西哥等國，哪怕只是一時，都曾驅逐過會士；修道院空無一人，神父們照顧教友的需要還不充足，更不能致力歸化異教徒了，所以自一八一五至一八三〇年，傳教

工作完全停頓。

慶幸歐洲的教會復興使它有餘力派遣傳教士；方濟、道明、耶穌等會士捲土重來，不久其他修會的會士也接踵而至。不過在許多地方，向本地人展開傳教工作以前，得先在天主教徒中從事佈道工作，因為他們太需要了。

聖座在同拉丁美洲新政權簽訂協議時，加入了在異教徒中保護傳教的條件；所以拉丁美洲的國家儘管政治不安，時起革命，但傳教士在一切尚未歸化的地區，自冰天雪地的火地島（Terra del Fuego）和巴塔哥尼亞高原（Patagonia）的大陸尖端（慈幼會會士在那裡工作），直至亞馬遜河熱帶森林的心臟，已有方濟、道明和聖神會士接觸到從未同外人來往過的部落。對他們傳教的詳情我們無法細述，不但多采多姿，而且常相機變化，各修會幾乎都有代表性的表現。

拉丁美洲二十世紀的情形

拉丁美洲在二十世紀是一個正在改變的世界。給人印象最深的現象是人口額外的增加：一九〇〇年有人口六千三百萬，一九五〇年已增至一億六千三百萬，一九六五年則有二億二千五百萬，預料一九七五年將增至三億。另外一種現象是社會的改造。以前居民只有兩類：一類是少數的知識階級，他們非常富有而保守，另一類

是鄉村大眾，極貧窮的印第安人、混血種和黑人。由於移民和工業的發展，社會也隨之改變；因城市增長得特別迅速，結果造成羣眾貧困，居處惡劣，飲食菲薄，教育更形落後。中層階級很少。

但這些貧苦羣眾卻占大多數（有些地區是百分之八十，有些地區是百分之九十五），他們都是天主教徒；拉丁美洲的一億八千萬名受洗者，實占全球天主教徒的三分之一。他們的信仰真誠，而且根深柢固，對聖母的敬禮非常普遍；可惜真正的宗教栽培大都太缺乏，以致摻雜了許多迷信的成分；主要的原因是神職人員太少，這是拉丁美洲教會的最大缺點。本堂區的教友太多，平均每個本堂有一萬五千名教友，城市甚至有的六萬以上，而且鄉村本堂所轄的地區，簡直是大得驚人。試想在這樣的情形下，神父如何能接觸自己所有的教友呢？他們除了受洗以外，自然無法領受其他聖事了！

徵召修生的運動雖然積極，效果也很可觀，但終屬杯水車薪，難以應急；教友數字的增長，比神父增加的數字快得多呀！

神職人員的缺乏，造成了喪失信仰的危機。當人民安居在農村時，信仰固然能代代相傳下去；但當他們湧向城市謀生時，遠離了傳統的氛圍，切斷了家庭親屬的來往，便漸漸忘記了他們是教友，對其他教派的宣傳，也很容易聽信，以致淪為古

老的異教徒，或是通靈術的迷信者了（在巴西尤其顯著）。基督新教——尤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派遣了許多傳教士，爭取到不少信徒：一九五一年有三百三十八萬，至一九六一年已增至七百七十萬。唯物和共產主義似乎影響青年很深。

自一九五〇年以來，教會當局已警覺事態的嚴重，他們呼籲大規模的協助，否則教友可能淪為無信仰者，或轉入其他教派，那麼所謂天主教拉丁美洲的美名也要隨之喪失。一九五五年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國際聖體大會，該洲各國的主教參加者不少；雖然按照地域有重大的歧異，卻仍表現出拉丁美洲大都信奉天主教，並且決定組織一個拉丁美洲的主教團（Consejo Episcopal Latino-Americano 簡稱 CELAM.），目的是為了研究有關拉丁美洲教會的問題，尋求解決的方案，促進並協助天主教事業，安排它們的活動。在這個機構推動之下，無數的工作著手興辦起來。何況大家都明白，成敗利鈍在此一舉，於是在教宗鼓勵之下，歐洲和北美對拉丁美洲都燃起了極大的關心，並願予以兄弟般的協助：除金錢的援助外，且派遣了宗教社會學的專家，尤其是傳教士；於是會內會外的神父（以西班牙和比利時為最多）、修女和在俗教友，源源而來，聽候拉丁美洲的主教們隨意安置。一九六〇年，這些外來的傳教士有一萬二千位神父，三千位修士，一萬七千位修女。在教會的歷史上從未見過這樣龐大的兄弟般的通力合作。至論效果的統計，尚嫌太早。

肆 太平洋區的傳教情形

太平洋區域，如澳洲、紐西蘭、新幾內亞和散布在太平洋中的無數島嶼，在十九世紀以前，尚未給傳教士打開門戶。

澳洲

一七七〇年英國探險及航海家庫克（Cook）發現了澳洲東海岸，立即將它劃歸大不列顛版圖。不管散居在這廣漠大洲上的原住民或石器時代的部落，英國人便把這新占領之地作為放逐犯人的處所了。在被放逐的人中，有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包括兩位神父——是以背叛英國國教的罪名被放逐的，他們便成了澳洲教會的先河。起先政府不准他們舉行天主教的敬禮儀式，那兩位神父又被遣送回籍；但英國的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的名義提出抗議，終於獲得勝利，於是神父又返回澳洲，定居在天主教徒中間。一八三三年，他們已有一萬七千名，羅馬且委任了一位宗座代牧來管理。一八五一年發現了金礦，於是移民大量湧來。從此教會便不停地增長，教區也加多了：現在有二十九個教區。天主教教徒已超過兩百萬——即全體居民的五分之一，他們很活躍且很有組織。教會在澳洲可說沒有經過傳教的階段，而是由歐

洲教會移植長大起來的。原住民的殘餘是世界上最原始的民族之一，不過並未被教會忽視；自一八四五年以來，傳教士——特別是本篤會士，便開始接觸這些野性未馴的民族，成績還很可觀。

紐西蘭

紐西蘭的教會也是來自移民。首批派遣來的傳教士，光是照顧白人的宗教事宜，無暇給原住民傳教。原住民在開始時很受威脅，幸賴他們有組織，而且意志堅強，未被白人消滅；近來他們且大有起色，傳教士向他們傳福音；一九四四年居然祝聖了一位本地神父，看來本籍的教會是大有希望的。天主教徒的數目雖較澳洲略有遜色，也有三十多萬，全民二百五十萬，大部分是基督新教徒。

新幾內亞

新幾內亞位於澳洲以北，在政治上分為兩部：東部屬澳洲，西部以前是荷蘭的殖民地，一九六三年已劃歸印尼。這個世間最大的島嶼，因為山高，雖在赤道下仍長年積雪，而且森林茂密，因此極難穿越，幾十年來，內部尚有許多人跡未到之處。全島居民大概有一百五十萬。巴布亞人源出某種黑人，已不可考，是石器時代的最

後遺跡。自一八四〇年基督新教的教士登陸以後，不久天主教的傳教士便接踵而至。這樣的佈道，真是在痛苦中下種：處處荊棘、水土惡劣、沼澤的蚊蟲、殺人的瘧疾、飢荒、高山峻嶺、無隙的密林、嗜食人肉的原住民。聖母司鐸會的神父自一八四五年便在此地工作，而依蘇丹的聖心會神父（*Missionaries of the Sacred Heart of Issoudun*）則自一八八一年；聖言會的神父自一八九六年，他們都表現了英豪的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傳教事業摧殘殆盡，不談物質的損失，只在新幾內亞和附近的各島上，即有一百八十八名神父和修士，七十八位修女被慘殺。但經過這次戰災以後，巴布亞人由於交戰國的人馬一再侵入、撤退，不再像以前那樣孤獨、逃避人了；傳佈福音，也不再像首批傳教士那樣困難。新幾內亞連同附近的俾斯麥和所羅門（*Solomon*）羣島，共有五十萬名天主教徒，占全人口的四分之一。一九五三年祝聖了首批兩位巴布亞神父。目下傳教最大的難題，是最原始的民族遽然接觸了原子時代的文化；最時髦的機械到處可見，而所用的工人則是剛由石器時代走出；這種缺乏過渡階段的衝突，處處造成了混亂，將原住民的社會湮滅；進步不能與時代脫節，教育事業也占據今日新幾內亞傳教的重要地位。

太平洋其他各島

除了幾個重要的以外，太平洋中還散布著成千上萬的島嶼，這些大小島嶼大約共有一百一十五萬居民。

十八世紀末葉，歐洲才開始對這些遙遠的島嶼產生興趣；經過了探險家如詩如畫的描述，便成了殖民國家競相爭奪的對象，尤其是英法兩國。距離的遙遠、居民的散處、民族和語言的紛歧、原住民的蠻野，再加上西方國家互相的敵視，對傳教士而言在在都是難題。加上歐美的捕鯨者、從事各種貿易和投機的人，常在那些島嶼的四周徘徊，他們所尋求的絕不是人靈，因而更增加困擾。發現大洋洲和開始傳教的時期，正是天主教傳教事業衰退而基督新教興起傳教的時候；基督新教的傳教士也往往比天主教捷足先登幾年，所以他們先定居的地方，也不願見到天主教傳教士的蹤跡，於是便起了劇烈的衝突。

最初開教是當時新創立的兩個修會著手辦理的：聖母司鐸會的神父在大洋洲西部，畢布斯聖心會的神父（*Fathers of the Sacred Hearts of Picpus*）在大洋洲東部。這次開教的代價著實不小，犧牲了許多神父，有的被原住民慘殺，有的死於瘧疾和覆舟；然而教會卻因此生了根。教會得以傳遍大洋洲，許多代牧區的居民幾乎全都是天主

教徒，這一切都得歸功於這些開路先鋒。

既然不能把那些英雄一一介紹出來，我們只好引證人所周知的兩位作為象徵：一位已被聖教會列入聖品，就是伯鐸·尚耐（St. Peter Chanel, 1803-1841），他是愛德的致命者；另一位是達彌盎神父（Damien, 1840-1889）。

伯鐸·尚耐

伯鐸·尚耐生於法國東部，當他加入新創立的聖母司鐸會時，已晉鐸多年了；他是該會派往大洋洲的首批傳教士之一。他同一位輔理修士在富土那（Futuna）小島登陸，島上的居民有一兩千，酋長予以熱烈的招待；不料兩年後，酋長嫉妒他們對居民的影響，因之態度大變；當他的兒子也表示願作教徒時，他遂勃然大怒，立命首相幹掉這位傳教士；一斧頭下去，便把教士打得腦漿迸裂。神父預知危險，本來能夠逃脫；但他不逃，卻說：「我被殺與否都沒關係，反正教會已扎了根，絕不會因我的死亡而消滅。」結果證實了他的預言；他在島上三年的努力，只歸化了幾個人；但他死後六個月，居民便自動請求給他們派遣傳教士；兩年後，島民全部皈依；兇手本人也痛悔前非，請求受洗。今日該代牧區全信天主教，且有數位本籍神父。一九五四年教宗碧岳十二世將伯鐸·尚耐列入聖品，並立他為大洋洲的主保。

痲瘋人的傳教士——達彌盎

德鄔斯特（Joseph de Veuster, 1840-1889），會名達彌盎，是比國魯汶附近農家之子，追隨他的長兄加入畢布斯聖心會作初學。一八六三年他啟程去夏威夷，因為畢布斯會士曾於一八二七年在該處開始傳教。他過了九年的傳教士生活，從事栽培教友，建造大小聖堂。可惜一種可怕的災難蹂躪著這個羣島，那就是痲瘋；當局為避免傳染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把已染患的人集中到摩洛開島（Molokai）去與世人隔絕，把成千患絕症的人聚集在一起。既已喪失了任何希望，還有什麼道德秩序可言！因此他們說：「在這裡沒有法律，更談不上道德。」能讓他們連宗教的幫助也得不到嗎？於是達彌盎神父便自動獻身，願去同他們生活在一起。他曾寫道：「他們的肉體醜陋難看，那是真的，但他們都有由救主的寶血所救贖的靈魂。耶穌在世時也曾經安慰過這樣的人，治癒過他們；我雖不能治好他們，卻能帶給他們安慰。」於是他不顧一切困難，先盡力設法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在他的領導下，凡有能力工作者，便開始工作。先製造溝渠水塘，把山上的泉水引下來，以備飲食灌溉之用；然後開荒種植，建築房屋聖堂，一切都組織起來。這位自貶於痲瘋人行列的神父，逐漸聲名洋溢，傳到了各處，於是善心人士的接濟源源而來。最值得注意的，還不

是達彌盎在這人間地獄所做的物質改善，而是道德的重建；以前那裡充滿著仇恨、互毆，弱肉強食，沒有絲毫道德的觀念；現在秩序卻建立了起來，正式的家庭出現了，暴力酗酒等惡習絕跡了，兒童們也開始受教育，男孩們組成了各種運動的團體，少女們學習女紅唱歌；成年人也學會了教會的禮儀，不時唱歌遊行。

達彌盎正如他早已預料到的，終於傳染上了癲瘋，自始他便甘心接受這種犧牲；他於一八八九年去世，得年四十九歲，在摩洛開癲瘋人之中度過了十六年。

甘地（Mahatma Gandhi）曾從達彌盎神父和其他類似的生活中，提取了如下的教訓：「如果傳教士，尤其是天主教的傳教士，認定伺候癲瘋人是一種可愛可喜的工作，那是因為任何服務也沒有這種服務需要更大的犧牲精神。政界和新聞界所傳述的英雄，哪個也不能同達彌盎相提並論。反之，在天主教內追隨達彌盎的榜樣而獻身為癲瘋人服務的，卻有成千上萬的人。這種英豪的根由是值得研究探討的。」⁶

大洋洲二十世紀的情形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大洋洲是一個新紀元，表明一個時代已告結束。幾乎所有的島嶼都接觸了西方和亞洲的文化，日本同美國在這個地域所進行的空戰和海戰，所造成的混亂情形，真是難以想像。以前同外界幾乎從未接觸過的島嶼，現在卻常有

旅行家光顧，因此思想和習俗都大為改變。亞洲方面，中國、越南、印度等處的移民，都向那些海島湧去，如此傳教事業也產生了新問題：為了這些移民，需要各該國籍或至少通曉各該國語言的神父，才能對他們傳教。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教徒的分裂：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彼此競爭，這種分裂更增強了教外人對教會的不信任。根據一九六〇年的統計，在這些羣島中，有二十七萬五千名天主教徒，三十八萬五千名基督新教徒。

伍 亞洲傳教的情形

近東的教務

在整個近東，無論土耳其（它在十九世紀不但統治了小亞細亞，還有阿拉伯各地區）或伊朗（即以前的波斯），回教徒都占著絕大多數。然而這也是自十九世紀初葉以來，便恢復傳教的地域之一。但以直接講勸去歸化回教徒，實際上幾乎不可能。最有效的辦法是開辦學校，學生無宗教與種族之分，一概收錄；這樣的學校，一方面可消散回教徒對天主教徒的成見；另一方面對提高該地少數天主教徒的水準也是必要的。同時慈善事業如醫院、孤兒院等，也能贏得當地居民的同情。直至第

一次世界大戰，教育事業可說非常繁榮，遣使會、道明會、耶穌會以及其他修會的許多修士修女，都熱心辦學。最著名的教育機構是一八八一年耶穌會士所創辦的貝魯特大學，它對近東一帶的影響，直到今日仍舊未衰。

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戰，激起了回教徒反基督宗教的情緒；這種情緒瘋狂地發洩了十年之久，屠殺了不少教友。小亞細亞和亞美尼亞等處的古代教團（無論天主教或同羅馬分裂的教會），已被消滅無餘，傳教事業也遭摧毀。教宗駐波斯的代表也慘遭屠殺。

與德意志同盟的土耳其戰敗後被分割，已侷促於小亞細亞，新興的幾個國家，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獲得獨立，像是敘利亞、伊拉克、約旦、黎巴嫩和以色列等國。目下土耳其的人民幾乎全數為回教徒，政府則自稱是俗化的，禁止任何宗教的宣傳。天主教徒尚不及全民的千分之一；教會的幾座學校和慈善機構，只是苟延殘喘而已。

在以色列及阿拉伯國家如敘利亞、伊拉克、約旦等國，基督徒只是極少數，還分為各種典禮的天主教徒和同羅馬分裂的基督徒，後者又分為許多不同的典禮。在伊朗境內也是如此。在這親聆基督或宗徒們傳布福音的地方，概為回教的海潮所淹沒，只剩下幾個信奉基督的小島。只有黎巴嫩例外。在這個小國內，天主教徒同分

裂的基督徒合在一起，和回教徒不相上下。憲法賦予信仰的完全自由；基督徒和回教徒在平等地位上和平相處。

至於阿拉伯，任何傳教士均不得入境，它是清一色的回教國；少數的基督徒能在該處生存，是二十世紀中葉後的事，他們都是石油礦的外籍職員。

印度傳教的情形

印度也和其他傳教區一樣，在十九世紀初葉情形很悲慘。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在耶穌會被取締以後，繼承了傳教的事業，不過人數不足，無處求援。教宗國瑞十六世為挽救這種情勢，派遣了宗座代牧，但遭葡國反對；他們雖無法負責一切教務，卻仍堅持舊日的保教權不放。因此起了很難堪的衝突，直至一八八六年教宗良十三世同葡國簽訂協議後，始獲正式解決。印度也就在那年建立了教會的正統。

雖然困難重重，但教會自一八三五年仍不斷進步，步伐儘管緩慢，情勢卻稱穩定。這個時期對傳教最大的鼓勵者是包囊主教（Mgr. Bonnard MEP, 1796-1861），他用印度語編著了一本《救贖史》，令知識界印象很深。一八四五年他召集了印度第一次會議，主要是為了建立教育系統——連女子教育也包括在內，這在當時是一種大膽的改革——以及改組神學院的事宜；這對徵召更多人數，受更好栽培的本地神職

人員，是非常緊要的。這些決議案只能逐漸完成，但日久功效自著。

十九世紀中葉，印度北部剛剛開教。耶穌會士隨著英國軍隊，以隨營司鐸的身分，於一八七六年在印度北部山岳地帶發現了一些人民，不像大多數的印度人信奉印度教，乃是精靈崇拜者；他們都遭受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壓榨。一位比籍耶穌會士名叫黎萬（Fr. Lievens），於一八八五年到達此地，盡力保護他們的權利。他們被他的愛德和慈善所感動，紛紛請求入教。五年後，他已給七萬九千多人覆洗；嗣因操勞過度，不得不回國休養；但因曾受他的鼓勵，常有成批的人皈依，至一九六〇年代，該處天主教徒已有二十六萬名。

印度傳教的一個特點，是自十九世紀以來教育事業的重大發展，不但是初級、中等和技術教育，還有高等教育。一九五八年已有大專學校七十五座，學生三萬兩千名。這些學校因為收錄各宗教的學生，所以影響很大；在校受洗者雖不甚多，但栽培了一批優秀的天主教學生，其中出了不少神父。未受洗的畢業生，對他們的老師經常保持著尊重和感激；其中不少人在政府和社會上占有崇高地位，對天主教常保持好感。十九世紀末葉教會曾遭人輕視，現在卻極受重視和尊重了。教友以前過分保守和被動，現在已覺醒而組織起來；公教進行會如今也已非常活躍。

困難並非沒有。自一九四七年獨立以來，有些愛國的團體常想立印度教為國教，

外國傳教士入境已大受限制，不少的知識分子已傾向馬克斯主義。

印度教會的弱點之一是分配不均，北部甚少，天主教徒多集中在南部。以前聖多默宗徒（St. Thomas the Apostle）和聖方濟·薩威所播種的地區，都是凱拉拉一帶，那裡的教友最多。

印度教友的數字，一八七一年有八十萬，一九六〇年已超過了七百萬；對這個數字不可發生錯覺：當知一九六〇年代，印度的人口已超過五億，那麼七十人中才有一名教友；不過司鐸和修女的聖召在南部相當可觀，本地的傳教會也創立不少，這都可以補助北部的缺乏，傳教的前途很有希望。印度自一九二三年已有近代的第 一位本籍主教，又在一九五三年有了第一位樞機——孟買總主教格拉西亞（Card. Gracias）。目下主教的半數和七千七百位神父中的六分之五，都屬本地神職界。（編註：此為一九六〇年代資料。）

巴基斯坦

當印度於一九四七年獲得獨立時，回教徒佔大多數的東北和西北部，共同組成了獨立的巴基斯坦。那裡只有極少數的天主教徒。憲法雖然保證信仰完全自由，回教徒的輿論卻極反對皈依其他宗教；本籍和外籍的神父都不充足。根據一九六一年

的統計，九千五百萬人口中，天主教徒只有三十萬五千人，也就是稍多於千分之三。

錫蘭

自十六世紀初，葡人已將福音傳入錫蘭。及至葡萄牙帝國瓦解，荷蘭基督教徒占領該島以後，天主教的進展便完全陷於停頓，直至十九世紀才又開始活動。錫蘭於一九四七年和印度同時宣布獨立。在一千萬人口中，天主教徒占七十萬。本地神職人員很多，但教友數字的增加趕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近年來天主教又觸及愛國運動的暗礁，此運動力主復興佛教；某政黨促使立佛教為國教，限制其他宗教的自由。一九六一年，一切私立學校均由政府接收。

越南：半世紀的教難

十七世紀由陸德（Fr. Al. de Rhodes）所開創的教會，雖經歷了教難的時期，仍有良好的進展；在十九世紀初葉尚有三十萬名教友。但皇帝明命（Minh-Mang，在位期間 1820-1841）所興起的教難，幾乎持續了半個世紀沒有間斷；除了高麗以外，任何國家為徹底根除教會，也沒有像越南那樣計畫得既周密又慘酷的了。一八二五年出了禁止傳教士入境的第一道上諭；隨後於一八三三年和一八三五年出了更為嚴厲的

上諭，命令將教堂拆毀；皇帝發給了各省總督多尊苦像，命令將它置於各城門口，凡進城者必須踐踏苦像而過，否則處以死刑。受酷刑殉道者有九位傳教士，本籍的神父、傳道員和各種年齡的教友更是不計其數。

明命於一八四一年去世，但禁教的法令仍屬有效，他繼位的兒子紹治（Thieu-Tri，在位期間 1841-1847）雖已不那麼嚴格執行，仍有許多神父和教友被逮捕或放逐，但流血的迫害已經減少。越南教會在這悲慘時期的偉大鼓勵者，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樂道爾主教（Mgr. Retord MEP）；他見教會沒有獲得自由的跡象，乃毅然從藏匿的地方走出，到各本堂區去巡視；神父和教友見此也膽壯起來，不再藏藏躲躲，且公然重建聖堂，慶祝瞻禮節日。宮廷雖曾試圖阻止教徒集會，但活動並未因此停止，神父和教徒也未遭受拘禁。在這個時期，羅馬聖座曾委任幾位新的宗座代牧，從此又展開了傳教的活動。

紹治於一八四七年去世，他的兒子嗣德（Tu-Duc，在位期間 1847-1882）繼位，教難死灰復燃；他命令將歐籍神父投入海中，國籍神父腰斬；凡涉嫌藏匿傳教士的村莊，都沿門搜查。傳教士不得已逃入森林和山中去避難。樂道爾主教在他的隱身處接到了更惡劣的消息：聖堂被拆毀了，教友遭受酷刑，臉上都烙了印，有的被放逐了。這一切並不能使主教絕望；他雖力盡筋疲，又發著高燒，仍從他最後的隱身

處計畫著重建廢墟，直至一八五八年去世為止。

這樣的事態傳至歐洲，激起了莫大的憤怒。輿論——連非天主教徒在內——認為非替自己受虐待的國民復仇不可，哪怕需要動用武力，也得爭取信仰的自由。於是法國數次派戰艦去保護傳教士，但結果並未像所預料的那樣順利；威脅一經解除，教難便變本加厲起來。於是法國已成騎虎之勢，遂決心去征服越南；此時教徒被視為同情侵略者的奸細，常被集體屠殺，直至一八八五年越南淪為法國的保護國，教難始告停止。

在這半世紀血腥教難的期間，越南教會表現了英豪的堅強：有一百一十五位越籍神父殉教，二千位修女被迫逃散，十萬名教徒為保持信德而致命。

在這些殉道者中，有一位放射著無比異彩的，人稱之為「喜樂的殉道者」，就是衛納爾神父（Théophane Venard），他於一八六一年被斬首，年僅三十二歲。他在九歲時閱讀一位越南殉道者的事跡，曾說道：「我也願去越南，我也願作殉道者！」他的志願得以實現。他加入巴黎外方傳教會後，於一八五四年被派至越南。七年的工夫東藏西躲，逃避追捕，最後還是被捕；判處死刑後，始終笑口常開，表示心中的愉快；他被關在木籠中等待執行達數月之久；就在那時他給家中寫了多封美妙的信，使閱讀的人產生了傳教的聖召。他在赴刑場時，一路唱著聖詠，好像去赴慶祝

會一樣。

越南：半世紀的平安

酷刑、流放、死亡都無法窒息皇帝們所稱的「邪教」。反之，連在迫害天主教最劇烈的時期，仍不斷有人奉教，經過了半世紀的教難之後，換來了半世紀的平安時期，莊稼又得以發芽滋長。傳教士和修女蜂擁而至，連專務默觀天主的修會，如熙篤會、聖衣會、佳蘭（加辣）會也跟著來了；本籍的神父也增加起來，教友的數字，自一八八五年的三十五萬，增加到一九三〇年的一百五十萬，尚在繼續增長中。除菲律賓外，越南是東亞地區教友比例最高的國家，即人口的百分之七至八。

越南的共產黨

越南教會最新無疑也是最強的敵人，便是共產黨。共產主義唯物的理論，宣傳的技巧，對良心所施加的壓力，和它手段的毒辣，使它對天主教比前世紀的血腥迫害更為可怕。當一九四五年革命爆發時，許多越南教徒積極地參與獨立運動。實際上領導這次運動的則是越共，他們盡力利用一切愛國熱忱以擴展他們的勢力。當北越共產黨徒認清了天主教徒那樣熱烈參加獨立運動，絕非有意按照共產黨的利益行

事時，他們便改變了對天主教的態度，在他們所控制的各地，發動了一次陰險而暴戾的政治迫害。

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協定，結束了戰爭，以北緯十七度為界，將越南分為兩部分：北部歸越共，南部為自由越，人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居留地。原住北部的六十多萬名天主教徒，不顧共產的宣傳和威脅、反對，毅然放棄了他們的田園房屋和一切，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向南越投奔自由。這次集體的流亡，震動了全世界。這些難民大部分是窮苦的農民、工人和漁戶，他們寧肯接受流亡的艱難困苦，唯一的目的只是為了保衛自己和子孫的信仰自由，真是信仰篤實的英勇表現，不愧為十九世紀殉道者的孝子賢孫。

這次流亡完全改變了天主教徒在越南的分配情形。以前北部為數最多，現在北部只剩下八十來萬名，南部卻增加到一百五十萬名。

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

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雖然有種種分別，但有一共同點，就是皆為佛教國家；佛教已深深浸入他們的風俗習慣，與國家的文化合為一體，政府雖給了人民信仰的自由，他們卻甚難接受天主教；所以在這幾個國家中天主教徒很少；泰國只有

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緬甸和柬埔寨（或稱高棉）有百分之一，老撾（或稱寮國）有百分之一點五；而且教徒多係中國和越南的僑民，或不信佛教而信靈魂的少數原住民。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的天主教是十六世紀由葡國人傳入的。我們記得聖方濟·薩威曾多次停留在麻六甲宣教。而這裡不是佛教徒而是回教徒阻礙傳教，因為那是大多數馬來西亞人的宗教。這裡的天主教徒大都是中國和印度的移民，為數十六萬。

印 尼

印尼是於十六世紀開教，聖方濟·薩威也在此講過道。但自荷蘭的喀爾文教派占領那些島嶼後，便把首次開教的成果消滅了。以後直至十九世紀，才得以重新再來。起初進步很慢；以後傳教士逐漸增加，尤其是在十九世紀，傳教事業展開了活動。一九二八年有教徒二十七萬五千名，在一九六〇年代則已增至一百四十萬名。

在印尼九千五百萬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回教徒，是世界回教徒最多的國家，等於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總和。不過回教是十二世紀傳入的，對其他宗教的態度比

較緩和。國家的基本信條不是回教，而是「五個原則」，主要是信仰一神和彼此互信。在這樣的原則下，占少數人的宗教不會受到歧視，而被視為國家構成道德和精神生活的一種助力；而且天主教的學校最多，入學的也最踴躍，並接受政府的津貼。這些學校為印尼造就了不少優秀而有影響力的天主教徒。

使教會進步緩慢的原因，是神職人員不敷；外籍傳教士的入境也受到嚴格的限制，本籍神父只占所有傳教士的三分之一（總數為一千），遠不敷傳教的需要。

菲律賓

菲律賓擁有人口三千三百萬，其中有二千六百萬天主教徒、三百萬基督新教徒，在全亞洲是唯一稱得上是天主教國的國家。在十六世紀競相尋覓新地的時代，福音由西班牙人移植於菲律賓羣島，在一代的時間便傳遍了大部分地區。所以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傳教工作，只是設法歸化深山中的落後民族而已。

一八九八年西班牙被美國打敗，割讓了菲律賓。美國的政策對天主教的進展，妨礙真是不小；美國政府派去的教育人員，世俗化的思想非常濃厚，反抗天主教的影響。基督新教徒也抓住美國占領的機會，大量湧入。

另一種不幸，就是名叫阿格利伯（Gregorio Aglipay, 1870-1940）的一位神父，為本

國獨立運動奮鬥無效，轉而組織了一個異端運動，取名「菲律賓獨立教會」，現在已經衰落。一開始在羣眾階級看來好似一個愛國的堡壘，在幾年之中，便贏得了一百多萬名會員。

一九四一年日本侵占菲律賓，凡是日本交戰國的傳教士都被關入集中營；傳教事業和國家，在戰爭時期都受了莫大的損失。

戰爭一結束（一九四六年），菲律賓便獲得了獨立，教會也得到新的力量。菲律賓人的宗教性本來就很深，而且傳統地堅決依附羅馬聖教會。宗教節日同社會生活緊密結合在一起。只是同拉丁美洲一樣，教會的教育接受得太少，原因也是因為神職人員不足，不敷分配；只有三千名神父，半數是本地人，所以平均一位神父須負責八千七百名教徒（一九六〇年代的臺灣一位神父只負責三百九十五位教友）。為提高宗教教育的水準，使一般教徒明瞭自己的責任，需要很大的努力。這樣一年的過去，天主教已有顯著的進步，希望菲律賓在遠東教會的發展上能擔任重要的角色。

日本

一八三一年傳信部邀請巴黎外方傳教會重拾日本傳教的工作。這項邀請未能立

即實行，原因是兩世紀以來日本便閉關自守，嚴禁外人入境。傳教士除了學習日語預作準備外，一籌莫展，只能等待時機好轉。為此他們居留在沖繩島等候。十年之中只付洗了兩個人。一八五三年日本同西方列強簽訂了條約，開埠通商；直至一八五九年，傳教士始得進入日本。其中一位名貝第讓（Perignon），在長崎建立了一座聖堂，特敬一五九七年的二十九位殉道者；這聖堂指定暫歸外交使節的人員使用，因為大家都想十七世紀此處雖有五十萬名教友，經過那樣慘酷的教難，必已煙消霧散，未留子遺。不料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七日舉行開堂時，竟有一夥日本人以奇異的步伐追隨著神父，一位婦人向神父低聲說：「我們的心同你們一樣啊！」隨後又說：「聖母瑪利亞的祭臺在哪裡？」次日又有一夥人集合來，甚至驚動了警察；到五月十五日左右，出現了千數來家的一夥，但態度表現出不敢信任，不知神父是哪一教派，為此問神父說：「您沒有子女嗎？您是不是服從羅馬教宗？您也敬禮救主之母瑪利亞嗎？」及至得到了滿意的答覆，立即喜形於色，表示完全信任。這些人無疑是十七世紀老教友的後代，雖然沒有神父，他們仍舊給兒女們授洗，傳授著信德的主要道理；不久便有數萬名教徒同教會再結合起來。教宗碧岳九世聞此消息後，高興得流下淚來，於是便委任貝第讓神父為日本宗座代牧。

政府聞知由地下出現了這個教團，聲明禁教的法令仍屬有效；於是威脅、放逐、

禁閉，想盡了各種方法使他們叛教，無奈均歸無效。一八七三年西方的外交團出而干涉，禁教的法令才被撤銷，坐監的也獲釋放，但兩千名業已死亡。雖然如此，當年的年尾，教徒已增至一萬五千，神父二十九位。

一八八四年的法律，將神道教和佛教與國家分離；一八八九年明治天皇（Emperor Meiji，在位期間 1867-1912）頒布憲法，准許信教自由。容忍的新制度准許教會公開組織；於是天主教便開辦學校，不過進展得很慢；至一八九一年良十三世建立教會正統時，日本只有四萬五千名教友，一九四七年僅增至十一萬。這是因為政教雖宣布分離，人民的成見仍認為神道教建基於效忠皇室，對國家也無條件地效忠，這是同天主教不能相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結束了這些困難，也給天主教徒帶來了一個特別的考驗：第二顆落在長崎的原子彈，殺害了八千名教友。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往日的系統全部癱瘓；日皇也下詔否認了他的神性。在人心混亂和國家觀念失敗所留的真空中，天主教好像引起了遭受痛苦的人民的注意；實際上同情的熱潮吸引了許多人嚮往聖教會，為日本招來了許多傳教士，但還沒有大批皈依的徵象；反之，技術和經濟的驚人進步，財富的增加和生活的舒適，反倒對唯物的思想有利。不過教會進展得雖慢，但隨著一定

的步伐，每年有近萬個人受洗。一九六〇年代教徒的數字已超過三十萬，但這在一億人口中又算得了什麼？不過教徒的影響是同他們的數字不成比例的。教會已根深柢固，只是還在播種的階段，收穫的時期尚未到來而已。

高麗（今稱韓國，分爲南韓、北韓）

由普通教友開始的高麗教會，自始便遭受流血的考驗，這些考驗延長了一世紀之久，因此可毫無誇張地說：高麗教會的歷史是以神父和教徒的血所寫成的。一八〇一年由北京派去教導最初教徒的中國神父周雅各，同三百位教徒殉教而死，從此他們又沒有神父了，然而教會團體卻賴信徒的虔誠和傳道員的熱忱，得以保存未滅。一八一二年他們曾上書給教宗碧岳七世，請求給他們派遣傳教士；教宗當時正作拿破崙的俘虜，未能滿足他們的願望。以後又上書給教宗良十二世（Leo XII，在位期間 1823-1829），教宗委託巴黎外方傳教會去設法辦理。但高麗禁教仍烈，傳教士只能冒險偷渡。第一位宗座代牧是由中國起身前去的，但在入境之前便身心交瘁而死（一八三五年）；他的兩位同會弟兄偷渡成功，一位新的代牧伊主教（Imbert）不久也入境；教會在他們的領導下便茁壯起來。一八三九年教難變本加厲，許多教友被逮捕受刑，神父遭到通緝；伊主教是第一個遭逮捕的，他以為如果神父自動投案，

教難或能停止，於是便命令他的兩位神父去自首。真是「善牧為羊捨命」，兩位神父果然如命去自首；他們受了種種酷刑之後，和自己的主教同被斬首。

六年之後，另一位主教，偕同一位在澳門讀書晉鐸的高麗神父金安德入境；可惜金神父次年便被捕，和許多教友一同被處死（一八四六年）。

雖然困難重重，教徒卻有增無減；一八六六年一次更有計畫，更加慘酷的教難正在雷厲風行時，教徒已增至兩萬多；兩位主教七位神父被逮捕處決，教徒遭徹底搜查，以便集體處決；幾乎所有教徒的半數被殺，或者逃至山中凍餓而死。

直至一八八四年教會才獲得自由，從那時以來，教會不停地進步。自一九〇五年日本併吞高麗後，它試圖把它的神道教介紹進去，但並未阻止人們信奉天主教。新的傳教士如本篤會士、瑪利諾會士、聖高隆會士等，都先後前來加強陣容。根據一九四〇年的統計，教徒已有二十萬名，本籍神父一百三十九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給高麗帶來新的困難：一九四五年高麗被分割為二：北韓已由共產黨支配，南韓尚享有自由。一九五〇年共產黨侵入南韓，雖只占據一時，已有多位神父被捕；停戰後（一九五三年計算），韓國的神職人員被殺害、死於囚禁和失蹤的，共有八十八位，其中有宗座代牧，另有三十一位修女和二十五位輔理修士。北韓鐵幕低垂，沒有一位神父能自由，天主教的公開生活已完全被取締。

聖教會在南韓努力減輕人民的極度貧困。人民經過了顛沛流離，死裡逃生之後，對生命的意義自然便要重新估計，不免要自問：像這樣的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凡願追求真理的人，教會都能給他滿意的解答；所以一九五三年以來，無論社會的優秀分子或一般大眾，嚮往宗教的一天比一天多。只自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一年之間，受洗的人就有六萬一千名；根據一九六六年的統計，在南韓二千九百萬人口中，教徒的數字已超過了七十萬。一般教友對傳教的熱忱，不亞於他們的祖先對開教的熱忱，再說本籍神職人員也相當多，這一切對傳教都有很大的貢獻。

註釋

1 此時宗座代牧雖稱為主教，但不是他所管轄地區的主教，而是一現已不存在的古代教區的名義主教；理由是他只是以教宗代表的身分行使該傳教區的職權，教宗才是該區的實際主教；教宗能按傳教的需要，將代牧調任、升遷或令他退休。至於本地主教，卻擁有所屬教區的本有職權。

2 因為十七世紀曾有過一位中國主教羅文藻（參閱卷三第十九章貳節）。

3 傳教士們把這種轉機，完全歸功於里修小德蘭的代禱；這位青年聖衣會修女在十年前去世，他們曾懇求她代禱。這個聖寵的奇蹟傳至羅馬，教宗碧岳十一世便決心尊聖女小德蘭為普世傳教區主保。

4 所謂拉丁美洲，就是說拉丁民族語言的二十個共和國，由十六至十八世紀曾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即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六個共和國；加勒比海中的古巴、海地和多明尼加共和國，以及南美洲的十個共和國。這些國家，雖然幅員、人口和地帶各不相同，但隸屬西班牙或葡萄牙已三世紀之久，深受這兩國的影響（語言和文化十分相近），除巴西一國外，都以西班牙語為國語；巴西則用葡語，海地卻用法語。這些國家的人民，大都信奉天主教，與北美正相反的是，印第安民族在拉丁美洲卻保存了下來；許多印第安人都同歐洲人和他們的後裔結了婚，近代拉丁美洲民族的大部分，都是混血族，此外還

有差不多三千萬人，仍保持著印第安的純粹血統；在加勒比海（或西印度羣島）特殊的一點是：印第安人已不存在，代替他們的是些黑人。

5 這個數字內不包括夏威夷，它自一九〇〇年已割歸美國的版圖。

6 這是一九四六年甘地給拉合爾（Lahore，在巴基斯坦）的學生們演講時說的。

7 一九六六年在太平洋（包括澳洲在內）有中國僑民九萬一千六百人，其中天主教徒有兩萬一千六百名。

8 殉道者中有一百多名的事跡可考，足以確切證明他們是為保持信德而死的，已先後由教宗良十三世、碧岳十世和碧岳十二世列入真福品。

9 一九二五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將一八三九和一八四六年的七十九位殉道者列入真福品，其中便有金安德。

第二十七章 十九及二十世紀天主教在中國的情形

壹 教難時期（自一八〇〇至一八四二）

這一段時期的教會史，只是我們在十九章第肆節所述教難的延續（請參閱卷三）。我們還記得中國教會在十八世紀末葉所處的悲慘情形：舉行敬禮和宣傳福音都在禁止之列。

神職人員

除了在北京供職內廷的人員以外，歐人一概嚴禁入境；傳教士無奈，只得冒著坐牢或被驅逐甚至喪失生命的危險偷渡，並在地下執行工作；他們被中國官廳視為走私人員，或外國的間諜；一旦被發覺，便控以擾亂治安、傳布邪教，或破壞地方

風尚之罪；再說躲躲藏藏，更加被人猜忌。神父給婦女聽告解，便蒙受勾引良家婦女的嫌疑，給病人傅油和給垂死的嬰兒覆洗，便誣以摘心剜眼以便製造藥品的罪名；竟有人深信不疑，連縉紳士子也不例外，真是愚昧得可笑！拉丁話誰也不了解；於是禮儀中所用的拉丁經文，便被視為邪術咒語；馴至禮節的裝飾、聖像、聖牌、聖水等，都視為妖術的符籙工具。這一切嚴重的誤解和曲解，便成了控告、誣讟和仇恨教會的根由。

當時中國籍神父稍多於外籍傳教士，大都是在國外接受的栽培。他們在國內雖然不能視為違法，但他們的地位危險性也不小，因為傳布外國教對他們而言便是一種該死的罪名。

情況雖這般惡劣，傳教事業仍繼續進行；其間也有較緩和的時期，因為有些比較開明的官員，對居留在他們轄區的傳教士，假裝不知。四川和雲南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在在地神父幫忙和掩護之下，傳教有顯著的成績，且維持著一座神學院，造就了不少的神父。一八〇三年四川宗座代牧徐德新（John Gabriel Dufresse），曾召集了一次四川、雲南和貴州所有神父的全體會議（這是中國教會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會議），制定了極具智慧的規條，且蒙羅馬批准，推行至全中國。

教友

在禮儀之爭以後，學有優長或在社會上有影響力的優秀教友，有的放棄了教會，有的遭政府迫害，大部分都銷聲匿跡了；不過在北京和上海以及這兩大都市的附近地區尚有例外，少數的官宦家庭還恆心地保持著他們的信德，寧願同社會絕緣，而維持著他們的宗教生活。這些大家庭的府第，便成了官廳追蹤的歐籍傳教士避難的穩妥之地。

北京的教友，在教難初起時，便有不少人離開京城，自動遷往內蒙古去了；許多團聚在西灣子一帶，該處便成了北部教團的中心。

可惜大多數的教友，尤其是內地省分的新教友，都屬社會低層階級，如果他們不參加敬孔和祭祖，便不能參加考試，獵取功名，將永無光宗耀祖之望。他們大多數是自耕農或漁戶，全部財產是幾畝薄田或一隻漁船，再不然就是工人和小本商人，這些人都不為人所重視。

教難

繼乾隆以後的兩朝：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和道光（一八二一—一八五

一) 屢起變亂，已呈式微之象。教友人少而孤，更加不堪其擾；因他們的生活與眾不同，風俗習尚也有些特別，往往被視同祕密結社的白蓮教，或不時倡亂起義的哥老會。

自康熙朝以來，在北京供職內廷的傳教士，多少受皇帝的庇護，往往賴他們在皇帝前求情，得以減低仇教者的氣焰。耶穌會遭取締以後，遣使會士繼承了他們在欽天監的職務。內廷既無供職之人，這一點奧援也就隨之消失了。再說法國革命幾乎阻止了傳教士的東渡，經濟的來源也告枯竭。嗣後一八〇五年（即嘉慶十年），又因地圖事件引起了教難。原來傳教士德天賜（Adeodatus）畫了一張「自廣平府至登州府路徑圖樣」，據稱上有「圖內自山東登州至直隸廣平府，又自曲阜至直隸景州，俱係傳教的地方；近日各堂爭要前往傳教，他想把這張地圖呈送傳信部，請傳信部傳諭各堂，不許他們競爭」等語。不料此圖為官廳截獲，遂疑心是寄給英國戰艦的地圖，以便他們登陸。這起事件過去以後，又來了一批新的傳教士，抵達北京後便遭拘禁，所有在京的傳教士也被嚴密監視。一八一一年（嘉慶十六年），一位中國神父在山西被捕，又引起一道新的仇教法令。這道上諭竟說「除惡務盡」。北京西堂的教士也被驅逐，教士住宅遭拍賣；北京其他三座聖堂也遭到同樣的命運。次年東堂失火焚燬，未予重建；北堂也於一八二六年放棄。當時北京只剩一位西人，

即南京主教畢學源 (Pires Pereira)；他總未能去南京上任，只是北京教區的代理人，住在利瑪竇 (Matteo Ricci)、湯若望 (Adam Schall)、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的舊宅上所建的南堂。他於一八三八年去世，北京教友一時無人管理。不久南堂也被拆毀。

一八一一年的教難蔓延全國。一向未遭教難的西部省分，這次教難更為慘烈。英勇的徐德新主教便作了教難的犧牲品，他於一八一五年被逮捕，解送成都，即在成都斬首。同年中國神父趙奧斯定亦遭逮捕下獄，瘐死獄中，時年七十一。英勇的張大鵬義士亦於是年被捕，他原在原籍貴州作傳道員，為了暫避該省的教難而逃至四川。徐德新主教請他回原籍去支持教友們的信德，後被一名叛徒出賣被捕，他的家人受地方官的誘騙慫恿，千方百計地勸他背教，他毅然予以拒絕，最後在高聲承認信仰中被絞決。

次年方濟會士藍月旺 (John of Trionia) 在湖南長沙被殺殉教；一八一七年中國神父袁在德，聖名若瑟，在四川致命；次年另一位劉保祿遭同樣的命運，劉達陡則是在一八二一年殉教的。遣使會會士劉方濟 (Francis Clet) 在華傳教二十八年後，於一八一九年在武昌殉教，時年七十一歲；另一位遣使會會士董文學 (Gabriel Perboyre)，在劉方濟殉教二十一年後，也在武昌為一叛徒以三十銀圓的代價出賣被捕，在獄中

受了一年的酷刑，於一八四〇年被絞於十字架而死，完全步武了吾主的芳表，真不愧為「耶穌的真徒」。

聖教會將以上殉道者，連同其他此處未及敘述者共二十四位，前後於一九〇〇和一九〇九年由教宗良十三世及碧岳十世列入真福品。不過在這段教難期間，其他不知名的教友、貞女和傳道員等，或被殺或坐牢或流放，只有天主知道有多少，對他們我們只能獻上馨香一瓣了。

一八四二年中國教務情形

一八四二年簽訂南京條約，當時中國有三個主教區（北京、南京、澳門），九個宗座代牧區，一個宗座監牧區。因為同羅馬聯繫困難，教難頻仍，這些教區的主教往往出缺後無人遞補，或只委人代理。當時在中國有多少位神父？因為只能在地下潛伏工作，所以很少；據估計大概中國籍神父有八十名上下，外籍傳教士在五、六十名之間。至於教友的數目，那更無法統計了。據歷史家的估計在一八〇〇年，恐在十二萬五千名至三十萬名之間；四十年以後，西部各省的教友倒是增加了，但因他省的損失，恐怕總數無大增減，大約二十萬名上下。無論如何，這些散處在各省的教友，常遭官廳搜索追捕，在國內所占的地位是無關緊要的。

這個兩世紀半以前由利瑪竇等人所傳入的教會，究竟成了什麼情形？由那麼多的血汗所建立的教團，究竟命運如何？就如唐朝由聶斯托里派（Nestorianism）所建立的教團，或如元朝由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主教和方濟會傳教士所建立的教團，同樣地雲消霧散了嗎？一八四〇年中國教團的確又有一次逐漸湮滅的危險。

貳 不平等條約時期

鴉片戰爭及其餘波

傳教的自由因列強的脅迫而訂入條約，對中國教會實是一大不幸；不但不能減低中國人對基督宗教的反感，反而變本加厲，何況又是由強權藉國恥的鴉片戰爭（自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所造成的。英商向中國輸入鴉片毒品，本就是一種慘無人道的事。朝廷出令禁止，派林則徐去往廣州查辦，林氏勒令英商將鴉片一萬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二百一十九袋繳出，悉數焚燬，遂引起中英之戰。

但其時中國的武力，已不能與西方列國的武力相頡頑。康熙崇尚西學，且喜躬親研究，設法給中國介紹輸入；無奈滿清末葉的幾位皇帝日益腐化，忘卻了他們聖祖皇帝的遺訓，盲目地自尊自大，不求上進；而歐西各國則因科學與機器的進步，

早已使中國望塵莫及，自然非英國船堅炮利之敵。所以英艦占領上海，溯長江而上，直逼南京；因而作了城下之盟，迫使中國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開闢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口通商。

南京條約簽訂後，列強競相效尤，爭求利益均沾，美利堅與法蘭西更甚，於是乃於一八四四年先後在澳門訂立中美條約，在黃埔締訂中法條約。法國全權代表拉亨納（Lagrene）乘機要求列入保護傳教之條文：即准在開闢之五口建造禮拜堂、醫院，開辦學校，聘請學人教授華語等；凡越出五口界限以外之法人，均可逮捕，但當交該國領事處理，中國官廳不得審訊虐待；此即所謂領事裁判權的由來。

兩年之後（一八四六年），法使拉亨納又與清外務部事務大臣耆英磋商，得蒙道光皇帝飭諭：中國人民可自由信教，不復以干法獲罪論；所有以前禁教之法令，一概取消。於是教徒獲准建造教堂，而康熙朝所查封充公之教堂，除已改為寺廟者外也一併發還。

在禁教一百五十年之後，這道上諭總算開了容忍之門，但絕不能與「米蘭詔書」相比，只可視為一種妥協，還不能使人完全滿意。上諭堅稱：傳教士在通商之五口以外居留，尚認為不合法（雖然實際上地方官對傳教士在內地居留，往往熟視無睹）；事實上自一八四二至一八五六年間，有十五位左右傳教士自內地被驅逐，其

他百十來位外籍傳教士，則同數目不相上下的中國籍神父，享受著或多或少的自由。另一方面，飭令地方官不得再歧視教徒和發還教會財產的訓令，則開了許多訴訟之門。

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〇——一八六四）

道光於一八五〇年去世，咸豐繼位；當年即在廣西爆發了革命，幾乎顛覆了滿清的社稷。自十九世紀初葉，民間即不斷有驅逐韃虜的騷動傳布民間；那是明朝遺民所早已醞釀的「故國之思」。他們先假手祕密結社，即所謂「天地會」、「三合會」，以後公然揭竿而起，組成了「太平天國」（開始也稱「拜上帝會」）。他們的領袖洪秀全（1812-1864）曾閱讀基督教新教所散布的書籍，結識了一位牧師，自稱為基督之弟，曾由天父授命拯救國家民族於滿清的虐政，因號太平天國。這股革命潮流，在長江以南發展甚速，但在想北上攻掠北京時即漸衰微。雖然如此，他盤據南京，統治華中一帶，竟達十年之久，直至一八六四年曾國荃攻破南京時始亡。計自洪氏起事，毀六百餘城，雙方死亡數百萬；教會所受的損失自可想見。太平軍拆毀教堂，殺戮了傳教士和數百名教友；最可惜的是洪氏抄襲基督教義的道理，致啟清廷的疑竇，視天主教與彼等為一丘之貉。尤其曾國藩曾嚴責基督徒（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以四部福音代替「四子書」。由天主教徒看來，這是由基督新教散布聖

經而不加充分的註解所致。

天津條約（一八五八）與北京條約（一八六〇）

一八五六年英人藉口亞羅船事件，法人藉口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馬賴神父（St. Auguste Chappellaine）被殺，英法聯合出兵來犯，攻陷廣州，粵督葉名琛被俘，乃乘勝直逼天津，迫清廷訂立新約，其中有一款：以前所有一切禁教法令，一概取消；基督新教及天主教凡有傳習，一體保護。

天津條約只是一時的停戰；兩年後聯軍又來進犯，連陷津沽，直達北京，火燒圓明園，迫簽北京條約。此條約對傳教也有規定：所沒收之教堂政府一律發還；准許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³。

從此以後，傳教士不必再躲躲藏藏了，且享有官廳的保護；甚至有些傳教士，當他們的教徒被控於官廳時，他們竟出面袒護（以致有些個人或家庭，為了得這項便宜而入教——自然有人要問，像這樣的皈依有什麼價值呢！）。但條約不能左右敵視外人的感情，也不能阻止流血事件不再發生，因此教士和教徒犧牲的事件，時有所聞。最悲慘的事件是一八七〇年在天津所發生的：當時有一種流行性疫症，在仁愛貞女會所辦的孤兒院中招致了許多死亡；於是便有人控告修女偷竊嬰兒，摘心

剗眼，以便配製藥品。民眾為這種流言所激，進而焚燬教堂和孤兒院；有十位修女、中法神父各一、九名歐人慘遭殺戮。

教宗良十三世與中國

天津和北京條約所造成的事態，是將中國的傳教士置於法國保護之下了；羅馬教廷卻寧願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一八八五年教宗良十三世相信此事能夠實現。法國當時正同東京（現在的北越）交戰，中法的關係相當緊張；德宗（光緒）聲稱中國教徒和傳教士都不致不贊成。教宗致書德宗表示謝意，並於一八八五年一月一日的信中說明，教宗所派遣的傳教士，並非單由一國所徵調，「這與天主教的性質很符合，因為它不是某一國的教會，而是萬國萬民的教會，所有的人類不分國籍種族，同屬兄弟。」

清廷在答書內通知教廷，他已準備派遣一位欽使常駐教廷，也歡迎教廷大使駐節北京。然而法國政府為了保持威望，不願放棄北京條約所賦予它的保教特權，此計畫便未能實現。

教務的進展

傳教事業雖然困難重重，但仍在進展；因教會在歐洲又蓬勃復興起來，傳教士遂得源源而來。遣使會的活動主要是在江西、浙江和直隸各省；道明會士仍在福建，他們在那兒已工作了兩世紀；方濟會的工作園地則是山東、山西、陝西、湖南、湖北；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西南各省：四川、雲南、貴州。至於耶穌會士，因咸豐於一八五〇年登基時有憾於耶穌會士，始終懷恨在心，不願使耶穌會士在北京仍從事天文等科學工作，他們便到上海附近的徐家匯去了——那是以前徐閣老光啟贈獻給他們的，所以他們便在江南一帶傳教，又自一八五六年讓他們到直隸東南部去。不過以上各修會的傳教士在中國已工作多年，無論他們如何熱忱，對偌大的中國而言，人數總是不夠的；於是又有新的修會加入：一八五八年米蘭外方傳教會前來，一八六五年聖母聖心會的神父們開始在內蒙古建立教友農村；西班牙的奧斯定重整會（Augustinian Recollects，簡稱O.R.S.A.）於一八七九年重返河南；一八八二年聖言會開始在山東傳教。最新奇的是，於一八八三年，熙篤會會士在北京教區的楊家坪（在察哈爾省懷來縣，今屬宣化教區）建立了一座苦修院。

另一項新的措施，就是派送修女來華：最早來的是仁愛貞女會（一八四七年），

華北都呼之為「白帽子修女」，其次是加諾撒仁愛會修女（*Canossians*）於一八六〇年來華，拯望會是一八六七年，聖衣會於一八六九年在上海建立了會院，方濟聖母傳教修女會是一八八六年來的，最後於一八九三年來華辦教育，而且發展很快的，是聖母小昆仲會。

傳教的方法

歷經整個十九世紀，成見最深的舊知識分子和無知的羣眾，百般反動攻擊。傳教士在那個時期，特別努力強化前人已建立的事業，並努力給教友以更堅實的栽培來徐圖發展。教團多在農村，且極分散，神父不能常去巡察探視，於是領導教友祈禱和栽培望教者的責任，大部分便專靠男女傳道員了。這個時期，政府不注意栽培人才，任令教士隨意辦教育，因此傳教士對學校非常重視；他們的目的，是教授已受洗的兒童們教義，並使他們受一種良好的教育，至於教外的兒童，則不強迫他們接受。慈善的事業則特別著重孤兒院，那是仁愛貞女們格外心愛的事業。

傳教士們用這些方法⁴培植教友們的堅實信德（這在拳匪時尤為顯著），但對公共社會生活未免脫節。既然敬孔祭祖的禁令尚在嚴格執行，他們除此之外也就無法可施了。此外對栽培本地神職人員也並未忽視，代牧區已日益增多，幾乎每一教區

都有自己的神學院（至少有小神學院）。

當時天主教雖然不及利瑪竇和湯若望時代的輝煌，但對科學並沒有完全忽視。就如遣使會戴維德（Armand David）神父曾搜集各種植物，移植中國；耶穌會士於一八七二年在徐家匯創建一座天文臺，在預測和預報颶風上便利航業界不少。對於印刷，則有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在香港所開設的納匝肋隱修院，耶穌會士在徐家匯的土山灣和直隸獻縣所開辦的印書館，以及遣使會士在北京北堂的印書館，不但出版教會書籍，且編印字典，翻譯或重印古典文學和有名學者的著作，其中不少至今尚一再重印。

義和團的倡亂

中日甲午之役（一八九五年，即光緒二十一年）慘敗以後，中國割讓臺灣，對朝鮮也喪失了宗主權。兩年之後，德國藉口兩名傳教士被害，強占膠州灣與青島，美其名曰租借，並取得在山東全省內之種種特權。其他列強如帝俄、日本、法蘭西、英吉利亦起而效尤，要求利益均沾；他們全得到了海口或港灣，作為海軍根據地，並約定劃分各該國的勢力範圍。

中國遭受了這樣的恥辱，幾遭亡國瓜分之禍，朝野上下都受了很大的刺激，再

不能不發憤圖強了，於是乃有「百日維新」之舉。但西太后深恐大權旁落，反對改革維新，保守派又從而慫恿，愚民無知，仍存自大之心，反對一切仿效歐美之「洋務洋政」；於是釀成「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幽禁，六君子被殺，康梁逃亡海外等一連串不幸的事件……當時海內騷然，岌岌不可終日；西太后將一切不幸統統歸罪傳教士，一時朝野鼎沸，直呼外國傳教士為「大毛子」，教徒為「二毛子」，大有滅此而朝食之勢。一八九八年兩位法國傳教士在廣西被害，又一名在廣東連同十三名教徒被殺；一名比籍方濟會士及八名教徒遇害；各處教徒被騷擾，房屋遭焚燬，仇教之事，層出不窮，至一八九九年幾已瀰漫全國，緊張已極；為禍最烈的，乃是山東的「義和團」。義和團又名義和拳，源出「大刀會」，是一種祕密會社；入會者必須學習拳棒棍杖以及落伍的刀槍劍戟；頭目號「大師兄」，能行妖術惑人，號稱刀槍不入；到處立團招人，勢甚猖獗。起初清廷對他們尚懷疑忌，深怕他們像太平天國一樣，轉而想推倒滿清。無奈西太后不知海闊天空，剛愎自恃，想利用他們打倒列強，以洩胸中之恨；義和團又盛倡「扶清滅洋」的口號，以固其心；於是西太后起始加以鼓勵，繼而遂公然予以保護支持了。

一九〇〇年五月，直隸省（今河北省）到處騷動；政府佯為不知，不加干涉，於是拆毀鐵路，焚燒教堂，集體屠殺教徒之事頻傳。六月二十日太后召集御前會議，

帝、后與各大臣辯論甚烈（請參閱蕭一山《清代通史》卷下，二一九五頁），穩健者力諫，不可貿然啟釁，更不可不分皂白開罪列強。無奈太后一意孤行，不納忠諫，竟傳諭剿滅洋人，命義和團為先鋒，董福祥軍為接應，聞者駭然。其實在北京由義和團訓練的亂民，在未接到這項諭令之前，早已動手搗毀教堂，屠殺天主教和基督教徒了；只有躲藏起來，或逃至使館和武裝防衛地帶的，始得求生。北堂便是一個這樣的地帶，教友把北堂和相連的仁慈堂關閉起來，急忙布置防禦工事；其中有教友三千來名，包括婦女孩童，有法國和義國水兵四十三名相助，抵抗成萬的義和團反覆猛烈圍攻，達兩月之久，直至自天津方面來的聯軍到達，始行解圍。

在北京鄰近各省，尤其是直隸、山西和內蒙等地，以及東北各省，義和團任意橫行，瘋狂肆虐；逃避不及和不能自衛的教士教友，幾乎均遭集體屠殺。山西太原總督毓賢格外敵視外國人，親身監斬主教、副主教及整堂內所有的人，計有神父、修生及七名方濟聖母傳教會修女。直隸朱家河，有三千教友在村中抵抗義和團的猛烈進攻，及至官兵前來聯合猛撲，始因眾寡懸殊而淪陷；未被打死者齊集聖堂內，兩位神父給眾人念了赦罪經，全部被焚而死。瀋陽的主教同百十來名教友也一起被焚死在主教座堂中。

其他省分也有暴亂和局部的屠殺，不過地方首長曉得這些屠殺的荒謬絕倫，乃

盡力維持秩序，保護教士教民。

秩序恢復以後，估計死了四位主教，三十一位神父，三萬多名教友⁵。中國艱危不安的教會史上，還從來沒有遭受過這樣血腥的大難。基督新教所受的損失也不小，只是他們的人數遠比天主教為少而已。

參 茁壯時期

二十世紀的前半期，由義和團的慘劇開始，由另一悲劇——共產黨的侵入——結束；其間不少的事故，完全改變了中國的面目。

八國聯軍加給滿清的壓迫和恥辱，終於使多年來反對維新的勢力解體了。日俄之戰結束，顯示所謂西方強權，並非立於不敗之地，利用自己的武器便能將它戰勝。衰老的慈禧也曉得改革實屬必要了。一九〇五年宣布廢除舊制科舉，創立學校。青年熱中新學，派赴日本與歐美的留學生也與日俱增。

然而滿清腐敗已極，積重難返，雖聲言預備立憲，派大臣赴歐洲考察，其實都是推諉拖延；有志之士，恍於亡國之痛，實不能再事容忍，終於演成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滿清卒告推翻，建立了民國。但數千年的老大帝國，維新談何容易！是以民國初年經歷了軍閥的多少變亂和內戰，國民黨始在蔣總統領導之下，統一了全

國。不料喘息未定，又面臨了日本的全面侵略，雖八年抗戰，勝利成功，共產黨又乘機而起，發動了亙古未有的內亂。

傳教事業的進步（一九〇一—一九二〇）

在義和團暴亂之後的二十年之間，傳教的方法未有多大的進步。傳教士的活動大都消耗在照顧教友和訓練傳道員上了。不過已感覺有接觸知識階級和發展教育事業的需要，於是開始創辦中等和高等教育機關，耶穌會士乃於一九〇三年於上海震旦創立第一座天主教大學。但在這方面天主教已較基督新教落後甚遠，他們早知利用機會，以滿足青年對新學的求知慾。

在二十世紀的初葉，雖仍有局部的騷亂困擾傳教士和教徒，但就大體來說，總算享受了一段平安與進步的時期；十二年之間，已使教友的數字倍增，由一九〇〇年的七十二萬，增至一九一二年的一百四十三萬，一九二一年已達兩百萬。不過儘管數字加增，但教會對國計民生，還沒有顯著的影響，平均教徒只占國民的兩百分之一，而且大多數是貧苦的大眾，至少對進步中的國家，不能起什麼作用。雖然努力發展神學院，但中國籍神父仍較外籍者為少；一九一二年中國神父雖有七百二十九位，外籍神父則幾乎多一倍，且沒有一位中國神父在管理教會上占有重要地位；

自羅文藻主教以來，竟沒有一位中國神父升任主教。

雷鳴遠神父獨樹一幟

即使有那麼多的中外神父鞠躬盡瘁地宣傳福音，其中也確有不少熱忱、知識、聖德都堪稱卓越不凡的；即使偌多的神父及教友為信仰流了鮮血，聖教會在中國，可說距離真正根深柢固尚遠，尚滯留在播種時期！於是有些人便開始熟思這種失敗的原因：是不是方法上有著根本的錯誤呢？

一位在拳禍後一年來到北京的青年遣使會士，便被這樣的思想困惑著。雷鳴遠（Vincent Lebbe）一八七七年生於比國剛城（Gand），十八歲加入了遣使會。因為健康不佳——尤其是眼疾——被長上派赴羅馬休養，希望那邊的水土能有助於他的健康。在那裡他邂逅了北京宗座代牧樊國樑（Mgr. Favier）；他雖然神學尚未畢業，竟蒙主教青睞，親自把他帶來中國。他被安置在北堂大修院內，與中國道生共朝夕，一面教書，一面學中文；不久便奠定了中國語文學的基礎，以後不但能說一口標準國語，且能瀏覽四書五經，寫一筆秀美的行書。他很快便看出，他所接觸的中國人，不但有很多聰明能幹的人才，而且德學兼優；何以竟沒有一位中國神父在傳教事業上擔任重要職務呢！興念及此，不覺五內俱焚！他發現所謂「保教權」，在教外人

眼中，使教會同西方文化連在一起，無怪乎他們視基督宗教為「洋教」了；他清晰地看出傳教的方法實在是大錯特錯，照這樣下去，萬難使中國皈依。從此他便下定決心，要以全力來從事改弦更張的運動，不達目的絕不休止。他感慨地說：「假如聖保祿當時墨守他的猶太生活不變，試問他還能使教外人歸化嗎？」所以他既來中國傳教，便願完全中國化。他先在京東京南一帶傳教，以後被派往天津；他的中國話是那般純熟自然，所以不但能隨意給教友講道，就是公開演講也毫無問題。外國傳教士在公共場合演講，那是前所未聞的，不但號召力驚人，收效也很可觀；無論是教友與否，也不管是縉紳學者或是凡夫俗子，都成千上萬的爭著聽他演講。「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這是他的口號。他見中國是那樣大，人口又是那麼多，只憑神父傳教，絕對不夠，於是他便創立了一個「傳信會」，組織教友傳教，這是「公教進行會」的先河。他也知道報章雜誌對傳教的助益很大，便想創辦一份刊物，無奈上峰反對；他幾經交涉，終於得到了主教的許可。他先辦了一份週刊，取名《廣益錄》，繼而又辦了一家日報，即有名的《益世報》。

雷鳴遠神父為天主的光榮，實事求是，把傳教士已往的作風完全推翻，提倡人民愛國，由愛國而愛教：這在當時新興的中國，是傳教最好的辦法，可以一掃中國過去對「洋教」的誤解。不幸天津發生了「老西開事件」，把他捲入了外交上的衝

突。原來天津法國租界與老西開接壤，而天主教的總堂又適在老西開；這是一片窪地，葦葭叢生，如果把它填平起來，可成為一塊大好的市區。法國領事對它早已垂涎三尺，但因是中國的領土，還不敢貿然占領，乃請求中國政府准他向該處擴展租界。中國為避免交涉糾纏，未予答覆，法領事以為是「默認」，遂開始興工填平。一時人心大譁，紛起反對，《益世報》也著論主持正義。雷鳴遠神父平日既然提倡愛國，自然不能袒護法國，但礙於法國的壓力，主教的禁止，又不能暢所欲言；他自稱當時真是心如刀絞，痛苦萬分。雷鳴遠神父終於被迫離開天津，調往浙江寧波。消息漸漸傳至羅馬，當他於一九一四年返回比國時，曾訪問梅謝樞機，作一長談，樞機對他謀求祝聖中國主教的主張甚表同情，且與汪勞松樞機（Van Rossum）的意見不謀而合，教宗本篤十五世正好於一九一八年委任汪勞松樞機為傳信部部長。一九二〇年雷鳴遠神父被調回歐洲，以便照顧中國的留學生；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同時他也得以乘機使羅馬教廷明瞭他的主張。於是在梅謝樞機的安排下，得見汪勞松部長，並蒙教宗本篤十五世召見；部長與教宗都同情他的奮鬥，並囑以暫時忍耐，保證祝聖中國主教一事，定要實現。他又利用在歐洲的這段時期，同鮑朗神父（Fr. Boland）共同創立了輔助傳教會（簡稱SAM），是不在修會的神父在傳教區給本地主教服務的一個協會；以後鮑朗神父又按照雷鳴遠神父的要求成立了鳴遠女子服務團。

《夫至大》通諭

一九一九年，教宗本篤十五世為了使人們認識教會的思想，頒發了《夫至大》通諭，給傳教史開了一個新紀元。我們不難發現其中不少的見解都同雷鳴遠神父的完全吻合：傳教士應絕對避免謀求其本國的利益，否則便要使傳教的努力完全失效；關於本地神職人員，通諭明確地說：「有些傳教區域，天主教已傳入了數世紀，而本地神職人員，至今只居次等地位……給他們以適當的栽培和教育，實屬刻不容緩；倘欲產生預期的效果……給他們的栽培，不可只求其能作外籍傳教士的助手，卻當使他們在自己的民族中，有接收管理的能力。」

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

一九二二年繼任本篤十五世的碧岳十一世，對宣傳信德的關心，絕不讓他的前任專美於前，他把《夫至大》通諭所擬的計畫，完全視為己出；他為急於在中國實現這計畫，即位後的最先措施之一，便是派遣一位宗座代表剛恆毅（Mgr. Costantini）來華。宗座代表雖不是外交使節，但顯而易見的是，從此傳教士——無論是哪國國籍——都要直接隸屬於聖座，教宗也是藉此表示他的意志，是使教會擺脫國家的保護。

剛恆毅大主教一到任，便立即建議羅馬將兩個教區委任中國人管理：成和德為湖北蒲圻監牧，孫德禎為河北蠡縣監牧；這兩位監牧且參加了在上海所召開的全國教務會議。

上海全國教務會議

剛恆毅大主教所負使命之一，是籌備中國主教全體會議。中國傳教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全國教務會議，於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召開，參加的是各教區首長，各修會和中國神職界的代表。會議討論各教區應一體遵守的正確綱要，要完全符合本篤十五世所給的指示。有整個一章，嚴禁傳教士涉足俗事和政治：「絕不可讓腦筋簡單的人，視天主教為某一國家的教會，要使由神聖的創教者所昭示的大公無私的特徵，顯耀於大眾之前。」大會便規定本地神職人員可擔任任何職務：「本地神職人員只要有資格，絕不可拒絕他們擔任任何職務。大會且有更高大的希望，並期望其盡可能早日實現，即在本國神父內選任主教。」

中國主教的祝聖

大會的希望也就是教宗的心願，碧岳十一世為使其圓滿實現，遂任命了六位中

國主教⁶，並為使全世界注意他這項行動的意義，他願親身予以祝聖，且要使禮節特別莊嚴輝煌。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聖伯多祿大殿裝飾得燦爛奪目，一如舉行最大慶節的情形，六位中國神父，在駐羅馬的全體樞機、五十位主教及全體駐梵蒂岡外交使節前，由教宗手中接受了主教祝聖禮。

這件大事的意義，誰也不難明白。一位中國部長曾向剛恆毅大主教說：「教會的大公性在中國以前幾乎很難令人了解；從此已成為顯明的事實了。」

教宗不久又委任了多位中國主教。

此外教廷又和中國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一九四六年教宗任命黎培理（*Msr. Ripari*）為教廷第一任駐華公使。同時羅馬認為在華建立教統之時機已成熟，於是擢升二十二位總主教，七十九位主教，代替宗座代牧，此外尚有三十七位宗座監牧。在全國一百三十七個教區中，有二十九位中國主教。教宗碧岳十二世又於同年冊封青島主教田耕莘為中國第一位樞機，且調任北平總主教；這是中國人榮膺此銜的第一人，也是東亞第一位樞機。

神職界

為培植神職人員，教會又在中國成立了十四座總修院，教區神學院也日益增多。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四八年中國神父增加了一倍以上，即自一千二百二十位增至二千六百七十六位。

為使教會在某一國根深柢固，它不但當擁有教區神職人員，也當有修會神職人員。在老修會中固然早已有許多中國會士，但教宗碧岳十一世在《中國傳教》通諭中，曾諄囑考慮，是否理應在傳教區域創立新的修會，就地域與環境的特殊情況，適應本地人的性格與傾向。

為響應這項號召，有兩個宗旨與會規完全不同，但同屬純粹中國的修會，於一九二七年同時產生：一個是雷鳴遠神父在安國所創立的「耀漢小兄弟會」，熔隱修與顯修生活的理想於一爐：「在會中為苦修士，在外為傳教士」；另一個是剛恆毅大主教所提倡並協助成立的「主徒會」，目的是培植熱心而有學識的神父，且要有高度敬禮聖體和堅決服從聖座的熱忱。

本地神職人員雖有增加，但為應付這浩大的使命尚嫌不足，是以仍有號召外籍傳教士前來相助的必要。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徵召歐洲傳教士阻礙了一時，美洲傳教士卻在此時前來補充。美國瑪利諾會的傳教士乃於一九一七年首批來華。由於本篤十五世和碧岳十一世的鼓勵提倡，大戰以後反而成了發展傳教熱忱的最好時期。在一九二〇至一九四〇年之間，修會和傳教協會派遣來華的人數很多：如聖高隆外方

傳教會 (Foreign Missions of St. Columban) 和愛爾蘭外方傳教會 (1920)、苦難會 (Passionists, 1921)、畢布斯二心會 (Picpus Fathers, 1922)、救世主會 (1923)、印五傷司鐸 (Priests of the Holy Stigmata) 和贖世主會 (Redemptorists) 等，外籍神父自一九二五年的一千八百零六位增至一九四八年的二千六百七十六位。

教 育

聖教會自知在籌辦中等和高等教育上已經落後，於是便在這一段時期內急起直追。天主教的三座大學直到大陸淪陷時尚在上課：最早的是震旦，那是耶穌會士於一九〇三年在上海創辦的；它所造就出來的醫師、工程師、法學博士等，已經散布全國，頗著聲譽。其次是輔仁，由美國本篤會士於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創辦，一九三二年由聖言會接辦。耶穌會士又於一九二二年在天津開辦了一座工商學院，一九四八年正式立案為津沽大學。

此時天主教在全中國有中學一百八十九所，小學二千座。

教友們的傳教活動

傳教士對他們的主要工作——傳教，絕不忽視：他們對照顧教友和給望教者講

道，已感餘力不多，於是便呼籲教友們的協助；那不只是對傳教工作占重要地位的傳道員，尤其是公教進行會的會員；該會由雷鳴遠神父發起試辦有效，他處多起而仿效，以後在剛恆毅大主教的鼓勵之下，日益發展。教宗碧岳十一世曾於一九二六年六月致函中國宗座代牧和監牧，敦促他們成立公進會，否則傳教之功便不能圓滿達成。于斌神父由羅馬歸國後，任全國公教進行會總監，曾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召開全國大會，成效卓著。陸伯鴻當時為全國公進會會長，他不但是位模範教友，且是一位殷實的實業家，對教會的熱誠以及扶危救困的愛德，都是超人一等的，教宗曾譽之為中國第一教友。

禮儀問題

對教會不只一次招來最大損害的，是天主教人士對傳統敬孔祭祖所持的態度。自教宗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在位期間 1740-1758）於一七四二年以這些禮儀沾染了迷信，予以斷然禁止以來，環境已經大變；因教育的普及和科學的精神，這些禮俗已失掉了原有的宗教性意義，政府也曾正式聲明不過是一種純政治與教化性的禮俗而已。

傳信部乃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根據事實的演變發出了新訓令，聲明政府

機關所舉行或下令舉行的敬孔典禮，既非向孔子施行宗教性的敬禮，乃是向這位偉人表示他應得的尊崇，並尊重本國文化的傳統，因此教會取消以前的禁令。羅馬這項決定，不但消除了教友們良心上的疑懼不安，以前的誤解也隨之雲消霧散了。

中國抗日戰爭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一直延續了八年，終於原子彈一擊，日本無條件投降。長期的國難也成了變相的教難：許多教團慘遭毀滅，許多聖堂、學校、醫院等建築被蹂躪損傷。那雖然不是物質繁榮的時期，精神方面卻顯然嶄露了頭角。愛國的堅貞，和神父、修士、修女以及教友為減輕人民的痛苦所完成的卓越工作，使教會的真實面目得以突出，在人前清楚地顯示，它真是一個博愛而關心人民幸福的機構。那些愛國愛人的事件，無法一一舉出；這裡只引證雷鳴遠神父和他那耀漢會的弟兄們所組織的救護隊（或稱擔架隊），以概其餘便了。抗戰軍興，雷鳴遠神父激於愛國愛教的熱誠，既限於自己的身分不便執戈衛教衛國，乃組織了前線救護隊，不顧任何危險，到前線去搶救傷兵，並在醫院內服侍安慰他們，真不知救活了多少生命，直至他本人和他的弟兄們犧牲了生命才告停止。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三日雷鳴遠神父和十五位本會弟兄，被共產黨徒陰險地逮捕，其中十二位慘遭屠殺。雷鳴遠

神父雖被蔣委員長救出，但已心力交瘁，病入膏肓，延至六月二十四日於重慶逝世。從此教徒始被視為真正的愛國者，而不再懷疑他們是「二毛子漢奸」了，天主教在社會上也贏得了榮譽與地位。

勝利後的兩年，在未被共產黨纏據的地區內，是一個喘息的時期，教會獲益不小。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曾在愛爾蘭和非洲目睹聖母軍所獲致的成果，為此在中國盡力提倡並推展這種教友傳教的新方式，成效卓著。在上海所成立的「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對教會服務的一切活動也活躍起來。

結 論

在共產黨篡據大陸的前夕，天主教的前途真是大有希望，數字已接近四百萬；不過若以全國的人口論，尚嫌太少，尚不到百分之一；但教會在國內已成了活躍而有作為的一股力量。中國主教已占居像南京、北平、上海、南昌、廣州等最重要的位置，全國聖統主教國籍化，預料已不在遠。教會除南京第一任中國主教于斌外，也吸收了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像曾作外交總長內閣總理卒於本篤會院長任內的陸徵祥（1871-1949），和學德兼優曾作中國駐梵蒂岡公使的吳經熊博士，都是中國教會的光榮。三千位中國神父和一千多位大修生正準備接班；有六十種中國女修會，三

十二萬曾在四千四百五十所各級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少年，二百一十六座醫院，二百六十四所育嬰院。在幾千位殉教者中，被教會列入真福品者已有數十位。中國教會，回顧過去足以自豪，瞻望將來大有前途。

然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料正當教會奮發有為時，霹靂一聲，大禍從天而降，竟遭受了千古未有，最有系統、最具陰謀和最難逃避的迫害。

肆 鐵幕內的教會

鐵幕內中國教會的歷史，雖說充滿了血淚，但也格外榮耀，現在我們予以敘述。對這個題目，曾有不少不同文字的書籍問世？。倘欲從其中摘錄一些最美麗動人的英勇事蹟，絕不是我們這部天主教簡史所能容納的，我們只能予以粗枝大葉的概括敘述而已。我們距離這段歷史太近，尚未揭曉的事蹟又太多，以致無法撰寫這個時期決定性的歷史。

自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中共偽政權對教會的態度，可分為三個階段：自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是暴力迫害時期；一九四九年是短暫的偽裝平靜時期；不久即發動的第三個階段，是有系統地先強迫中國教會脫離羅馬，最後由內部予以徹底消滅。

暴力迫害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四八）

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教友早已知道共產黨徒仇視天主教，因為在抗戰時，已吃了八路軍游擊隊不少的苦頭。雖然當時黨的路線是避免惹惱民眾的感情，而與之發生正面的衝突，但很顯然的，他們仍在尋找各種方法利用各種機會來破壞教會。抗戰勝利後，他們便在日軍撤退而由他們竊據的地域內，例如北部各省，揭開了猙獰的面目：教堂被拆毀，或改為開會、演戲、儲藏糧秣的處所；以後藉著清算鬥爭和公審，令各地教會接受數字驚人的罰款，以剝奪他們的財產；同時更以暴力加諸人身。在一九四七年的一年中，至少有五十八位神父、十六位修士、十三位修女遭屠殺；其他瘐死獄中及失蹤者更是無法計算。在熱河，迫令神父、修女和教友背教；不從者備受酷刑，或在大路上拖拉，以致凍餓而死。

有兩件驚人的慘劇惹起了全世界的忿怒：一是毀滅西灣子，一是鬥爭楊家坪熙篤苦修會。

西灣子是察哈爾省最古老、教友人數最多的一個教團，且是該教區的中心；自日本投降便被共產黨徒占據，神職人員和教友均遭受了嚴酷的鬥爭和洗腦；但一九四六年秋季，國軍收復該地，紅軍便誓言報復，他們於十二月反攻成功，遂將教會

建築及聖堂等付之一炬，撤退時又將未能逃脫的鄉民帶走，斷臂缺腿的殘屍遺棄遍地。

次年懷來縣楊家坪苦修院的熙篤會修士便受了公審，有兩位神父和三位輔理修士當場被石頭打死，其他的將手腕以鐵絲綁起來，在行軍中被拖拉步行了三個星期，一路遭受著虐待毒打，有些倒斃路旁。計該苦修院七十五位會士中，死了三十一位。

短暫的平靜時期（一九四九）

一九四八年末，戰術轉變：共黨到處聲明「信仰自由」，有些神父被釋放了，也有幾處教堂發還了。轉變的原因不難猜測：共黨正開始所謂過江解放江南，認為此時不宜多樹立敵人，何況為組織新占領區也需要時間，有比對付幾百萬天主教徒更急切的事情。

傳教士們對這短暫的平靜並不心存幻想，不過利用這喘息的時間加強工作罷了。上海的天主教教務協進會散布護教的小冊子；一時皈依聖教者很多，但人人都預料到須準備將來的奮鬥。

迫害的再起

實際上迫害的再起按地域有遲早的不同；這次並非全面公開地幹，卻是更為陰

險，這是同馬列主義相符合的。按照馬列主義，宗教——這「人民的鴉片」——必須予以鏟除，但需要時間；要盡力避免殉教事件，因為那是教徒的種子。信仰自由的口號仍是到處高叫著，教會也從未直接受過攻擊，卻以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工具的罪名加以誣讟鬥爭。向教會指定繳納的捐稅和罰金，數目大得驚人，目的就是要把迫使他們出賣或放棄他們的房屋，甚至是教堂。因為經費無著，學校自然得關閉，或是必須教授唯物辯證法。這樣一步一步地進逼，先是由「進步」的叛徒管理，但不久便完全落到政府的手中。藉口正在實行土地改革，人人得從事勞作，不能再舉行宗教儀式去曠費時日；除了大都市尚准許舉行宗教崇拜，以轉移國際間的耳目外，他處是不准舉行了；神父們或回家從事生產，或軟禁在教堂內，不准有任何活動。

神職人員無論中國籍或外籍，都得設法適應環境。他們既被剝奪了全部財產，便效法聖保祿，靠兩手工作謀生；有的種田，有的操手工業；這位主教作鞋，那位主教糊火柴盒；神父們有的經營小本商業，有的作賣藥郎中，這樣可以藉機去訪問教友。

三自運動

物質的損失和外來的打擊雖嚴重地阻礙了它的活動，但在精神方面，教會尚能

屹立不搖；脆弱的分子固然經不起考驗而垮了，但信友大眾卻愈考驗愈堅強，蹣跚在他們的牧者主教和神父身邊，同整個教會及最高領袖——教宗，堅決保持著聯繫。教會的敵人此時藉協商為名，發動了更狡猾、更具危險性的攻擊，就如他們誘使佛教徒親手去搗毀寺廟的偶像一樣，他們也試圖使天主教徒親手去搗毀教會的精神建築，使教會的聖統解體，斬斷同羅馬宗座聯繫的鎖鍊。

這樣的目的自然得細心喬裝起來，否則便要立即遭受教會人士的拒絕。但馬列主義的信徒為散播分裂的種子，布置了有效的辦法——辯證法。若能使教徒互相告發政府加給他們的罪名（特別是帝國主義），不但他們互愛的鎖鍊要斬斷，良心要被攪亂，就連教會內部的分裂也是輕而易舉。於是向教徒宣布說：「教會的本身必須革新，教徒應清除隱藏在其中的帝國主義分子。」為實現這項原則，外籍主教、神父必須先驅逐出境，「他們是隱身在羊羣中的豺狼，帝國主義的工具，他們在教會的掩護下，進行他們間諜和破壞的工作。」凡拒絕合作的神父或教徒，都應視為「帝國主義的走狗」而先加以清算。這樣一來，教會便徒具虛名，成了政府手中宣傳的工具，日久便會自行消滅了。

這就是「三自運動」（自治、自養、自傳）的目的，為欺騙沒有經驗的頭腦所精選的名詞，因為該項名詞的本身，可給予很正確的解釋。這項辦法，在一九五〇

年先向基督新教開刀，於是便有了各種名稱互不相同的教會。他們的組織本來就不及天主教的健全，致使這種陰謀很容易實現。一個基督新教的領袖吳耀宗與共產黨妥協，甘作政府的馬前卒，首先對自己的同道倡行了三自運動，其實是蹂躪了自己的同道。

一九五〇年末，政府認為已到了對天主教下手的時期，卻找不到一個有影響力的人物發起這項運動，於是便改用欺騙的手段。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新華社」乃發表了一篇消息：「廣元（在川北）五百多名教徒宣言，贊成教會革新的三自運動，絕不容許聖潔的教會再被帝國主義玷汙利用……」然而這項報導是真的嗎？查廣元堂區以前幾乎不為人知，教友一共不到一百名；宣言上說：十一月三十日會議，一致熱烈擁護。事實上到會者只四十人左右，其中十五名是孩童，大部分是尚不懂事、不會講話的小孩。會議時將政府擬好的宣言當眾朗誦了一遍，要求眾人簽名，大部分人都不明白內容究竟是什麼。當該本堂區神父王良佐發現他的名字被人冒用刊登在報端時，立刻擬就更正啟事，要求報社如實刊登，他的要求當然未被接受。中共所製造的「三自運動發起人」是假的，可是三自運動在各處發起的消息，報紙上層出不窮的報導，他們以為神父和教徒被捏造的消息所騙，必將羣起響應。

鬥爭教廷公使及董世祉神父在重慶的信仰宣言

實際上，神職界和教友對施予他們的壓迫都一致地奮勇抵制，而對他們的狡猾宣傳自然也有人上當。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立即致書全國主教，請他們提高警覺。這正是政府所期待的機會，以便打擊教宗代表，將他驅逐出境——當時黎培理公使已被中共軟禁在公使館內（一九五一年六月）——但為配合中共的戰術，政府願教徒們自動攻擊他。於是各地開會、上書、請求政府驅逐「帝國主義者黎培理，天主教愛國運動的破壞者」。

據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報載：昨日（三日）天主教徒在重慶開大會遊行，大喊驅逐黎培理的口號，其他教會也有人參加；並說在參加的人中有一位不在會的四川籍神父，名叫董世祉。這個消息使人十分驚奇，因為董神父是教務協進會的一員，他對教會的堅貞不移是人所共知的。

事實是這樣的：董神父固然參加了遊行的行列，但晚間在主教大堂前開會，中共代表和副主教相繼演講，要求驅逐黎培理時，他忽然從人羣中擠出，登上講臺，發表了一篇演講，真如青天霹靂，給了中共一個莫大的打擊。他先堅定沉著地畫了一個十字聖號，呼求耶穌聖心、聖母、聖伯多祿、聖保祿之後，向「毛主席」像和

各位首長一鞠躬，開口說道：「各位首長、神長、有信德的教友，各位來賓，我今天的講題是：兩全其美，自我犧牲。不承認有天主、有靈魂，也不承認耶穌的代表——教宗，與天主教聖統的人們，把『三自運動』講成純愛國運動，雖說承認天主教的信仰自由，雖說天主教教友與教宗有純宗教的聯繫，但是脫離了聖統的『三自』，今天要我們攻擊教宗的代表黎培理總主教，明天就會要我們攻擊耶穌的代表——教宗，後天豈不是要我們攻擊天主了？哪怕理論上可以把它分裂了來攻擊，但在實際上，天主是一個，教宗是一個整體的人，而教宗的代表也是一個整體的人，因此這樣的『三自』與天主教自己的『三自』，實在無法結合。」他見幹部們出其不意地未加干涉，便繼續說道：「而且我只有一个靈魂，不能分作兩分，只有我的身體才是能分割的。更好把我整個的靈魂獻給天主，獻給教會；而把我的身體獻給國家，粉身碎骨在所不辭。為不信有靈魂而只說有身體的唯物論者，邏輯地講，應該滿意我這種奉獻了吧……」

「我是一個中國天主教教友，我要愛國又要愛教會。一切違反國法或教規的事，當然乾脆拒絕，尤其是不作從中挑撥的事。但是政教兩方，如果不能諒解，中國教友早晚是活不成的。不如趁早獻出自己的生命，促進雙方的諒解。誰不接受這個請求，就表示誰拒絕了解，拒絕和平。想政府不致堅決地要逼我們三百七十萬名中國

教友沒有生路吧！……」⁹

他一講完，在場的人，無論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或佛教徒，均報以熱烈的掌聲。一位手無寸鐵只靠真理的天主教神父，竟敢面對著大權在握的人，高聲宣布他心底的思想。這次大會使組織它的人感到非常尷尬；一星期之後，那些因怯懦或因政府的虛偽宣傳，誤信可以搞三自運動的人，都公然表示了懺悔；尤其是重慶的副主教，六月十日在明供聖體之前，以全體神職界的名義，當眾朗誦悔過書。董神父在七月二十二日被捕，以後便消息全無了。但他這輝煌的榜樣，堅強了人們的勇氣，此後誰也不能再心存幻想。政府所提倡的三自運動，同天主教的道理水火不容，它要導致一個與羅馬分離的裂教！

鬥爭聖母軍

教友們競相傳閱董神父的信仰宣言，他使他們自豪且又增加了勇氣；他們實在需要勇氣，因為反宗教的鬥爭尚繼續不停。政府現在又開始鬥爭聖母軍，在天津特別劇烈；隨後發覺組織中心在上海，便決心予以粉碎；為了幾百名聖母軍團員，全城動員起來，報紙、廣播電臺、展覽、開會，一齊進攻，弄得雞犬不寧，想不到有多少公務人員致力於這個特殊工作，期待著聖母軍悔悟，也就是說，準備承認聖母

軍是一種反革命的帝國主義組織；聖母軍團員給勸他們示弱的幾位神父，寫了一封用血簽名的信，說明他們絕不承認那些玷辱聖母軍和教會的罪名，要至死對聖教會效忠。大無畏的上海主教龔品梅，鼓勵他們堅持這種態度。

張伯達神父之死

正在這樣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某日在教友中傳遞著一個消息說：「張伯達神父死了」。張伯達是徐匯中學的校長，素有學養，是上海婦孺皆知的，深為人所敬愛。一九五一年春天，政府召集私立學校校長開會，當時正在進行「三自」運動，伯達神父在開會時演講說明主教的立場，講得淋漓盡致，贏得全場如雷的掌聲，這是共黨絕不能容忍寬恕的；張伯達雖然賦性仁厚，態度和藹可親，但如觸及良心問題，他卻絕不肯屈服，於是在八月九日被捕。那時他正當壯年，健康甚佳；他受了怎樣的酷刑？我們只能揣測；正所謂鋼鐵意志，威武不能屈也。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警察交出了一具枯瘦乾癟的屍體，令人無法辨認，若非由一顆金牙辨認出來，誰也不相信那是張伯達。這個消息一經傳出，教友們的激動，簡直無法形容。警察怕教友有所反響，把他們誣的「罪人」，表揚成光榮的英雄，於是勒令悄悄地將他埋葬。然而全上海每座天主堂，無視警察的威嚇，紛紛舉行大禮彌撒，帝王堂且舉

行紅色十字架彌撒，祭臺上滿供紅花，彌撒後且齊聲高唱〈謝恩經〉，青年都為他帶孝；男青年佩黑袖章，女青年頭戴白花；人人面上所表現的，不是悲痛失去了一位敬愛的神父，乃是殉道者的弟兄所感受的光榮。

對聖母軍的鬥爭，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收了兵。除極少數的例外，男女青年並沒有氣餒；政府只得承認失敗。

驅逐外籍教士

一九五一年九月政府認為時機已成熟，乃下令驅逐教廷公使出境。他像一名罪犯一樣被押送至香港。遭受這樣待遇的不只他一人，因為政府已下定決心，要清除所有的外籍教士。但為符合它的戰術，絕不願扣以傳教的罪名，卻要教徒控訴他們，令他們自認危害國家，在宗教的外衣下搞間諜的勾當，作美帝的工具，破壞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的仇敵，醜惡的罪人，外披羊皮內藏狼心；這是他們一再叫囂的控訴。為了逼供，不論是洗腦、日夜不停地疲勞審訊甚至酷刑，無所不用其極。雖說他們不願見殉教者，主教神父因受刑而死者卻比比皆是：例如廣東梅縣瑪利諾會的福主教（Mgr. Ford M.M.）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被捕，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去世；濟南總主教楊恩寶（Mgr. Cyrillus Jarre），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被捕入獄，時已高

齡七十六，受折磨後不支，送入醫院，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逝世。直至將斷氣時，警察尚不停地提出種種問題來折磨他，最後他說：「我要到墳墓裡去答覆你們。」他去世的消息一傳出，闔城及附近敬愛他的教友，齊來為他送殯。人們給總主教入殮時穿的是紅色主教祭服；一名叛徒去向警察告發，說紅色表示死者為殉教者。警察立命將死人掘出，剝去紅色祭服，易以囚犯的衣服。羣情大譁，誓死反對這種侮辱，致使警察不得不讓步；最後乃換穿白色祭服埋葬。警察雖盡力找麻煩，這樣的殯儀對附和革新運動者實在是奇恥大辱。

教友們拒絕附和對傳教士們的誣讟控訴，不少的中國神父和教友，為了不肯違反良心而喪失了生命；因此為完成驅逐外籍教士的陰謀，竟拖延了那麼久，真是中共政府始料未及的。既然無人控訴，當局便轉而改用其他辦法：為了教他們無法生活下去，斷絕了同他們的一切來往，連替他們賣東西以維持生活也不許，這樣他們便不得不自動請求離境了。他們也往往組織公審，教人提出最荒謬的控訴；最令人痛恨的是對育嬰院的公審鬥爭：修女們收養的棄嬰，往往進育嬰院時已奄奄一息，有人卻控訴修女屠殺成百成千的嬰兒。但如何證明呢？到育嬰院的墓地去挖掘，不是白骨累累嗎¹⁰！

一九五五年末，留駐中國的外籍神父、修士、修女尚有六千人上下，均以各種

方式被迫出離中國。一九六六年只剩下九位方濟聖母傳教會的修女，她們獲准居留，是因為她們在北平有一所學校，專收外交團的子女；現在連這一小撮人他們也不能容忍了，雖然她們只求老死在她們所選擇的第二祖國也不能，終於被紅衛兵粗暴地驅逐。此時除了華理柱主教（Mgr. James Walsh M.M.），在中共區內連一名外籍傳教士也沒有了；華理柱主教至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已滿七十六足歲，當初他被判二十年徒刑，仍在獄中。

試圖給中國找一位教宗

在獄中的外籍傳教士早已看出，當他們被迫離境時，他們的痛苦也就算完了；至於中國的主教、神父卻不那麼簡單，他們或是違反良心同共產黨妥協，最後走上裂教之途；或是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受更大的壓迫、坐監、受死，並且權位愈高，受苦也愈大；因為政府已看清，倘若沒有一位主教出頭領導運動，成立與羅馬分裂的教會的企圖絕難實現，於是便想用誘騙的手段達成他們的目的。一九五一年，他們看中了南昌的總主教周濟世，想擁立他為中國教會的教宗。一位高級幹部到南昌去見他，向他說：「我看主教才德兼優，聰明能幹，何不出來發揮一下帶頭作用，領導進步的教徒？我們願擁立你為中國的教宗。」「你認為我有資格嗎？」「當然

有！」於是主教幽默地答道：「假如你們有法子使全球天主教會承認我是教宗，我真有意搞一下，這樣對我們中國也有面子；只作中國教會的教宗實在不過癮。」共產黨絕不甘受這樣的奚落，數月之後，周總主教和教區的神父便受了兩個月的洗腦教育，嗣後更受人民的公審，並警告他要同梵蒂岡斬斷「政治的關係」。他回答說：「根本沒有這樣的關係，你教我怎樣斬斷呢？這就如同要求一個從未結婚的人辦理離婚一樣。」他也拒絕成立一個純天主教的組織，以便從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為什麼專向天主教徒要求這事呢？如果他們是良好的國民，根本不需要這類的組織；假如政府認定他們不是良好國民，這對我們教區的教友是絕大的侮辱。」這一下更激惱了共產黨，於是聲明他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而將他銀鐐入獄。教區的人非常愛戴周主教，這樣可惡的宣判真是中共的恥辱；這次公審，使那些對三自運動尚存幻想的人，因而大澈大悟。周主教因他對教會和宗座的忠貞，犧牲了他的性命，最後死在獄中。

愛國運動

在展開三自運動一年半以後，中國教會雖然有幾處因怯懦而讓步了，但大致都拒絕與基督的代表斷絕關係；政府雖竭盡一切努力，總未能建立一個全國性的革新

中心；它已承認失敗，於是聲言不再提三自運動，但鬥爭絕未中止。接著提出的第二個口號是「愛國愛教」運動（好像天主教徒不知怎樣愛護他們的教會一樣！），雖然他們用種種欺騙的言詞，目的總歸是一樣的：設法毀滅各教區的教團。為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先使他們與世上有形的領袖——教宗分離，因此成立了許多「愛國協會」。為了引誘神父、修女、修生和教友們加入，簡直無所不用其極：宣傳、威脅、利誘、開討論會等，更番利用；誰敢為真理辯護，便加上「國家敵人」的罪名；隨後便是洗腦，無盡無休的上課、開討論會、小組會，有時一連幾星期、幾個月；用坦白、整風、公審疲勞而嚴酷的手段，壓迫神職界和教友們加入。

雖然用盡了各種壓力，仍未能達到目的，尤其是上海的教團，在賢明而堅決的龔主教領導之下，堅守著純宗教的崗位，樹立了輝煌的榜樣。宗教事務部的專員對公教青年瘋狂地施以再教育，想改變他們的頭腦，結果他們的工作被青年們粉碎了；城內各本堂區的教友急忙學習禮儀，熱烈聽講教義，他們感覺有更加明瞭自己勇氣的需要。

政府對天主教的抵制既不能說服，威脅又無用，一九五五年九月便決心予以公開打擊；光是兩夜（即九月九日和九月二十六日），在上海一地，除龔主教外，又逮捕了三十多位神父，三十八位修生，五位修女和數千名教友；幾天以後便知其中

十七人已被槍決。在中國唯一還有上課的徐匯神學院也遭關閉，地址改為再教育營。其他城鎮的副主教、神父和教友大批大批的被拘捕；只在那兩夜，總共便有三千名教友在監獄失蹤。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政府的壓力下，在北京召開了一次「天主教愛國大會」，由瀋陽總主教皮漱石擔任名譽主席，他當時正在獄中，特為此被釋放前來。實際上是由宗教事務部人員主持。大多數參加大會的代表雖然反對，大會仍發表了攻擊教宗的宣言。

自這時起，又發生了許多新的暴力，冗長的討論會，甚至選舉和祝聖不合法的主教等新花樣，源源而出。客觀地說，這樣的選舉祝聖都是不合法的，因為與聖教會的立法不合，且違反教宗的旨意¹¹；何況往往並非教區主持無人，那些教區的主教或合法代理人尚健在，只是已被驅逐或在監獄內受苦，或因某種原因被阻不能執行職務而已。我們對在鐵幕內經過的事情，消息太不靈通¹²，無法明瞭那些選舉的真相。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猜測，必定有非人的壓迫，才達到了那樣的結果；而且誰也不會懷疑，中國的神父和教友衷心依戀基督、祂的聖教會和祂在世的代表；有那麼多熱愛他們的祖國，並在他們的信仰中找到愛它的更高尚理由的人，在不斷的逮捕、坐牢和強迫勞動營中失蹤了；他們的善表和他們默默的祈禱，支持著中國的教

會與基督的奧體保持聯繫。

教宗與中國

教宗對中國教會這些悲慘的動態，常密切地注視著；他也不斷呼籲全球教友祈禱犧牲，以支持中國的弟兄們忍受考驗。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教宗碧岳十二世致函〈我們切願聲明〉（*Cupimus imprimis*）給中國神職界和信友，讚美、鼓勵且指導他們。一九五四年十月七日，教宗又在《致中華民族》（*Ad Sinarum gentes*）通諭中，再度讚揚中國教友，並譴責三自運動；他提醒人們注意：誰也不會相信教會是為給某一強權服務；同樣，誰也不能向它強求，破壞它的創立者耶穌基督所制定的統一，在各國另行建立與伯多祿的首座分裂的教會。凡這樣作的教團，就如由葡萄幹上砍下來的枝子，必將自行枯槁，絕不能結出救靈的果實。最後碧岳十二世於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宗徒之長》（*Ad Apostolorum Principis*）通諭中，對試圖在中國建立與羅馬分離的教會，表示悲傷；他相信當光明之日重新照耀時，教友的痛苦和眼淚以及殉道者的苦刑鮮血，都是教會復興的種子。

傳教帳目的一篇總結

兩千多年前，基督曾吩咐祂的宗徒們說：「你們到普世給所有的受造物宣傳福音！」在最近這一百五十年間，傳教士的努力究竟怎樣？福音真的傳到了所有民族的面前嗎？

一九五一年，教宗碧岳十二世在《致中國教會》通諭中，曾為其之前的二十五年結了一下帳：一九二六年有四百個傳教區，其中教友總數不到一千五百萬，幾乎所有教區的領袖都是外國人；二十五年以後，傳教區超過了六百個，教友的數目是二千八百萬；八十八個教區已委任本地人管理。

從那時起，新的進步也有記載。自從亞洲許多國家被赤化以後，非洲的進步，給人以強烈的印象。天主教在非洲，在一百多年之間所造成的形勢，已可同教會初興時在羅馬帝國內三個世紀所造成的形勢相媲美了。自梵二大公會議以來，天主教的大公無私才充分地表現出來。出生在亞非二洲的主教竟有一百六十多位了，他們和東方禮的主教們，在教會的中央羅馬，同樣是大公會議的代表，誰看見這個場面會不感動高興呢？可見教會絕不單是西方或白種人的教會！光他們這樣在場，便足以表示有些事情變了，聖教會的大公，不再只是一種許諾，卻已成為鐵一般的事實。

這是說「給普世傳福音」已接近完成的階段了嗎？不但沒有，而且適得其反，甚至應該說不認識基督的，現在比已往任何時期都多。實際上，當我們說教友的數字增加時，不要忘記世界人口的數字同時也在增長；自二十世紀初葉以來，人口同物質進步的速度，尤其是醫藥衛生進步的速度，同樣的愈來愈快。一八八〇年世界人口是十三億二千五百萬，天主教教友則是二億一千一百萬；一九六四年呢，世界人口已超出三十億，而教友不過增至五億七千五百萬。如果把東正教徒和基督教徒也合在一起，則是十億；然而尚有二十億人未信仰基督。在非洲教友數字的增長在近代可說是無比的驚人，但教友與人口的比例也只是一比五，而且皈依的人愈多，新生教會的困難也愈大：神父太少，又得照顧日益增多的教友，又得向同樣增多的外教人傳福音。在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亞洲，教友（菲律賓除外）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自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以來，福音傳播的速度，無疑已是歷來最快的了，但還無法看出，什麼時候才能普世完全皈依；在將來的歲月中，教友同人口的比例，大概也要減低。全球的教友應當體會這些事實，庶幾能激發他們傳播福音的熱誠。

註釋

1 徐德新得以到達他工作的崗位，且能在那裡居留，足以證明他堅決的毅力，實不尋常。他在一七七五年首次來到中國，在由澳門潛入四川的中途，曾兩次遭逮捕留難，他終於脫逃了；一七八四年再次被捕，且被解至北京；倘他留住北京，便可邀得釋放，但他寧願被驅逐出境，遣送回歐；五年之後他又潛入四川。一八〇〇年被祝聖為主教，一八一五年被捕斬首。

2 在被驅逐出境的傳教士中有兩名遣使會會士古伯察 (Huc) 和賈伯特 (Gabet)，他們經過蒙古、甘肅而抵達西藏的拉薩 (一八四六年)；在拉薩住了六星期又被驅逐，終於抵達澳門。古伯察描寫這次行程，真是美麗如畫；譯成了多國語言，一時膾炙人口，引起了許多人對中國傳教的興趣。

3 此款載於法文條約內，中文則無；此問題後經中法兩國政府折衝協定 (一八六五年及一八九五年)，始告結束；其特點為：傳教士所購買之財產，應成為各該地方教會之公產。

4 這和當時基督新教所用的方法大不相同。留駐在中國的第一位牧師是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於一八〇七年來華。在北京條約簽訂以前，他們只蟄居在通商口岸，絕不外出冒險；他們散發聖經和其他宗教書籍，傳布基督的思想；及至准許在內地傳教，他們便努力或以書籍或以輸入西方的知識，協助建設近代的中國。為此，他們也不重視天主

教所辦的初級小學，卻盡力增設中學大學；尤其注重建設醫院和醫科學校。所以基督新教的傳教中心多在都市城鎮，天主教則多注意鄉間和農村的發展。

- 5 在這無數的被害人中，有一小夥可以就目睹的人確切證明他們真是為了信仰而致命的，教宗碧岳十二世將他們列入真福品；在漢中和太原殉教的三位主教、五位方濟會神父、七位方濟聖母傳教會的修女、五位修生和九位教友，於一九四六年列入真福品；克勒西（*Alberico Crescivelli PIME*）在陝西殉教，一九五一年列入真福品；在直隸獻縣教區殉教的有四位耶穌會神父，五十二位年齡和身分不同的男女教友，於一九五五年列入真福品，其中一位十四歲的少女——王亞納，生前即志行純潔，德行不凡，真不愧稱為「中國的聖雅妮」。

- 6 六位中國主教：察哈爾宣化主教趙懷義，河北蠡縣主教（後改安國）孫德禎，江蘇臺州主教胡若山，湖北蒲圻主教成和德，山西汾陽主教陳國砥，江蘇海門主教朱開敏。

- 7 我們可提供一本標名《愛的考驗》的中文書籍，其中記述不少這類的事蹟，作者是竺禎宇，一九五七年光啟出版。

- 8 寧夏主教王守禮（*Mgr. Van Melckebeke*）曾聲明過他對三自的解釋：如果「自治」是說教區應歸本地主教主持，那正是聖教會自教宗本篤十五世及碧岳十一世以來所期望達到的目的；倘同教宗斷絕關係，那便不再是「公教」（天主教的另一名稱）了；自養和自傳

是地方教會所致力理想，當某處教團已充分發展，用不著其他教團的輔助時，便自然會實現，根本不需要一個自稱無神的政府越俎代庖來決定；誰能禁止同一信仰的弟兄們互助呢？假如「自傳」是說各地教團應自行決定講什麼教義，那是絕對不能接受的；然而這卻是政府的用意所在。

9 宣言全文見《愛的考驗》八十六頁。

10 關於這段歷史的「實錄」，可參閱光啟文化出版的《湘西風雲路》——幾乎以日記的方
式，詳述湖南省沅陵教區的遭遇。

11 不能說在教會初興時，主教由地方的神職界和教團選舉的例子，尚可實行；因為由教會合法的權威很久以來所制定的規矩，不准由下級人員隨意改選，也不能以需要有人照顧人靈為理由自選主教。因為這樣破壞教會的法律，顯然不是為了供給教友的心靈需要。

12 直到一九五五年，凡自中共地區驅逐出來的神父及修女，對他們所知大陸的情形，常有消息帶出；這些消息的來源現在已枯竭了，幾乎只有共產黨報紙所刊載的消息可以傳出，誰也知道這樣的報導，甚難分辨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虛偽的宣傳。

第二十八章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壹 若望廿三世：大會開幕（一九五八）

若望廿三世的膺選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全球樞機的祕密會議，要給去世的碧岳十二世選一位繼位人；第三日下午三分之二的多數票終於開出；一位樞機照例出現在聖伯多祿大殿的陽臺上，給鴿候的羣眾報告選舉的結果：「我給諸位帶來一個喜幸的消息：我們已有了一位教宗，就是隆嘉禮樞機（Card. Roncalli），他取名若望廿三世。」

像這樣不同的人物相繼領導教會，真是少見；身體方面的對比已足以驚人了：碧岳十二世瘦長，若望廿三世則圓胖。他們兩位的出身也有強烈的對比：前者是羅馬的貴族，後者則和聖碧岳十世一樣，出身義國北部的農家，而且子女甚多又貧窮：

在這清苦而衛生的生活中，養成了非常健壯的體格。他雖已七十七歲，精力卻還充沛，不過那樣的高齡，自然預警他在位的期間不會太長。當時且流行著這樣的話：碧岳十二世長期在位之後，新教宗不過是過渡的教宗罷了，強大的人物之後，也需要小人物來緩衝一下。若望那種謙遜樸實，很容易使人有這樣的看法：他要以他那微笑和人所共知的幽默，將教會放寬，以便大事發揮。

很少有人猜想得到，正是這位教宗要發動這一世紀中教會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但當若望廿三世回憶自他晉鐸後那五十八年的歲月時，能看得出他的整個一生，便是天主安排好為準備這件大事。他剛讀完神學，便被任命為他的故鄉——柏加摩（Bergamo）總主教的祕書；他有十年之久分擔著這位司牧的操心和工作，參加了牧靈的職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以隨營司鐸的身分，在戰場和醫院，經歷了戰爭的恐怖，學會了愛護戰鬥人員，不管他們隸屬哪一方。以後在近東作了二十年宗座代表，先在保加利亞，後在土耳其和希臘，由此對東正教獲得了深刻的認識，同時在心中產生了熱烈的希望，願為所有的基督徒合一而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混亂期間，他擔任著宗座駐法大使，操練外交的本領。最後升任威尼斯宗主教，得以發展他那牧靈和治理教會的天賦才能。

在這一切職務中，隆嘉禮樞機表現了他那「和事老」的性格，寧願和解，不願紛爭（雖然當天主的利益受損時，他也會發怒）；他那慈祥、樸實和細膩的仁愛，為他贏得了眾人的心，無論是國家元首也好，或最貧窮、最被遺棄的人也好。

在作教宗的期間

數世紀以來，教宗聖座的四周便顯現排場，有時未免過分；若望廿三世卻一變而為樸實謙遜的作風，真是名副其實的「天主的眾僕之僕」。那些不合時宜的排場和繁文縟節逐漸取消了；以歌唱〈信經〉代替了教宗進聖伯多祿大殿時的歡呼，他寧願步行，也不願高坐在轎椅上被人抬著。

對其他事情，他也毫不遲疑地予以革新。自三世紀以來，樞機的人數已固定為七十位；若望使這個數字大為增加；升任非洲黑人為樞機是他的創舉，並升任馬尼拉的總主教桑道斯（Mgr. Santos）為菲律賓第一位樞機。

宣布召開大公會議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若望廿三世膺選後才三個月，便首次宣稱他有意召開大公會議。這是在聖保祿大殿宣布的；他是為結束「合一週」而去訓話，並為「偉

大的中國」(他這樣稱呼)念了一端經。在禮節結束時，他召集御前會議的十八位樞機開祕密會，交給了他們三種草案：一個是羅馬教區會議，一個是大公會議，一個是重訂教會法典。最使人吃驚的是第二項，他們是以極度的驚奇而予以接受的。

這項決定是誰也想不到的，不但是因為它出自一位人們以為是「過渡的教宗」，而且來勢突然；更是因為自前四世紀脫利騰會議以來，只開過一次大公會議——就是一八七〇年開的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而那次會議卻宣布了教宗不可錯誤的神權。從那時以後，許多人士，連天主教人士也不例外，認為此後已沒有再開大公會議的必要：既然教宗能單獨決定，何必召集全球的主教呢！不是多此一舉嗎？(事實證明這是一種誤解。)何況從那時起，聖教會並未面臨任何真正的異端，也沒有什麼重大的變故，何必驚動全教會！？

若說教宗剛即位就要召集大公會議，未免使人驚奇，連教宗自己也感覺有些奇怪，那是他自己承認的：這個思想並非來自默想深思，「乃是一種前未料及的意外衝動，就如預報春來的一朵早開的花一樣」。教宗認為是聖神的靈感。但召開大公會議的目的是什麼呢？所有以前的會議都有對異端邪說的詛咒譴責。若望願這次會議沒有這類的譴責；它要是一種實用性的會議，而非宣布教義的；他為說明它的性質慣常用的一句話，就是「提出來討論」，使教會適應時代的情形，並使教友的一

切活力復興起來。教會先把以前愁眉蹙額的面孔掃除淨盡，對分裂的弟兄姊妹顯示一種更吸引他們的面孔；大公會議要給那「共成一棧，共屬一牧」的日子鋪路，儘管那個日子距離尚遠，我們仍熱烈期待著。

改造中的世界

這次大公會議，出乎意料之外地符合了急切的需要。聖教會雖非對付任何指定的異端邪說，但也從未像這次這樣被徹底討論過；它所面臨的世界好似已不需要它了，可是它應當找到它所處的地位。

我們試向世界看一眼：它自上屆大公會議（一八七〇年）以來所有的變化，實在比自教會開始至該會議開幕時所有的變化還大；汽車的發明還沒有一百年，飛機和無線電廣播剛剛六十年，太空飛行尚不及十年，電的利用也不過一世紀，原子的運用才二十來年；以前的世界很安定，或者說進化很慢，繼之而來的，則是一個進步愈來愈快的世界。這樣的情勢，自然要求教會有同樣愈來愈快的適應。

這種戲劇性變化的動力就是科學和技術的進步。科學在各方面，把生活、工作以及貿易的方式都改變了。技術呢，也使現在的人普遍希望更幸福的生活，人文也要成為道德的最高標準。然而這種進步，也隨著欺騙和威脅俱來；生產雖然增加，

還有很多的人吃不飽，國際間的不平等從來沒有這樣巨大；原子能量的使用，使文化受著迅速而全面毀滅的威脅。

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對人生命的影響，雖然不是那樣戲劇性地顯著，然而卻更深。抗生素的發明，使治療法起了變化；每個文明人的生命可預期延長一倍，今日已超過了七十歲。此後世界人口增長的速度要加強，幾十年間恐怕要增加一倍。技術改變了物質生活，也改變了思想方式：已往世界是靠傳統的寶藏生活，那是一代代逐漸積累的；現在卻靠報紙、廣播和電視馬上傳播給普世的新聞和活動而生活。

社會生活也在改變；都市因吸引鄉村的人口而時時在膨脹；人與人和國與國互相依存的關係也日益增長，人文的一致也愈來愈緊縮；這是一種進步，但這種進步也顯示許多矛盾；這是世界團結的時代，但也是國家主義加劇的時代；是容忍、自由、民主和擺脫殖民主義的時代，但同時也是暴力、洗腦的心理酷刑、極權和變相奴役的時代。

至於聖教會，她的情勢也很奇特；她的活力和聲望無疑地比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時大得多，從那時起，在傳教區實現了很大的進步；在老教友的國家，優秀分子也更接近她了。但另一方面，大批的羣眾卻同她距離更遠了，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活在無神主義的政府之下，同教會割斷了一切接觸。

這就是這次大公會議所面臨的史無前例的事實：科學和技術的文化固然奇妙，但失掉了平衡，是在啟示的影響之外產生的；聖教會能接受它，使它純潔化且基督化，而不讓信德的寶庫變質嗎？

《慈母與導師》通諭

若望廿三世在召集大公會議以前，乘《新事的》通諭七十週年之便，在他那《慈母與導師》的通諭中，已談到社會生活的幾個嚴重問題。最使讀者驚奇的，是其中的人情味：人在那裡找不到什麼抽象的理論；教宗所注視的是人，是血肉的人，他是理解 and 同情研究人的問題。

教宗提示了他的前任良十三世、碧岳十一世和碧岳十二世對這個題材所給的教訓之後，隨即以簡明的語氣——好像一點也不覺得問題有什麼複雜——提出了時勢演變所要求的正確性和補救的方法。人們尤其理會這位義大利的農民之子，是以多麼適當和熱烈的心情，談論現代農民的地位所有的問題。最後教宗觸及恐怕是他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在經濟已經發展的國家和經濟正在發展的國家之間的問題，前者已在享受高度生活的水準，後者則受著嚴重缺乏的痛苦」。教宗說對營養不足的民族人人有責，他呼籲國際間的合作。就如良十三世在一八九一

年曾保護無辜遭受貧困的無產階級羣眾，若望廿三世也同樣替現在被迫處於惡劣情勢的民眾辯護。

在《慈母與導師》通諭中，顯示了作者的人格，他那牧靈的熱誠和他的樂觀，不但是教友，連所有善意的人，都表示最熱烈的歡迎。

大公會議的籌備

兩千多人共聚一堂，討論最重要的問題，倘若沒有長時間又細心的籌備，絕不能獲得預期的結果。這項籌備需要三年半的繁重工作：把諮詢書先給所有的主教、大使、公使、各修會總長以及各公教大學寄去，邀請他們坦白地貢獻提議。把所收集的資料先分門別類地整理好，然後交給由樞機、主教和各國按照他們專長所遴選的專家和神學家所組成的小組委員會；各委員會再就所陳述的提案製成草案，準備提交大會的會員們討論。

出席人員

大會於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在聖伯多祿大殿開幕。歷屆的大會，從未像這次這麼多人。有投票權的會員，即樞機、主教、修會總長、隱修院院長，共二千九百

零八位。當然，有些因為年紀太大、健康欠佳或其他政治情事未能出席；不過出席的人數常在兩千以上，平均是二千二百人。最堪注意的是，從來沒有像這次大會這樣完美地表現了聖教會的普遍大公；不但是足以代表東方教會的宗主教和主教們全體出席（安提約基雅的宗主教馬克西莫四世〔Maximos IV〕，雖已高齡八十五，曾發表了數次卓越的演講），而且歷史上第一次，不但有傳教的主教，且有多位本籍的樞機和主教，代表遠東和黑人的非洲出席大公會議。

為了使主教們更無拘無束地自由討論，教宗不親身出席一般的討論會，只以電視追隨著，很審慎地領導著議程；只是在必要時，為避免僵持不下的關頭，他才出面干涉。也有許多普通教友列席，不過沒有投票權。在第一期集會時，若望廿三世以個人的名義邀請了法國哲學和著作家讓·圭同（Jean Guilton）列席參加。嗣後保祿六世也請了另外十位教友，以旁聽者的身分列席。旁聽者的數目不斷增加，自第三期開會以來且有女性；在大會閉幕時，計有四十六位男女列席旁聽。此外，自第三期會議的中途，有三十六位本堂神父和十位修女也應邀參加；甚至有幾位教友（其中一位屬非籍）和幾位本堂神父曾應邀在大會中發表演論。

代表分離教會的觀察員也應邀參加；在第三節中再為詳述。

歷屆大公會議，所有參加會議的人，對討論的一切問題皆應嚴守祕密：第一是

怕被沒有充足能力的人誤解，其次是為避免大會受外來壓力的影響。人們萬想不到這次竟能面對全世界公開討論如此重要的問題。大會開幕時也曾有過保守秘密的規定，但經驗很快地便證明了，在這到處充斥新聞報紙、無線電廣播和電視的世紀，簡直無法保守秘密。因此自第二期集會以來便取消了秘密，並且每次會議以後，便把簡要的消息通知新聞記者。因此，世界輿論每天都能注視著大會的過程和變化，這也足以表現人們關心這項世界的重大事件。

大會第一期

歷屆大會都是針對一定的問題而召集的，在討論時所應遵循的步驟，都已事先劃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卻非如此，它的目的是「提出來討論」。

在籌備期間所收集的大批資料，小組委員會已予以修改整理，作為討論的基礎，各種不同的資料已彙為七十種草案，資料仍嫌太多，而且系統不夠清晰。對這樣龐大的項目如何著手？如何運用？在兩千多人的會議中，怎樣能讓每個人有發言的自由而能避免嘵嘵不休的危險？否則，豈不要拖長一世紀嗎？而且對顯然無法解決的問題如何答覆？以上都是許多會員們所焦慮的。

教宗若望曾想應該有所行動，終會找到應遵循的途徑。他本人先選了一個開會

討論的主題：禮儀草案；這是一個最實際的課題，似乎不致遭遇困難的爭辯和反對；但在討論的過程中，很快便發現，當討論到問題的深處，不能不觸及教義的問題，例如主教們的權限，教友在教會所處的地位等。光明逐漸來到，這得歸功於孟第尼樞機（Card. Montini）（未來的教宗保祿六世）和比國馬連的總主教孫南樞機（Card. Suenens）。許多認為混淆不清的問題，當歸併為決定性的程序：大會應准許教會藉信德的光明，確定它的性質和使命；另一方面應認可如此革新的教會，同今日的世界及其重大問題，應如何應付，例如信仰的自由、和平、貧窮與飢餓以及人身的尊嚴等；這就是大公會議的深刻靈感：教會先說明自己的立場，然後同教會以外的人商談，這是給此後各期工作指定方向的兩個關鍵。

《和平於世》通諭

大會第一期閉幕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尚未批准任何公文。教宗希望大會於來年結束，不見得能實現。教宗繼續領導大會的艱巨工作，並在休會期間繼續在小組委員會內工作。除此以外，教宗若望仍有餘力來撰寫《和平於世》（*Pacem in Terris*）通諭，並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公布。這道通諭的對象，一反慣例，並非單給教內人寫的，乃是給全世界的一封公開信，向所有善意的人發表的一篇談話。

言詞簡明。教宗發揮這個題目說：全世界所希望的和平，應以真理作基礎，以正義為規範，以愛為動力，以自由為養成所。從來沒有一位教宗，在全球各處，引起過這樣一致、有力的反應。

教宗若望的逝世

這道通諭彷彿教宗的遺囑一樣，因為他虛弱已極，幾乎飲食不進；延致五月底，諸醫束手，回天乏術。全世界以激動的心情注視著他的彌留。教宗真是贏得了眾人的心，無分種族與信仰，人人愛戴。在他彌留期間，他強忍著痛苦，為大公會議的成功和人類的和平奉獻了他的生命，他對環繞病榻的人友愛有加，一直為世界的大問題祈禱著。一九六三年六月三日，當無數的羣眾正在聖伯多祿廣場參加為教宗舉行的彌撒時，這位以「善良的教宗若望」永留史冊的老人，便安然長逝了。他在位的日期雖是二十世紀的教宗中最短的——只有四年零七個月，但結的果實卻不少。其他教宗逝世，普世教友哀悼，他卻無疑地是第一次有基督新教徒、東正教、猶太人以及無信仰者同聲哀悼的一位教宗，大家一致地由衷分擔著羅馬教會的悲傷。我們分離的弟兄之一（阿特那哥拉斯〔Athenagoras〕宗主教），曾以福音上的話貼合在他身上說：「曾有一人是天主派遣來的，他名叫若望。」（若一6）²

貳 保祿六世及大公會議圓滿閉幕

保祿六世

召開大公會議的教宗去世，產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按照教會的法典，主教們倘若不與教會的有形領袖——教宗聯合在一起，不能組成大公會議。教宗一去世，會議馬上停止，繼任的教宗有重開或斷然關閉的自由。在選舉教宗的祕密會議中誰將占上風？是深怕若望所發動的革新運動的人呢？還是對大公會議懷著無限希望的人呢？誰將繼承若望廿三世的職位？

六月二十一日——即選舉會的次日，樞機們便選出了若翰·孟第尼為教宗，他取名保祿六世；當時人便曉得了教宗若望的事業絕不致中斷，因為孟第尼樞機早已表示過，他希望眼見大會圓滿閉幕。

新教宗一如他的前任若望，一八九七年生於義大利北部，對他的使命可說是天主早已安排好了。他曾在教廷任職達三十年之久（自一九二四至一九五四年），最後作了碧岳十二世最親密的助手，所以他完全認識羅馬統治機構的每個齒輪和它的一切問題。但他在盡治理教會的職務時，並沒有忘記諸事之先他是一位司鐸：只要

他的職務許可，他便每天去羅馬的一個本堂作彌撒聽告解；同時還是大學生們的指導司鐸。一九五四年被任命為米蘭的總主教；他領導著這個大教區展開了偉大的活動，還常盡力同各階層的人——連分離教會的人也不例外——保持著接觸，尤其對工人特別關心。在米蘭，他為盡教宗的職務獲得了最有用的牧靈經驗，尤其是為好好地領導若望所希望的「牧靈大公會議」。

在籌備會議和開第一期會議的期間，孟第尼樞機就擔任著重要的角色；他那高度的智慧，已分辨出應把大堆的提案資料，編組成中心思想。若望在去世的前兩天，最後一次接見在羅馬的樞機們時，親口向孟第尼樞機說：「我把教會、大公會議以及世界的和平，委託給你。」

繼續召開大公會議

新教宗在他膺選的次日向全世界致詞時，便聲明他在位的主要事業是繼續召開大公會議；他也要為民族間的和平和基督徒的統一而致力工作。這就是若望廿三世所立的目標，現在很顯明的是，他所創的事業不致中斷了。

我們不擬在這裡描述大會在後三期中的變化，那對圓滿結束也是很要緊的（自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四日；又自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一

日；再自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至十二月八日）。絕不可認為，主教們一到達羅馬，便對展開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會立刻一致同意。聖教會對信條，固然是命令所有的子女們全心信服，但對其他事項，卻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絕大自由。幾乎在討論的一切題材上，常有爭辯，有時甚至爭得面紅耳赤；有的希望革新，其他人（有少數的所謂保守派，奧大維尼樞機〔Card. Ottaviani〕是最顯著的代表）深怕試圖革新會危及信德，給異端邪說敞開方便之門；不過所謂兩派都是熱心衛護真理和聖教會的益處的，每人都為此貢獻自己的力量。雖有對立爭執，但都同意修改條文，有時原提案的面目完全改變，並且大會的決議案幾乎一致接受；這證明已獲得了全教會的同意。

大公會議的第一個好處，就是把全球各地、各國、各民族的信徒，無論行東方禮或拉丁禮，都聚在一起對質；他們私下接觸和全體會議時一樣，大家交換意見，彼此詢問，都能增長自己的見聞。有些主教的知識，以前只限於自己的教區和國家，現在認識了其他各洲的問題；他們對世界的眼界拓寬了，也更加體會到自己原是整個教會的一分子，以及向全世界傳布福音當負的責任。

大公會議的一覽表（綜合報導）

呈交大會討論的一切資料，最後彙編為十六種草案。在這冗長的文件中，主要

的幾點是一切都向著教會的中心思想集中，大會基本的文獻是教會憲章《教會憲章·萬民之光》（*Lumen Gentium*），它給教會本身的性質下了定義。《天主啟示的教義憲章：天主的聖言》（*Dei Verbum*）是啟示的憲章，因為教會是建立在天主的啟示上的。其他論禮儀、主教、司鐸、教友、修道院、天主教教育、修會會士、傳教、東方教會等文獻，陳明了教會及其機構的內部革新。

另有一系列文獻證明教會對她以外的所有人類都關心，對天主教教徒、非基督徒、不信者，甚至全世界，都敞開了商談之門。

我們不擬分析一切文獻的內容，只簡短地把比較突出的指出便夠了。

教會憲章

就如一個人雖然不曉得生物學的規律，但能生活得很健康，同樣聖教會對自身的性質沒有思考以前，已經生活了很久而且很壯大了。神學家們，尤其是基督新教改教以後，對這層思考和分析深深地下了一番工夫：基督教徒推翻了教會的聖統組織，否認教宗的首位，不承認教會是一個有形的組織。天主教的神學家，以聖羅伯·白敏（St. Robert Bellarmine，或譯羅伯·博敏）為首，曾努力反駁那些錯誤，並證明基督在世上建立了一個有形的教會，她在世的領袖，就是繼承聖伯多祿職位的羅馬

主教；這是一種必要的反應。但因強調這些真理，遂致把教會無形的但卻同樣基本的一面，雖說不是忘記了，卻是過分忽視使它晦暗不明了。

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已經開始辯論關於教會本身的道理；但因政局的關係，使大會未能充分準備，便結束了它的工作。只把關於教宗，包括確定他不可錯誤的神權的那一章，加以討論並投票通過了；有關主教的那一章——那正是為說明教宗不可錯誤的神權所不可少的——卻未暇討論；致使教宗的神權特別突出，主教們的職務和地位好像淹沒消失了。《教會憲章：萬民之光》，將教會的問題通盤處理，確定了正確的比例。它提示教會諸事之先是一個超自然的實體，對我們常顯得神祕。為描寫它，引用了聖經的各種象徵：教會是天主的子民，是牧棧，是羊羣，是天主的葡萄園，是基督的神妙身體。對上屆大公會議所確定的道理一毫也沒有削減，只是把主教的職務充分說明了。主教由祝聖禮領受司鐸的完滿秩位，以及教誨、聖化、治理的權柄。主教不只在本地區內行使這些權柄（雖然教宗有權限制行使），另外同教宗聯合在一起的主教團，能對全教會行使最高的權力。這個最高的權力固然以隆重的方式在大公會議內行使，但當教宗認可主教們的聯合行動時，也能由教宗和散處在全球的主教們行使。

為實行這個原則，產生了兩個新機構：一是主教會議，即一國或一個地區的主

教們共同開會，商討有關該國或該整個地區的問題；一是教宗保祿六世所建立的主教諮議會，開會時由教宗或他的代表出席，為贊助教宗對全教會行使他的職權。這個諮議會的會員，大部分由各處主教開會選舉，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於羅馬開了第一次會議。

這次大公會議的一種新決定，是恢復六品制。六品已因習慣只成了邁向司鐸聖秩的一種過程；由於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主教們的請求，大會決定恢復六品為一種永久性的階級。地方的主教會議可以開會決定，為人靈的利益制定這樣的六品是否適宜，然後請求教宗批准實行。六品可付給已婚的成年人，或付給有志的青年，但未婚的青年仍不准結婚。六品的職務是：給人付洗，送聖體，以教會的名義給人證婚，講道，領導教友行敬禮和祈禱，主持喪葬等禮。

禮儀憲章

《禮儀憲章：神聖的公議會》（*Sacrosanctum Concilium*）是革新禮儀的憲章，更恰當地說，是將拉丁禮儀教會已廢弛的古禮再予以恢復實行。原則是領導教友更完美、更主動地參加禮儀，並使禮儀適應地方的情形和各民族的心理。無需敦促，新禮儀已普遍實行起來；最使教友興奮的是在禮儀中使用本地語言，不過還有其他改

革，比如恢復「共祭」，就是多位神父圍繞著一個祭臺用同一聖爵同時行祭；這更能表現司祭秩的單一性（教宗、主教、神父都是分享基督的唯一大司祭秩）。還有在特殊的情形下，准許教友兼領聖體聖血，這也是恢復古制³。

自脫利騰大公會議以來，教會普遍的現象，是大權愈來愈集中於聖座，而且在拉丁教會內紀律和禮儀也力求一致。這次大會推翻了這種傾向，這由恢復主教們的權限和創立主教會議可以看得出來；它特別為禮儀，建立了變換花樣的原則，這與信仰的一致並無抵觸。

與全世界敞開商談之門

大會的召開是為革新，不是為重複已規定的事項，但也萬萬不可認為，因為這幾點改革，大公會議以後的教會，便同往日完全不同了，絕對不會。建立在基督身上的教會，根本常是一樣；大會並非把已往的鉅光，只是使教會更符合福音，並按照福音去生活而已。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與以往最不同的是，給教會以外所有的人敞開了商談的大門。幾乎所有以前的會議，都對錯謬的道理予以譴責。這次會議，遵照若望廿三世的願望，未譴責任何人，真稱得上是一個「商談的會議」：轉向外面，邀請所有

不是它子女的人來同它商談；先邀請那因對基督救主有共同信仰，同它更為接近的，那就是「大公主義法令」；然後邀請那些至少同它共同相信一個全能天主的人，那就是教會對基督宗教以外的宗教所應持的態度。這個宣言不提彼此不同之點，乃是尋找彼此接近之點；「天主教絕不屏棄任何宗教所揭櫫的真理與神聖性，卻由衷地尊重各宗教行動與生活的諸般措施，以及其規律與理論，雖然這些觀點及訓誨與聖教會所持所教的不同，但也往往提供普照全人類的真理之光」。商談的條件，是每人能隨從他良心的呼聲，那就是「宗教自由宣言」了。

最為人所周知的文獻，恐怕就是《喜樂與期望》那個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的憲章了；它在一開始便明白揭示了它的目的和精神：「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是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也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凡屬於人類的種種，在基督信徒心靈內，莫不有所反映……因此，教會深深感到自身和人類及其歷史，有著密切的聯繫。職是之故，大公會議在深加探討了教會的奧蹟後，不獨向教會的子女及信仰基督者致辭，而且也毫不猶豫地向整個人類講話，以期闡明教會寄居並活動於現代世界的意義。」

憲章描述了我們這個時代在各方面所產生的重大變化以後，證明人類尊嚴的基礎，是因他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並由基督的寶血所救贖的。它又分析無神主義

的原因，證明這個世界既能毀滅，所以它的開始存在和完結絕不在它自身。但教友絕不可因期待來生，便不關心這世界的文化，反而應當振作精神去研究；因為雖然世上的進步，與基督神國的進展不同，但對天主的國卻有很大的幫助。

在憲章的第二部分，藉由福音和人類經驗的光照，它提醒人們注意我們這個時代幾個特別迫切的問題，這些問題關係人類至巨，就是婚姻、家庭、文化、社會、政治生活，以及各民族的團結與和平。最後它號召大家互相商談合作，以達成建立世界和平的目標。

保祿六世與世界開誠相見

教宗保祿對與世界開誠相見一節，躬親踐諸實行。當他對大會宣稱，他有意去參加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孟買舉行的國際聖體大會時，使大會非常驚異。同年年初，保祿親赴耶路撒冷朝聖，是兩千年來第一位離開歐洲的教宗，但那還是伯多祿的繼位者去基督生活和受難的聖地；這次去印度，卻是到一個教友尚居少數的國家，不是有招致其他國家不滿的危險嗎？

實際上，教宗深知印度人是最虔誠的民族，他們視教宗到他們之中去作客為無上的光榮。當教宗下機去巡視城中最高貧陋的街道時，不只是三十萬名天主教友

友和政府首長，連所有的人民都給他以該國史無前例的歡迎，民眾熱烈的程度真是始料所不及的。估計有一百萬名各種信仰的人夾道歡呼，歷久不衰，全國熱情沸騰，這是該國對獻身神明的人所有傳統的虔敬。教會對印度這史無前例的殊遇，也寄予同情和應有的欣幸。

一九六五年十月四日，教宗應邀赴聯合國，見全球各國聚集在紐約的代表，同全世界商談今日人類所關心的種種問題：怎樣避免戰爭，確保和平？次日返回羅馬，教宗便向大會聲明：「和平的使命，從來沒有向一個更高尚、我們可以說也更愛聽的議會傳達過。教會顯示了她本來的面目——天主和世間的中介，她可以把人類最深的希望向天主傳達。由言而行的時候已經來到，從此以後我們應該更注意窮人，因為物質分配的不均是亂源，且可引起戰爭。這種對世界上的不公和貧窮的注意，催促著信德多做愛德服務的工作，不但在大會中討論，還要同一切民族、一切信仰中懷有善意的人，促進社交和精神的交往。」

也是這同樣的思想，啟發了保祿六世成立一個永久機構「為無信仰者的祕書處」，委任維也納主教客尼格樞機（Card. König）為主席。這樣的商談是困難的，有時幾乎不可能實現，但教會既已受命向所有的受造物宣傳福音，勢必要求她試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以便將真理也傳達給不信天主的羣眾。

參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與大公主義

若望廿三世給大會指定的目標之一，是準備實現基督的願望：「一個羊棧，一個牧羊人。」

相信所渴望的這個日子已經臨近，未免是幻想，但自教宗宣布計畫的那天起，已在這條路上邁進了幾大步，則是不能懷疑的。若望的偉大人格，他那平凡的慈祥，他那對人廣泛的理解，以及他對東方教會的認識，都大有助於創造彼此信任的氣氛，那是一切接近的先決條件。召開大公會議的預告，也喚起了非天主教徒的最大興趣。

合一祕書處

為便利彼此的接觸，教宗若望於一九六〇年六月五日成立了一個永久的機構「合一祕書處」，說明這個機構的近程目的，是協助非天主教的基督徒觀察大會的工作，更廣大的目的是協助所有基督徒走向合一：這足以證明他的經驗宏富。同時他更委任一位德籍耶穌會士伯雅樞機（Card. Bea）為祕書長。伯雅樞機曾任教宗碧岳十二世的聽告司鐸，而若望廿三世本人六個月前剛升任他為樞機。實在不能有更好的人選

了；人所周知的這個說法：「基督徒是由聖經分裂的，還要藉聖經來重新聚首」，好像是對伯雅樞機的一則預言。他是一位著名的聖經學者，曾在羅馬擔任三十年聖經講座的講師，他已準備好而且最適當不過，同基督新教的神學家開始商談。他精通多種語言，他那長足的經驗使他對這項職務應付裕如；尤其是他那敏捷的理解力和坦率的性格以及正確的判斷等才能，使他在大會中成為最受歡迎的一位演說家。他雖年已八十，活力仍很充沛。他以「合一的大使」為己任，在周遊歐洲時，對大公運動曾作過多次演講，同分裂教會的領導人也有過不少的接觸。

由他這種活力和教宗若望所贏得的普遍同情，產生了非常和諧的氣氛；其中最顯著的表示，是坎特伯里（Canterbury）總主教兼聖公會首長斐設爾博士（Dr. Fisher），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日來羅馬晉謁教宗。他雖聲明只是以私人的名義來作禮貌上的訪問，事實卻不因此而減低其重要性。自四世紀多分裂以來，這是破天荒第一次聖公會的首長來羅馬見教宗；這在幾十年前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⁴。

僵局已被斐設爾打破，隨即有許多基督新教或東正教的高級人物來訪問教宗；教廷也派遣觀察員去參加「普世基督教協會」，尤其是一九六一年在新德里召開的全體代表大會。

大公會議的觀察員

大公會議是不是會邀請分裂的基督徒，尤其兩個最大的集團——基督新教和東正教？如果他們受邀，將以什麼名義來參加呢？他們是否應邀參加？這些問題都與將來的大公運動有關。

當然不能邀請分裂的教會代表來參加大會的討論⁵，並且在邀請觀察員以前，羅馬願意知道他們是否接受邀請。事情看去似乎有些費解，東正教對信仰和教會的觀念，都比較接近天主教，但同基督新教交談卻遠比同東正教為易。普世基督宗教協會和基督新教幾個著名的大教派都派遣了觀察員；教宗若望還另外以個人名義邀請了許多基督新教的神學家。

同東正教談判更為困難。一九六一年一切東正教會在羅德斯島（Rhodes，位於希臘）開會時，他們決定採取一致的行動。但從政治的立場卻出現許多難題；因為東正教有的在鐵幕之內，有的在鐵幕之外；何況還有君士坦丁堡和莫斯科的競爭問題：前者享有精神領袖的榮譽，號稱「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阿特那哥拉斯是東正教最高權力的象徵，因此羅馬的請柬便給他寄去了。然而莫斯科的宗主教是擁有教徒最多的一個教會，它不承認君士坦丁堡的首位，而爭取「第三羅馬」的名

銜。宗主教阿特那哥拉斯本來全心接受羅馬的邀請，但直到大會的前夕，莫斯科方面始終表示不友好的態度，他因為不願破壞羅德斯島會議所議決行動一致的協定，便拒絕了羅馬的邀請。不料兩天後——即大會開幕的次日，莫斯科的宗主教所派的兩位觀察員卻抵達了羅馬。雖說是不速之客，卻給大會平添了很大的喜慶，然而在君士坦丁堡方面卻未免感覺不是滋味。不過事態並非不可挽救，因為在大會第三期一切東方教會除希臘以外，都給大會派遣了觀察員。會議第一期只有四十九位觀察員，在大會閉幕時則增至一百零三位。許多人以為開大會，只是把教廷所準備的草案稍加修飾批准通過而已；豈知卻是自由辯論，人人能發表自己的意見。觀察員自然不能參加公開討論，但私下卻能發表自己的觀感，且有小組和不少的主教們去徵詢他們的意見，無疑地因他們的在場，大會公開討論問題時多少有點顧忌，免傷感情。

保祿六世去耶路撒冷朝聖

在開會期間，有兩宗突發的事件，對與東正教的心情接近，大有裨益：第一是教宗赴耶路撒冷朝聖，第二是天主教與東正教同意撤銷雙方開除教籍令。首先是教宗保祿於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至六日去耶路撒冷朝聖。這是自教宗碧岳七世於一八〇九年被俘虜以來，教宗第一次出離義大利國境。這次是伯多祿的繼位者返回伯多祿

起身到外邦去傳教的地方，去到基督誕生和受難的白冷、納匝肋、加里肋亞湖邊和耶路撒冷。教宗在他所經過的兩個國家——約旦和以色列，曾受到當局最殷勤的歡迎和招待。約旦國王胡笙（Hussein）和以色列總統夏莎（Zalman Shazar）都在教宗抵達該兩國國境時，親身去歡迎致敬。但最感人的是羣眾難以形容的興奮。他們衝破警察的一切封鎖線，只為了能接近教宗，致使預定的禮節和演講都無法施行；但什麼樣的演講能比得上眾人的興奮更有聲有色呢！阿拉伯人也好，猶太人也好，信徒也好，都爭先恐後地一睹羅馬教宗——納匝肋人耶穌的代表——的丰采為快。

教宗一宣布他去耶路撒冷的計畫，宗主教阿特那哥拉斯便高聲說：「這是由天主來的靈感！」他立即表示願到聖地去會見教宗。他們是在耶路撒冷相見的。這一幕歷史性的照片——宗主教同教宗互相擁抱，散布到普世去了。這樣的會見已經有四世紀未曾出現了。一四三〇年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約瑟（Joseph II of Constantinople, 1360-1439）曾前往參加佛羅倫斯大公會議，並曾與希臘人共同簽署合一的協定；但當時並沒有合一的誠心，成見和仇怨也未完全消除，因此合一的簽訂只是一紙空文，並未見諸實行（參閱卷二第十章肆節）。這次的會見卻適得其反，雖明知對全面合一尚有重大的阻礙，但雙方的心情卻已接近。

絕罰的取消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即大公會議閉幕的前夕，雙方教會在和解的路上邁進了一大步：雙方同意取消一〇五四年造成東方和西方教會決定性分裂的絕罰令（參閱卷二第八章肆節）。教宗派遣了一個代表團赴君士坦丁堡，在阿特那哥拉斯宗主教和議會前宣讀了共同聲明。同時一個東正教的代表團，以梅里東（Mellion）為首，在聖伯多祿大殿參加了教宗和二十多位主教所舉行的共祭（彌撒）；在禮節進行的期間，梅里東宗主教宣讀了同樣的聲明。雖然公認雙方的分裂並未因此舉便算結束，但共同聲明承認：「這是相互諒解的誠懇表示，並共同邀請，在彼此信任、尊重和互相的友愛下，進行商談，以期賴天主的助佑，引導雙方在信德和友愛的完美融合中生活，那本是東西教會在他們歷史的最初千年中早已存在的現象。」在這項文獻宣讀後，教宗與梅里東宗主教行親抱禮，大會報以激動而熱烈的掌聲。

我們站在這段和平與諒解的歷史過程中，希望使教會悲傷的分裂早日結束。此日何時到來？誰也不能預言，因為仍有很大的阻礙；不過有一件事實是我們能確認的：即自塞魯來（Michael Cerularius）的裂教（一〇五四年）和馬丁·路德的改教以來，東正教和基督新教走上了他們同天主教愈來愈遠的路線；自大公運動產生以來，

尤其自若望廿三世即位後，他們對天主教已向復合的道路邁進；我們對完全實踐耶穌「願他們合而為一」之願望的日子，已能寄予堅強的希望。

結 論

五旬節日撒在田地裡的小小種子，已長成了參天大樹。有些帝國傾覆了，許多文化也毀滅了，教會經歷了這些危機，雖然遭受了無數的痛苦，卻屹立長存。教會自身雖常在能毀滅的文化中，卻世世代代傳達著她的創立者基督永世不滅的信息。

教會一誕生，便當從事選擇：她的創立者是猶太人，她最初的信徒也是忠於梅瑟（Moses）法律的猶太人，教會仍是猶太人的教會嗎？要成為猶太教中的一派嗎？還是要收錄外邦人呢？遲疑並沒有延長多久。聖保祿毅然決定了選擇的路線，聖伯多祿也批准了：此後已沒有猶太人或希臘人、文明人或野蠻人、自由人或奴隸的分別，人人都同樣蒙召成為天主的子民。

教會擺脫了梅瑟法律的羈絆而成長起來，在羅馬帝國中發展著；羅馬的平靜時代，讓她能夠傳播，直至西方文明世界的極端。然而福音的觀念，在許多點上是同羅馬文化的基礎相抵觸的；信徒拒絕崇拜皇帝，不承認他為良心的至上主宰，於是尼祿、戴克里先（Diocletian）等決意要消滅他們。然而殉道者的英勇戰勝了迫害者的

暴力。君士坦丁（Constantine）給了教會自由，她便在光天化日下成長發展起來。她在前期的大公會議中與異端邪說奮鬥，確定了基本信條。教父——那些無與倫比的大思想家，在古代的文明中，把那能歷久不變的成分吸收了。

但日爾曼、匈奴、斯拉夫等蠻族由各方來侵，希臘羅馬的世界便崩潰了。在當時西方人的眼裡，在羅馬帝國之外無所謂文化。教會也要隨著它消滅嗎？許多人懷著這樣的憂慮。可是教會的眼界並不那麼短淺，她不相信羅馬一亡，其他一切都算亡了；她對人類並不失望，她應付著所經歷的種種變故，深知自己永久的使命，毫不畏縮地去和蠻族接觸。

結果如何呢？蠻族征服了羅馬和皇帝，然而教宗們的羅馬卻歸化蠻族，且使他們接受了文化。這當然需要時間，也遭受了許多損失和危險。回教徒的進侵淹沒了北非的一切教團，他們豎起了一道不能逾越的壁壘，阻止教會向東方發展，達數世紀之久。東方教會自幾百年以來便同西方愈走愈遠，終於一〇五四年斷然脫離羅馬。教會在西方也幾乎被封建勢力所奴役，幸賴教宗國瑞七世解放了她。在十二、十三兩個世紀，中古時期的文化達到了最高峰：西方普遍接受了基督宗教的信仰，公私生活都瀰漫著信徒的精神，教會領導著創立大學，像教堂等藝術的傑作，都是受她的靈感而建造的。她還栽培了許多聖人——新修會的創立者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聖道明 (St. Dominic) 等，還有博學聖師像聖道茂和聖文德 (St. Bonaventure)，以及聖君賢王如法國國王聖路易 (St. Louis)。所有西方國家雖有他們種種的不同點，但在教宗的最高領導下，卻都認為他們形成了一個大團體。

然而不久中古的天主教團體便崩離析了，原因是歐洲各國都愈來愈羨慕獨立自主，互相爭雄；西方大分裂時，幾乎認不清哪一位是聖伯多祿的真正繼位人了，於是大大地減低了教宗的權威。人們的思想也大變，那就是所謂的文藝復興——文明的出奇繁榮；同時又受了發現新地的刺激，尋獲了新大陸和從未認識的文化，這是對希臘羅馬古典傑作的加深研究，以及印刷術的發明所促成的結果。基督宗教的教義注重來生，異教的觀念認為人的最終目的就是世間的幸福，因此二者勢同水火，不能相容。可是不能像教父們那樣，借用古代更豐富和更美好的方式，發揮基督宗教取之不竭的底蘊嗎？任令文藝復興的強有力運動來衝擊教會嗎？教宗們沒有這樣想。尼閣五世 (Nicholas V, 在位期間 1447-1455) 卻試圖領導這個運動把它納入正軌。他們並不憎厭學術的發明和繁榮，他們認為只是用得不得其當而已；他們願意利用它來光榮天主，救人靈魂。

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而且頗具危險性；為使古代的文明同基督宗教的文明互相調和，大費周章摸索試探，而且往往過分。在抱持人文主義者中，有不少人受了

異教思想的傳染，導致道德的墮落。在這個艱巨的時期，尼閣五世的繼位者，糾纏在俗事中，雖然能維持「信德的寶庫」未受損傷，但對自己神聖的使命只是聊以塞責而已，對全世界所期待的教會內部革新，未能採取主動。於是馬丁·路德奮起；可惜他未做到革新，卻煽起了宗教的離叛，使北歐的大部分同羅馬分裂了。

其實天主教已著手革新，古老的修會也在重新整頓，新的也正在創立；傳教士也隨著發現新地的人去開教。教會在脫利騰大公會議中，在一切爭論之點上確定了她的教義，銳意進行紀律的革新。大批的聖人，其中有教宗、主教、修會的創立人或改組者，努力將會議的議決案付諸實施，教會重新振作了她的毅力。

不料又湧來一股思想的逆流，起初尚忸怩作態，隨後便大張旗鼓，不是攻擊某端信條，卻是攻擊教會的本身；一種新的世界觀出現了，堅持應把它建立在科學上，想把一切神祕逐漸使之消失；基督宗教的啟示被陰險地攻擊，列為古老的傳奇小說。有人相信進步是無止境的，認為人的本性是徹底善良的，長久被壓制的衝動應當予以解放。伏爾泰和盧梭自稱是這新福音的先知，不料結果卻促成了法國大革命的浩劫。革命的浪潮衝擊著顯然已經動搖的教會建築。拿破崙失敗後，浪潮便退了，人們很驚奇地看見教會仍屹立不搖；教會成了唯理派輕視和譏嘲的目標達一世紀之久，又一次證明了她的生命力；她雖然在物質方面顯得貧困了，卻以更大的毅力重新拾

起了對遠方的傳教事業；在這個工業的新時代，走在前面。一位天才的教宗——良十三世，對他所處的時代有廣泛的理解，他為使教會的永恆道理適應新時代，做過很大的努力。他在混亂的時期中，早已看出極權政府的誕生和世界大戰。碧岳十一和十二世把教宗的聲望提升得極高。

然而在我們眼中，世界不止一次改變了面目。技術的文化，傳遞的新方法，改變了生活方式，連由新思想所創造的在內，強令全世界接受；原始文化的國家，竟在一代內，一變而為原子時代的國家。人能改造自然、創造財富，有幾乎無限的新能力。然而在富庶的民族和貧窮的民族之間的偏差，卻從來沒有這樣大過；只需幾個人發瘋，馬上便可引起史無前例的原子毀滅戰。在好多的人心中，虔誠的不安已經消散無餘，不是不信有神，便是對宗教漠不關心。

在這千變萬化的世界上，我們多次看不出有什麼嚴重（正是：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原因是我們相處得太近，反而熟視無睹了。若望廿三世的真知灼見卻分辨得出這是「時代的標誌」。教會應使她的機構和方法，適合社會的新組織，她該給那些在黑暗中摸索尋找光明，以及在個人和民族間嚮往更大正義的人，指示應走的道路；她對尋求合一的基督徒，無論他們屬於哪個教派，應當對他們的嚮往有所答覆。若望廿三世，那般溫文和善的一位老人，誰也沒想到他竟有那樣的

毅力召開大公會議，他的左右幾乎都認為太冒險。教會在分裂的弟兄姊妹和全世界的眼前，給自己下定義，改革禮儀，同分裂的弟兄姊妹，同非基督徒，甚至同連天主是造物主都不信的人，大膽地敞開了商談之門。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教會的歷史上，也要像脫利騰大公會議一樣，畫一個新時代嗎？我們交給將來的時間去說明吧。因為會議不是終點，乃是起點。就歷史的教訓我們可以預先看出來，天主教要面目一新，不過常是同樣的天主教；就如一棵枝葉繁生的樹，過了每個冬季以後，便要結新的果實。暴風雨能摧殘它，枝葉能枯乾或者脫落，新芽又長出來，然而常是同樣的樹；同樣，教會雖經歷年代的變化，都仍是那個建立在磐石上的教會；她的創立者基督向她許下了：「我同你在一起，直至世末。」

註釋

- 1 其實若望的兩位前任——碧岳十一和十二世，都曾有過召集大公會議之意；碧岳十一世在他第一道通諭中便曾提過；他們兩位也都為此事徵詢過他人的意見，而且做過準備工作，只是時局阻礙他們實現而已。
- 2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教宗保祿六世在致大公會議的一篇演講中，為答覆眾人的請求曾宣布，碧岳十二世和若望廿三世列真福品的案件即將進行。
- 3 在拉丁禮教會內，直至這次大公會議，只有神父能領聖血，這也是習慣使然。當初教友們是兼領聖體聖血的，東方禮教會一直保存著這種習俗。不過聖教會常堅信，餅酒二形並沒有把耶穌的聖體分開，餅酒二形下，都有耶穌的全體。在西方，單領聖體的習俗，是由十二世紀至十四世紀行開的，這是為了實際的理由：即方便、乾淨利落、節省時間。十五世紀胡斯（John Huss）的門徒妄言兼領聖體聖血對救靈是必要的，那是很大的錯謬邪說（參閱卷二十第十章參節）。為了避免袒護這種錯誤，康士坦斯（一四一五年）及脫利騰（一五六二年）兩大公會議才不准教友領聖血。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有此禮儀的改革，並未改變教義，只是認為現在誤信那種邪說的危險已不存在了。
- 4 當時誰又想得到，五年多以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斐設爾博士的繼位者：藍西博士（Dr. Ramsey）竟亦來訪教宗若望的繼位者，而且這次是以聖公會代表的資格作正式

5

的訪問。這當然還不是合一，嚴重的阻礙尚存，不過至少在愛德內的商談之門已經敞開了。在羅馬教廷，人們還記得當一八六九年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召開時，在羅馬所發生的事情。它曾邀請同宗座沒有往來的東方禮所有的主教，勸他們同羅馬言歸於好，他們能同其他的主教一樣來參加會議。對所有的基督新教徒及其他非天主教徒，也一併致函邀請他們同天主教恢復關係。這些邀請都引起了不友好的反應；就大公運動來說是一次完全的失敗。顯然地，倘若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仍以同樣的詞句發出請柬，也不會有較好的結果：

人名中文索引

三畫

于斌 293,295

大德蘭 St. Teresa of Avila 219

小德蘭 St. Thérèse of the Child Jesus 139-141,264

四畫

公保尼 Comboni 226

公勃 Combes 112-113

公撒味 Consalvi 42

孔德 Auguste Comte 96-97,119,128

巴本 von Papen 163-164

巴塞里 Pacelli 164,175

文德 St. Bonaventure 349

方濟 St. Francis of Assisi 348

方濟·薩威 St. Francis Xavier 140,250,256

比約 Pie 93

比諾 Noël Pinot 36

王守禮 Van Melckebeke 316

王良佐 301

王亞納 316

五畫

- 代古爾丹 Decurtins 119
加里波底 Garibaldi 86
加富爾 Cavour 86
加斯巴利 Gasparri 151
包爾達 Portal 194-195
包囊 Bonnard MEP 248
古伯察 Huc 315
史特勞斯 Strauss 98,131
史達林 Stalin 51,182
尼祿 Nero 179,347
尼閣五世 Nicholas V 349-350
布倫特 Charles Brent 196-197
弗海伯爾 Faulhaber 164
弗戛匝勞 Fogazzaro 120
本篤十四世 Benedict XIV 293
本篤十五世 Benedict XV 146-149,151,167,212,214,216,28
7-289,291,316
札里高 Pauline Jaricot 210
瓦特生 Wattson 199
甘地 Mahatma Gandhi 245,265
甘迺迪 J.F. Kennedy 231
田耕莘 215,290

皮漱石 311

皮爾 Peel 61

六畫

伊（主教）Imbert 261

伊曼紐爾 Victor Emmanuel 85-86

伏爾泰 Voltaire 27,54,111,206,350

列寧 Lenin 51,146,170

吉瓦奴加 Kiwanuka 224

多林格 Döllinger 59,130

多默（宗徒）St. Thomas the Apostle 250

成和德 289,316

朱開敏 316

米開蘭基羅 Michelangelo 54

西彼連 St. Cyprian 217

西門 Saint-Simon 81

七畫

亨利四世 Henry IV 109

伯多祿 St. Peter 88,198-199,302,312,334,339,344,347,349

伯勞西 Perosi 137

伯雅 Bea 341-342

伯爾納德 Bernadette Soubirous 134,142

伯鐸·尚耐 St. Peter Chanel 243

- 佛朗哥 Franco 171
- 佛蘭克 César Franck 137
- 克勒西 Alberico Crescitelli PIME 316
- 利瑪竇 Matteo Ricci 271,273,280
- 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348
- 吳經熊 295
- 吳耀宗 301
- 希特勒 Hitler 146,161-166,174,176-177,202
- 李文斯頓 Livingstone 223
- 杜邦魯 Dupanloup 90,93
- 汪勞松 Van Rossum 287
- 沃婁 Louis Veuillot 93
- 沙維豪 St. Dominic Savio 138
- 狄托 Tito 178
- 良十二世 Leo XII 261
- 良十三世 Leo XIII 64-65,82,100,102-103,105-106,108,110
.112-114,116,119,127-128,150,153,157,193-194
- 良·哈爾美 Leon Harmel 119
- 貝第讓 Petitjean 259

八畫

- 亞爾伯·得蒙 Albert de Mun 119
- 亞爾豐索十三世 Alfronso XIII 170
- 佳琳·拉布萊 Catherine Labouré 132

- 依沙貝拉 Isabella 77
周雅各 261
周濟世 308
孟高維諾 John of Montecorvino 273
孟第尼 Montini 329,331-332
尚巴拿 B. Champagnat 142
拉米耶 Ramière 131
拉亨納 Lagrené 274
拉高爾代 Lacordaire 56,71-74,124,128
拉崗熱 Lagrange O.P. 131
拉梅內 Lamennais 55-56,71-73,106
拉斐爾 Raphael 54
拉維熱利 Lavigerie 221-223,225-226
明命 Minh-Mang 251-252
明治天皇 Emperor Meiji 260
林則徐 273
法柏 P. Faber 64
法蘭西斯一世 Francis I 31
法蘭西斯·若瑟一世 Francis Joseph I 76
祁朗緒 Dom Guéranger 126,136-137,188
臥各桑 Vogelsang 119
金安德 262,265
阿格利伯 Gregorio Aglipay 257
阿特那哥拉斯 Athenagoras 330,343-346

九畫

- 保祿 St. Paul 48,88,186,199,211,220,271,286,299,302,321,3
39,344,347
- 保祿六世 Paul VI 202,221,224,327,329,331,336,339,340,3
44,353
- 保祿·瑪納 Paolo Manna 211
-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271
- 咸豐 275,278
- 哈利法克司 Lord Halifax 194-195
- 威廉(荷) William 75
- 威廉·皮特 William Pitt 38
- 客尼格 König 340
- 思道四世 Sixtus IV 88
- 思道五世 Sixtus V 117
- 查理曼 Charlemagne 43-44
- 柯圖烈 Paul Couturier 200
- 洪秀全 275
- 約瑟 Joseph II of Constantinople 345
- 胡若山 316
- 胡笙 Hussein 345
- 胡斯 John Huss 353
- 若望 St. John 63
- 若望廿三世 St. John XXIII 108,193,201,215-216,319-321,

325-327,331-332,337,341,347,351,353

- 若瑟二世 Joseph II 125
若翰·衛雅 St. John Mary Vianney 123

十畫

- 俾斯麥 Bismarck 109-110,162,241
剛伯達 Gambetta 100
剛恆毅 Costantini 288-291,293
夏多布利昂 Chateaubriand 54,68
夏莎 Zalman Shazar 345
孫南 Suenens 329
孫德禎 289,316
庫克 Cook 239
徐光啟 278
徐德新 John Gabriel Dufresse 268,271,271,315
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38,40,42-46,48,53,69,74,86,93
,114,120,206,261,350
拿破崙三世 Napoleon III 93,111,222
格拉西亞 Gracias 250
格萊斯 Görres 58
格魯阿爾 Grouard 233
桑道斯 Santos 321
紐曼 John Henry Newman 60,62-65,68,119,130,194
索特婁 Calvo Sotello 171

- 袁在德 271
- 郝夫包爾 St. Clement Hofbauer 58
- 馬立雍 de Marion-Brésillac 221
- 馬克西莫四世 Maximos IV 327
- 馬克斯 Karl Marx 81,99,111,119,130,154,159,172,250
- 馬寧 Manning 64,119
- 馬賴 St. Auguste Chapdelaine 276
- 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315
- 高刀藍高 St. Joseph Cottolengo 138
- 高林 Colin 142
- 高特萊 Gautrelet 133
- 高萊第 St. Maria Goretti 138,142

十一畫

- 乾隆 269
- 偉斯曼 Wiseman 64,68
- 勒南 Renan 98,119,130-131
- 國瑞七世 St. Gregory VII 109,348
- 國瑞十六世 Gregory XVI 73-74,84,208,212,248
- 康熙 270,273-274
- 張大鵬 271
- 張伯達 305
- 梅里東 Méliton 346
- 梅瑟 Moses 347

- 梅謝 Mercier 131,155,195,287
梯瑞爾 Tyrrell 120
畢學源 Pires Pereira 271
紹治 Thieu-Tri 252
莫勒 Möhler 59,130
莫萊諾 Garcia Moreno 78
陳國砥 316
陸伯鴻 293
陸徵祥 295
陸德 Al. de Rhodes 251
麥爾米勞 Mermillod 119

十二畫

- 傑倫 Jerome Bonaparte 44
凱特萊 Ketteler 59,82,109,119
喀爾文 Calvin 63,256
富高 Charles de Foucauld 190,192,228
斐理·乃立 St. Philip Neri 64
斐設爾 Fisher 342,353
斯代比納克 Stepinac 178
斯坦萊 Stanley 223
斯麥特 de Smet 231
普勞 Miguel Pro 169
普魯東 Pierre Proudhon 81

- 曾國荃 275
曾國藩 275
湯若望 Adam Schall 271,280
華理柱 James Walsh MM 308
華盛頓 Washington 65
閔真諦 Mindszenty 178-179
隆嘉禮 Roncalli 319,321
雅物艾 Anne Marie Javouhey 218-220

十三畫

- 嗣德 Tu-Duc 252
塔伊基 Anna Taigi 138
塞勒 Sailer 58
塞魯來 Michael Cerularius 346
奧力振 Origen 217
奧大維尼 Ottaviani 333
奧考乃爾 O'Connell 61-62
奧斯定 St. Augustine 217,235,271,278
奧薩南 Ozanam 57
慈禧 283
楊恩賚 Cyrillus Jarre 306
溫陶爾 Windthorst 109
葉名琛 276
董文學 Gabriel Perboyre 271

- 董世祉 302
董福祥 282
該爾博 Querbes 142
賈伯特 Gabet 315
賈勞 John Carroll 65-66
賈萊 Calles 169
賈爾定 Joseph Cardijn 154-155,202
賈藍 von Galen 165
路昂加 Charles Lwanga 224
路易 St. Louis 349
路易十六世 Louis XVI 25,27-28,32
路德 Luther 63-64,196,346,350
道尼奧老 Toniolo 119
道光 269,274-275
道明 St. Dominic 349
道茂 St. Thomas Aquinas 105,130-131,349
達尼爾 Daniel 63
達伽馬 Vasco da Gama 217
達彌盎 Damien 243-245
達彌謝 Emilie Tamisier 132
雷鳴遠 Vincent Lebbe 285-288,291,293-294

十四畫

- 嘉勒 Don Carlos 77-78

嘉慶 269-270

瑪加利大 St. Margaret Mary 133

碧岳六世 Pius VI 25,38,39-40,45,65,124,206

碧岳七世 Pius VII 40,42-45,47-48,50,206-261,344

碧岳九世 Pius IX 64,69,70,76,78,82,84-89,91-92,102,113,
131-132,151,201,212,259

碧岳十世 St. Pius X 102,113-118,131,136,146,150,153,187,
199,212,265,272,319

碧岳十一世 Pius XI 51,87,121,137-140,149-153,157-162,
164-167,169-173,175,183,201,211,213-216,234,264-265,288-
289,291,293,316,325,353

碧岳十二世 Pius XII 118,134,164,175-176,180-182,185-
188,202,215,220,224,229,243,265,290,312-313,316,319-320,
325,331,341,353

福（主教）Ford MM 306

福庇詹森 Forbin-Janson 211

維辛斯基 Wyszinski 179

蒙大郎白爾 Montalembert 71-72,74,82

蒲賽 Pusey 62-63,194

趙奧斯定 271

趙懷義 316

十五畫

劉方濟 Francis Clet 271

- 劉保祿 271
劉達徙 271
墨索里尼 Mussolini 87,146,151,159-162,166,174,176-177
德天賜 Adeodatus 270
德日進 Teilhard de Chardin S.J. 186
德宗（光緒） 277
德波那 de Bonald 68
德鄔斯特 Joseph de Veuster 244
德蓮索非 St. Madeleine Sophie Barat 128
撒爾托 Sarto 114
樂道爾 Retord MEP 252
樊國樑 Favier 285
熱瑪 St. Gemma Galgani 138
衛納爾 Théophane Vénard 253
黎伯滿 Liberman 220-221
黎培理 Riberi 290,295,302-303
黎奧保一世 Léopold I 75
黎萬 Lievens 249

十六畫

- 盧梭 Rousseau 27,51,79,350
穆利 Murri 120
篩肋 Shell 120
鮑思高 St. John Bosco 128-129,136

鮑朗 Boland 287

十七畫

彌勒·希爾 Mill Hill 232

戴克里先 Diocletian 347

戴來郎 Talleyrand 30,32

戴維德 Armand David 280

邁斯特爾 Joseph de Maistre 55,68

十八畫

藍月旺 John of Triora 271

藍西 Ramsey 353

十九畫

瓊斯 Spencer Jones 199

羅文藻 264,285

羅西 Rossi 85

羅伯·白敏 St. Robert Bellarmine 334

羅伯斯比爾 Robespierre 29,35

羅依西 Loisy 120

二十畫

蘇德布隆 Nathan Söderblom 196

二十二畫

龔品梅 305

二十四畫

讓·比加 Jeanne Bigard 211

讓·圭同 Jean Guitton 327

人名英文索引

A

- Adam Schall 湯若望 271,280
Adeodatus 德天賜 270
Al. de Rhodes 陸德 251
Alberico Crescitelli PIME 克勒西 316
Albert de Mun 亞爾伯·得蒙 119
Alfronso XIII 亞爾豐索十三世 170
Anna Taigi 塔伊基 138
Anne Marie Javouhey 雅物艾 218-220
Armand David 戴維德 280
Athenagoras 阿特那哥拉斯 330,343-346
Auguste Comte 孔德 96-97,119,128

B

- B. Champagnat 尚巴拿 142
Bea 伯雅 341-342
Benedict XIV 本篤十四世 293
Benedict XV 本篤十五世 146-149,151,167,212,214,216,
287-289,291,316
Bernadette Soubirous 伯爾納德 134,142
Bismarck 俾斯麥 109-110,162,241

Boland 鮑朗 287
Bonnand MEP 包囊 248

C

César Franck 佛蘭克 137
Calles 賈萊 169
Calvin 喀爾文 63,256
Calvo Sotello 索特婁 171
Catherine Labouré 佳琳·拉布萊 132
Cavour 加富爾 86
Charlemagne 查理曼 43-44
Charles Brent 布倫特 196-197
Charles de Foucauld 富高 190,192,228
Charles Lwanga 路昂加 224
Chateaubriand 夏多布利昂 54,68
Colin 高林 142
Combes 公勃 112-113
Comboni 公保尼 226
Consalvi 公撒味 42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 348
Cook 庫克 239
Costantini 剛恆毅 288-291,293
Cyrillus Jarre 楊恩賚 306

D

- Döllinger 多林格 59,130
Damien 達彌盎 243-245
Daniel 達尼爾 63
de Bonald 德波那 68
de Marion-Brésillac 馬立雍 221
de Smet 斯麥特 231
Decurtins 代古爾丹 119
Diocletian 戴克里先 347
Dom Guéranger 祁朗赭 126,136-137,188
Don Carlos 嘉勒 77-78
Dupanloup 杜邦魯 90,93

E

- Emilie Tamisier 達彌謝 132
Emperor Meiji 明治天皇 260

F

- Faulhaber 弗海伯爾 164
Favier 樊國樑 285
Ferdinand Verbiest 南懷仁 271
Fisher 斐設爾 342,353
Fogazzaro 弗戛匝勞 120

- Forbin-Janson 福庇詹森 211
Ford MM 福（主教） 306
Francis Clet 劉方濟 271
Francis I 法蘭西斯一世 31
Francis Joseph I 法蘭西斯·若瑟一世 76
Franco 佛朗哥 171

G

- Görres 格萊斯 58
Gabet 賈伯特 315
Gabriel Perboyre 董文學 271
Gambetta 剛伯達 100
Garcia Moreno 莫萊諾 78
Garibaldi 加里波底 86
Gasparri 加斯巴利 151
Gautrelet 高特萊 133
Gracias 格拉西亞 250
Gregorio Aglipay 阿格利伯 257
Gregory XVI 國瑞十六世 73-74,84,208,212,248
Grouard 格魯阿爾 233

H

- Henry IV 亨利四世 109
Hitler 希特勒 146,161-166,174,176-177,202

Huc 古伯察 315

Hussein 胡笙 345

I

Imbert 伊（主教） 261

Isabella 依沙貝拉 77

J

J.F. Kennedy 甘迺迪 231

James Walsh MM 華理柱 308

Jean Guitton 讓·圭同 327

Jeanne Bigard 讓·比加 211

Jerome Bonaparte 傑倫 44

John Carroll 賈勞 65-66

John Gabriel Dufresse 徐德新 268,271,271,315

John Henry Newman 紐曼 60,62-65,68,119,130,194

John Huss 胡斯 353

John of Montecorvino 孟高維諾 273

John of Triora 藍月旺 271

Joseph Cardijn 賈爾定 154-155,202

Joseph de Maistre 邁斯特爾 55,68

Joseph de Veuster 德鄔斯特 244

Joseph II 若瑟二世 125

Joseph II of Constantinople 約瑟 345

K

- König 客尼格 340
Karl Marx 馬克斯 81,99,111,119,130,154,159,172,250
Ketteler 凱特萊 59,82,109,119
Kiwanuka 吉瓦奴加 224

L

- Léopold I 黎奧保一世 75
Lacordaire 拉高爾代 56,71-74,124,128
Lagrange O.P. 拉崗熱 131
Lagrené 拉亨納 274
Lamennais 拉梅內 55-56,71-73,106
Lavigerie 拉維熱利 221-223,225-226
Lenin 列寧 51,146,170
Leo XII 良十二世 261
Leo XIII 良十三世 64-65,82,100,102-103,105-106,108,110
,112-114,116,119,127-128,150,153,157,193-194
Leon Harmel 良·哈爾美 119
Lieberman 黎伯滿 220-221
Lievens 黎萬 249
Livingstone 李文斯頓 223
Loisy 羅依西 120
Lord Halifax 哈利法克司 194-195

Louis Veillot 沃婁 93
Louis XVI 路易十六世 25,27-28,32
Luther 路德 63-64,196,346,350

M

Méliton 梅里東 346
Möhler 莫勒 59,130
Mahatma Gandhi 甘地 245,265
Manning 馬寧 64,119
Matteo Ricci 利瑪竇 271,273,280
Maximos IV 馬克西莫四世 327
Mercier 梅謝 131,155,195,287
Mermillod 麥爾米勞 119
Michael Cerularius 塞魯來 346
Michelangelo 米開蘭基羅 54
Miguel Pro 普勞 169
Mill Hill 彌勒·希爾 232
Mindszenty 閔真諦 178-179
Minh-Mang 明命 251-252
Montalembert 蒙大郎白爾 71-72,74,82
Montini 孟第尼 329,331-332
Moses 梅瑟 347
Murri 穆利 120
Mussolini 墨索里尼 87,146,151,159-162,166,174,176-177

N

- 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崙 38,40,42-46,48,53,69,74,86,9
3,114,120,206,261,350
- Napoleon III 拿破崙三世 93,111,222
- Nathan Söderblom 蘇德布隆 196
- Nero 尼祿 179,347
- Nicholas V 尼閣五世 349-350
- Noël Pinot 比諾 36

O

- O'Connell 奧考乃爾 61-62
- Origen 奧力振 217
- Ottaviani 奧大維尼 333
- Ozanam 奧薩南 57

P

- P. Faber 法柏 64
- Pacelli 巴塞里 164,175
- Paolo Manna 保祿·瑪納 211
- Paul Couturier 柯圖烈 200
- Paul VI 保祿六世 202,221,224,327,329,331,336,339,340,3
44,353
- Pauline Jaricot 札里高 210

- Peel 皮爾 61
- Perosi 伯勞西 137
- Petitjean 貝第讓 259
- Pie 比約 93
- Pierre Proudhon 普魯東 81
- Pires Pereira 畢學源 271
- Pius VI 碧岳六世 25,38,39-40,45,65,124,206
- Pius VII 碧岳七世 40,42-45,47-48,50,206-261,344
- Pius IX 碧岳九世 64,69,70,76,78,82,84-89,91-92,102,113,
131-132,151,201,212,259
- Pius XI 碧岳十一世 51,87,121,137-140,149-153,157-162,
164-167,169-173,175,183,201,211,213-216,234,264-265,288
-289,291,293,316,325,353
- Pius XII 碧岳十二世 118,134,164,175-176,180-182,185-1
88,202,215,220,224,229,243,265,290,312-313,316,319-320,3
25,331,341,353
- Portal 包爾達 194-195
- Pusey 蒲賽 62-63,194
- Q
- Querbes 該爾博 142
- R
- Ramière 拉米耶 131

- Ramsey 藍西 353
Raphael 拉斐爾 54
Renan 勒南 98,119,130-131
Retord MEP 樂道爾 252
Riberi 黎培理 290,295,302-303
Robert Morrison 馬禮遜 315
Robespierre 羅伯斯比爾 29,35
Roncalli 隆嘉禮 319,321
Rossi 羅西 85
Rousseau 盧梭 27,51,79,350
- S
- Sailer 塞勒 58
Saint-Simon 西門 81
Santos 桑道斯 321
Sarto 撒爾托 114
Shell 篩肋 120
Sixtus IV 思道四世 88
Sixtus V 思道五世 117
Spencer Jones 瓊斯 199
St. Auguste Chapdelaine 馬賴 276
St. Augustine 奧斯定 217,235,271,278
St. Bonaventure 文德 349
St. Clement Hofbauer 郝夫包爾 58

- St. Cyprian 西彼連 217
- St. Dominic 道明 349
- St. Dominic Savio 沙維豪 138
- St. Francis of Assisi 方濟 348
- St. Francis Xavier 方濟·薩威 140,250,256
- St. Gemma Galgani 熱瑪 138
- St. Gregory VII 國瑞七世 109,348
- St. John 若望 63
- St. John Bosco 鮑思高 128-129,136
- St. John Mary Vianney 若翰·衛雅 123
- St. John XXIII 若望廿三世 108,193,201,215-216,319-321,
325-327,331-332,337,341,347,351,353
- St. Joseph Cottolengo 高刀藍高 138
- St. Louis 路易 349
- St. Madeleine Sophie Barat 德蓮索非 128
- St. Margaret Mary 瑪加利大 133
- St. Maria Goretti 高萊第 138,142
- St. Paul 保祿 48,88,186,199,211,220,271,286,299,302,321,
339,344,347
- St. Peter 伯多祿 88,198-199,302,312,334,339,344,347,349
- St. Peter Chanel 伯鐸·尚耐 243
- St. Philip Neri 斐理·乃立 64
- St. Pius X 碧岳十世 102,113-118,131,136,146,150,153,187
,199,212,265,272,319

- St. Robert Bellarmine 羅伯·白敏 334
St. Teresa of Avila 大德蘭 219
St. Thérèse of the Child Jesus 小德蘭 139-141,264
St. Thomas Aquinas 道茂 105,130-131,349
St. Thomas the Apostle 多默(宗徒) 250
Stalin 史達林 51,182
Stanley 斯坦萊 223
Stepinac 斯代比納克 178
Strauss 史特勞斯 98,131
Suenens 孫南 329

T

- Talleyrand 戴來郎 30,32
Teilhard de Chardin S.J. 德日進 186
Théophane Vénard 衛納爾 253
Thieu-Tri 紹治 252
Tito 狄托 178
Toniolo 道尼奧老 119
Tu-Duc 嗣德 252
Tyrrell 梯瑞爾 120

V

- Van Melckebeke 王守禮 316
Van Rossum 汪勞松 287

- Vasco da Gama 達伽馬 217
Victor Emmanuel 伊曼紐爾 85-86
Vincent Lebbe 雷鳴遠 285-288,291,293-294
Vogelsang 馱各桑 119
Voltaire 伏爾泰 27,54,111,206,350
von Galen 賈藍 165
von Papen 巴本 163-164

W

- Washington 華盛頓 65
Wattson 瓦特生 199
William Pitt 威廉·皮特 38
William 威廉(荷) 75
Windthorst 溫陶爾 109
Wiseman 偉斯曼 64,68
Wyszinski 維辛斯基 179

Z

- Zalman Shazar 夏莎 345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天主教史. 卷四 / 穆啟蒙 (Joseph Motte, S.J.) 編著 ; 侯景文譯.
-- 八版. -- 臺北市 : 光啟文化, 2016. 11
面 ; 公分
譯自 :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Vol. IV)
ISBN 978-957-546-856-9 (平裝)

1. 天主教 2. 歷史

246.2

105019687

天主教史 卷四

1967 年 11 月初版

2016 年 11 月八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 者：穆啟蒙 (Joseph Motte, S.J.)
譯 者：侯景文
執行編輯：黃榆評
出 版 者：光啟文化事業
地 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 話：(02) 2740 2022
傳 真：(02) 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 (戶名：光啟文化事業)
發 行 人：甘國棟
E - m a i l：kcg@kcg.org.tw
網 址：http://www.kcg.org.tw
承 印 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 話：(02) 2367 3627
定 價：3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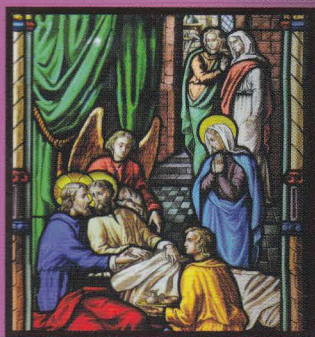
光啟書號 209002d

ISBN 978-957-546-856-9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

天主教史

/ 卷四 /



十八世紀的革命浪潮席捲了全世界，也對整頓中的教會產生了莫大的影響。科技的發展、知識領域的擴張、生活水準的提升……大大地改變了這個世界的面貌，人類的手中似乎握有無限的力量，不但可以適應自然，甚至可以改造自然。新思潮和新時代的衝擊對教會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標記，不但要順應社會的新結構，更應該為那些還尋不到光明，以及期待更大正義的人指示應走的道路。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這樣的理念下，為全世界開啟一扇交談之門，教會因著梵二產生許多變革，而會議的結束也正是另一個起點的開始。無論世界如何變化，教會永遠是建立在磐石上的教會，一切正如基督的許諾：「我同你在一起，直到世末。」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SBN 978-957-546-856-9



9 789575 468569

光啓書號 209002d

定價38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